

D691

Y648

中国私家藏书
皇家珍藏治世修身宝典

大义觉迷录

〔清〕雍正皇帝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QADS/07

897521

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义觉迷录 / (清)雍正皇帝著. —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1. 1

(中国私家藏书·皇家珍藏治世修身宝典 / 朱阳, 武振玉, 王军伟主编)

ISBN 7-5385-1826-6

I. 大... II. 雍... III. 政治—研究—中国—清代 IV. 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6472 号

中国私家藏书·皇家珍藏治世修身宝典

大义觉迷录 (清) 雍正皇帝 著

出 版 者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电 话 ⊙ 0431-5640624

印 刷 ⊙ 长春新华印刷厂

开 本 ⊙ 32(880×1230 毫米)

印 张 ⊙ 11.625

主 编 ⊙ 朱 阳 武振玉 王军伟

责任编辑 ⊙ 安春海

封面设计 ⊙ 龙震海

版式设计 ⊙ 王咏梅

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85-1826-6/I·352

全套定价:234.00 元 本册定价:18.00 元

目 录

雍正上谕	7
一、满清入主中原君临天下，是否符合正统之道？岂可再以 华夷中外而分论？	7
二、朕到底是不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 酗酒、淫色、诛忠、好谀、任佞的皇帝？	21
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	57
一、大清朝的建立正是天命民心之所归，乃道义之当然	57
二、华夷之间、人兽之间的本质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59
三、清朝统治八十年后，造成地塌天荒，神哭鬼号吗？	63
四、社会出现贫富差别的原因是否可以归咎于君王呢？	66
五、整个大清国的人民到处都在呼号怨恨吗？	69
六、像岳钟琪一样臣事清朝的人就是低头屈节效忠于匪类 吗？	70
七、明朝亡于李自成之后，清兵的确是明臣请来除寇治乱 的，是救亿万生灵于水火之中的仁义之师啊！	74
八、对于孔子的《春秋》大义，岂可以乱臣贼子之心来解 释？	79
九、对于一个臣民来说，到底什么是荣辱生死的大义？	83

十、那些狂肆毁谤皇帝的谣言传语到底从何而来? 85

十一、这“山崩川竭”的传言到底是何等之事? 89

十二、“五星聚,黄河清”的瑞祥征兆到底是什么因缘?
..... 90

十三、被曾静奉以为师的吕留良到底是何许人也? 93

奉旨讯问曾静口供二十四条 97

一、曾静等人各处行走,纠合叛逆之人的缘由如何? ... 97

二、大清国里考生增多,如何说是文人趋下,无耻奔竞呢?
..... 101

三、著述《格物集》的刘先生,其人其书是什么情形?
..... 103

四、如果皇帝只应孔、孟、程来做,那么汉、唐、宋、元的
开国皇帝都是“光棍”吗? 105

五、你曾静真的是可以担当“天亶聪明,乾之九五”的大人
物吗? 111

六、“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道理讲得通吗? 114

七、清朝得天下到底是盗窃天位的强盗呢,还是驱逐流寇的
主人呢?
..... 116

八、到底是“中华之外,四面皆是夷狄”呢,还是“天下一
家,万物同源”呢?
..... 119

九、大清王朝八十多年没有国君吗? 臣民也禽兽不如吗?
..... 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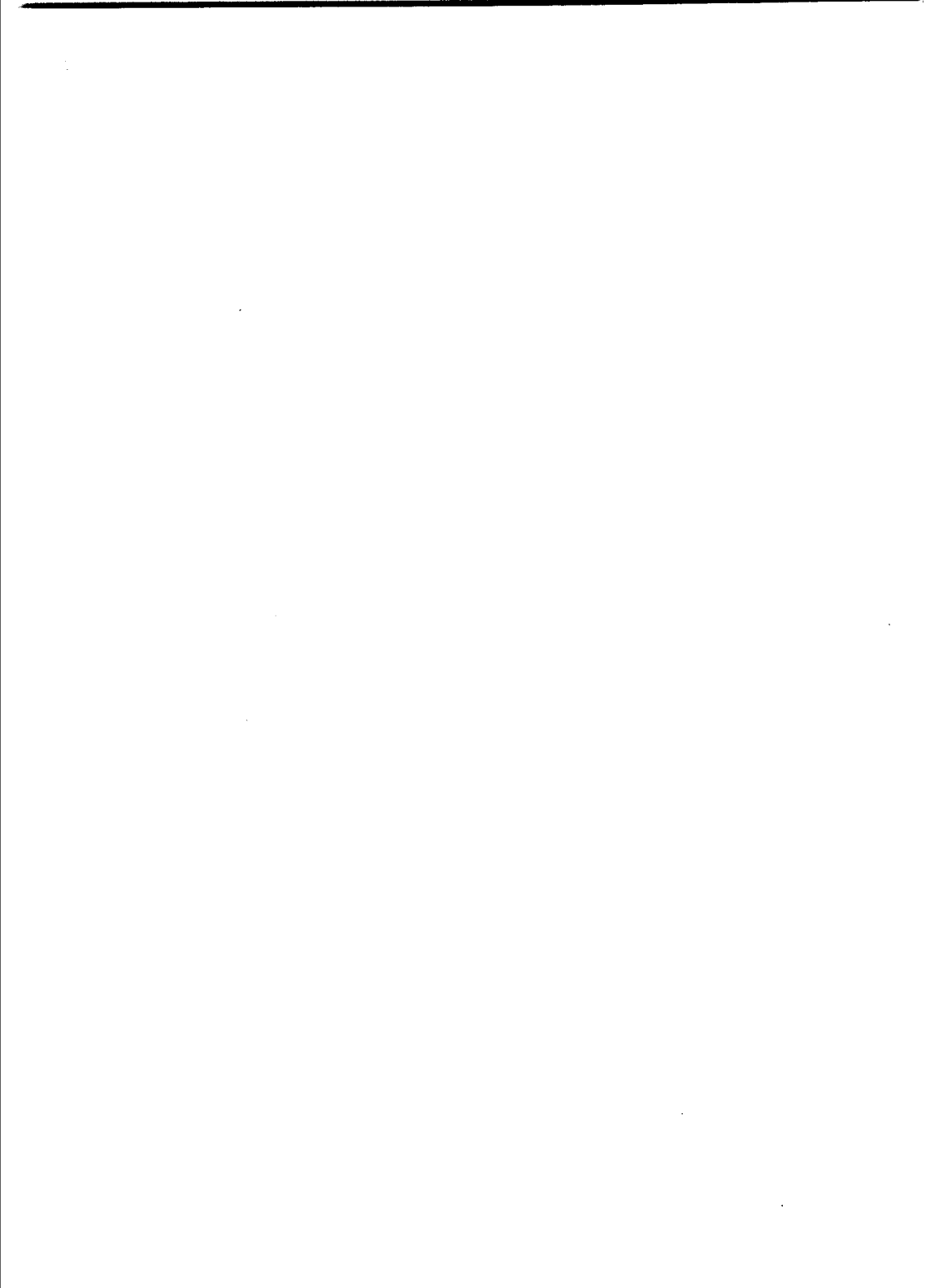
十、科举制度仅仅是讲名讲利、卑污苟贱而不知耻的方法
吗?
..... 126

十一、你曾静为何尊敬悦服一个行走于市井江湖的吕留良
呢?
..... 131

- 十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土建邦、割据而治真的适合大清国情吗？
..... 133
- 十三、边地民族全是无耻无状的小人，难道没有像尧舜一样的圣人吗？..... 140
- 十四、对于夷狄入主中原，难道一定要诛戮讨伐，而不能和睦相处、共图大业吗？..... 142
- 十五、大逆不道的吕留良真的能和孔子相提并论吗？
..... 144
- 十六、你曾静自命为济世英才，你真的有“宰相之量”，还是心怀异谋、图为不轨呢？..... 147
- 十七、程颢提出的选拔人才方法在宋代已经证明行不通，难道能够在本朝实行得通吗？..... 153
- 十八、雍正钱发行不久，不能普遍流通，你便造谣“雍正钱，穷半年”，是居何用心？..... 167
- 十九、为什么山西百姓争先恐后为国效力，忠诚爱戴朝廷，而湖南竟有你这样猖狂悖逆之徒？..... 176
- 二十、有人诬蔑你的父亲有盗窃的劣迹，母亲有淫乱的行为，你能不加审查便将父母唾骂一番，甚至著书立说到处宣扬吗？..... 180
- 二十一、自称忠民义士的曾静，你为什么甘愿赴蹈灭族死罪而谋反呢？..... 194
- 二十二、山西嘉祥兆瑞迭现，湖南连年水灾，这些说明什么？..... 196
- 二十三、云贵两地民风淳厚，服教乐善，以至感召丰收大稔，正是天人感应昭著啊！..... 200
- 二十四、孔庙失火和庆云出现是礼乐制度遭受厄运的灾异呢，还是文明光华的祥瑞呢？..... 203
- 曾静供词五条**..... 208
- 一、皇上嗣位以来，是五谷丰登，人民乐业？还是四时易

序, 五谷少成?	208
二、雍正皇帝是励精图治, 爱抚百姓, 还是谣言所传的虐待百姓呢?	210
三、皇上调拨粮食是平抑物价, 还是倒卖粮食做生意?	212
四、雍正皇帝是有好生之德, 还是草菅人命, 滥杀无辜?	214
五、雍正皇帝是霸嫂为妃, 还是按照惯例让她们居在别宫呢?	225
雍正上谕	228
忠诚报国、公正无私的岳钟琪与叛逆曾静有鲜明的对照	228
曾静、张熙供词二条	230
一、我曾静这个文弱书生是怎样成为弥天重犯的?	230
二、我张熙久居僻壤穷乡, 怎么会误入歧途, 随师造反呢?	236
曾静供词二条	241
一、皇上不是有意遵循守孝三年的古制, 不过是为了尽心尽孝才安心罢了	241
二、雍正皇帝勤政爱民, 与天理浑然一体, 神功伟德实在是顶天立地	246
内阁九卿奏本	253
曾静等即使是一失足铸千古恨, 也应该殃及九族人牢狱	253
雍正上谕	258
一、我雍正是将遗诏的“十”改成“于”字而谋取皇位的吗?	258
二、朕诸兄弟不可以德化, 不可以理喻, 不可以情感, 不可	

以恩结，而其悖逆妄乱，的确是百折不回·····	272
三、朕之“屠弟”，正是为了不负皇考付托之重，顾及宗社之安危·····	280
诸王大臣奏请 ·····	285
应将诽谤皇上的曾静按律处决，碎尸悬首，以昭国宪，以快人心·····	285
雍正上谕 ·····	289
吕留良怎么得罪了圣祖皇帝在天之灵，而落致戮尸枭首的下场？·····	289
曾静供词二条 ·····	306
一、我是怎样受吕留良思想毒害，而成为弥天重犯的？·····	306
二、乱臣贼子吕留良是怎样把我们引入歧途的？·····	315
雍正上谕 ·····	319
一、本朝子民严鸿逵追随吕留良效颦狂吠，谩骂诽谤朝廷，是何居心？·····	319
二、曾静痛心疾首地说：“我这过去的禽兽，如今是怎样脱胎成人的？”·····	326
曾静著述 ·····	328
归仁说·····	328



雍正上谕

一、满清入主中原君临天下，是否符合正统之道？岂可再以华夷中外而分论？

【原文】 上谕：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如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

《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赐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又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又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惟有德者乃能顺天，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

我国家肇基东土，列圣相承，保义万邦，天心笃佑，德教弘敷，恩施遐畅，登生民于衽席，遍中外面尊亲者，百年于兹矣。

【译文】 皇上谕旨：自古以来帝王取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由于一心想保护百姓，恩惠遍施全国，而受到上天的宠信，并取得亿万百姓的欢心，这样才能统一全国，并将帝位一代代地传承下去。因为教养百姓的根本道理，就在于只有有仁德的圣人才有资

格当天下的君王。这使天下一家，万物一体，从古到今，万世不变的规律，决不是平常所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或靠同一乡里或地域的私谊浅见，可以随意拥护谁反对谁去做君王的。

《书经》里说：“上天是不讲亲疏情面的，只帮助有仁德的人取得天下。”只有仁德够得上做君王的，上天才降恩保佑他成为君王。从没有听说过不以仁德去取得上天的感动和信任，而仅靠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就去保佑他做君王的道理。又说：“抚育我的是我的君王，虐待我的是我的敌人。”这是民心拥护或反对的常情，从没听说过受天下百姓拥护的君王，不是依靠他的仁德政绩，而是看他是什么地方人的道理。又说：“顺应天道的才能昌盛，背逆天道的一定灭亡。”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顺应天道，上天赐给人的，又怎能因为他是什么地方的人而区别对待呢？

我大清帝国创业于东北地方，几代圣人相继承袭帝位，保护了天下的安定，受到上天的保佑关怀，道德教化得到弘扬广大，恩惠遍及很远的地方，给百姓以应有的地位，受到中外的尊敬亲近，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原文】 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

乃逆贼吕留良，凶顽悖恶，好乱乐祸，倣拢彝伦，私为著述，妄谓“德祐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而逆徒严鸿逵等，转相附和，备极猖狂，余波及于曾静，幻怪相煽，恣为毁谤，至谓“八十余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人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好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

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

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

且以天地之气数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生民涂炭，疆圉靡宁，其时之天地，可不谓之闭塞乎？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义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而尚可谓之昏暗乎？

【译文】 我朝既然是秉承天命，作为中外臣民的君主，那么蒙受我朝抚育爱护的百姓，怎能用中原和边远地区来区分而歧视呢？而中外臣子和百姓，既然共同尊奉我大清朝为君主，那么就应忠心拥护并为我朝效力，以尽做臣子和百姓的责任，尤其不应当以中原内地和边远民族的区分而产生异心。以此来揣测天道，验证人情，即使在天涯海角日出的地方，普天下的百姓，也没有不知道我朝是大一统的国家。凡是我朝的子民和臣下，是没有敢于有越规的想法的。

可是逆贼吕留良，这个凶恶狂悖的人，好乱乐祸，扰乱伦理纲常，私自著书立说，狂悖地胡说“自宋恭帝德祐年以后，天地有了大变，是自古以来所没有见过的，而到今天又重复出现”。而他的徒弟严鸿逵等，又互相附和，猖狂到极点。余波又影响到曾静，他受希奇古怪的言论煽动，恣意地诋毁诽谤，胡说什么“八十多年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这些逆贼的本意，不过是说本朝只是满洲的君主，而进关当了整个中国的皇帝，错误地怀着地域、民族的偏见，故意捏造一些言论来进行诽谤诋毁。

而他们不懂得本朝原居地为满洲，这好比中国人有籍贯于某地一样。古代的大舜籍贯是东夷，周文王籍贯是西夷，这丝毫不能损害他们圣人的光辉。《诗经》里说：“痛击北狄和西戎，严惩荆楚使知痛。”是因为他们僭称王号。不懂得尊重周朝天子而丧失了君臣大义，所以数说他们的罪行并加以讨伐，并不是称他们为戎狄，就是把他们划为外国。如果把戎狄解释成外国，那么孔子周游列国，就不应该接受楚昭王的聘请。而秦穆公称霸于西戎，如把西戎当成外国，那么孔子在删定《诗经》时，就不会把《秦风》列在周朝国风的后边了。

至于过去把中国分为华夷的说法，是产生于东晋和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分裂为很多小国，彼此之间地域都很小而道德威望也相差不多，谁也压不倒谁而有能力统一整个中国，所以北方的人便攻击南方人为岛夷，南方人便指责北方人为索虏。在那时候的人，人们不懂得去修整道德实行仁义，而只知道从口舌上去互相讥讽，在今天，这已成为一种十分卑鄙和十分浅陋的错误思想。而逆贼一伙，在今天中国统一，汉族与少数民族一家共处的时候，而去荒谬地划分中外，华夷错误地制造矛盾怨恨，这岂不是违背天理，无父无君，连蜂蚁都不如的禽兽吗？

现在且用天地间的气数来说，明代在嘉靖朝以后，君臣们丧失道德，盗贼蜂起，百姓们受到苦难，国家疆域也得不到巩固。在当时的天地，气运难道能不说是闭塞不畅吗？本朝自统一中国以来，荡平了国内寇乱，全中国得到安宁，政治教化兴旺发达，文明之风一天比一天强盛，百姓们安居乐业，从内地到远疆，到处呈现出一片祥和气氛，百姓从儿童直活到成为白发老翁，一辈子也没遇见过兵灾。今天国家天地清静安宁，全国百姓受到的恩惠超过了明朝时期，这是连三尺孩童也都知道的事实，这怎么还能说成是天昏地暗呢？

【原文】 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为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孔子曰：

“故大德者必受命。”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

今逆贼等以冥顽狂肆之胸，不论天心之取舍，政治之得失，不论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以琐琐乡曲为阿私，区区地界为忿嫉，公然指斥，以遂其昧弃彝伦，灭废人纪之逆意。至于极尽狂吠之音，竟敢指天地为昏暗，岂皇皇上天，鉴观有赫，转不如逆贼等之智识乎？

且逆贼吕留良等，以夷狄比于禽兽，未知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若据逆贼等论，是中国之人皆禽兽之不若矣。又何暇内中国而外夷狄也？自罽乎？罽人乎？

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獯犹，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从来为君上之道，当视民如赤子；为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如为子之人，其父母即待以不慈，尚不可以疾怨忤逆，况我朝之为君，实尽父母斯民之道，殚诚求保赤之心。而逆贼尚忍肆为讪谤，则为君者，不知何道而后可也。

【译文】 天地是以仁爱为核心，它宽弘广大天盖着人类，地载着人类，对任何人都不偏心，所以道德文明在内地昌盛的，则皇帝就会在内地诞生；道德文明昌盛于边远地区时，则皇帝也可以出生在边疆地区。孔子说过：“所以大仁大德的人必然受天命的眷顾。”自从中国有帝王以来，这道理是始终如一的。

现在这伙逆贼，以顽固不化狂妄无伦的心胸，不讲天心的所向，国家政治上的得失，不讲百姓及万物的安定和危难，和国家疆域的大小，而仅仅抱着狭隘乡土观念，以地区界限、华夷之分来发泄忿懣和嫉恨，公然指责我朝，妄图让人们顺遂他们抛弃伦

理纲常，毁灭做人处世的道理的叛逆思想。以至于狂吠达到极点，竟敢指责天地为昏暗，岂有皇天上苍，英明赫赫，反不如这伙逆贼的知识高远吗！

而且逆贼吕留良等人，竟把夷狄比成禽兽。他们不知道上天厌弃内地缺少仁德的圣人，才关怀爱护我们这些处于外夷边远地区的人，天命让边疆地区的圣人做了中国内地的皇帝。如果按逆贼们的论调，边远地区的人是禽兽，那么内地的人就连禽兽也不如了。还有什么空闲心思去区别内中外夷狄。这是自己骂自己，还是骂别人呢？

而且自古以来中国统一的时候，国家疆土都并不广大，其中有不服王化的，便斥责他们是夷狄。比如夏、商、周三代以前的有苗、荆楚、獬狃等地，就是现在的湖南、湖北、山西。而在今天，把这些地方说成是夷狄地方能行吗？至于到汉、唐、宋等朝代全盛的时候，还有北狄、西戎等少数民族，世代在边境上作乱，而各朝代皇帝从来没有征服过他们并占有这些地区，所以有了疆界的区分。自我大清朝统一了中国，在中原即皇帝位以后，使蒙古等极边远的少数民族部落都统一入了中国版图，使中国的疆土开拓得更加广阔，这真是中国每个臣民的大幸事，怎么还能去硬行分裂中国，而鼓吹划分华夷界限的论调呢！

从来作为君主的道德标准，就是要爱护人民如子；作为臣子的道德标准，就是应当尊奉君王如父母。比如作为儿子的人，他的父母对他不够慈爱，他还不应当因此产生怨恨而忤逆双亲。何况我朝的皇上，实实在在做到了像父母爱护儿子一般爱护百姓，竭尽最大诚心去保护自己的百姓，而逆贼等还要忍心去肆意诽谤，那么使做君王的人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对待百姓才可以了。

【原文】 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数。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蛊惑愚民，现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

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

况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肆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

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

至于厚待明代之典礼，史不胜数。其藩王之后，实系明之子孙，则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亦前代未有之旷典。而胸怀叛逆之奸民，动则假称朱姓，以为构逆之媒。而吕留良辈又借明代为言，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为本朝之贼寇，实明代之仇讎也。

【译文】 以前在康熙年间，各处多有好徒发动扰乱，动不动的就借着朱三太子的名义活动，比如一念和尚、朱一贵等都是如此，真是不可胜数。近来还有山东人张玉，假称自己姓朱，伪托是明朝皇帝的后代，碰到算命的推算，说他有帝王之命，希望用这来鼓动、迷惑一些无知百姓来为他效力，现在他已经被步军统领衙门逮捕审问。自古以来，不同姓氏的人，先后建立王朝进行统治，而前朝皇帝的家族，臣服于后一朝代的人很多，否则也是隐姓埋名，隐居不作官而表现自己气节，从来也没有像本朝有这么多的奸刁民众假冒姓朱，企图动摇蛊惑人心，扰乱天下。如果让这种风气蔓延下去，不加平息，那么以后中国皇帝的子孙，如

遇上改朝换代的新皇帝时，必然会被弄得一个也活不下去，这岂不是被那些奸刁百姓逼迫到这等地步上去了吗？

况且明朝代替元朝而统一中国，明太祖就是元朝的子民百姓。如果用纲常伦理来说，是无法逃掉犯上篡位的罪责的！至于我朝和明朝的关系，则是邻国关系，何况明朝是灭亡在流寇李自成手里的。当时明朝边境时遭祸乱，倭寇骚扰沿海，流寇的名称多到无法计数，而各乡村城镇的流氓无赖，乘机杀人抢劫。不法官兵又借着征剿匪患的名义，到处祸害百姓，以到杀良民代替冒充杀土匪的数字以请功劳，使中国百姓死亡过半。就拿四川一省来说，竟然到了几乎一个不剩的地步。即使偶然有幸存下来的人，也往往肢体不全，耳鼻残缺，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事实。

到康熙四五十年间，还有目睹过当时情况的父老，哭泣着叙述当时的悲惨状况。并且没有一个不庆幸我朝统一天下，削平了各地寇乱，把全国人民救出了水深火热之中而得安坐于筵席之上。我朝对中国百姓造福可谓广大，达到了极点。

至于厚待明朝的典章规定，更是史书中写也写不完。明朝的藩王后代，凡是经过查实确系明朝皇帝的子孙，则格外加恩优待，封为侯爵。这也是以前各朝各代没有过的特殊恩典。可是心怀叛逆的奸民，动不动地便假称姓朱，把它当做举行叛乱的手段。而吕留良这伙人，又假借明朝的名义，肆意宣扬他的分别华夷的荒谬邪说，以求达到他们叛乱的愿望。这种人不但是本朝的贼寇，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明朝的仇人了。

【原文】 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人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倘若外国之君人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况抚之则后，虐之则仇，人情也，若抚之而仍不以为后，殆非顺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为君者，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为下者其能堪乎？为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人于下，岂为下者转可以此施之于上乎？

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夫以春秋时百里之国，其大夫犹不可非。

我朝奉天承运，大一统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谤议乎？且圣人之在诸夏，犹谓夷狄为有君，况为我朝之人，亲被教泽，食德服畴，而可为无父无君之论乎？

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历代以来，如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述者寥寥。其时之名臣学士，著作颂扬，纪当时之休美者，载在史册，亦复灿然具备，而后人则故为贬词，概谓无人物之可纪，无事功之足录，此特怀挟私心识见卑鄙之人，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欲贬抑淹没之耳。

【译文】 而且像中原的人，轻待边疆少数民族到中原继承国家大统，其害处不过是狂妄地诽谤，蛊惑一二个匪人而已，并不能损害是非的公正和伦理纲常的大义。假如少数民族的君王到中原来继承国家大统，不把中国人当成赤子来爱护抚育，那么中国人又怎么能依靠这样的君主生活呢？况且能爱护百姓则百姓就尊其为王，虐待百姓则百姓便视其为仇敌，这是人之常情。假如爱护和抚育百姓，而百姓仍不承认其为君主，这是不合乎天理人情的。倘使当君主的人把不合乎人情的事强加给下面的臣民，那么在下面的臣民能承受得了吗？做君王的还不能把不合乎人情的事强加给下边的臣民，难道下边的臣民倒可以把不合乎人情的事转加给君主吗？

孔子说过：“正人君子住在他的国家里，不随便议论诽谤国家的大臣。”何况国家的君主呢！又说：“夷狄等边远地区的部落，也有他们的君王，而中原地区也有没有君王的时候。”拿春秋时来说，小的国家疆域不过才百里大小，他的大臣还不允许随便诽谤。何况我朝乃秉承天命开启国运，一统天下的太平盛世，对君王怎么还可以随便诽谤呢！而且孔圣人生在中国，还称夷狄

也有君王，况我朝的臣民，亲自受到皇上的恩德教化，在国家荫庇下抚育下生活，怎么还可以随便去说那些无父无君的论调吗？

韩愈说过：“中原人如采用边远地区民族的夷礼，便把他当做夷人来看待；边远地区的夷狄民族，如果采用中原的礼仪，就把他当做中国人看待。”中国历代王朝，像元朝那样一统天下，建国百年之久，疆域极为广大的朝代很少。元朝的政治措施，有很多是美好的，可是被后世称赞的却很少。当时的名臣学士，有不少著述颂扬他们的国家，记述了当时不少良好的政绩，这些都记载在史书里面，是十分清楚完备的。可是后人往往故意贬低元朝，讲了关于元朝不少坏话，说元朝没有什么杰出人物可以记述，也没有什么功绩可以流传。这都是由于心里带有私心，眼光见识短浅的人，不愿意把功绩归于少数民族的君王，打算贬低他使之淹没无闻罢了。

【原文】 不知文章著述之事，所以信今传后，著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于外国人承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当秉公书录，细大不遗。庶俾中国之君见之，以为外国之主且明哲仁爱如此，自必生奋励之心，而外国之君见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于为善，而深戒为恶，此文艺之功，有补于治道者，当何如也。

倘故为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诬其恶而妄载，将使中国之君以为既生中国，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隆之治。而外国人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无望于载籍之褒扬，而为善之心，因而自怠。则内地苍生，其苦无有底止矣。其为人心世道之害，可胜言哉！

况若逆贼吕留良等，不惟于我朝之善政善教，大经大法，概为置而不言，而更空妄撰，凭虚横议，以无影无响之谈，为惑世诬民之具。颠倒是非，紊乱黑白，以有为无，以无为有。此其诞幻誇張，誑人听闻，诚乃千古之罪人，所谓憫不畏死，凡民罔不愆，不待教而诛者也，非只获罪于我国家而已。

此等险邪之人，胸怀思乱之心。妄冀侥幸于万一。曾未通观古今大势，凡首先倡乱之人，无不身膏斧钺，遗臭万年。夫以天下国家之巩固，岂乌合鼠窃之辈所能轻言动摇？即当世运式微之时，其首乱之人，历观史册，从无有一人能成大事者。如秦末之陈涉、项梁、张耳、陈余等，以至元末之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虽一时跳梁，究竟旋为灰烬。而唐宋中叶之时，其草窃之辈，接踵叠迹，亦同归于尽。总之，此等奸民，不知君臣之大义，不识天命之眷怀，徒自取诛戮，为万古之罪人而已。

【译文】 他们不懂得文章著述这种事情，之所以能够取得人的信服并传之于后世，把劝诫写到书册中去，是因为坚持公平正直的态度去评论。对于出身于少数民族出身的君主而进入中原继承中国大统的君主，对他的善恶尤其应当公正地直书，大事小事都不要遗漏。这样使出身于中原的君主见了，会以为边疆民族的君主，还能够如此读书明理讲究仁爱，必然会激励他自己努力做得更好的决心。而边远民族地区出身的君主看见了，以为是非记录得一点不差，会相信正义真理是常存的，也必然会能努力地去做好事，而深诫去做坏事。这是文章著述的功劳，对治国之道，起到了补充和辅助的作用。

假如故意地去贬低和淹没其政绩，把他做的好事隐藏起来而不留传给后世，捏造或夸大他们的错误并记载下来，就会使中国的君主，以为既出生在中原，自然会享受到好名声，不必去修养道德实行仁爱，去努力追求极其兴盛的政治。至于出身于边疆民族而入承中国大统的君主，也会以为即使昼夜励精图治，勤奋不息，也难以得到史书的好评，因而为百姓做好事的心思也便怠慢下来。这样下去，内地的百姓，所受的痛苦真会永无止境了。可见存有不公正的私心而去评论世事，对于人心世道的祸害实在是说也说不完的！

吕留良等逆贼，不仅对于我朝的良好政绩和妥善的教化，实行的重要政策和法律，一概放在一边不说，而且更凭空捏造杜

撰，编出一些假话胡乱议论，用一些无影的奇谈怪论，作为蛊惑人心的工具，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以有当做没有，以没有当成实有其事。用这种荒诞不经的话，去耸人听闻，真是千古的罪人。所谓强横到不怕死的亡命之徒，百姓是没有人不痛恨他们的，这种人是无法教育而必须诛杀的，因为他们不只是对国家有罪。

像这样阴险狡诈的人，胸中包藏着叛乱的祸心，妄图能万一侥幸而获得成功。这种人不懂得观察古今大势。历史上凡是首先发动叛乱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身受极刑，遗臭万年的。当天下和国家十分巩固时，岂是一些乌合之众、鼠窃狗偷的小人们的一些言论能动摇得了的吗？即使当世道衰退的时代，其首先发动叛乱的人，从历史记载来看，也是没有一个人能成大事的。比如秦末的陈涉、项梁、张耳、陈余等人，以至元朝末年的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人，也只是一时猖狂，很快就都灰飞烟灭了。而唐、宋中期的时候，出现一些叛乱草寇，接连不断，也都同归于尽。总之，像这种奸民，不懂得君臣大义，认识不到天命所归，白白自取灭亡，成为千古罪人而已。

【原文】 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缺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

朕思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天下亿万臣民，共具天良，自切尊君亲上之念，无庸再为剖示宣谕。但险邪昏乱之小人，如吕留良等，胸怀悖道者，普天之下不可言止此数贼也。用颁此旨特加训谕，若乎日稍有存此心者，当问天扪心，各发天良，详细自思之。

朕之详悉剖示者，非好辩也。古昔人心淳朴，是以尧舜之

时，都俞吁咈，其词甚简。逮至殷周之世，人心渐不如前，故《殷盘》、《周诰》所以告诫臣民者，往复周详，臧训切切，始能去其蔽固，觉其遇蒙，此古今时势之不得不然者。

每见阴险小人，为大义所折，理屈词穷，则借圣人之言，以巧为诋毁，曰：“是故恶夫佞者。”不知孔子之以子路为佞，因子路“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之语而发。盖以无理之论，而欲强胜于人，则谓之佞，所谓御人以口给也。

若遇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逆天背理，惑世诬民之贼，而晓以天经地义，纲常伦纪之大道，使愚昧无知，平日为邪说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致遭天谴而罹国法，此乃为世道人心计，岂可以谓之佞乎？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著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谕。

【译文】 人之所以为人而不同于禽兽的地方，就在于人明白伦理纲常的道理。五伦齐备就是人伦，缺少一种人，便不能称之为人了。君臣这一伦，在五伦当中是第一最重要的，普天下心中没有君王的人，还配称的上为人吗？作为人而怀有没有君王的心，这种人难道还可以称他为禽兽吗？能尽人伦的才配称为人，灭天理的就叫禽兽，并不是按照中华内地和边疆夷狄地域区分去别人和禽兽的。而且君王都是秉承天命而为君王的，心中没有君王，就是违背了天意，这种人怎么能不受到上天的惩罚呢？

朕想到遵守法度爱好道德，是普天下人心都所具有的。国家里亿万臣民都具有天地良心，自然有尊敬君王亲近皇上的思想，完全没有要再三去宣传解释这个道理。但是有一些奸险小人，如吕留良等心怀叛逆的，从全国来讲，就不能说只有他们几个奸贼

了。所以特地颁发这个谕旨，再进行一番训导教育。如果有平常稍存有这种错误思想的人，应该扪心自问，各自用自己的良心，好好地仔细想想。

朕之所以在这里详细解剖这个道理告知大家，并不是因为喜好辩论。古代人心比较敦厚朴实，所以在尧舜的时候，君臣对话时不过用“都俞吁咈”四个叹词来表示是与不是，词句十分简单。到了殷、周的时候，人心渐渐不如过去，所以才出现了《殷盘》、《周诰》这些告诫臣民的谕旨，告诫臣民，要用反复周详、真诚切实的语言，才能够除去他们错误的见解，觉醒他们愚昧的思想，这是古今形势不同，不得不这样去做。

常常见到有些阴险的小人被大义所驳倒，理屈词穷，便去假借圣人的语录巧妙地进行诋毁，说：“这本来就是毒恶奸佞的人。”他们不知道孔子以为子路奸佞，是针对子路说的“何必读书而后才能称为好学”而说的。这就是说用无理的言论，而要强使别人接受，这就叫做佞，也就是靠巧言善辩来抵御别人的不同看法。

如果碰到像吕留良、严鸿逵、曾静这些违逆天理、蛊惑人心，祸害百姓的贼人，而明白地用天经地义、伦理纲常的大道理来进行告诫，使那些愚昧无知，平常受邪说蒙蔽的人，豁然醒悟过来，不至于受上天的惩罚而身受国法。这是从安定世道和人心出发，怎么能说是巧言善辩呢？天下臣民和后代人自有公正的评论。为此特令把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人是佞荒谬忤逆的言论和朕的谕旨，一一刊刻成书，全面颁发公布到全国各府、州、县以及所有远乡僻壤，以使各地读书人和乡村百姓都知道。并且命令各地都要保存一册存于当地儒学之中，以使将来新到学校读书的人，人人都能读到此书，知道这件事。假若有没有见过这部书，或没听说过朕的旨意的人，经朕随时考察出来，一定要将这省的学政和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此晓諭。

二、朕到底是不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谏、任佞的皇帝？

【原文】 上谕：朕荷上天眷佑，受圣祖仁皇帝付托之重，君临天下。自御极以来，夙夜孜孜，勤求治理，虽不敢比于古之圣君哲后，然爱养百姓之心，无一时不切于寤寐，无一事不竭其周详。抚育诚求，如保赤子，不惜劳一身以安天下之民，不惜殚一心以慰黎庶之愿，各期登之衽席，而无一夫不得其所。宵旰忧勤，不遑寝食，意谓天下之人，庶几知朕之心，念朕之劳，谅朕之苦，各安生业，共敦实行，人心渐底于善良，风俗胥归于醇厚，朕虽至劳至苦，而此心可大慰矣。

岂意有逆贼曾静，遣其徒张熙投书于总督岳钟琪，劝其谋反，将朕躬肆为诬谤之词，而于我朝极尽悖逆之语。廷臣见者，皆疾首痛心，有不共戴天之恨，似此影响全无之事，朕梦寐中亦无此幻境，实如犬吠狼嗥，何足与辩？

既而思之，逆贼所言，朕若有几微愧歉于中，则当回护隐忍，暗中寝息其事，今以全无影无声之谈，加之于朕，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而逆贼之敢于肆行诬谤者，必更有大奸大恶之徒，捏造流言，摇众心而惑众听，若不就其所言，明目张胆宣示播告，则魍魉魍魉，不公然狂肆于光天化日之下乎？

如逆书加朕以谋父之名，朕幼蒙皇考慈爱教育，四十余年以来，朕养志承欢，至诚至敬，屡蒙皇考恩谕。诸昆弟中，独谓朕诚孝，此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

朕在藩邸时，仰托皇考福庇，安富尊荣，循理守分，不交结一人，不与闻一事，于问安视膳之外，一无沽名妄冀之心。此亦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

【译文】 皇上谕旨上：朕蒙受上天的爱护和保佑，承受圣祖皇帝托付重任，而登上皇位。自从登基以来，每天从早晨到晚上孜孜不倦，谨慎地追求把国家治理好。虽然不敢自比古代的圣明君主，但爱护和抚育百姓的心思，没有一刻不牢记心中甚至于梦寐之中，没有一件事不竭力求其处理得周详，抚育百姓倾尽诚心，就像保护婴儿一样。不惜劳苦自己一人的身体，以使全国老百姓得到安宁；不惜用尽最大的心思，以安慰全国百姓的心愿；务必使每个百姓都受到恩惠待遇，不使有一个人流离失所。每天直到深夜还在勤劳，往往顾不上吃饭睡觉。以为天下的百姓大概可以知晓朕的心意，想到朕的劳累，体谅朕的勤苦，从而各安生业，共同诚恳做事，使人心慢慢走向善良，社会风气达到醇厚。这样朕个人虽然至劳至苦，而心中却可以得到很大安慰了。

没想到有逆贼曾静，派他的门徒张熙投书信给陕西总督岳钟琪，劝他起来造反。书信中对朕大加诬陷诽谤，而对我朝更是攻击荒谬的猖狂到极点。朝廷内的臣子见到这书信的，没有一个不痛心疾首，感觉对逆贼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像这种毫无根据的事，即使朕在做梦时也没出现过这种幻境，所以逆贼的攻击，实在和狗吠狼嗥一样，不值得一驳！

但后来又仔细想了一下，逆贼所说的话，朕如果稍微有一点亏心事在其中，则应当回护隐忍下去，暗中平息这件事。而今逆贼说的全是无影无踪的话，强加到朕头上，而朕自以为本心可以无愧于天，可以无愧于皇父，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把事实告诉普天下的亿万臣民。而逆贼之所以敢于肆意诽谤，必然有更大的奸佞之徒，暗地里捏造谣言，广大百姓的心思，蛊惑视听。如果不把他们的无耻谣言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那么他们不是会更加猖狂地公开造谣吗？

比如叛逆书信里强加于朕谋杀皇父的罪名。朕幼小时便蒙受皇父的慈爱教育，四十多年来，一直顺应皇父心意而承欢膝下，竭力诚恳恭敬，多次受到皇父赞扬，在诸兄弟中间独认为朕最诚实最孝顺，这是朕的兄弟和一切大臣、侍从都知道的。

朕在身为亲王的时候，上托皇父的荫庇，安享荣华福贵，安分守礼，不随便交接一个私人，不干预一件国家政事，除了依礼制进见皇父问安问饮食以外，丝毫没有沽名钓誉和别的企图，这也是朕的兄弟和一切大臣、侍从们共知的事实。

【原文】 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予，静摄于畅春园，朕清侍奉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应于斋所虔诚斋戒，朕遵旨于斋所至斋。

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未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祐、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公允禔、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是时唯恒亲王允祺以冬至命往孝东陵行礼，未在京师，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禩、贝子允祹，俱在寝宫外祇候。

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号呼，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皆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此当日之情形，朕之诸兄弟及宫人内侍与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见者。

夫以朕兄弟之中，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邪谋，希冀储位，当兹授受之际，伊等若非亲承皇考付朕鸿基之遗诏，安肯帖无一语，俯首臣伏于朕之前乎？而逆贼忽加朕以谋父之名，此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

又如逆书加朕以逼母之名，伏惟母后圣性仁厚慈祥，闾宫中若老若幼，皆深知者。朕受鞠育深恩，四十年来，备尽孝养，深得母后之慈欢，谓朕实能诚心孝奉。而宫中诸母妃咸美母后，有此孝顺之子，皆为母后称庆，此现在宫内人所共知者。

及皇考升遐之日，母后哀痛深至，决意从殉，不饮不食。朕稽颡痛哭，奏云：“皇考以大事遗付冲人，今圣母若执意如此，臣更何所瞻依，将何以对天下臣民，亦惟以身相从耳。”再四哀

悬，母后始勉进水浆。自是以后，每夜五鼓，必亲诣昭仁殿，详问内监，得知母后安寝，朕始回苫次。

【译文】 到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的前几天，朕奉皇父的旨意，代替皇父到南郊行祭天大礼。那时皇父身体欠佳，静养在于畅春园内。朕请求到身边侍候，皇父以为南郊祭天典礼十分重要，应当到斋宫里进行斋戒，朕因此遵命住入斋宫戒斋。

到十三日那天皇父派人到斋宫通知要召见朕。朕未到畅春园之前，皇父已经命令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祐、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公允禔、恰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等人来到御床跟前，告诉他们说：“皇四子人品贵重，非常相似朕躬，一定能担负起治理国家的重担，现在让其继承皇帝之位。”当时，只有恒亲王允祺因为冬至，命令其去东陵祭祖，没有在京师。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禩、贝子允祜等都在寝宫外边守候。

等到朕急驰来到问安以后，皇父告诉朕病症日益加重的原因，朕含泪劝慰。这天夜里戌时，皇父驾崩。朕哀恸号呼，真是痛不欲生，隆科多便宣布皇父遗诏。朕听说之后，惊恐恸哭，昏倒在地。诚亲王等向朕叩头，劝朕节哀。朕才强打起精神办理大事。这是当日的情形，朕的各位兄弟和宫女太监，以及当时在官中行走的大小臣子侍从，都亲眼见到这事。

在朕的兄弟当中，像阿其那、塞思黑（满语：猪、狗的意思。这里指康熙的第八子允禩和第九子允禟，他们因与雍正争夺皇位失败，被雍正禁锢，并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译者注）等久怀奸谋，妄图谋取皇储地位。当朕被授命继承皇位时，如果他们不是亲闻亲见皇父把皇位传给朕的遗诏，怎么肯服服帖帖，一句话不讲，拜伏于地向朕称臣呢？而逆贼忽然加给朕以谋杀皇父篡夺帝位的罪名，这真是朕在梦寐之中，也不会想到有人如此诽谤造谣的。

又如逆书上给朕加的逼死母亲的罪名。母后圣性是非常仁厚

慈祥的，这一点在整个皇宫内，无论老幼，都是深知的。朕受母后抚养的深恩，四十年来努力尽孝，深得母后的欢心，说朕能做到诚心孝顺。而宫中各位母妃，也都羡慕母后有这么一个孝顺的儿子，都为母后称贺，这些都是现在皇宫中的人所共知的。

到了皇父驾崩升天的时候，母后哀痛到极点，决心随皇父殉葬，不吃不喝。朕叩头痛哭，上奏母后说：“皇父把国家大事托付给臣儿，如今圣母又决心从死，使臣儿更没有任何依靠了，怎样对得起天下臣民？也只好以身随着皇父皇母于地下了。”再三哀求，母后才放弃寻死念头，勉强进了点饮食。自此以后，每夜五更，朕必定要亲自到昭仁殿，详细询问值班太监，得知母后一夜安睡，才回到守灵的地方。

【原文】 朕御极后，凡办理朝政，每日必行奏闻，母后谕以不欲与闻政事。朕奏云：“臣于政务素未谙练，今之所以奏闻者，若办理未合，可以仰邀训诲，若办理果当，可仰慰慈怀，并非于予政事也。”后朕每奏事，母后辄喜，以皇考付托得人，有不枉生汝，勉之莫怠之慈旨。

母后素有痰疾，又因皇考大事，悲恸不释于怀，于癸卯五月，旧恙举发。朕侍奉汤药，冀望痊愈。不意遂至大渐。朕向来有畏暑之疾，哀痛辘踊，屡次昏晕，数月之内，两遭大事，五内摧伤，几不能支，此宫廷所共知者。

朕于皇考、母后大事，素服斋居，三十三月如一日，除祭祀大典，及办理政事外，所居之地，不过屋宇五楹，不听音乐，不事游览，实尽三年谅阴之礼，此亦内外臣工所共知者。

至于朕于现在宫中诸母妃之前，无不尽礼敬养，今诸母妃亦甚感朕之相待，岂有母后生我，而朕孺慕之心，有一刻之稍懈乎？况朕以天下孝养，岂尚缺于甘旨而于慈亲之前，有所吝惜乎？逆贼加朕以逼母之名，此更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

又如逆书加朕以弑兄之名。当日大阿哥残暴横肆，暗行镇

魔，冀夺储位，二阿哥昏乱失德。皇考为宗庙社稷计，将二人禁锢。此时曾有朱笔谕旨：“朕若不讳；二人断不可留。”此广集诸王大臣特降之谕旨，现存宗人府。

【译文】 朕自登基称帝以后，凡是办理朝政大事，每天必定要把情况奏明母后，母后说不想参予政事。朕奏说：“臣儿初登皇位，对于政务还不太熟练。现在所以要奏闻母后，是因为如果办理得有不妥的地方，可以得到母后教诲；如果办理得妥当，也可以使母亲放心，这并不是要母后干预政事。”以后朕每奏事的时候，母后都十分高兴，以为皇父付托的人很妥当，所以有“不枉生你一场，要努力干下去不可松懈”的话。

母后平常就有个疾病，又因为皇父丧事，心中悲痛不能释怀，于癸卯年五月旧病复发。朕亲自侍奉汤药，希望病能够好起来，不料却一天比一天加重而至病危逝世。朕平素便有怕热的老病，这时哀伤哭号，几次昏倒于地。几个月以内，连遇两次大丧，内脏受到严重伤害，几乎支持不下来。这是宫廷内的人都知道的。

朕在皇父和母后的大丧期中，素衣素食，三十三个月如一日。除了祭祀大典和处理政事以外，所住的地方房屋不过五间，不听音乐，不作游览，谨守居丧三年的礼制。这也是内外臣子和侍从们所共知的事。

至于朕在现在宫中的各位母妃的跟前，没有不尽礼以敬养，诸母妃也十分感谢朕对她们的厚待。哪有母后生下我来，而朕仰望敬爱的心思，能有一刻松懈的？逆贼强加给朕以逼害母后的罪名，这更是朕在睡梦中也难以想到，竟会有人诬谤到这种地步。

又如逆书中强加给朕的谋杀兄长的罪名。当年大阿哥残暴专横，暗中进行镇魔的邪术，梦想夺取储君的位子；二阿哥则昏乱丧失道德。父王从国家社稷的安定着想，把他们二人禁锢起来。同时父王还写了朱笔谕旨说：“朕如果去世，这二人一定不可留下。”这个召集诸王大臣们集会公布的谕旨，现在还存在于宗人

府内。

【原文】 朕即位时，念手足之情，心实不忍，只因诸弟中如阿其那等，心怀叵测，固结党援，往往借端生事，煽惑人心，朕意欲将此辈徐徐化导，消除妄念，安静守法，则将来二阿哥亦可释其禁锢，厚加禄赐，为朕世外兄弟，此朕素志也。所以数年以来，时时遣人赉予服食之类，皆不令称御赐，不欲其行君臣之礼也。二阿哥常问云：“此出自皇上所赐乎？我当谢恩领受。”而内侍遵朕旨，总不言其所自。及雍正二年冬间，二阿哥抱病，朕命守护咸安宫之大臣等，于太医院拣择良医数人，听二阿哥自行选用。二阿哥素知医理，自与医家商订方药。迨至病势渐重，朕遣大臣往视，二阿哥感朕深恩，涕泣称谢云：“我本有罪之人，得终其天年，皆皇上保全之恩也。”又谓其子弘皙云：“我受皇上深思，今生不能仰报，汝当竭心尽力，以继我未尽之志。”及二阿哥病益危笃，朕令备仪卫移于五龙亭。伊见黄舆，感激朕恩，以手加额，口诵佛号。以上情事，咸安宫宫人、内监百余人，皆所目睹者。

及病故之后，追封亲王，一切礼仪有加，且亲往哭奠，以展悲恻。其丧葬之费，动支库帑，悉从丰厚，命大臣等尽心办理，封其二子以王公之爵，优加赐赉。今逆贼加朕以弑兄之名，此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

又如逆贼加朕以屠弟之名，当日阿其那以二阿哥获罪废黜，妄希非分，包藏祸心，与塞思黑、允禩、允禵结为死党，而阿其那之阴险诡譎，实为罪魁，塞思黑之狡诈奸顽，亦与相等。允禩狂悖糊涂，允禩卑污庸恶，皆受其笼络，遂至胶固而不解，于是结交匪类，蛊惑人心，而行险侥幸之辈，皆乐为之用，私相拥戴，竟忘君臣之大义。以致皇考忧愤震怒，圣躬时为不豫，其切责阿其那也则有“父子之情已绝”之旨。其他忿激之语，皆为臣子者所不忍听闻。

朕以君父高年，忧怀郁结，百计为伊等调停解释，以宽慰圣

心，其事不可枚举。及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朕即位以后，将伊等罪恶，俱行宽宥，时时教训，望其改悔前愆，又加特恩，将阿其那封为亲王，令其辅政，深加任用。盖伊等平日原以阿其那为趋向，若阿其那果有感悔之心，则群小自然解散。岂料阿其那逆意坚定，以未遂平日之大愿，恚恨益深，且自知从前所为，及获罪于皇考之处万无可赦之理，因而以毒忍之心肆其桀骜之行，扰乱国政，颠倒纪纲，甚至在大庭广众之前诟朕躬，及于宗社。此廷臣所共见，人人无不发指者。

【译文】 朕即位以后，由于怀念同胞手足之情，实不忍心按父皇谕旨办。只是因为几个兄弟中如阿其那等，心怀叵测，结党营私，往往借端生事，煽动扰乱人心。所以朕打算对这些人慢慢地开导，消除他们的错误野心，使他们安静地守法过日子。那时，二阿哥也就可以从禁锢中释放出来，并给以丰厚的俸禄，作为朕的世外兄弟，这是朕的一贯志愿。所以几年以来，常常派人去送给他饮食衣服等用品，并且不让告诉他是皇上御赐，为的是不想让他们行君臣之礼。二阿哥常问送东西的太监，说：“这是皇上颁赐的吗？如果是，我应当行君臣之礼，跪拜谢恩。”而太监们总是遵照朕的旨意，不告诉他这些物品的来历。到雍正二年冬天，二阿哥生病，朕命令护卫威安宫的大臣等，到大医院选择技术高超的医生数名，任从二阿哥从中选择，给他看病。二阿哥平常懂得一些医理，便自己和医生商量决定药方。等到病势逐渐加重以后，朕派大臣前往探病。二阿哥感谢朕的关怀大恩，曾哭泣流涕地称谢说：“我本来是有罪的人，能获得善终，这都是皇上保全的恩惠。”又对他的儿子弘皙说：“我受到皇上深恩，今生无法报答，你应当竭尽全力，继续完成我这个没有完成的志愿。”等到二阿哥病势更加危险沉重的时候，朕命令用仪仗护卫他移居于五龙亭。他见了天子专用的黄轿，感激朕的恩德，用手加在额

上，口中念着佛号。以上情况，咸安宫里的宫女、太监共一百多人，都是亲眼见过的。

等到他病故以后，又追封他为亲王，一切礼仪都提高规格，并且朕还亲自前往哭吊祭祀，以抒发朕心中的悲痛。他的丧葬费用，准许动用国库，一切务必丰厚，命令大臣等尽心竭力去办理丧事。又封赐他两个儿子为王公的爵位，赏赐也特别丰厚。现在逆贼强加给朕以杀兄之名，朕在睡梦之中也不会想到有人竟会诽谤朕到这种地步的。

又如逆贼加朕以屠杀兄弟的罪名。当时阿其那因为二阿哥犯罪而被废黜，便产生了非分的想法，暗中包藏祸心，和塞思黑、允禩、允禴等结成死党。而阿其那尤其阴险诡诈，实在是个罪魁祸首；塞思黑则是个狡猾奸顽的人，阿其那差不多。允禩狂悖糊涂，允禩卑鄙可恶，都受到他们的笼络，遂结成一团牢不可破。于是他们结交匪人，蛊惑人心，而希望冒险一番或能侥幸成功的小人，便都乐意被他们利用，私下里互相吹捧谋夺皇位，竟然完全忘掉君臣大义，以致父王忧愤震怒，时常被气得病倒。父王曾非常痛切地责备阿其那，有“父子之情已经断绝”的话。其他非常忿恨激烈的话，都是臣下所不忍听闻的。

朕想到父王年岁已高，心怀忧结不畅，千方百计从中调停解释，用来宽慰父王圣心，这种事例多得无法一一枚举。等到父王驾崩那天，朕正处在悲痛之中，塞思黑突然来到朕的跟前，大刺刺地伸长着腿坐在对面，态度非常傲慢无礼。他的内心想些什么真无法测度。如果不是朕镇定忍耐，必然会引起事端。朕即位以后，把他们的一切罪行都加以宽大不究，时时教导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又特别加恩把阿其那晋封为亲王，让他辅政，加以重用。因为他们平常本来就是以阿其那为核心，如果阿其那真有改悔之意，那么小集团自然就解散了。岂料阿其那叛逆的心十分坚决，以为没有达到他平日梦想当皇帝的目的，心中的怨恨更深。而且他也知道自己以前的一些作为，以及得罪于父王的地方，是决没有赦免的道理。因而便运用狠毒残忍的心，肆意猖狂

横行，扰乱国政，颠倒国纪朝纲。甚至在朝廷之上群臣面前，诅咒谩骂朕以及国家社稷。这是朝内群臣所共同亲见的事，没有人不对这种犯上的狂徒气愤不已。

【原文】 从朕遣塞思黑往西大同者，原欲离散其党，不令聚于一处，或可望其改过自新。岂知伊怙恶不悛，悖乱如故，在外寄书允禔，公然有“机会已失，悔之无及”等语。又与伊子巧编格式，别造字样，传递京中信息，缝于骡夫衣袜之内，诡计阴谋，甚于敌国奸细。有奸民令狐士仪，投书伊处，皆反叛之语，而伊为之隐藏。其他不法之处甚多，不可胜数。

允禔赋性狂愚，与阿其那尤相亲密，听其指使。昔年因阿其那谋夺东宫之案，皇考欲治阿其那之罪，允禔与塞思黑在皇考前袒护强辩，致触圣怒，欲手刃允禔。此时恒亲王允祺抱劝而止。皇考高年，知伊愚逆之性，留京必致妄乱启衅，后因西陲用兵，特遣前往效力，以疏远之。伊在军前，贪婪淫纵，恶迹种种。及朕即位，降旨将伊唤回，伊在朕前放肆傲慢，犯礼犯分，朕悉皆曲宥，仍令奉祀景陵。竟有奸民蔡怀玺，投书伊之院中，造作大逆之言，称允禔为皇帝，而称塞思黑之母为太后。允禔见书，将大逆之语剪裁藏匿，向该管总兵云：“此非大事，可酌量完结。”即此，则其悖乱之心，何尝改悔耶！

允禔无知无耻，昏庸贪劣，因其依附邪党，不便留在京师，故令送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出口。伊至张家口外，托病不行，而私自禳祷，连书雍正新君于告文，怨望慢蔑，经诸王大臣等以大不敬题参。朕俱曲加宽宥，但思若听其闲散在外，必不安静奉法，是以将伊禁锢以保全之，伊在禁锢之所竟敢为镇魔之事，经伊跟随太监举出，及加审讯，鉴鉴可据。允禔亦俯首自认，不能更辩一词。

从前诸王大臣胪列阿其那大罪四十款，塞思黑大罪二十八款，允禔大罪十四款，又特参允禔镇魔之罪，恳请将伊等立正典刑，以彰国宪。朕再四踌躇，实不忍，暂将阿其那拘禁，降旨

询问外省封疆大臣，待其回奏，然后定夺。仍令太监数人供其使。令一切饮食所需，听其索取。不意此际阿其那遂伏冥诛，塞思黑从西宁移至保定，交与直隶总督李绂看守，亦伏冥诛。

夫以皇考至圣至慈之君父，而切齿痛心于阿其那、塞思黑等，则伊等不忠不孝之罪，尚安有得逃于天谴者乎？

【译文】 从前朕派遣塞思黑去大同办事，原想是拆散他们的小集团，不让他们聚在一起，也许可以让他们改过自新。谁知他坚持作恶，不肯悔改，仍然悖逆扰乱。在外边寄书信给允禩，公然在信里说“机会已失，悔之无及”等话。又和他的儿子巧编了一些暗语，或造一些只有自己知道的字样，传递京中的信息，并把这些情报缝到骡夫的衣服和袜子夹层里。其诡计阴谋，比敌国的奸细更狠。有个奸民名叫令狐士仪，投书信到他那里，内容都是鼓动反叛的语言，而他却对令狐士仪进行包庇隐藏。其他还有许多不法的地方，不胜枚举。

允禩本性狂妄而愚昧，和阿其那关系尤其密切，一切听阿其那指挥。当年因为阿其那谋夺东官的案件，父王准备处治阿其那的罪行。允禩和塞思黑在父王面前替他辩护，以致触怒父王，打算亲自拔刀杀死允禩。这时被恒亲王允祺抱住劝说，才平息下来。因为父王年事已高，知道允禩愚昧而忤逆的个性，如留在京师，一定要生起祸端，后来因为西方有边境战事，才特派他前往军营出力，用以疏远他。他在军队里贪婪淫纵，做了很多坏事。到朕即皇帝位以后，才下了谕旨，将他召回京师。他在朕的面前，依然十分放肆傲慢，违犯礼仪和名分，朕都一一宽大不究，仍然派他奉祀景陵。竟然有奸民蔡怀玺投书信到他家的院子里，内容有很多大逆不道的话，竟称允禩为皇帝，而称塞思黑的母亲为太后。允禩见了这书信，把其中大逆不道的话剪裁下来收藏，向管理这案的总兵说：“这不算大事，可以酌情完结案子。”从这一点来看，他悖乱的心思，何尝有一点悔改的意思呢？

允禩既无知又无耻，昏庸贪劣。因为他依附于奸党，不便

留他在京师，所以送他到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出口居住。他到张家口外，便托病不行，而暗中禳祷诅咒，接连在告文中书写雍正新君名字焚化，表现了他的怨恨和对朕的亵渎。经诸王公大臣发现，以犯大不敬罪上本参奏他，朕都加以宽容原谅。但想如果让他在外随意游荡，一定不能安分守法，所以才把他禁锢起来，以保护他不再生出是非。他在禁锢的地方，仍然不安分守己，竟敢用镇魘的邪术害人。经跟随他的太监发现检举，便加以审问，证据确凿，允禩也低头承认了这事，无法作一句辩解。

以前诸位王公大臣共列举了阿其那大罪四十条，塞思黑大罪二十八条，允禩大罪十四条，又特别参奏允禩搞镇魘的事，请求把他们立正典刑，以彰明国法。朕心中再四踌躇，确实有些不忍用刑。因此暂时把阿其那拘禁起来，又下谕旨给各省总督、巡抚，让他们对如何处理发表看法，等他们回奏以后，再作出最后决定。同时仍然派了太监数人，供阿其那使唤，一切饮食用物，听凭他随便索要。不料这时阿其那受到阴司惩罚而死去。塞思黑从西宁移到保定，交给直隶总督李绂看守，也受到阴司惩罚而死。像皇父那样非常圣明非常仁慈的君主，尚且深切痛心于阿其那、塞思黑等人，那么他们犯下了不忠不孝的大罪，怎么还能逃掉上天的惩罚。

【原文】 朕在藩邸，光明正大，公直无私，诸兄弟之才现实不及朕，其待朕悉恭敬尽礼，并无一语之争竞，亦无一事之猜嫌，满洲臣工及诸王门下之人，莫不知者。今登大位，实无丝毫芥蒂于胸中，而为报怨泄愤之举，但朕继承列祖皇考基业，负荷甚重，其有关于宗庙社稷之大计，而为人心世道之深忧者，朕若稍避一己之嫌疑，存小不忍之见，则是朕之获罪于列祖皇考者大矣。古人大义灭亲，周公所以诛管蔡也，假使二人不死，将来未必不明正典刑。但二人之死，实系冥诛，众所共知共见。朕尚未加以诛戮也。至于朕秉公执法，锄恶除奸，原不以诛戮二人为讳，若朕心以此为讳，则数年之中，或暗赐鸩毒，或遣人伤害，

随时随地皆可陨其性命，何必咨询内外诸臣，众意金同而朕心仍复迟回不决，俾伊等得保首领以歿乎？至允禩、允禵将来作何归结，则视乎本人之自取，朕亦不能预定。而目前则二人现在也。

朕之兄弟多人，当阿其那等结党之时，于秉性聪明，稍有胆识者，则百计笼络，使之人其匪党，而于愚懦无能者，则恐吓引诱，使之依附声势，是以诸兄弟多迷而不悟，堕其术中。即朕即位以后，而怀藏异心者，尚不乏人，朕皆置而不问。朕之素志，本欲化导诸顽，同归于善，俾朝廷之上，共守君臣之义，而宫廷之内，得朕兄弟之情，则朕全无缺陷，岂非至愿。无如伊等恶贯满盈，获罪于上天、皇考，以致自速冥诛，不能遂朕之初念。此朕之大不幸，天下臣庶，当共谅朕为国为民之苦心，今逆贼乃加朕以屠弟之名，朕不辩亦不受也。

【译文】 朕在藩邸时，光明正大，正直无私，各位兄弟的才能和见识，确实不如朕。他们待朕都恭敬尽礼，并不因一句话而争论，也不因一件事而猜疑，满洲的臣下和侍从和诸王属下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的。朕今天登上皇帝之位，实在并没有一丝一毫芥蒂存在于心里，以致对他们做出报怨泄愤的行为。但是朕既然是承袭了列位皇祖留下的基业，担子是很重的，其中有关国家社稷安危的大事，受到人心和世道深为担忧的事，朕如果为了避免自己的嫌疑，存在着一点不忍的私心，那么反而使朕大大得罪于列位皇祖在天之灵了。古人就有“大义灭亲”的说法，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就是这样。假如阿其那、塞思黑二人不死，将来也未必不明正典刑，但是二人之死确实是受了阴司惩罚，这是很多人亲眼见到的，朕还没有来得及对他们执行杀戮。至于朕秉公执法，锄恶除奸，本来就不怕杀了他二人被别人说闲话。如果朕心中存有不敢公开杀死他们的心思，那么在拘禁他们的几年里，或者暗用毒药，或者派人伤害，随时随地都可以害他们性命，何必发旨征求内外大臣们的意见呢？大家意见一致认为该杀，而朕内

心仍然迟疑不决，仍使他们得以保全头颅落个全尸而死！至于允禩、允禩将来结果如何，则要看他们本人的表现行为，朕也没法预定，而这二人目前还活着。

朕的兄弟很多，当阿其那等勾结党羽营私时，对于头脑聪明，稍有胆识的，便千方百计地去笼络，使他加入他们的匪党；对于懦弱无能的，则采用恐吓和引诱的方法，使他去依附他们，以壮大他们的声势。因此各位兄弟大都受到他们的迷惑而不省悟，落入他们的圈套。即使在朕即位以后，而心中包藏着叛逆之心的，还不止一两个人，朕对这些都放置一边不问。朕的一贯志愿，是希望化导他们顽固思想，一同归于善美。使得在朝廷里面，共同谨守君臣的道义，在宫廷里面，朕享得兄弟之情，那么朕就不会感到有什么了。这不是朕最大的愿望。怎奈他们恶贯满盈，获罪于上天和皇父，以致自己加速自己受到神的惩罚，不能顺遂朕当初的心愿，这实在是朕的一大不幸。天下的臣子百姓，一定要都谅解朕这种为国为民的苦心。现在逆贼强加给朕以杀弟的罪名，这一件事，天下后世自有公断，朕不打算辩解，也决不接受这种诬谤的说法。

【原文】 至逆书谓朕为贪财，朕承皇考六十余年太平基业，富有四海，府库充盈，是以屡年来大沛恩泽，使薄海黎庶，莫不均沾。如各省旧欠钱粮，则蠲免几及千万两，江南、江西、浙江之浮粮，则每年减免额赋六十余万两。地方旱涝偶闻，即速降谕旨，动帑遣官，多方赈恤，及灾伤勘报之后，或按分数蠲除，或格外全行豁免。今年又降谕旨，被灾蠲免分数，加至六分七分。至于南北黄运河工堤工，兴修水利，开种稻田，以及各省建造工程，备办军需，恩赐赏赉，所费数百万两，皆内动支帑项，丝毫不使扰民。夫以额征赋税，内库帑金减免支给如此之多，毫无吝惜，而谓朕为贪财，有是理乎？

只因从前贪官污吏，蠹国殃民，即置重典，亦不足以蔽其辜。但不教而杀，朕心有所不忍，故曲宥其死，已属浩荡之恩，

若又听其以贪婪横取之资财肥身家，以长子孙，则国法何存，人心何以示儆？况犯法之人，原有籍没家产之例，是以将奇贪极酷之员，照例抄没，以彰宪典，而惩贪污，并使后来居官者，知赋私之物，不能入己，无益有害，不敢复蹈故辙，勉为廉吏，此朕义安百姓，整饬吏治之心。今乃被贪财之谤，岂朕不吝惜于数百万之帑金，而转贪此些微之赃物乎？

至于属员，虚空钱粮，有责令上司分赔者，盖以上司之于属吏有通同侵蚀之弊，有瞻徇容隐之风，若不重其责成，则上司不肯尽察吏之道，而侵盗之恶习无由而止。是以设此惩创之法，以儆惕之。俟将来上官皆能察吏，下寮群知奉公，朕自有措施之道。若因此而谤为贪财，此井蛙之见，焉知政治之大乎？

至逆书谓朕好杀，朕性本最慈，不但不肯妄罚一人，即步履之间，草木蝼蚁，亦不肯践踏伤损。即位以来，时刻以祥刑为念，各省爰书及法司成讞，朕往复披览，至再至三，每遇重犯，若得其一线可生之路，则心为愉快，倘稍有可疑之处，必与大臣等推详讲论，期于平允。

六年以来，秋审四经停决，而廷议缓决之中，朕复降旨，察其情罪稍轻者，令行矜释，其正法及勾决之犯，皆大逆大恶之人，万万法无可贷者。

夫天地之道，春生秋杀。尧舜之政，弼教明刑。朕治天下，原不肯以妇人之仁，弛三尺之法。但罪疑惟轻，朕心慎之又慎，惟恐一时疏忽，致有丝毫屈枉之情，不但重辟为然，即笞杖之刑，亦不肯加于无罪者，每日诚饬法司，及各省官吏等，以钦恤平允为先务。今逆贼谓朕好杀，何其与朕之存心行政相悖之甚乎？

【译文】 至于逆书又攻击朕是个贪财的人。朕继承了父皇六十多年的太平基业，富有整个国家，各地国库充盈丰裕，所以几年来屡次施加恩惠，使全国黎民百姓没有不得到利处的。比如各省过去欠的钱粮，就豁免了几乎有几千万两。江南、江西、浙江等

省的浮粮，则每年减免田赋六十余万两。有的地方偶然发生旱灾或水灾，便立刻发下谕旨，动用国库，派遣官员，多方面地去赈济抚恤受灾百姓。到灾情详细报来以后，按照情况或者按比例免除田赋，或者完全豁免。今年又降下谕旨，将遭灾地区减免赋税的比例，加到六至七分。至于南北的黄河和运河的河工、堤工，兴修水利，开种稻田，以及各省的建造工程，置备军需，以及特恩赏赐等，共需花费几百万两银子，全部动用国库开支，丝毫不准向百姓征收，以防扰害百姓。征收赋税向来都有定额，国库和皇室内库的库藏减免和动用这么多，没有一点吝惜，竟然说朕贪财，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

只是因为从前贪官污吏祸国殃民，即使把他们处以极刑，也不足以抵得上他们的罪恶。但是如果不加教育而杀掉他们，朕心中实在有些不忍，所以采取宽大处理免去死罪，这已经是很大的恩惠了。如果又听任他们把贪污得来的财物养肥自己身家以及留给子孙，那么国法何在？人心如何以此为警戒？况且对犯法的人原来就有抄没家产的定例，所以要把奇贪极酷的官员，依例抄没家产，以申国法，以惩治贪污。并且使后来做官的人，知道赃私的东西不能侵吞归己，否则有害而无益，而使他们不敢重蹈覆辙，努力去做一个清廉官吏。这是朕为了爱护百姓、整饬吏治的措施，如今竟被作为贪财的表现而进行诽谤。岂有朕不吝惜千百两的库金，反而去贪这些微小的赃物吗？

至于下属官吏亏空赋税钱粮，有责令上司分赔的情况，是因为上司和所属吏员，往往有共通作弊侵吞，或者包庇纵容的邪风。如果不追究他的责任，那么上司便不肯尽力监督手下的办事官吏，而侵吞公款贪污盗窃的邪风也没办法制止。所以才设立这种惩办方法，以劝戒警告他们。等到将来上官都能认真监督下属，下属都知道廉洁奉公，朕还自有新的措施。如果因为这一点，便诽谤朕是贪财的人，这实在是井底之蛙的浅见，怎能知道政治手段的高深博大呢？

至于逆书又攻击朕生性好杀。朕的本性是最仁慈的，不但不

肯随便惩罚一个人，即使在走路时，连草木蝼蚁，也都不肯去践踏伤害。自即位以来，时时刻刻以谨慎用刑为宗旨。各省上报的犯人口供文书以及法司定罪的意见，朕总是反复阅读，往往看两三遍。每遇到死刑重犯的案件，如果从中可以找出他还有一线生机之路，朕心中总是十分愉快。如果稍有可疑之处，一定和大臣们仔细商量推究，务必求得判刑公平适当。

六年以来，每逢秋天判决死刑犯时，有四次下谕停止执行，而在朝廷内讨论暂缓处决的犯人时，朕又降旨，考察其中罪行较轻的，命令可以不杀。那些被正法和勾决的犯人，都是大逆大恶，法律上万万难以宽大的人。

天地的规律是春生秋杀，尧舜的政治，是明确刑法把它当做教育的辅助工具。朕治理天下，本来不肯以妇人般的小恩小惠，而废弛三尺刑法。但是对判刑都要从轻处着想，朕心中是慎之又慎的，惟恐因为一时的疏忽大意，而产生一丝一毫冤屈的情况。不但对于死罪重刑是这样，即使判杖打的，也不肯随便加到无罪的人身上。每天都告诫司法官员和各省地方官吏等人，都要以体恤百姓处理公正为第一要紧的事。现在逆贼竟说朕生性好杀，怎么和朕的存心以及实行的政治相差得那么远呢？

【原文】 又逆书谓朕为酗酒，夫酒醒之设，圣贤不废。古称尧千钟，舜百榼，《论语》称孔子惟酒无量，是饮酒原无损于圣德，不必讳言。但朕之不饮，出自天性，并非强致。而然前年提督路振扬来京陛见。一日忽奏云：“臣在京许久，每日进见，仰瞻天颜，全不似饮酒者，何以臣在外任，有传闻皇上饮酒之说。”朕因路振扬之奏，始知外闻有此浮言，为之一笑。今逆贼酗酒之说，即此类也。

又逆书谓朕为淫色。朕在藩邸，即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远色二字，朕实可以自信，而清王大臣近侍等，亦共知之。今乃谤为好色，不知所好者何色？所宠者何人？在逆贼既造流

言，岂无耳目，而乃信口讥评耶！

又逆书谓朕为怀疑诛忠。朕之待人，无一事不开诚布公，无一处不推心置腹，胸中有所欲言，必尽吐而后快，从无逆诈，亿不信之事。其待大臣也，实视为心膂股肱，联络一体，日日以至诚训诲臣工。今诸臣亦咸喻朕心有感孚之意。至于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则朕之所诛戮者也。年羹尧受皇考及朕深恩，忍于背负，胸怀不轨，几欲叛逆。其贪酷狂肆之罪，经大臣等参奏九十二条，揆以国法，应置极刑。而朕犹念其西藏、青海之功，从宽令其自尽；其父兄俱未处分，其子之发遣远方者，今已开恩赦回矣。

鄂伦岱、阿灵阿实奸党之渠魁。伊等之意，竟将东宫废立之权，俨若可以操之于己。当阿其那恶迹败露之时，皇考审询伊之太监，比将鄂伦岱、阿灵阿同恶共济之处，一一供出，荷蒙皇考宽者之恩，不加诛灭。而伊等并不感戴悔过，毫无畏惧，愈加亲密，鄂伦岱仍敢强横踞傲，故意触犯皇考之怒。当圣躬高年颐养之时，为此忿懣恚恨，臣工莫不切齿。

阿灵阿罪大恶极，早伏冥诛。伊子阿尔松阿，仿效伊父之行，更为狡狴。朕犹念其为勋戚之后，冀其洗心涤虑，以盖前愆，特加任用，并令管理刑部事务。而伊逆心未改，故智复萌，颠倒是非，紊乱法律。一日审理刑名，将两造之人，用三木各夹一足，闻者皆为骇异。又与鄂伦岱同在乾清门，将朕所降谕旨掷之于地，其他狂悖妄乱之处，不可殫述。朕犹不忍加诛，特命发往奉天居住，使之解散其党羽，尚可曲为保全，岂料二人到彼全无悔悟之念，但怀怨望之心，而在京之邪党，仍然固结，牢不可破。朕再四思维，此等巨恶，在天理国典，断不可赦，于是始将二人正法。

至于苏努则老奸大蠹，罪恶滔天，实逆党之首恶。隆科多则罔上欺君，款迹昭著。二人皆伏冥诛，未膺显戮。逆书之所谓怀疑诛忠者，朕细思朕于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三人之外，并未诛戮忠良之大臣。想逆贼即以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苏

努、隆科多等为忠良乎？天下自有公论也。

又逆书谓朕为好谏任佞。朕在藩邸四十余年，于人情物理，熟悉周知，谗谄面谀之习，早已洞察其情伪，而厌薄其卑污。不若冲幼之主，未经阅历者也。是以即位以来，一切称功颂德之文，屏弃不用，不过臣工表文，官员履历，沿习旧日体式，作颂圣之句，凑合成章，朕一览即过，不复留意。日日训谕大小臣工，直言朕躬之阙失，详陈政事之乖差，以忠谏为先，以迎合为戒。是以内外诸臣，皆不敢以浮夸颂祷之词见诸言奏，恐为朕心之所轻。今逆贼之所谓好谈任佞者，能举一人一事以实之否耶？

以上诸条，实全无影响，梦想不及之事，而逆贼灭绝彝良，肆行诋毁者，必有与国家为深仇积恨之人捏造此言惑乱众听。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之奸党，被朕惩创拘禁，不能肆志，怀恨于心，或贪官污吏，匪类棍徒，怨朕执法无私，故造作大逆之词，泄其私愤。且阿其那、塞思黑当日之结党肆恶，谋夺储位，也于皇考则时怀忤逆背叛之心。于二阿哥则极尽摇乱倾陷之术，因而嫉妒同气，排挤贤良，入其党者，则引为腹心；远其党者，则视为仇敌。又如阿其那，自盗廉洁之名，而令塞思黑、允禩、允禴贪赋犯法，横取不义之财，以供其市恩沽誉之用。且允禴出兵在外，盗取军需银数十万两，屡次遣人私送与阿其那，听其挥霍。前允禴之子供出，阿其那亦自认不讳者。又如阿其那残忍成性，逐日沉醉。当朕切加训诫之时，尚不知改。伊之护军九十六，以直言触怒，立毙杖下，长史胡什吞，亦以直言得罪，痛加箠楚，推入水中，几至殒命。允禴亦素性嗜酒，时与阿其那沉湎轻生。允禴又复渔色宣淫，不知检束，以领兵之重任，尚取青海台吉之女，及蒙古女子多人，恣其淫荡，军前之人谁不知之？

【译文】 又逆书说朕性好酗酒。酒是祭祀和宴会必须安排准备的，即使是圣贤，也不废除饮酒。古时称“尧千盅，舜百榼”。《论语》里也说孔子“唯酒无量”。所以饮酒本来对圣人的道德就

没有什么损害，所以不必讳言。但是朕不喝酒，却是天生的习性，并不是自己不喝。前年提督路振扬进京朝见，一天忽然启奏说：“臣在京很久，每天进见皇上，仰看皇上容颜，完全不像喝过酒的。为什么臣在外省任上时，有传闻皇上饮酒的说法？”朕因为路振扬这次启奏，才知道外边有这种不实的传说，也只一笑了之。现在逆贼诽谤朕酗酒，就是这一类谣言的反映。

又逆书说朕好色贪淫。朕在身为雍亲王时，便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便不好性欲。即位以后，皇宫内的宫女很少，朕常常自以为天下人不好色的，没有能比得上朕的。“远色”两个字，朕完全可以自信。而且各王公大臣和侍从们也都知道。而今却诽谤朕好色，不知所好的什么色？所宠的又是什么人？逆贼既然能制造流言蜚语，难道就没有一点耳目，便只是信口胡诌加以讥讽吗？

又逆书里说朕生性好怀疑而滥杀忠良。朕对待别人，没有一件事不是开诚布公的，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推心置腹的。心中想说什么话，一定要全部吐露出来才感到痛快，从来没有做过欺诈和不讲信用的事。至于对待大臣，确实把他们看成心腹和臂膀，结成了一个整体。天天用至诚来教育臣子和侍从，如今诸臣也都明白朕的这种用心，都非常信服。至于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则是朕下令处死的。年羹尧受到父皇和朕的深恩，竟然忍心背负，胸中怀有不轨的想法，几乎要发动叛乱，他的贪脏和残暴的罪行，经大臣们参奏，竟有九十二条之多。依照国法，应当处以极刑，而朕念他在西藏、青海的武功，从宽处理，让他自尽。他的父兄都没有受到处分，他的儿子流放到边远地区，现在已经开恩放回。

鄂伦岱、阿灵阿则确实是奸党的首要头目。他们的想法，把东宫废立的权力，好像就操纵在他手里一样。当阿其那罪行败露的时候，父王审问其官中的太监，太监才把鄂伦岱、阿灵阿共同作恶的事一一招供出来。蒙受父王的开恩宽大，没有加以诛杀，可是他们并没有感恩悔过，一点也不害怕，反而更亲密地抱成一团。鄂伦岱依然十分强横傲慢，故意去触动父王的发怒。当父王

年龄老大需要静心休养的时候，还要为了这事心情十分愤懑，而臣子和侍从对他们无不切齿痛恨。

阿灵阿罪大恶极，早已受到阴司的惩罚而死。他的儿子阿尔松阿却仿效其父亲的行为，更加狡猾奸诈。朕想到他是有功勋的皇戚后代，希望他能洗心革面，以弥补从前的过错，特别加以任用为官，并让他管理刑部事务。而他叛逆的心却一点不改，故态复萌，颠倒是非，混乱法律。有一天审问案件，竟然不问是非，用大刑把原告和被告各夹住一只脚，听到这事的人没有一个不骇异的。又和鄂伦岱一同在乾清官门外边，把朕所下的谕旨扔到地上，其他狂妄忤逆的事情还很多，不能一一尽述。朕还不忍对他诛杀，特下令流放到奉天居住，使他们的党羽分散，还可以保全他们不再犯罪。而他们二人却全无悔改之心，仍然怀着对朕的积怨，他们在京的党羽，仍然结成一团，牢不可破。朕再四地考虑，像这种罪大恶极的人，在天理和国法上都是绝对不可赦免的，于是才把他们二人正法。

至于苏努，则是个老奸巨滑的贼子，罪恶滔天，实在是逆党的头号恶人。隆科多则欺君罔上，罪状所列条款都十分明白。二人都受到阴司冥诛病死，并没有受国法处以死刑。逆书里说的所谓朕生性好疑而诛杀忠良，朕细想朕除了杀过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三人以外，并没有杀过任何忠良大臣，因此想逆贼大概是把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苏努、隆科多等当成忠良吧！这一点天下自会有公平的评论。

又逆书中说朕爱好阿谀奉承而任用奸佞。朕身为藩王达四十余年，对于人情事故知道得十分详细，对于进谗言和谄媚的世俗习惯，早已十分清楚明白其虚伪并十分讨厌其卑鄙污浊，不像那些还在童孩时便当了皇帝没一点阅历的人。所以自即位以来，一切称功颂德的文章，都抛弃不用。不过臣子们的奏章和官员们的履历，都沿用过去的老套子，夹杂一些颂扬皇帝的词句，凑合成文章。朕总是一看带过，不再留意。并天天训谕大小官员和侍从，要敢于直言朕的缺点和过失，详细议论政事上出现的错误和

不足。要以忠言为第一，以迎合皇帝的心理为戒。所以内外诸臣，都不敢把浮夸颂扬的词句写入奏章或口头说出，恐怕被朕所讨厌而轻视。现在逆贼说的所谓朕爱好阿谀奉承而任用奸佞之人，那么，能够举出一人一事来证实一下吗！

以上各条，实际上全是毫无根据连做梦想不到事，而逆贼等灭绝天良，猖狂进行诋毁，一定是对国家心怀深仇大恨的人所捏造的，以困惑乱百姓视听。比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一伙的奸党，因为被朕惩办拘禁，不能任意胡为，所以才怀恨在心。或者是贪官污吏、流氓无赖等匪徒，怨恨朕执法无私，所以才捏造了这些大逆不道的谣言，以泄他们的私愤。况且阿其那、塞思黑当年结党营私，谋夺皇储位子，对父王时刻怀着忤逆背叛的黑心，对二阿哥则极尽动摇陷害的手段。他们怀着嫉妒的心理，排挤贤良。凡参加他们小集团的，便被看成是心腹，疏远他们的便被看成是仇敌。又如阿其那自己假作廉洁以沽名钓誉，却去指使塞思黑、允禩、允禴等去贪赃枉法，强横夺取不义之财，以供他赏赐别人，施加小恩小惠之博取名誉使用。而且允禴领兵在外，盗取军需银几十万两，多次派人私自送给阿其那，供他挥霍，这是前些时允禴的儿子招供出来的，阿其那自己也承认了事实。又如阿其那性情非常残忍，整天喝得醉醺醺的。朕对他诚恳的训诫，他仍不知道改悔。他的卫士九十六（人名）因为直言触怒了他，被他立刻用刑杖打死。长史胡什吞也是因直言得罪了他，便痛加鞭打，并推到水中，差一点死去。允禴也性喜饮酒，时常和阿其那在一起豪饮不顾性命。允禴又好色宣淫，不加约束。身为领军统帅，还取要了青海台吉的女儿和蒙古女子多人，留在军中供他淫乐。军队里的人哪个不知此事！

【原文】 今逆书之毁谤，皆朕时常训海伊等之事，伊等即负疚于心，而又衔怨于朕，故即指此以为訛谤之端，此鬼蜮之伎俩也。且伊等之奴隶太监，平日相助为虐者，多发遣黔粤烟瘴地方，故于经过之处，布散流言。而逆贼曾静等，又素怀不臣之

心，一经传闻，遂借以为蛊惑人心之具耳。

因储位未定，奸宄共生覬觐之情，是以皇考升遐之后，远方之人皆以为将生乱阶，暗行窥伺。及朕缙承大统，继志述事，数年以来幸无失政。天人协应，上下交孚，而凶恶不轨之徒，不能乘间伺觉，有所举动，逆志迫切，自知无得逞之期，遂铤而走险，甘蹈赤族之罪，欲拼命为疑人耳目之举耳。殊不知实于朕无损也。

又逆书云“明君失德，中原陆沉，夷狄乘虚入我中国，窃据神器”等语。我朝发祥之始，天生圣人起于长白山，积德累功，至于太祖高皇帝，天赐神武，谋略盖世，法令制度，规模弘远。是以统一诸国，遐迹归诚，开创帝业。迨太宗文皇帝，继位践祚，德望益隆，奄有三韩之地，抚绥蒙古，为诸国之共主。是本朝之于明，论报复之义，则为敌国，论交往之礼，则为与国。本朝应得天下，较之成汤之放桀，周武之伐纣，更为名正而言顺，况本朝并非取天下于明也。

崇祯殉国，明祚已终，李自成僭伪号于北京，中原涂炭，咸思得真主，为民除残去虐。太宗文皇帝不忍万姓沉溺于水火之中，命将兴师，以定祸乱。干戈所指，流贼望风而遁。李自成为追兵所杀，余党解散。世祖章皇帝驾入京师，安辑畿辅，亿万苍生成获再生之幸，而崇祯皇帝始得以礼殡葬。此本朝之为明报怨雪耻，大有造于明者也。是以当时明之臣民，达人智士，帖然心服，罔不输诚向化。今之臣民，若果有先世受明高爵厚禄，不忘明德者，正当感戴本朝为明复仇之深恩，不应更有异说也。况自甲申，至今已八十余年，自祖父以及本身，履大清之土，食大清之粟，而忍生叛逆之心，倡狂悖之论乎？

【译文】 现在逆书里进行的诋毁诽谤，都是朕时常训诫教育他们的事。他们既内疚于心，又对朕怨恨，所以便把这些事强加到朕身上进行诽谤，实在是鬼域的伎俩呀！况且他们的奴仆太监，平常帮助他助纣为虐的人，大都被流放到两广、贵州等边远烟瘴

地区，所以他们便在经过的地方，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而逆贼曾静等人，平素又怀着叛逆之心，一听到这些传闻，便借以用作蛊惑人心的工具。

过去因为皇储没有确定，奸诈之徒便都生了覬觎的念头，所以在父王驾崩以后，远方的人都以为将要发生动乱，便暗中窥伺时机。等到朕继承皇位以后，遵照父王遗志处理政务。几年以来，庆幸没有出现什么过失，天意和民心一致，上下协调相互信赖。因而图谋不轨的凶徒，不能够趁机有什么举动。而他们叛逆的心思非常迫切，自念没有得逞的机会，因此不顾一切铤而走险，甘心冒着灭族大罪的危险，打算拼命造谣以迷惑人的耳目。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这种谣言实在对朕是起不到一点损害的。

又逆书里说“明朝的君王丧失了道德，以致中原沦陷，夷狄少数民族乘虚侵入中国，窃取了帝位”等话。我大清朝发祥的开始，是上天降生圣人，兴起于长白山，积累了很多德行和武功。到太祖高皇帝时，上天赋予神圣的武功，谋略盖世无双，法令制度的设置，规模弘大，见识深远，所以统一了东北各民族和部落，而开创了帝业。到太宗文皇帝继承帝位以后，三韩地方也都来臣服，蒙古也受到绥抚，被诸国共同尊为主。所以本朝和明朝的关系，从报复的意义上讲，则是敌国；从交往的礼节上来讲，则是平等友邦。所以本朝得以统一中国天下，比成汤的放逐夏桀，周武王的讨伐殷纣，更为名正言顺，不像他们是以臣伐君。何况本朝并不是取天下于明朝手中。

崇禎殉国以后，明朝便已结束了。李自成称皇帝于北京，中原百姓遭受涂炭，都一致地希望真命天子出世来为民除残去暴。我太宗文皇帝不忍心见万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便命令将军兴兵，去平定祸乱。锋芒所到之处，流寇望风而逃。李自成被追兵所杀，余党也随着解体。世祖章皇帝御驾进入北京，安定整顿了京师附近的地方。亿万百姓都欢欣能获得再生，而崇禎皇帝才得到依礼加以殡葬。这表明本朝为明朝报仇雪耻，是大有贡献于明朝的。所以当时明朝的臣民和有见识的人士，都帖然心服，没有

不竭诚拥护本朝的。今天在世的臣民们，如果有祖先在明朝时受过高官厚禄，而不能忘记明朝恩德的，正应当感谢本朝为明朝复仇的深恩，不应该再有其它怪异的说法。况且自甲申年明亡以来，至今已八十多年了，一个人从他祖父到他自己，都是居住在大清的土地上，吃大清的粮食，怎能忍心生出叛逆的念头，倡导一切狂悖的言论呢？

【原文】 逆书云：“夷狄异类，譬如禽兽。”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义存心。若僻处深山旷野之夷狄番苗，不识纲维，不知礼法，蠢然漠然，或可加之以禽兽无异之名。至于今日蒙古四十八旗，喀而喀等，尊君亲上，慎守法度，盗贼不兴，命案罕见，无奸伪盗诈之习，有熙皞宁静之风，此安得以禽兽目之乎？若夫本朝，自关外创业以来，存仁义之心，行仁义之政，即古昔之贤君令主，亦罕能与明朝伦比。且自入中国，已八十余年。敷猷布教，礼乐昌明，政事文学之盛，灿然备举，而犹得谓为异类禽兽乎？

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是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诸夏之亡，君即为禽兽之类。宁在地之内外哉！《书》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本朝之得天下，非徒事兵力也。太祖高皇帝开创之初，甲兵仅十三人，后合九姓之师，败明四路之众。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师时，兵亦不过十万，夫以十万之众，而服十五省之天下，岂人力所能强哉？实道德感孚，为皇天眷顾，民心率从，天与人归。是以一至京师，而明之臣民，咸为我朝效力驰驱。其时统领士卒者，即明之将弁，披坚执锐者，即明之甲兵也。此皆应天顺时，通达大义，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而其人亦标名竹帛，勒勋鼎彝，岂不谓之贤乎？而得以禽兽目之乎？

及吴三桂反叛之时，地方督抚提镇，以至县令武弁攻城破敌，转饷挽粮，多半汉人也。且多临阵捐躯，守土殉节者，国史不胜其载，历历可数。又如三次出征朔漠，宣力行间，赞襄荡平

之勋者，正复不少。岂不谓之忠且义乎？而得以禽兽目之乎？即如岳钟琪，世受国恩，忠诚义勇，克复西藏，平定青海，屡奏朕切，赤心奉主，岂非国家之栋梁，朝廷之柱石乎？

如逆贼曾静者，乃汉人之禽兽也。盖识尊亲之大义，明上下之定分，则谓之人。若沦丧天常，绝灭人纪，则谓之禽兽。此理之显然者也。且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孟子云：“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本其所生而言，犹今人之籍贯耳。况满洲人皆耻附于汉人之列，准噶尔呼满洲为蛮子，满洲闻之，莫不忿恨之，而逆贼以夷狄为诮，诚醉生梦死之禽兽矣。

【译文】 逆书上说：“夷狄民族是个异类，应当骂为禽兽。”人和禽兽不同的地方是很小的，主要看他的存心。君子是以仁存在心中，以义存在心中。如果居住在深山僻境的夷狄番苗，不懂得国家纲常，不知道礼法，蠢愚无知，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与禽兽无异。至于今天的蒙古四十八旗、喀尔喀部落等，他们能尊亲君王，谨慎地遵守法制，没有盗贼，命案十分稀少，没有奸伪诈骗的习惯，到处一片光明祥和宁静太平的景象。像这样的少数民族，能把他们比作禽兽吗？又如本朝自关外创业以来，存着仁义的思想，实行仁义的政治，即使古代著名的贤德君主，也很少能和我朝相比配的。而且自统一中国以来，已经八十多年，筹划富国的大计，广施仁爱教化，礼乐昌明，政治和文学的兴盛，更是光彩夺目，这样还能说是和禽兽无异吗？

孔子说过：“夷狄也会有了英明君主，中原地区也会有亡国昏君。”所以夷狄有英明君主，就可成为圣贤一样的人；中原的亡国昏君，也就和禽兽没什么区别，怎么能根据地域的内外来评判！《书经》上说：“上天不偏爱任何人物，只保护有仁德的人。”本朝所以能取得天下，并不是全靠兵力去征服的。太祖高皇帝开始创业时，只有十三个士兵，后来汇合九姓部落的军队，击败了明朝的四路大兵。至世祖章皇帝进入京师时，兵力才不过十万。要拿十万人的军队，去征服十五省的天下的天下，这岂是人力所能做到

的！实质是由于能实行道德和诚信，才被上天保护，百姓也都来拥护，天心人心都归向本朝。所以一到京师，明朝的臣子和百姓，都努力为本朝效力和奔走。当时，统帅士兵的，就是原来明朝的将官；披甲执枪的，就是原来明朝的士兵。这些都顺应天时，通晓大义，才辅佐本朝完成一统天下的太平基业，而这样的人也名垂竹帛，记功于鼎彝，怎么能不说他们是贤明的人？难道还可以用禽兽来看待他们吗？

到后来吴三桂叛乱时，地方上的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文武官员，以至到县令和武弁，为讨伐叛逆尽心尽力，攻城破敌，运送粮饷，大都也是汉族人。而且有很多人临阵捐躯，为守护国土而光荣殉国。国史里记载也记载不完的，这些事例到处可见。又如三次出征沙漠，在军队中效力，参赞军机而获得功勋的汉人，也不少。这些人难道不应该说他们是忠义的人吗？还可以用禽兽去看待他们吗？像岳钟琪这样的人，世代受国家恩惠，忠诚义气而又勇敢威武，克复西藏，平定青海，多次建立功勋，多次上奏忠谏之言赤心报效朝廷，这样的人岂不是国家的栋梁、朝廷的柱石吗？

而像逆贼曾静等人，才真正是汉族人中间的禽兽！凡是懂得尊敬爱护君王的大义，明白上下关系的定分，就可以称做人；如果丧失伦常，灭绝人性，就可以称做禽兽。这道理是十分明显的。

而且对于“夷狄”这词，本朝并不忌讳。孟子说过：“舜，是东夷的人；文王，是西夷的人。”这是从其出生地来说的，这就和人有籍贯一样。何况满洲人都以依附于汉族人为羞耻，准噶尔人称满洲人为蛮子，满洲人听到后，没有不忿恨的。而逆贼以为用夷狄是一种贱视的称呼，真是醉生梦死不明世理的禽兽了。

【原文】 本朝定鼎以来，世祖十八年建极开基，圣祖六十一年深仁厚泽。朕即位以后，早夜忧劳，无刻不以闾闾为念，是以上天眷佑，雨暘时若，奸宄不兴，寰宇享升平之福。在昔汉、唐、

宋极治之时，不过承平二三十年，未有久安长治如今日者。百姓自龆髫之年，至于白首，不见兵革，父母妻子家室完聚，此非朝廷清明庶绩咸熙之所致乎？且汉、唐、宋、明之世，幅员未广，西北诸处，皆为劲敌，边警时间，烽烟不息。中原之民，悉索敝赋，疲于奔命，亦危且苦矣。今本朝幅员弘广，中外臣服，是以日月照临之下，凡有血气，莫不额手称庆，歌咏太平。而逆贼谓乾坤反复，黑暗无光。此又瘦犬鷓鴣之吠鸣，禽兽中之最恶者矣。

或逆贼之先世为明代之勋戚，故恋恋于明乎，今昌平诸陵，禁止樵采，设户看守，每岁遣官致祭。圣祖屡次南巡，皆亲谒孝陵奠爵，实自古所未有之盛典，朕又继承圣志，封明后以侯爵，许其致祭明代陵寝，虽夏、商、周之所以处胜国之后，无以加矣。若逆贼果心念前明，更当感切肺腑，梦寐之中，惟本朝崇奉，而犹云：“内中国而外夷狄乎？”此逆贼也。非惟在本朝为汉人之禽兽，即在明代，亦一禽兽，且其意非仅比本朝为禽兽，其视明代亦一漠不相关之禽兽耳。

【译文】 本朝自建国以来，世祖开创基业在位十八年，圣祖在位六十一年，仁德非常深厚。朕即位以后，日夜忧劳，没有一刻不挂念着民间百姓。所以受到上天的爱护保佑，风调雨顺，奸宄不兴，全国共享太平幸福。在过去汉、唐、宋各朝国家最兴旺的时候，也不过太平二三十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长治久安的。百姓们从婴儿时代开始，一直到成为白发老翁，一辈子不经历过兵灾战祸，父母妻子家庭完聚。这难道不是因为朝廷政治清明，成绩显明的表现吗？而且在汉、唐、宋、明的朝代，中国地域还不广大，西北等地部落都是强大的敌人，边疆的警报不断听到，烽火连年不熄。中原的百姓，常常担负着很重的赋税，疲于奔命，也实在危险和艰苦得很了！现在我朝幅员广大，中外各国都臣服我朝，所以在日月照临的光明盛世，凡是有血气的人，没有不举手加额而庆是因为，歌颂太平盛世的。而逆贼却说什么乾坤

反覆，黑暗无光，这真是好像疯狗和夜枭一样的吠叫，是禽兽中最可恶的东西了。

逆贼的祖先是明朝的勋臣或皇戚，所以才对明朝恋恋不舍吗？今天昌平县明朝的皇陵，禁止百姓进去打柴，并设立门户派人看守，每年还要派官员去祭祀。圣祖几次南巡，都亲自到南京的明孝陵祭奠，实是自古以来从没有的盛典。朕又继承圣祖遗志，封明代皇帝后人为侯爵，并允许他们到明朝皇陵祭奠。这种恩典，即使在夏、商、周时，处理亡国君主的后代，也不能超过今天了。如果逆贼真是怀念前明，更应当铭感于肺腑和梦寐之中，对我朝加以感恩崇敬，还能说什么内地是中国，边远地方是夷狄吗？这些逆贼，他不但在本朝可以说是汉族人中间的禽兽，即使在明朝也是一个禽兽。而且他们不但把本朝比作禽兽，他们也把明朝看成是一个漠不相关的禽兽了。

【原文】 又云：“五六年内寒暑易序，五谷少成，恒雨恒暘，荆、襄、岳、常等郡，连年洪水滔天，吴、楚、蜀、粤，旱涝时闻，山崩川竭，地暗天昏。”夫天时水旱，关乎气数，不能保其全无，所恃人力补救耳。如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曾无损于一帝一王贤圣之名，但朕自嗣位以来，赖天地祖宗之福庇，阴阳和顺，风雨时调，五谷丰收，农民乐业，各省之内，间有数州县旱涝不齐，即令动帑赈济，民获安全。湖广惟上年江水泛涨，有伤禾稼，即特发帑金，筑堤捍御，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幸六年之内，各省薄收之处不过数州县耳。倘遇大水大旱，不知又作何幸灾乐祸之说也。方今天下，凡有知识之人，以及草木昆虫，皆居于戴高履厚之内，而云“地暗天昏”，盖逆贼之心昏暗，人于鬼道，固不知有天地矣。

至云：“孔庙既毁，朱祠复灾。”孔庙之不戒于火，唐宋皆有之。明弘治时，被灾尤甚。弘治非明代之贤君乎？若以此为人君之不德所致，则将来叛逆之徒，必藉此煽动人心，至有纵火焚毁，以及各府州县文庙者。逆贼既称东鲁腐儒，附于圣人桑梓，

而忍为此言乎？若朱祠之焚，未知果有其事否？但朱子祠宇遍天下，偶一被火，即关君德，则诸儒之祠宇何穷，宁能保其一无回禄之灾乎？

至云：“五星聚，黄河清；为阴尽阳生，乱极转治之机。”夫果至乱极之时，有此嘉祥，犹可附合其说，今天下吏治虽不敢曰尽善，然已大法小廉矣，民生虽不敢曰义安，然已衣食粗足矣。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正万国咸宁之时，而乃云“乱极”乎？且食草木者何人，积尸者何地，逆贼能确指之乎？昧心丧理，总不举首仰观于天也。

昊苍之所以恩眷本朝者，历代未有若斯之厚，而且显也。朕即位之初，孝陵菁草丛生，六年之秋，景陵芝英产于宝城山上，以至双歧五秀之嘉禾，九穗盈尺之瑞谷，五星聚于奎壁，黄河清于六省，骈实连株之应，卿云甘露之祥，朕虽不言祯符，而自古史册所艳称而罕观者，莫不备臻而毕具。而道书则云：“山崩川竭。”试问此数年来，崩者何山，竭者何川，能指出一二否乎？

【译文】 又说：“五六年的时间内，寒暑颠倒，五谷缺少收成，忽涝忽旱。荆州、襄阳、岳阳、常德等府，连年水灾，洪水滔天。吴、楚、蜀、越等地方，旱涝的消息不断传来。山河崩枯，天昏地暗。”水旱灾荒的出现，与自然运行的气数有关，不能保证它完全没有，只能依靠人力来加以补救。比如唐尧时有九年的大水灾，商汤时有七年的大旱灾，这并没有对他们的贤圣名声有一点损害。但是自从朕继承帝位以来，依靠天地祖宗的保佑，阴阳和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农民安居乐业。各省里面，或者出现几个州县旱涝不匀，便马上下令发款救济，百姓因而获得安居。湖广地方只有去年长江涨水泛滥，对庄稼有所损害，朕及时地调动资金，筑堤防洪。这是天下臣子和百姓都知道的事。有幸的是六年以来，各省庄稼歉收的地方，不过是几个州县而已。如果遇上大水大旱，真不知这些逆贼又该幸灾乐祸地说些什么了。现在的天下，凡是有知识的人，以及草木昆虫，都居住在天覆地

载之内，而却要说天昏地暗。这是因为逆贼的心是昏暗的，已经迷入鬼道，所以便不知道有天地了。

至于他说：“孔庙既被烧毁，朱嘉祠庙又遭了火灾。”孔庙不慎发生火灾，唐、宋朝都曾发生过。明朝弘治年间，受灾更为严重。弘治皇帝不是明代的一位英明的贤君吗？如果说孔庙失火是因为皇帝无道才出现的，那么将来进行叛逆的人，必然要借此来煽动人心，就会去故意放火烧孔庙和各州县的文庙。逆贼既自称是东鲁的一名腐儒，攀附孔圣人作老乡，竟能忍心制造这种谣言吗？至于朱熹的祠庙被烧，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不过朱子的祠庙遍于天下，偶然有一处失火，便说是与皇帝丧失道德有关，那儒家先贤的祠庙数不清，谁能保证它一处也不偶然发生火灾呢？

至于说“五星聚，黄河清，是阴气衰竭阳气生长，天下由乱到治的吉祥征兆”。如果真是天下处于极乱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还可以加以附会去说。而今天天下的吏治虽然不敢说尽善尽美，然而也达到制度基本完备，官吏较为清廉了；百姓生活虽不敢说十分丰足安定，然而也已经可说达到温饱，衣食可以自足了。四方安定没战事，百姓幸福康乐，人口不断增加，田地日益开垦拓广，万国一派太平景象，这怎能说是极乱的时候呢！至于吃草根树皮的是什么人？尸体积如山的地方在哪里？逆贼能准确指出来吗？昧尽良心丧尽天理的，总不想抬起头来看看上天啊！

苍天所以降恩保佑于我朝的情况，历代从来也没有过这样深厚和明显的。朕即帝位那一年，孝陵上著草一丛丛生；雍正六年秋天，景陵出生灵芝草于宝城山上；又长出双穗、五穗的麦子，九穗长达一尺的谷子，五星聚会于奎星和壁水之间，黄河澄清于六省之地，一蒂两果连株而生的瑞应，彩云出现甘露下降的祥光。朕虽然不注重祥瑞的出现，但自古以来史册上记载而少见的种种祥瑞，没有不齐备而出现的。而逆书却说当今出现山崩河枯的凶象。试问这几年来，崩塌的是什么山？干枯的是什么河？能指出一二个来吗？

【原文】 夫灾异之事，古昔帝王未常讳言。盖此乃上天垂象，以示儆也。遇灾异而能恐惧修省，即可化灾为福矣。遇嘉祥而或侈肆骄矜，必致转福为灾矣。朕于此理见之甚明，信之甚笃，故每逢上天赐福，昭示嘉祥，寤寐之间，倍加乾惕。并饬内外臣工，共深敬谨，若涉冰渊，所颁谕旨，已数十次，朕岂敢欺天而为此不由衷之语耶！

数十年来，凡与我朝为难者，莫不上干天谴，立时殄灭。如内地之三逆，外蕃之察哈尔、噶尔丹、青海、西藏等，偶肆跳梁，即成灰烬。又么么丑类，如汪景祺，查嗣庭、蔡怀宽、郭允进等，皆自投宪网，若有鬼神使之者。今逆贼曾静，又复自行首露。设逆贼但闭户著作，肆其狂悖，不令张熙投书于岳钟琪，其大逆不道之罪，何人为之稽察，不几隐没漏网乎？而天地不容，使之自败，朕实感幸之。昔明世嘉靖，万历之时，稗官野史所以诬谤其君者，不一而足。如《忧疑竝议录》、《弹园杂志》、《西山日记》诸书咸讪诽朝廷，诬及宫室，当时并未发觉，以致流传至今，感人观听。今日之凶顽匪类，一存悖逆之心，必曲折发露，自速其辜，刻不容缓，岂非上天厚恩我朝之明徵欤？

又云：“自崇祯甲申，以至今日，与夫德祐以迄洪武，中间两截世界，百度荒塌，万物消藏，无当世事功足论，无当代人物堪述。”夫本朝岂可与元同论哉？元自世祖定统之后，继世之君，不能振兴国家政事，内则决于宫闱，外则委于宰执，纲纪废弛，其后诸帝，或欲创制立法，而天不假以年，所以终元之世，无大有为之君。

【译文】 关于灾异的事情，古代的帝王并没有什么忌讳而不敢说，因为这是上天用这种景象来警告世人的。遇到灾异而心怀恐惧，努力修德来平息上天的愤怒，就可以化灾为福了；遇上祥瑞吉兆而骄傲起来任意放肆，必定会转福为祸。朕对于这个道理看得十分明白，并且牢固地相信。所以每当遇到天降给福气，出现祥瑞，朕在睡眠当中，也要倍加兢兢业业，警惕出现什么错；同

时也要命令内外官吏，谨慎处理政务，如同走过结冰的深渊一样小心翼翼。为此所颁发的谕旨已经有几十次了，朕怎么敢欺哄上天，而说这言不由衷的话啊！

几十年以来，凡是和我朝作对的人，没有不受到上天谴责、立刻就被消灭的。比如内地的吴三桂等三个逆贼，边境外藩的察哈尔、噶尔丹、青海、西藏等地，偶尔跳梁，便立刻成为灰烬。又如妖魔小丑如汪景祺、查嗣庭、蔡怀玺、郭允进等，都是自我暴露投入法网，好像鬼使神差一般。现在逆贼曾静，又自己把自己暴露出来。假设逆贼只是闭门著书，抒发他的狂悖思想，不派张熙到岳钟琪那里投书，那么他大逆不道的罪恶，又有谁去稽察？不是要隐没漏网吗！而天地鬼神都容不下他，使他自行败露，朕心里实在感到欣庆。过去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稗官野史著作中，诬谤他们的君王的，不止一部书。比如《忧疑彘议录》、《弹园杂志》、《西山日记》等，都是讥讽诽谤朝廷，诬蔑官室的。当时并没有发觉，以至流传到今天，迷惑人的视听。今日的凶顽匪类，一旦心存悖逆的想法，必然要曲折的暴露出来，自己加速灭亡，一刻也不肯迟缓，这难道不是上天对我朝特别恩厚的证明吗？

又说：“自崇祯甲申到今天，和从宋末德祐年间至明初洪武年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百事荒废，万物消藏。没有什么对世道有功绩的事可说，没有什么英雄人物可以记述。”元朝怎么能相提并论！元朝自元世祖建国以后，继承他当皇帝的君王不能振兴国家，政事上在内则决定于官闱妇人，在外则把大权交给宰相，纲纪废弛。其以后几代君王，或者想创立新的治国办法，而上天不给他以寿命，所以一直到元朝灭亡，没有出现一个大有作为的君王。

【原文】 本朝自太祖、太宗、世祖以来，圣圣相承。圣祖在位六十二年，仁厚恭俭，勤政爱民，乾纲在握，总揽万机，而文德武功，超越三代，历数绵长，亘古未有。朕承嗣鸿基，以敬天法

祖为心，用人行政，无一不本于至诚。六年以来，晨夕惕厉之心，实如一日。朕虽凉德，黽勉效法祖宗，不敢少懈，是岂元政之可比哉？且元一代之制作，及忠孝节义之人物，亦史不胜数。《元史》独非明洪武时之所编辑乎？其称太祖则云：“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称世祖则云：“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信用儒术，立经陈纪。”是明之于元帝誉美如此，而云“无当世事功足论”乎？且《元史》专传之外，其儒学、循良、忠义、孝友诸传，标列甚众。而云“无当代人物堪述”乎？《元史》系明太祖所修，而逆贼云尔，是厚诬明太祖矣。乃称欲为明复仇乎？

夫天眷帝德，以为保定，朕惟兢兢业业，夙夜基命，则自蒙上天嘉佑，历世永享太平，为内外一家之主，岂一二禽兽之吠鸣，可以感人心而淆公论哉！

人生天地间最重者莫如伦常，君臣为五伦之首，较父子尤重。天下未有不知有亲者，即未有不知有君者，况朕之俯视万民，实如吾之赤子，朕清夜扪心，自信万无遭谤之理。而逆贼之恣意毁谤，果何自而来乎？夫造作蜚语捏饰诬词，加之平等之人，尚有应得之罪，今公然加之于君上，有是理乎？何忍为乎？朕思秉彝之良，人所同具，宇宙亿万臣民，无不怀尊君亲上之心，而逆贼独乘乖戾之气，自越于天覆地载之外，自绝于纲常伦纪之中，可恨亦可哀矣。

逆贼之所诋毁者，皆禽兽不为之事，而忍心加之于朕，朕实不料吾赤子之内，有此等天良尽丧之人。普天率土之臣民，定不为其所惑于万一，但天壤间，既有此诞幻怪异之事，则天下之人情不可以常理测度，或者百千亿万人之中，尚有一二不识理道之人，闻此流言，而生几微影响之疑者。是以特将逆书播告于外，并将宫廷之事宣示梗概，使众知之。若朕稍有不可自问之处，而为此布告之词，又何颜以对内外臣工，万方黎庶，将以此欺天乎？欺人乎？抑自欺乎？朕见逆贼之书，坦然于中，并不忿怒，且可因其悖逆之语，明白晓谕，俾朕数年来寝食不遑，为宗社苍生忧勤惕厉之心，得白于天下后世，亦朕不幸中之大幸事也。特

谕。

【译文】 本朝自太祖、太宗、世祖，圣明的君主一代代继续承传下去。圣祖在位六十二年，仁厚恭谦，勤政爱民，君权在手，总揽一切。其文德武功，超过了夏、商、周三代，在位年数的长久，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朕又继承了基业，以敬奉上天，效法祖宗为心愿，用人和处理行政，没有一点不是出于至诚之心。六年以来，朝夕怀着警惕谨慎的心情，如同一日。朕虽然才德平庸，但努力去效法祖宗，不敢有一点松懈怠慢。这岂是元朝的政治能比拟的吗！而且元朝的功德业绩及忠孝节义人物，也是多得史不胜数。《元史》不就是明朝洪武年间所编辑的吗？其中称元太祖成吉思汗“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称赞元世祖忽必烈“肚量宽弘，知人善任，信用儒术，注意经史”。这是明朝对于元朝皇帝的称赞评价，怎么能说是没有什么对世道有功绩的事可说呢？而且《元史》除专传以外，其他还有儒学传、循良传、忠义传、孝友传等，所列的人物很多，而能说是没有什么人物可以记述的吗！《元史》是明太祖所编定，而逆贼如此说法，实际上是对明太祖很大的诬谤。这样的人，还敢自称要为明朝复仇呀！

上天爱护有道德的君王，并且保佑他。朕做事兢兢业业，日夜秉承天意，那么自然会受到上天的赞许和保佑，一代一代永享太平，做中国内外一家之主。这岂是一二个禽兽的狂吠啼叫，就能够蛊惑人心混淆公论的？

人生于天地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伦理纲常。君臣是五伦中的第一伦，比父子伦常更为重要。天下没有不知道有亲的，也就没有不知道有君的。何况朕抚育亿万百姓，确实是犹如对待孩子一般。朕在深夜扪心自问，自信决不会有遭人诽谤的道理，而逆贼的恣意诋毁诽谤，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引起的呢？造作流言蜚语，编织诬蔑不实的言词，加到平等身份的人身上，还有应得之罪，如今竟公然加到自己的君王身上，有这种道理吗？能忍心这样做吗？朕想遵守上天的良好常道，是人类所共同具有的本性，宇宙

间亿万臣民，没有不怀着尊敬君王亲近皇上的心意，而逆贼却独乘受乖戾的邪气，自己跑到天盖地载的国家以外，自己绝于伦理纲常之中，真是既可恨又可悲啊！

逆贼所说诽谤的话，就连禽兽也不想干这事，而却忍心加到朕的身上，朕实在是料不到。在朕抚爱的赤子之中，竟有这种天良丧尽的人！普天下全国家的臣民，被他这些悖逆的话蛊惑的绝不会超过万分之一。但是天地间既这种荒唐怪异的事，那么天下的人情，也就不可以用常情去推测，或者在百千亿万人的中间，还有一二个不识道理的人，听到这些谣言而产生一些微小影响疑惑的。因此朕特地把逆书公告于社会，并且把宫廷内的一些事情宣示一个大略梗概，使大家都知道。如果朕稍微有一点不敢公开说明的地方，而却作这篇布告之词，那么又有什么颜面去对内外臣下，各地百姓呢？是要拿它欺骗上天吗？欺骗别人吗？还是自己欺骗自己呢？朕看到逆贼的书信，心中是非常坦然的，并不忿怒，而且可以就着他那些悖逆的话，明白地向全国晓谕事情真相，以使朕几年来顾不上吃饭睡觉，为国家为百姓而忧愁勤劳的心思，得以告白天下和后世。这也是朕的不幸中的大幸了。特此谕告。

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

一、大清朝的建立正是天命民心之所归，乃道义之当然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上岳钟琪书内云“道义所在，民未尝不从；民心所系，天未尝有违。自古帝王能成大功建大业，以参天地，而法万世者，岂有私心成见介于其胸”等语。

我朝积德累功，至太祖高皇帝神武盖世，统一诸国，成开创之功，太宗文皇帝，弘继统之业，世祖章皇帝，建极绥猷，抚临中外。此正顺天命，从民心，成大功，建大业，参天地而法万世之至道也。你生在本朝，不知列祖为天命，民心之所归，而云“道义所在，民未尝不从，民心所系，天未尝有违”，是何所指？

曾静供：弥天重犯这些话，是泛说自古帝王之兴，与帝王之在位皆是顺天命，得民心的。天命顺，民心从，而兴起在位，即是道义之当然。

弥天重犯生长楚边山谷，本乡本邑，以及附近左右，并没有个达人名士在朝，而所居去城市又最远，所以盛朝功绩，传闻不到。直至旧年到省城，由省城以至于帝畿，见闻渐广，方知东海龙兴，列祖列圣承承继继，不惟非汉、唐、宋、明所及，直迈三代成周之盛。盖天地精英日流日开，上世浑噩，人文未起，积到成周，而大和翔洽，文明大著。然天之笃生圣人以开治者，在周

亦惟算文武二圣为极，至岂着本朝叠叠相因，日远日大，愈久愈光。

自太祖高皇帝神武盖世，开创王基；太宗文皇帝继体弘业，统一诸国；世祖章皇帝建极绥猷，抚临中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遍及薄海；迨至我皇上，天亶聪明，恢弘前烈，已极礼明乐，备海晏河清。此正是天命民心所归，乃道义之当然，参天地，法万世，为天运文明之隆会。从前弥天重犯实实陷于不知，不是立意要如何，以自外于圣世。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你给岳钟琪的书信里为什么有“只要道德和正义存在，人民没有不服从的，民心拥护的事，上天从没有违背过。凡是古代帝王能取得成功，建立大业，功勋顶天立地，而能使后代万世效法的，哪有把私心杂念放到心上”这样的说法。

我们大清朝积善作德，功高无量，到了太祖高皇帝英明威武，盖世无双，统一了各部族，成为国家的开创者；太宗文皇帝发扬和继承了他的大业；世祖章皇帝建立了雄伟强大的国家，安抚了中国全境和国外的藩属。这一切都应合了天意，符合了人民的愿望，取得了丰功伟绩，建立了大业，这正是顶天立地值得后世万代效法的光辉道路。你生在本朝，不知道各位祖先乃是天命所归民心所向，却说：“只要道德和正义存在，人民是没有不服从的；民心拥护的事，上天从没有违背过。”你指的是什么呢？

曾静供：犯了弥天大罪的我说的话，只是笼统的说法。自从古代帝王的建国与帝王的在位，都是顺应了上天的旨意和人民的心愿，顺从天命，取得民心，因而建立国家，取得帝位，这是道德和正义的必然结果。

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生长在湖南边界的山谷里，本乡本县以及附近地方，没有一个做官的名人在朝廷，居住的地方离城市又最远。因此，本朝的功德业绩传不到那里。直到去年来到省城，从省城又来到了京师，看到和听到的越来越多，才知道我朝兴起于

东方海滨，各位列祖列宗不断承传，功业不仅汉、唐、宋、明等朝比不上，而且可以直比三代、成周一样的兴盛。胜过天地间的精华，每天畅流不息，一天比一天进步。上古时人民愚昧无知，人类社会的各种文明还没有开化，累积到了成周，天地人和，吉祥融洽，才文明大盛。然上天降生下圣人开创治理国家大业的，在周朝唯算大王、武王二圣达到了顶点，怎么能比得上本朝几代圣人相继承袭，一天比一天强大，愈久越光辉。

自从太祖高皇帝英明威武，盖世无双，开创了君主的业绩；太宗文皇帝发扬和继承了他们的大业，统一了各部族；世祖章皇帝建立了雄伟强大的国家，安抚了中国全境和国外的藩属；圣祖仁皇帝深得人民的厚爱，遍及海内外；到了我们皇上，天资聪颖，广泛发扬了前辈的绩业，已经把礼仪道德发挥到顶点，使天下太平。这些都是顺应了天命和民心，这正是道德和正义的表现，顶天立地，为以后万代树立了榜样，文明兴盛都聚集到今天。从前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确实是由于无知，不是自己打算要怎么办，而是自己把脚站到当今盛世之外了。

二、华夷之间、人兽之间的本质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天生人物，理一分殊，中土得正，而阴阳合德者为人，四塞倾险而邪僻者，为夷狄。夷狄之下为禽兽”等语。禽兽之名。盖以居处荒远，语言文字，不与中土相通，故谓之夷狄。非生于中国者为人，生于外地者不可为人也，人与禽兽同在天地之中，同禀阴阳之气，得其灵秀者为人，得其偏异者为禽兽，故人心知仁义，而禽兽无伦理。岂以地之中外，分人禽之别乎？

若如你说，则中国阴阳和合之地，只应生人之一类，不应复有禽兽并育其间矣。何以遍中国之地，人与禽兽杂然共居，而

禽兽之旅，比人类为尤多。且即人类之中，还生出你这等叛逆狂悖、沦丧天良、绝灭人理、禽兽不如之物来呢，你有何说处？

曾静供：天生人物，理一分殊，其有分别，实以理之偏，全不在所居之内外。弥天重犯读书浅少，义理看不透彻，妄意以地之远近分华夷，初不知以人之善恶分华夷，今日伏读皇上谕旨，谓如你所说中国只应生人之一类，不应复有禽兽并育其间矣。义更精实，理更明显，虽顽石无知，亦应灵动了。况本朝之兴，列圣相承，亘古所无，万国咸宁，历代罕睹，且开辟幅员之广，声教四讫。自有生民以来，到今日而极盛。又圣祖皇帝承天眷顾之笃厚，享年之久，三代以来所无。况更有几多善政善教，纬地经天，开万世之弘基，立百王之大法，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正于今日见之矣。

所以圣祖皇帝宾天诏到，虽深山穷谷，亦莫不奔走悲号，如丧考妣，即以弥天重犯冥顽无知，至此亦曾废食辍饮，恸哭号涕，被素深山，居丧尽制。然在当时皆起于心之不及觉，发于情之不容己，非有所为而为也，若非圣德隆厚，皇恩浩大，何以使民至此，今日圣祖皇帝在天之灵，犹或洞鉴。只为向见《春秋》有华夷之辨，错会经旨，所以发出诞妄狂悖言语，其实到今日方晓得经文所说。只因楚不尊王，故攘之，而本朝之兴，与经文之所指天悬地隔。

弥天重犯固思天地之内无气不通，无理不到，华夷之辨固不可以地言，即以地言，亦无定限。天地精英之气日散日远，而且循环无常，今日二五之精华尽钟于东土，诸夏消磨，荡然空虚，是实话实理。况夷狄本是论人，亦善恶五性克全，无所亏欠为人，五性浊杂，不忠不信，为夷狄。孟子既称大舜、文王为东西夷所生，又诋杨朱、墨翟之无父无君为禽兽，是中国岂无夷狄，要荒岂无圣人，至于有明之世，非鲁、卫、齐、晋之旧，而本朝之兴，直迈成周之辙，更不待言。

弥天重犯识浅见小，未曾经历，又得这些无知流言，夹杂胸

中，所以有此妄言，悔罪无及。弥天重犯记得前而两次亲供，前供就人而论，看得天地精英之气愈开愈远，循环无常，不以地限。而后供指出，有明之世非鲁卫齐晋之旧，而本朝之兴，直迈成周之辙。以今看来，益觉自信无疑，悔罪无及，是弥天重犯虽昔同禽兽，今蒙金丹点化，幸转人胎矣。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你在书信里有“天生人和动物，从道理上来说，是一样的，但生长结果是有区别的，在中原出生的人受到正气，阴阳交合得当而成为有理性的为人；四面八方边远的地方偏僻荒险，受到道德正气孕育的较少的是夷狄，夷狄再往下就是禽兽”这样的说法。以禽兽称之，都是居住在荒山野岭，极偏僻山区，语言文字和中原出生人的语言有所不同的，所以称为“夷狄”。并不是生在中原的是人，生是边远地区的就不能算他是人。人和动物都生存于天地之间，都沐浴着阴阳的灵气，得到其纯正灵气的是人，得到其偏杂邪气的就成为禽兽，所以人类知道仁义和道德，而禽兽不知道这个道理。哪能以中外地区作为类分人和禽兽的标准呢！

如果按你这样的说法，中原阴阳融合的地区，只应生人类一种，不应有其它的禽兽生存了。为什么全中国境中，到处都有人和禽兽共同生长，而禽兽的类别，比人类还要多呢？而且即使是人类中间，竟然还会生出你这种狂妄叛逆、丧失天良、灭绝人性道德、连禽兽都不如的东西来呢？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曾静供：上天生人和动物，道理一样，生长结果有区别。分别的原因，应该以其理性多少来决定，而不在于其所居住的是中原地区或边境地区。犯有弥天大罪的我读书太少，道理看的不深不透，狂妄地以地区远近分别中华和夷狄，当初并不知道以人的善恶来分中华和夷狄。今天跪读了皇上的谕旨，说“依照你的说法，中原只应该有一种人类，不应该有其它的禽兽在中原生存了”。内容更精彩实际，道理更加显明，即使石头没有知觉，也应该被感动了。何况本朝的兴旺发达，几位英明大圣人接连继承

皇位，这是古代所没有的。中国及其藩属到处一片太平景盛，历代很少看到这个状况。况且中国疆域的广大，国家的影响远播四方，自从有人类以来，到现在达到了极盛的顶点。又因为圣祖皇帝，深蒙上天厚爱，承受皇位的长久，三代以来是没见过的。更何况有许多开明的举措，有经天纬地的才能和治理手段，开创我朝万代大业的基础，树立了历史上无数帝王的治国榜样。这比所谓夏、商、周三代的盛世没有一点逊色，树立到天地间，也没有一点感到不足，询问一下鬼神也不会说上一句不好的话，等到百代以后的圣人出现，也不会有一点否定的说法这样的盛世，今天总算看到了。

所以在圣祖驾崩的诏书传到的时候，虽然处于深山穷谷的人，也都失声痛苦地奔走相告，好像失去自己的父母一样。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十分昏庸顽钝，不明事理，在那时也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失声痛哭，在深山里穿上了孝服，按照制度守丧尽礼。然而在当时，都是不知不觉地出自内心的情感，并不是为了抱有别的目的而做给别人看的。如果不是圣祖的德高望重，给百姓的恩惠十分浩大，深得民心，怎能使人们到了这样地地步？今天圣祖皇帝在天有灵，可以洞察鉴别。

后来只因为看到《春秋》把中国分为华夷两部分，错误地领会了它的含意，所以发出了错误荒谬的言论。到现在才知道《春秋》里讲的，只是因为楚国不尊重周朝王室，为此才把它称为夷蛮。而本朝的兴旺与《春秋》里面所说的华夷的区别，实在是悬殊极大。

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只想到天地之间，没有一个地方不通灵气，人生哲理没有一个地方不实用，中国和夷狄的区别，决不可以以地区来划分，即使依照地区来说，也没有一个固定标准。天地孕育的精神灵气，一天比一天传播的远，而且循环变化没有规律。今天天地间阴阳五行的精华，都集中在东方的土地上，而中原的灵气已消磨殆尽，荡然不存，这是实话、是事实。何况夷狄的说法，应当以人的文明程度来区分，也就是在善恶和仁、义、

礼、智、信这五种德性全具备的情况下，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才是人，五性混乱不知礼度，不忠不信的人才称为夷狄。孟子既称大舜和周文王是东西夷地方出生的人，又诋毁杨朱和墨翟是无父无君的禽兽。按照这种说法，中原能没有夷狄吗？边远荒僻的地方能没有圣人吗？至于到明朝时，中国疆域已不同于春秋时的鲁、卫、齐、晋等中原诸侯国，而本朝的兴起，更是直追成周的盛世，更不须辩说。

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知识浅薄，见识狭小，自己又无亲身经历，又听到这些无知的流言诽谤的话而记在心中，所以说出这些错误狂妄的话，追悔莫及。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前面两次供词，前一个供词是就人而论，看到天地的精华之气越传播越远，循环而没有规律，不能以地区来限制区分。后一个供词指在明朝时候，已不同春秋时鲁、卫、齐、晋的诸侯国，而本朝的兴旺更是直追成周的盛世。从现在来看，越觉得对上述道理深信不疑，对自己的罪孽后悔莫及。这是犯了弥天大罪的我过去如同禽兽，今天承蒙皇上起死回生的金丹感化，有幸转入人胎了。

三、清朝统治八十年后，造成了地塌天荒，神哭鬼号吗？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云“聪明睿智，仁能育万物，义能正万事，礼能宣万化，智能察万类，信能孚万邦者，天下得而尊之亲之，概自先明君丧其德，臣失其守，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反复，地塌天荒，八十余年，天运衰歇，天震地怒，鬼哭神号”等语。从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我太祖、太宗、世祖，圣圣相承，圣祖在位六十二年，深仁厚泽，浹髓沦肌。正所谓聪明睿智，仁育万物，义正万事，礼宣万化，智察万类，信孚万邦者也。天与人归，懋昭大德。凡有血气，莫不尊亲，盖列祖之至德感孚，奉若天道者，为从古之极盛。是以皇天

之保佑，申命恩厚于我朝者，为从古之极隆。

若谓乾坤反复，地塌天荒，而我朝八十余年以来，享承平之福，凡叛逆之徒，稍萌奸回，即灭不旋踵。是岂天震地怒，鬼哭神号，皆无可奈何，而人力竟可胜天乎？此非敢于评诬稍诋我朝，乃敢于诬诋上天矣。曾静，你有何说处？

曾静供：弥天重犯所说必聪明睿智而兼具五性之全德，乃是尊贵天位之语。到今日看来，列祖列圣之聪明睿智，仁义礼智信之施于薄海内外者，固已共信为圣神之极致。我皇上御极以来，圣德神功，上承列祖，尤无纤毫不愆于民心。惟弥天重犯为谣言蛊惑，遂戴天不知天之高，履地不知地之厚，出入作息，竟忘帝力于何。有以是酿成大恶，身陷乱贼。

直到旧冬，得闻钦差大人宣传圣德之大，涵育宇宙，又伏读圣谕谆谆，光被四表，始觉心神开豁，脱然得悟从前之非。然耳虽闻圣德，心虽服圣教，目实未曾亲见有道盛世的光景。昨奉解来京，自湖南而湖北，以抵河南，由河南而到直隶京城，所过都邑省郡，自野及市，历人历境，不知凡几万千。但见民康物阜，风景和平，生其间者，皆气象古茂，性习淳厚，治化休明，太和翔洽，油然共庆太平有道之世。若不是皇上聪明睿智，仁育万物，义正万事，礼宣万化，智察万类，信孚万邦，休养抚育，励精不倦，为从古所未有。何以民心爱戴，休徵齐著，天眷隆笃至此，到此愈觉从前错误之罪大弥天，无地自容，惟日自痛悔号泣而已。

至若谓“中原陆沉”以下等语，总因错听谣言，错解经义，一个病根，一路直错到底。今日虽万死万刚，亦所宜然，更何能稍置一喙？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你在书信里有“聪明又有远见，仁爱能哺育出宇宙间的万物，道义能公正一切事情，礼仪能感化万物，智慧能认识一切东西，诚信能取得一切国家信任。如果能做到这些，就能得到世界上各国的敬重和亲近。君主丧失了自己

的道德，臣子失去了自己的职责，中原大地沦陷，夷狄乘虚而入，窃据了国家政权，乾坤颠倒，地陷天塌。八十多年来天运变得衰弱，天地震怒，鬼哭神号”这样的说法。历来皇天对人类没有亲疏之分，谁有德行便降福给谁，我朝太祖、太宗、世祖，几位圣人接连继承帝位。圣祖在位六十二年，对百姓施以的深厚仁德，深入到每个人的肌肤，正像人们所说的既聪明又英明远见，仁爱能哺育出宇宙间的万物，道义能公正一切事情，礼义能感化万物，智慧能认识一切东西，诚信能取得一切国家的信任。上应天运，下顺民心，仁德盛大。凡是有气血的人，没有不对圣祖皇帝尊敬和亲近的。由于我朝各位皇祖具有至高无尚的道德，取得了人民的感动和信任，尊敬和服从他们同敬奉上天一样，我朝达到了自古以来最兴盛的状况。所以上天保佑我朝，给我朝深厚的恩惠，也是自古以来最丰隆的。

如果说这是“乾坤颠倒，地陷天塌”，而我朝八十多年来，一直享受天下太平的幸福。而凡是叛逆的人，稍有一点奸谋，便立即遭到毁灭。这能够说是“天地震怒，鬼哭神号”都没办法动摇我朝，而我朝竟能以人力战胜苍天吗？这不仅仅是诬蔑我朝上应天运，而且是擅敢诬蔑上天了！曾静，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曾静供：犯了弥天大罪的我所说的“既聪明又英明远见，而且五德全备”，仍然是尊敬上天的话。到今天来看，列祖列圣的聪明和远见，仁、义、礼、智、信的做法，施行到中国内外，已经使人们共同相信已达到了圣神的地步。当今皇上继位以来，崇高的道德和功勋，从上面继承各位祖先的统治，行事没有一丝一毫不符合人民的心愿。只有犯了弥天大罪的我被谣言所迷惑，虽然顶着天却不知道天有多高，踩着地却不知道地有多厚，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太平日子，竟然忘记了这都是得自皇上治国有力的效力，以致造成大罪，身陷乱贼之中。

直到去年冬天，听到钦差大人宣传圣人的品德高大，恩惠哺育着整个世界，又用心跪读了圣上谕旨的谆谆教导，其光亮照亮四方，才开始感觉到心明眼亮，突然醒悟以前做的不对。然而，

虽听到了皇上的高尚品德，心里虽然诚服圣人的教育，但我从来没有亲眼目睹道德盛兴时的美景。前些日子奉命来到京都，从湖南到湖北又来到河南，由河南又来到直隶、京城，所经过的都邑省郡，从远郊到城市，遇到的人和走过多少地方，不知道总共有几万几千。看到的都是人民康乐物产丰盛的一片大平景象，生活在这时代的百姓都有上古三代的遗风，风俗淳厚朴实。这都是由于我朝政治教化的美善，才能达到这种阴阳融洽，百姓们才能自由自在地共同享受着太平盛世的快乐。如果不是皇上聪明又有远见，以仁爱哺育宇宙间的一切东西，以道义公正一切事物，以礼仪感化万物，以智慧认识一切东西，以信用取得一切国家的信任，抚育百姓休养生息，不知疲倦地为国操劳，是过去所没有过的圣明，又如何获得民心的拥护爱戴，各种祥瑞吉兆不断出现，上天对我朝爱护这么深厚！看到这些，更使我感到以前的错误真是罪大弥天，羞惭地无地自容，只有每天自己痛恨后悔，哭叫不止。

至于所说的“中原陆沉”以下的说法，都是错听了谣言，错误地理解了《春秋》的经义，有了一个错误的病根，便一错再错。今天就是万刀乱剐也是应当的，我还能有什么可辩解的呢？

四、社会出现贫富差别的原因 是否可以归咎于君王呢？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土田尽为富户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等语。自古贫富不齐，乃物之情也。凡人能勤俭节省，积累成家，则贫者可富；若游惰侈汰，耗散败业，则富者亦贫。富户之收并田产，实由贫民之自致窘迫，售其产于富户也。

今你说土田为富户所收，其果自雍正元年以后，富者始收民之土田乎？抑康熙年间，富者已收民之土田乎？其果本朝以前，

若明若宋若汉、唐之代，民间皆贫富均齐乎？抑自古以来，民间即有富者，收民之土田乎？你以富者日富，贫者日贫，俱归咎于君上，有何理据呢？

曾静供：此是太平日久，民间辗转积而成弊。固自然之势，不关君上事。亦汉唐以来的通弊，不起于本朝。但本朝历圣相继，承平之久，亘古少及。而皇上御极以来，德盛民化，风清弊绝，民间无丝毫烦扰，而惟田业一项，富户安于有余，贫民常苦不足、辗转流弊，土田将多为富户所收。此际似正须裁成辅相，因妄谓斯民所仰望君上者，在酌盈剂虚，衰多益寡。圣人成能，宜不忍任物情之自流。此是弥天重犯鄙之粗见，不通世事之愚论，岂知贫以游惰而致，富因勤俭而得。此等不齐，自天降下民已然，原非人力之所能挽。

盖天之生物不齐，因五气杂揉，不能一致，人之昏明巧拙，才质不同，乃造化之自然，虽天亦无可如何。人之贫富，视乎作为营办，作为营办，又视乎才力之巧拙昏明，此自然之理势也。况天道福善祸谲，要幽远莫测，其穷困者，安知不是天厄之，其丰亨者，安知不是天相之乎？皇上以抚育为心，举一世而涵濡之，岂愿其有此。得圣谕点化，更觉分明。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你在书信里有“土地田产都让富裕人没收了，富裕的人，越来越富，贫穷的人，越来越穷”这样的说法。从古到今贫富不平均，这是事物的常情。凡是能勤劳、俭朴、节约的人，慢慢积累，贫穷的也可变为富人。如果游手好闲、懒散、奢侈，把家产都消耗掉，富有的人也会变为穷贫的人。富有的人家收购田地，实际上是因为贫穷的人自己把自己弄穷了，才把自己的田产卖给富户。

今天你说土地田产都让富有的人收走了，是不是自从雍正元年以后，富有的人才开始收购百姓的土地田产呢？或是自康熙年间富有的人已经收购百姓的土地田产呢？果真从本朝以前，如明朝，如宋朝，如汉唐时代，民间都贫富平均了吗？或是自古以

来，民间就有富贵的人收购百姓的土地田地呢？你说富有的人越富，贫困的人越穷，都归罪在我朝皇上，有什么道理和依据吗？

曾静供：这就是天下太平的时间太长，人民中间转来转去积累而成弊端。这种自然的发展趋势，和皇上没有关系，是从汉朝、唐朝以来都具有的通病，不是从本朝开始的。然而本朝历来的圣人相互继承，太平时间这么长久，从古到今很少见。而自当今皇上执政以来，盛厚的道德感化了百姓，社会风气正，弊端杜绝，百姓中间没有任何烦恼忧愁。然而只有田地产业这一项，富有的人仍占有多余的田地，贫苦的人经常为缺少田地感到苦恼，翻来覆去，形成弊端，很多土地田产被富有的人占去。这时候好像正需要设法帮助解决，因此，错误地说百姓都仰着头看着皇上，是希望能考虑抑富济贫，取有余补不足，圣人一定能够做到，应该不忍心让这些情况放任自流下去。这是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粗野的俗见，不懂世事的愚蠢议论。哪里知道贫穷的人是游手好闲导致的，富有的人是因为勤俭持家而获得的。这些贫富差异，自从上天培育出人类以来就已成这样，不是任何人力所能够扭转的。

天生万物都是各各不同的，因为阴阳五行的气参杂揉合在一起，万物的气质也就不能达到完全得一致。人的蠢愚、聪明、智巧、拙笨、才质都不一样，这些都是自然造出来的，即使上天也奈何不得。人的贫和富，只能由他经营和办事能力决定；经营和办事的能力，决定于这人的才智是聪明还是愚昧。这些都是自然的道理和趋势。况且上天降福给善人而惩罚恶人，更是深远而难以推测。穷困的人，怎知这不是上天给的惩罚？富贵发达的人，怎知这不是上天赐福给他的？皇上以抚育百姓为根本出发点，对全国人民一视同仁地爱护培养教育，怎能愿意百姓受穷苦呢！得到圣上的指点，更加感到心清肚明。

五、整个大清国的人民到 处都在呼号怨恨吗？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到处呼号怨恨，切日丧借亡之愿”等语。这呼号怨恨的确何人？确在何地？确有何被虐之事？确有何愿丧之情？须一一据实供来。

曾静供：这等呼号的，乃是洞庭湖滨偶被水灾，不能安业之民。盖人生疾病痛苦，饥寒劳瘁，忍耐不过，多呼天呼父母，此情之不容自己者。而小民太平日久，素享丰盈，偶尔被水，觉苦不聊生，曾不如他郡他邑之群歌大有。皇上痲痲赤子，必帑赈济，存留者虽沐恩惠，而散流辗转者或远不遍及，其逃于外的，间有呼号。弥天重犯不能广览远稽，故有此语。其实寒暑怨咨，何伤天地之大，况沐恩者久，且多未遍者，暂而少不获安业者，以湖南计之，不过百分之一，以普天下计之，尚不及亿万分之一乎。此个缘故，到今方知。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你在书信里有“到处都是哭号和怨恨，真有点‘天天怀着一同死去’的愿望”这样的说法。这到处哭号和怨恨的人是什么人？这个人在什么地方？有什么被虐待的事？又有什么冤屈而想死？一一从实供来。

曾静供：这种呼喊哭叫，就是洞庭湖滨，偶而被水灾所淹没，没有能力安家治业的百姓。人生来遭到疾病痛苦，忍受寒冷、饥饿和劳累病苦，忍耐不下去，多呼天号地，呼喊父母，这种情况是不能让他自动停息的。而小民长期过惯了太平的日子，平常享受的比较丰盛充裕，偶然遇上水灾，便感觉太苦无法生存，便觉得不如其他地方的百姓可以歌舞庆祝丰年。皇上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发钱救济大家，活着的人虽然受到了恩惠，然而流落在外面的或者偏远的地方仍照顾不到，有逃荒到外面的

人，仍不时有呼天叫地的哭号。犯了弥天大罪的我没有广阔深远的眼光思考这些现象，所以有这种说法。其实冷热的一点怨声，对广大的天地不会造成多大伤害！何况受到恩惠的人很多而且时间长久，一时没照顾到的，只是暂时的少数人。没有得到安家立业的人，以湖南来计算，不超过百分之一，按照天下的人来统计，达不到亿万分之一。这个道理，直到今天才知道。

六、像岳钟琪一样臣事清朝的人就 是低头屈节、效忠于匪类吗？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戴皇祖之仇以为君，且守死尽节于其前”，又有“俯首屈节，尽忠于匪类”等语。曾静以岳钟琪之远祖武穆王，称为皇祖者，是奉岳钟琪为主而已，为其臣子也。且曾静狂言，以《春秋》大义自居。其逆书有云“人臣之择主，如女之子从夫，为臣者事非其主，而失身如女子已嫁于人而再醮者矣。而曾静又臣事于岳钟琪，是以失身再醮”等语。

岳钟琪假若依曾静之说而叛本朝，是岳钟琪为不能守死尽节，而再醮之人矣。曾静以岳钟琪之臣事本朝为屈节尽忠于匪类，则曾静之愿奉岳钟琪为君，岂不为匪类中之匪类乎？且逆书内以岳钟琪为岳飞之后，称功颂德，乃钦差讯问时，又盛言本朝之恩泽勋业。未知曾静之心，仍欲臣事岳钟琪乎？抑愿臣事本朝乎？如愿臣事本朝，则曾静不亦屈节于匪类乎？设岳钟琪为曾静蛊惑，未知曾静此时以岳钟琪为是乎？抑为匪类也。可一一讯问，令其逐条供明。

曾静供：弥天重犯本心毫无所为，只为误听谣言，错解经义，故一切大义大分，都至混淆。加以闻见狭隘，不知本朝世德之隆，得统之正，深仁厚泽之久而且洽，所以上书岳钟琪。种种悖谬，直是痛悔无及。

盖人臣之择主，因如女子之从夫，今岳钟琪以文武全材，笃

生圣神之世，而事圣神之君，正如皋夔之事尧舜，伊周之事汤武，不但如正女之从贤夫而已者。固万无可叛之义，亦决无或叛之心。而弥天重犯以误听流言，遂至冒昧上书，不恨自昧君臣之大义，而并劝人以不忠。是微如蜂蚁，尚知有君臣，毒如蛇虎，尚不忘恩报，而腆然人面，直匪类之不若也。

迨至去冬奉钦差大人审问，传宣圣德，已知从古盛世帝王莫与伦比；而且详告本朝来龙兴功德，事事仁至义尽，得统之正，全是天与人归。盖本朝来抚万国之初，明愍帝已身殉国难，而李贼猖狂，中原涂炭，毒逾水火，世祖章皇帝不烦一兵，不折一矢，而天下感戴，率从如赤子之依父母，较之杨武，昔尝为夏殷诸侯，而临时不免兵戈者，更名正言顺，神武而不杀。弥天重犯得闻此义，始如坠深渊，而痛哭追悔，万死莫及。嗣后蒙大人仰遵皇上高厚深恩，一路抚惜到京。而弥天重犯自长沙以抵京师，沿途目之所见，尽是圣世隆景，耳之所闻，莫非圣德仁声。且当身亲被，又有几多破格恩典，而一到京师出之囹圄，居以广厦，给食赐衣。弥天重犯生长山陬，不知圣天子忧切民瘼，曲谅民难，哀矜民隐，竟及于极恶重囚，万死莫效之徒，直至如此。弥天重犯虽同草木无知，顽石无灵，亦当翻然感化。

故在当时岳钟琪幸而怒斥，得免乱贼之名，万一误见听从，不惟弥天重犯为万世乱贼之罪魁，而岳钟琪亦不免为万世乱贼之巨恶了。岳钟琪之守正，固益显其为圣世之良臣，而弥天重犯到此尚有何别义可以借口？只痛恨谣言之害人，遂至陷身于大恶而莫解，然犹幸到今，尚得接天语下诘，省悟以翻身，纵不敢望苟免幸生，得为圣世之民。然得闻大义而知前此之非，是即为圣世之鬼，亦所甘心矣。

至若奉岳钟琪为君，而已为其臣子，在弥天重犯初无此心，其称彼远祖为皇祖者，乃是见得礼经，自诸侯以下，概有皇考皇伯父之号，故欲用三代以上称呼而妄耳。盖当时止做旁人献义，未即输身归顺，总之大义既错，罪在恶极，一路皆错，尚有何是处可言。惟千万叩首感激隆恩盛德，自伤欲为圣世之民，而不可

得。至于臣事本朝，乃天经地义之当然，又易尝自即于匪类乎。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你在书信里有“拥戴皇祖的仇人为君王，并为他效死尽忠”，又有“低头屈节，尽忠于匪类”之类的话。曾静将岳钟琪的远祖武穆王称为皇祖，是想拥护岳钟琪为皇帝，而自己作他的臣民。曾静的谬误狂言，是以《春秋》大义自居，逆书里有“人臣要选择主人，就像女人随从他的丈夫。作为臣民如果选择的主人不当而失去气节，就好像女人再嫁而失节一样”等说法。

岳钟琪假如按照曾静的说法而背叛了本朝，就是岳钟琪不能尽臣之节，如再嫁人而失节一样了。而曾静又向岳钟琪称臣，不也是等于失节再嫁他人吗？曾静认为岳钟琪的臣事本朝是低头屈节，效忠于匪类，而曾静自己又愿意把岳钟琪当为君主，这不就成了匪类中的匪类了吗？而且在这逆书内称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为他歌颂功德，钦差审问他时，又称颂本朝皇恩和功业。不知道曾静的心，是仍将替岳钟琪办事呢？还是愿意替本朝办事呢？如果愿意替本朝办事，曾静不也就成了低头屈节、效忠于匪类了吗？如果岳钟琪被曾静所迷惑，不知道曾静这时候会以为岳钟琪做得对，还是称他为匪类呢？可以一一讯问，让他一条一条说明。

曾静供：犯了弥天大罪的我自己心里丝毫没有这些想法，只因为错误地听信了谣言，错误地解释了经义，使一切大义大分都混淆不清，再加上见闻非常狭隘，不知道本朝世代德行的兴旺，取得天下十分乃顺应天意，对百姓所施的深厚的仁德已经很久并已深入民心。所以才给岳钟琪写信，种种荒谬，真是痛悔不及。

人臣要选择主人，就像女人跟着丈夫。今天岳钟琪以其文武双全，忠诚地生活在神圣的时代，而效忠于神圣的君主，正像皋陶和龙臣事尧、舜，伊尹、周公臣事成汤和周武王一样，好像正派的妇女跟从贤明的丈夫，没有任何可背叛的理由，当然也没有背叛的心思。然而犯了弥天大罪的我错误地听信了谣言，以至鲁

莽地写信，不但自己不知道君臣的大义，而且还劝说别人不忠。即使微小得如同蜜蜂、蚂蚁，还知道有君臣之义，狼毒得像长蛇和猛虎，还忘不了报恩，而我空有一到人脸，真还不如匪类还不如啊。

直到去年冬天，被钦差大臣审问，宣传皇上圣德，才知道自古盛世的英明的帝王，没有谁能够比得上当今皇上的。而且又详细告诉了本朝创业以来的一系列丰功伟绩，每件事都做到了仁至义尽，取得天下的正统，都是归功于天意和人心。本朝来中原绥抚万国的初期，明朝的崇祯皇帝已经死于国家的灾难中，然而李自成猖獗狂妄，中原陷入困苦的境遇，不幸超过洪水烈火。世祖章皇帝不费一兵，不射一箭，而天下人感激和爱戴就像孩童依顺父母一样，比较起汤商和周武曾经是夏朝和殷朝的诸侯，获得天下时仍不免使用武力，更为名正言顺，树立神圣的武功却没杀人。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听到这个道理，才好像掉进深渊，十分痛苦和后悔，死一万次也难赎自己罪过。以后承蒙大人遵照皇上的深恩厚爱，一路护送来到京城。然而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从长沙来到京师，沿路看到的一切，都是圣世兴旺的景象，耳朵所听到的一切，都是对皇上仁德的赞誉之声。以后自己又亲身受到教导，又多了几条破例的恩典，一到京师，便被放出了监狱，住到了宽广的大厦，赐给饭吃和衣裳穿。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由于生长在荒僻的山沟里，不知道仁圣天子关心百姓的疾苦，体谅人民的艰辛，怜惜人民的痛楚，竟然关怀到我这个罪大恶极的重犯、万死不赦的囚徒，直到这种地步。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即使是和草木一样没有知觉，像顽石一样没有头脑，也应当受到感化而彻底悔悟。

所以在当时，岳钟琪幸好愤怒责斥了我，使我得以免掉乱贼的罪名。万一错误地听从，不仅仅犯了弥天大罪的我成了万世乱贼的罪魁祸首，而且岳钟琪也免不了成为万世乱贼的巨恶了。岳钟琪坚守正气，更加显示出他是一个太平盛世的贤臣，而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到这个地步，还有别的什么理由可以作为借口呢？我

只能痛恨谣言如此害人，以至于身负大罪而不能解脱，但我还庆幸到现在，仍能得到皇上过问，反省觉悟得以脱身。我仍不敢奢望苟全性命偷生，能够成为太平盛世的良民，但是能够聆听到大义至道，而且明白了得了前面所作所为的错误，这样即使成为太平盛世的鬼魂，我也心甘情愿。

至于如果把岳钟琪奉做君王，而自己成为他的臣子，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当初并没有这个意思。其称呼他的远祖为皇祖的原因，是因为看到《礼经》中从诸侯之下，都有皇考、皇伯父的称号，所以想用三代以上的习惯来称呼而造成这个错误。因为在当时只是作为旁观的人提出建议，并没有马上投身归顺而已。总而言之，在大的道义上我已做错，罪大恶极，所作所为一切都错了，我还有什么对的地方可说呢？只有千万叩首，感激圣上皇恩浩荡，自己伤叹再想成为圣世良民而不能实现。至于我事奉本朝，乃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又怎能自己甘心去当匪类呢！

七、明朝亡于李自成之后，清兵的确是明臣请来除寇治乱的，是救亿万生灵于水火之中的仁义之师啊！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明亡之恨”等语。前明之亡国，亡于流寇李自成之手，与我朝毫无干涉。自有明之季，政教不修，纲纪废弛，内则盗贼纷起，李自成等扰乱残虐，沦陷京师，外则边警时闻，各处蒙古外藩，皆为劲敌。是蹂躏中国，消耗明之元气，非独本朝也。

况我太祖创业以来，并无取明之天下之心。太宗皇帝曾勒兵入关徇地，直到山东临清，周视京城，纵猎南苑，数日乃归。明朝并不能一矢加遗。彼时若欲取明之天下，岂不易如反掌？盖我祖宗列圣惟冀息兵安民，解仇释忿。屡欲与明朝和好，而明之君臣总置之不问。迨李自成已陷北京，明愍帝殉国而死，明祚已

绝，明位已移，始清兵我朝，来除寇乱。太宗皇帝命将兴师，兵至山海关，一战而胜。李自成二十万之众，望风逃窜，席卷长驱，是以我世祖皇帝君临万邦，廓清群寇，救亿万臣民于水火之中，为明朝报仇雪耻，是我朝深有德于前明，显然著明可白万世者也。我朝得国较之汤武征诛，更为名正言顺，何明亡之有恨乎？

以李自成之横行中原，所过残破，明朝糜饷百万，曾不能少抗其锋。贼兵一至城下，长驱直入，李自成唾手得明之天下。是明之兵力，万万不如流寇甚明。当李自成既陷京师之后，其志方张，精锐之锋未尝少挫，更增明之叛臣降卒以助其势。而我朝兵威甫及，如摧枯拉朽，只经山海关一战，流贼即亡魂夺魄，奔逃溃败。由是而论，我朝之兵力声势，与明何啻相悬云壤乎？设若取明之天下，已早取矣，何待流贼之摧残乎？惟以仁义为心，不肯代有其国。本朝之光明正大若此，今你怀叛逆之心，若在明朝，即是流寇李自成。而乃以明亡致恨为词，曾不反心自问乎？你还有何说？

【译文】 问曾静：皇上问你，你在书信里有“明亡之恨”的说法。明朝的灭亡，就灭亡在流寇李自成的手里，与我清朝没有丝毫的关系。自从明朝未亡时候，国家的政治就已腐败，纲常礼教松弛颓废。国内盗贼纷纷而起，李自成等人四处流窜，残忍暴虐，攻占了京城，边境上也是警报时闻，各地的蒙族和其他藩属，都成了大敌。所以践踏中国，消耗明朝国力的元气，不只仅是我们大清朝。

而且我太祖开始创建帝业以来，并没有夺取明朝天下的心思。我太宗皇帝曾带兵进入山海关视察地形，一直到达山东临清，绕着京城巡视，在南苑（皇家猎园）尽情围猎，几天之后才回去，明朝没有能力射我们一支箭。那个时候如果想夺取明朝的天下，岂不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因为我的列祖列宗，只希望平息战火，让百姓安定，解除双方的仇恨。我们几次想和明朝和好，

但是明朝的君臣总是置之不理。等到李自成攻陷了北京，明朝的崇祯皇帝以死殉国，明朝国体已经灭亡，明朝皇位已经转移，才到我清朝来请求派兵去除掉乱贼。太宗皇帝命令将领率领部队，到了山海关，一战就取胜了，李自成二十万大兵望风而逃，我军像卷席子一样长驱直入。因此我世祖皇帝亲临中原登上皇位，扫清了大批叛贼，把亿万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为明朝报了仇，洗掉耻辱。所以我大清王朝对明朝实有大恩大德，是非常明显的，可以清清楚楚告诉后代万世。我朝得以统一中国，比起商汤和周武王征伐桀、纣，更加名正言顺，哪有什么明朝灭亡的仇恨？

李自成横行中原，所经过的地方都是过关斩将，明朝耗费百万银子的军饷，都不能和他们稍稍对抗。贼兵一到京城下面，便长驱直入，李自成不费丝毫的力量就得到了明朝天下。所以明朝的军队万万比不上流寇是很明显的。李自成攻陷京城以后，他的斗志仍然强盛，精锐的锋芒不曾遭到一点点挫折，又添上了明朝的变节大臣和投降的士兵来为他助威。而我朝军队所到之处便摧枯拉朽，只经过山海关这一战，流贼就失魂落魄，逃亡溃败。从这方面来看，我朝的兵力和声势，与明朝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照此看来，如果想夺取明朝的天下，早已经得到了，何必等到流贼们糟踏呢？只是因为我朝心存仁义，不愿意代替明朝而占有中国。本朝是如此光明正大，而你却有叛逆之心。如果是在明朝，你就是流寇李自成，你还拿明朝亡国大恨作为话柄，你就不会反省一下自己吗？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原文】 曾静供：这个源头，弥天重犯从前全然不知，盖因失父太早，独居山僻穷陋者，已数十余年左右。附近不惟元史册可以借观稽考，而乡党邻里，并无知事老成传闻，但知本朝代明而有天下，初不知有明之天下，早已失之于流寇之手。直至旧冬，闻大人之说后，又得仰读圣谕，乃知本朝全是以仁义而兴，直驾千古莫媲，其弘功伟绩之在当世。不惟明之君臣感其恩，戴其

力，即在当时之草木，亦莫不被德而蒙惠。

盖有明之季，上下怠慢，政教全然荡废不举，纲纪颓然倒坠不整，内则任宦官把持国政，外则听诸藩剥削民力，荒淫恣纵，无礼无学，遂致民不聊生，奔入贼党，四起为敌。在外官兵望风而靡，所以贼得长驱，直抵京师。当此之时，生民流离困苦，残杀惨掠，直不啻如水火之告急。

太宗皇帝龙兴东海，政举教修，仁声仁闻，施及薄海内外，并未萌一点取天下之心。曾勒兵入关，纵猎南苑，以期为明解仇释怨，息兵而安民。而明之君臣，竟置之不问，由是振旅东归，当时若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取明直如反掌之易耳。又何待贼陷京城，愍帝身殉国难，明祚已绝，明位已移，请求除寇安乱，而后兴师命将乎？即此一举，较之武王观兵孟津，以冀纣恶之改侮，心事更光明正大，表里无憾。况入关一战而胜，李自成二十万之众流寇，亡魂夺魄，溃散奔逃，扫荡廓清，当时天下之众如出深渊，如睹父母。世祖皇帝由是发政施仁，抚临天下，救亿万生灵之苦于水火之中，而天下之感戴者，不惟在明之君臣雪耻复仇，衔结莫报。而为亿万生灵救死扶生，其大德直与天地同流。由是看来，汤武虽以仁兴，而君臣一伦犹不能脱然无憾。所以当时成汤不免有惭德，武庚不免以殷叛。岂若本朝之有天下得于流贼之手，名正言顺，明臣、汉人皆感激深切，乐为效力致死者乎！

弥天重犯从前陷于不知，任臆狂悖，妄引《春秋》以自误，所以有“明亡之恨”等语。到今知之，痛悔流涕，几不欲生，而且蒙恩高厚，更觉无地自容了，复有何说。

【译文】 曾静供：这个事情的头，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以前一点也不知道。因为我父亲很早就死了，独自住在穷山僻野已经几十年，我的周围，不但是没有书籍可以借来观看参考，邻居乡亲，也没有知道这些事的老成人传告。我只知道本朝代替明代占有了天下，当初不知道明代的天下早已失在流寇的手里了。直到去年冬天，听到大人的解释后，又能够荣幸读到圣上的谕旨，才

知道本朝全都是凭借仁义而兴起，在漫长的历史中一枝独秀而没有朝代能比的。这些丰功伟绩在当代，不只是明代的君臣感恩戴德，即使是当时的无情草木，也没有不蒙受皇恩圣德的。

因为明朝时，朝廷上下松弛懈怠，政治教化全都废弛不修，纲常风纪颓废不整。内部是宦官把持朝政，外部是听任各个藩王剥削老百姓，荒淫放纵，礼教不存。以致于民不聊生，投奔乱贼，天下大乱，贼寇纷占而起。外地的官兵们望风而逃，所以叛贼能长驱直入，直达北京。在这个时候，老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遭到乱贼惨杀抢掠，危急不下于水火之灾。

太宗皇帝在东海地方兴起，修明政治，教化大道，仁义的名声传遍四海内外，而且没有萌发一点夺取明朝天下的心思。太宗皇帝曾经亲自带兵入关，在南苑尽情打猎，期待和明朝解除怨仇，平息战火，使百姓安居乐业。而明朝君臣，竟置之不理，因此只好遗憾地回去了。在当时如果有一丝一毫谋取天下的想法，夺取明朝正是易如反掌的事，又何必等到叛贼攻陷京城，崇祯帝以死殉国，明朝已亡，明皇位已失，接到平叛除寇的请求后，才命令将领率军队出发呢？这样的行动，比较起武王陈兵孟津，希望用兵力压使殷纣王有改悔之心，想法更加光明正大，内心外表如一，没有丝毫可以缺憾的。何况进入山海关后一次战斗便击败了李自成二十多万的军队，乱贼失魂落魄，四下逃亡溃散。我大清扫荡了敌人，平定了天下。当时天下百姓，像从深渊中挣扎了出来，像看到了父母一样。世祖皇帝从此发布了一系列仁政措施，安抚天下百姓，把亿万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而且天下人之所以感恩戴德，不只是因为为明代的君臣报了仇，洗掉耻辱，使他们结草衔环也无法报答恩惠，而且把亿万百姓从死亡中救出，这样的功绩，可与天地同存。从这方面来看，商汤武王虽然凭借仁政兴国，但在君臣伦理上，还不能够，没有一点遗憾，所以在当时商汤不免有惭愧之心，而武庚也免不了打着为殷雪耻的旗号，背叛周朝。哪里比得上本朝拥有的天下是从流贼手中得到，名正言顺，明朝臣子和汉族人都十分感激，乐意为本朝拼死

效力呢！

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从前被蒙蔽，一无所知，狂妄任性，错误地引用《春秋》的话来论证，所以有了“明亡之恨”等说法。到现在知道实情后深感后悔，流泪不止，几乎不想再活下去，而又得到了如此浩荡的皇恩，更觉惭愧得无地自容了，哪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八、对于孔子的《春秋》大义，岂 可以乱臣贼子之心来解释？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春秋》大义，未经先儒讲讨，有明三百年，无一人深悉其故。幸得东海夫子秉持撑柱”等语。孔子成《春秋》，原为君臣父子之大伦，扶植纲常，辨定名分。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今曾静以乱臣贼子之心，托《春秋》以为说，与孔子经文判然相背，无怪乎明三百年无一人能解。不但元、明之人，即汉、唐、宋以来之儒，亦无人能解也。惟逆贼吕留良凶悖成性，悍然无忌，与曾静同一乱贼之性，同一乱贼之见，所以其解略同耳。

曾静之恶逆大罪，肆诋朕躬，已为自古乱臣贼子所罕见。而吕留良涛张狂吠，获罪于圣祖，其罪万死莫赎，宜曾静之服膺倾倒，以为千古卓识。可问曾静，吕留良所说《春秋》大义，如何昭然大白于天下？吕留良是域中第一义人，还是域中第一叛逆之人？着他据实供来。

【译文】 问曾静：圣上问你，书信里有“《春秋》的微言，没有经过前辈大儒解释研究，明代三百年间没有一个人能清楚它的内涵，幸亏有东海夫子一柱撑天，了解大意”之类的说法。孔子写《春秋》，本来是为了讲明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巩固三纲五

常，确定名分，所以说：“孔子写成《春秋》，乱臣贼子就害怕了。”现在曾静有乱臣贼子的心思，借《春秋》来为自己辩解，和孔子经文大义截然相反，离经背道，也难怪明朝三百年间没有一个人能解释清。不仅是元、明朝的人，即使是汉、唐、宋以来的儒生，也没有人能够研究透。只有逆贼吕留良凶恶悖乱成性，悍然放肆，和曾静具有着同样的乱贼心性，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大致相同。

曾静大逆不道，恶毒攻击朕躬，已经是自古以来乱臣贼子中极少见的。而吕留良嚣张狂吠，对圣祖犯下了滔天大罪，万死也不能赎回他的罪过。吕留良却令曾静听从，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是千古以来的远见卓识。可以问曾静：吕留良所说的《春秋》大义，怎样才能明确地告知天下的人们？吕留良是天下第一讲道义之人，还是天下第一逆叛之贼？让他从实供来。

【原文】 曾静供：弥天重犯僻处山谷，离城甚远，左右邻里，无读书士子，良师益友就正，因应试州城，得见吕留良所本朝程墨，及大小题，房书诸评。见其论题理，根本传注，文法规矩先进大家，遂据僻性服膺，妄以为此人是本朝第一等人物，举凡一切言议，皆当以他为宗。其实当时并未曾晓得他的为人行事何如。而中国有论管仲九合一匡处，他人皆以为仁，只在不用兵车，而吕评大意，独谓仁在尊攘。弥天重犯遂类推一部《春秋》也只是尊周攘夷，却不知《论语》所云“攘”者止指楚国而言，谓僭王左衽，不知大伦，不习文教，而春秋所摈，亦指吴楚僭王，非以其地远而摈之也。若以地而论，则陈良不得为豪杰，周子不得承道统，律以《春秋》之义，亦将摈之乎。况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其说载于《孟子》，更大昭著者也。由是看来，在当时吕留良因为背谬之极，而弥天重犯信而宗之，尤为失之千里矣。

但吕留良议论弥天重犯所见者止此。其余文字著作，并不曾见过。惟到雍正五年，有学徒张熙，到浙江购书，到吕家传得吕

留良题《如此江山图》及《钱墓松歌》诗。彼时闻之，不觉惊异，不敢信以为然，随复得谣言，叠叠惑乱，遂疑他的话是实，且妄悔当身大义之不能早闻。

今奉旨将吕留良家藏旧作日记纂一本、诗集一本、日记草本四束、抄本文集四本、散诗稿一束赐看。其中不惟错看《春秋》，罪与弥天重犯同，且竟有讥诋圣祖皇帝处。圣祖皇帝在位六十余年，深仁厚泽，遍及薄海，即弥天重犯生长山僻，犹知感佩，况吕留良身居浙江大地，列名胶庠，食毛践土，亦已数十余年，如何丧心病狂，竟至如此。弥天重犯从前不知，姿以《春秋》之义说，虽出于吕氏，旨实发于孔子，不得不信。

今日解出孔子不是如此说，又深知本朝得统之正，全是天与人归，历圣相承，无不道隆德备。而吕留良所云，如此到今，实实见得他是凶悻成性，悍然无忌，涛张狂吠，得罪圣祖，万死莫赎，诚为盛朝叛逆之罪魁。而弥天重犯山鄙无知，坐昧当身大义，姿信而附和之，万死亦不足以当其罪。今虽深痛无知而误信，切恨吕说之害人。俱嗟无及矣，更有何说。

但吕留良之说行世日久，如弥天重犯之为其蛊惑者，谅复不少，今幸得因弥天重犯败露，莫非历圣德隆，皇天笃佑我朝，故水落石出，一至于此，此岂人力之所能与？弥天重犯今虽陷法网，由此而天下之人共知其叛逆，不为彼说所惑，弥天重犯死所甘心矣。

【译文】 曾静供：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居住在偏僻的山谷里，距离城镇很远，左邻右舍，也没有读书人和良好的老师、朋友来纠正我的错误。因为到州城参加科举考试，才得以见到吕留良所评选的本朝科举试卷和八股文格式等评论，看到他论述分析试题的涵义和注释试卷的文法程式非常谨严，很有前辈大家的风范，就从我的怪脾气开始佩服他，错误地认为这个人是本朝第一流的人物，所有一切的言论观点，都应当把他作为亲师。其实当时并不知道他的为人处事如何，书中有一段证述管仲九次联合诸侯结盟

尊王的事迹，别的人都认为是仁义之举，因为没有使用军队打仗，但吕留良却评论，认为仁在于尊重周朝王室，排斥夷狄。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由是依次类推一部《春秋》，以为写的都是尊周攘夷，却不知道《论语》所说的“攘”的意思，仅仅指楚国而言，因为楚国自称为王，不知道君臣伦理，不推行政教文明。而《春秋》所评击的，也指的吴楚二国自称为王，不尊周王，不是因为他们的地理位置远而抨击他们。如果按地理位置说，那么楚国的陈良不能算是英雄豪杰，宋朝的周敦颐不能继承儒家的道统。如果依照《春秋》大义，也要摈弃他们吗？何况舜是东夷的人，周文王是西夷的人，这种说法记载在《孟子》里，更能清楚地说明这个道理了。依此看来，在那时吕留良固然是荒谬之极，而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信奉他，推崇他，就更加荒谬千里了。

但吕留良的观点，犯了弥天大罪的我所看到的只有这些，其它的文章作品，我都没有看见过。直是到了雍正五年，有一个叫张熙的学生到浙江买书，到吕留良家传抄到他题的《如此江山图》和《钱墓松歌》的诗。我那时看到后，不由得吃惊，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随后又听到了许许多多的谣言，于是就疑心他的话是真实的，而且后悔这样的立身大道未能早些知晓。

现在奉旨将吕留良家里藏的旧作日记纂一本、诗集一本、日记草本四捆、抄本文集四本、散诗稿一捆，赐给我看。这里面不仅错误地解释《春秋》和犯下弥天大罪的我认识相同，而且竟然有讥讽诋毁圣祖皇帝的地方。圣祖皇帝在位六十多年，仁慈敦厚，恩义遍施天下，即使像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生长在穷山僻岭中，还知道感激敬佩，何况吕留良家住浙江文明发达的地方，身为儒学秀才，享受皇恩生活也已经几十年了，为何如此丧心病狂到这种地步！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以前不知道，错误地认为《春秋》大义的观点虽然是吕氏提出的，而其思想实际是孔子阐发的，不能不相信他。

今天明白了孔子不是这样的观点，又深深了解到本朝得到天下是如此纯正，全由上天降福、百姓归附而得，历代圣上一脉相

承，没有一个不是德高望重的。通过吕留良所说的这些话，到现在实实在在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凶顽成性、悍然放肆、嚣张疯狂的人，对圣祖犯了万死难赎的大罪，实在是本朝叛逆中的罪魁祸首。但犯了弥天大罪的我这个山区中粗鄙无知的小人，糊涂得违背了立身大义，一味相信去附和他的谬误，真是死一万次也不能抵消我的罪过。现在虽然深切痛恨自己无知而轻信异见，而更切齿痛恨吕氏说法害人至深。后悔嗟叹都来不及了，哪里还有什么可说的？

但是吕留良的邪说，在世上流传时间很长了，像我这样被毒害的人，想来一定还有。现在值得庆幸的是因为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罪行暴露，莫非是历代圣上德高道隆，上天保佑我朝，所以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一下到了这个地步。这岂是人的力量所能做到的？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现在虽然身陷法网之中，但也因此使天下的人都知道吕留良的叛逆，不为他的邪说所迷惑，犯了弥天大罪的我死了也甘心了。

九、对于一个臣民来说，到底 什么是荣辱生死的大义？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可荣可辱，可生可死，而此义必不可失坠”等语。今钦差审问之时，曾静缮写亲供全然改变，求哀乞怜，备极称颂。在曾静将以为荣乎，将以为辱乎？又未知曾静之心，此时愿生乎，抑愿死乎？其争持大义者何在？着他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向谓荣辱死生大义必不可失，只因错解《春秋》，错听谣言耳。其实弥天重犯原是皇上的赤子，非有历世功爵在先明难忘，素怀背叛不臣之心。今日发觉被执，只为谣言蛊惑，错解经义遂至狂悖若此。即在旧年狂悖蒙心之中，此心自问毫无别为，皆是从知识闻见上差错起。到今日解出经义，毫不

相干，知得谣传是蜚语诋诬。弥天重犯是蝼蚁小民，实是心悦诚服，到此惟有痛哭流涕，自恨当身大义，自悔不能为顺则之民，其乞哀求怜，正是弥天重犯今日当身之正义，但恐求乞之诚不至不能赎补当前之罪，虽蒙皇恩浩荡，自计于法无可生耳。

至若颂德称功，亦弥天重犯为臣民之分，所宜然，尚得似前日之陷于不知，而姿自诋诬，惟所虑者，识浅学陋，不能仰测龙德中正之备，而颂与称有不能至，以是死难瞑目也。盖君之尊同天，亲同父，民之称天，子之颂父岂得为过，况五伦从天而下，及之昆虫草木皆有，而君臣一伦，尤为五伦之首。弥天重犯从前错听流言，错解经义，所以陷身禽兽，自咎虽生犹死，今既晓得本朝龙兴，不同寻常万万，又亲被圣德，高厚从古所无，此时虽死犹生，虽辱亦荣了。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你在书信里有“可荣可辱，可生可死，而此义必不可失坠”这样的说法。现在派钦差审问此案时，曾静亲笔招供，全部改变了立场，摇尾求怜，说尽奉承的话。曾静，你自己认为这是光荣的呢？还是认为这是耻辱的？又不知道曾静你的心思此时是愿意活呢？还是愿意死呢？曾静所争论坚持的大义哪里去了，让他从实供出来。

曾静供：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一向认为关系荣辱生死的大义，一定不能失去，只是因为错误理解了《春秋》，误听了谣言的缘故。其实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原本是皇上的子民，并没有一个祖先在明朝有过功勋和封过爵位而对明难以忘怀，也没有一贯怀着叛逆本朝的心思。现在案发而被逮捕，只因为错误理解了经文大义，以至于狂妄悖乱到这种程度。即使是在过去被狂乱悖逆蒙骗时，我扪心自问，没有一点别的行为，都是从知识见闻上出现差错引起的。到了现在，参透了经文大义和吕说一点联系也没有，知道了所得到的谣言是在造谣惑众诋毁圣哲。犯了弥天大罪的我是一个像蚂蚁一样微不足道的小百姓，实在是心服口服。到现在只有痛苦流泪，自己痛恨处事立身失去大义，后悔自己不能成为

太平盛世的一个顺民。我乞哀求怜，正是因为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现在找到了立身大义，只害怕请求之心不够虔诚，不能偿还弥补过去的罪过，虽然承蒙了皇上的浩荡皇恩，但自己想来在国法上怕已没有生路了。

至于说到歌功颂德，也是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做臣民的份内事情，是应该的，哪还能像从前陷于愚昧无知而狂妄地百般诽谤！我所担心的只是学问浅薄，不能够准确完全地领会圣上高深的仁德思想，而导致称颂时有不贴切，或见不到的地方，因此而死不瞑目。君主的尊严像皇天一样，亲情像父亲一样，老百姓赞美皇天，做儿子的颂扬父亲，哪里能成为过失呢？况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从上到下，五种伦理关系，即使是草木昆虫都有这样的关系，而君臣间这一伦，居五伦中的第一位。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从前错听了流言蜚语，错解了经文大义，所以身陷禽兽之类。自己虽然活着就像死了一样。现在既然知道了本朝建国比过去所有一切朝代都强过万倍，又亲身承蒙受了皇上深厚的恩德，从古至今，没有人能比。这个时候，即使死去就像活着，虽是耻辱，亦感到光荣了。

十、那些狂肆毁谤皇帝的 谣言传语到底从何而来？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生当今日，遭逢今世，无志于当世之利禄以自污”等语。曾静果无志当世，则宜早为高尚，何以应试入学，身列青衿，及考居五等，然后愤懑穷居，肆为狂放？尚得云无志利禄乎？又书内“与一二同志，闭门空山，养鸡种瓜”等语。观曾静书内，见闻甚多，援据甚广，若闭门空山之中，蜚语讹言，何因人耳？是曾静同志之人，必非一二数也。着据实供吐，若供出何人传说，则曾静是误听传闻，罪尚可恕，不可以身犯大逆之罪，遂拼一死以含糊了事，甘为众人容

隱。皇上恩旨，着你据实供吐，你须将书内所云若者得自何人，若者传自何处，逐一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书内千错万错，无一字著实者，总因错听谣言，误解经义，所以酿成大恶，到今日不可疏解。今圣德光洁，毫无瑕玷，而皇恩浩荡，不可名言。以弥天重犯如是之大罪大犯，尚如是优容宽待，另置幽闭清旷之地，且敕部给食赐衣，此诚千古未有奇典，尧舜所不到之殊恩。即此一事，弥天重犯粉身碎骨，亦不能仰酬皇恩于万一。

此时此际，若果晓得造言首犯，方欲寝食其皮肉，又岂敢容隐他人奸回，以负皇恩？所以当日在长沙，大人审问再三，不敢说者，实为胸中不晓得个实在源头上造言的人。而传言的人，又实是个忠厚守法，不惟不肯造言，并不肯乱言的人。且自计罪大咎深，自料必不能生，虽蒙大人屡宣皇上智虑神奇，聪明天纵，事事非常，法所得定，亦非常情所得拟。弥天重犯的死生，断非事前所得决然。在弥天重犯当身自计，万难自信，可以侥幸于不死，与其临死而又牵累他人，不如自家一死之安为稍愈。

今感皇恩如此高厚，且奉旨意询问，思量自家一死何足轻重，即死亦要说明白自家的心事。赤子冒触父母，虽当父母盛怒之下，亦要向前号泣，说个明白，况今日旨意煌煌，得许弥天重犯直吐其人乎。此在自家分上计合，该要供出人。因思水流毕竟有源即流，或可以寻源，胸中记出有两个偶尔传言的人，一是安仁县生员姓何名立忠，曾说他听闻有个茶陵州人姓陈字帝锡，传说朝中有人上议皇上多条，其大者如此如此。又永兴县十八都有个医生，姓陈字象侯，也说他在一处人家行医，听得人说茶陵州有个堪輿姓陈字帝锡，口传有个本章，谏议皇上如此不好，那上本的臣子姓岳名钟琪。弥天重犯听得二人之话符同，遂渐疑此为实事，其实源头造言的人，不知就是那陈帝锡，抑陈帝锡上手还递传有人否。且陈帝锡弥天重犯从未会面，不知其人形貌何如，即帝锡两字，也不知是此两字否，问何立忠便知。听闻此人会堪輿，前两年在安仁县起学官，何立忠是安仁县的秀才，或者

知得他的名字。

其实今日仰惟皇上如天如地，何可毁谤。天经云隔，何伤于天，反因云隔，而转见天之高；地经穿凿，何损于地，反因穿凿，而转见地之厚。今皇上之行，如日月经天，虽湖山万里，莫不共见共闻。弥天重犯幸今亦如盲，得视复见天地日月了。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你在书信里有“生当今日，遭逢今世，无志于当世之利禄以自污”这样的说法。曾静如果在本朝没有什么求取功名志向，就应该早早做出高尚的举动，为什么去应试赶考，挤身于秀才的行列，等考试定为第五等时，才产生不满而闭门不出，言行放肆狂妄？这还能说是“无志利禄”吗？书信里又有“和一二个志同道合的人，闭门深山里，养鸡种瓜”等说法。看曾静的书信里，见到听到的很多，引用的事实也很多，如果闭门空山中间，流言蜚语，怎么能进入他耳中呢？所以和曾静志同道合的人，一定不止一二人。令他从实招来。如果供出了是什么人传说的，那么才证明曾静是误听人言，罪恶还可以原谅，不能因为犯了大逆不道的罪，于是就拼着一死来含含糊糊完事，甘心替众人隐瞒罪过。皇上有旨，令你从实招来，你必须将书信里所说的，这个从什么人那里听到的，那个从什么地方传来的，一条一条从实供来。

曾静供：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书信中有千错万错，没有一个字不是编造的，都是由于错听了谣言，误解了经文大义，所以才酿成了大错，到现在不得已无法疏通开脱。现在皇上仁德光明正大，没有任何缺点，而且皇上的恩德浩荡，不能用语言来表述。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罪行滔天，还能如此宽大优待，单独安置幽静清旷的地方，而且责令刑部部衙门供给衣食，这真是千古少见的例子，是尧、舜也做不到的特殊恩典。就这一件事，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即使粉身碎骨也难报答皇恩的万分之一。

此时此刻，如果知道造谣的作俑者，正想扒他的皮，吃他的肉，又哪敢隐瞒包庇奸人，辜负了皇上的深恩呢？所以当时在长

沙，钦差大人审问多次，我不敢说的原因，实在是心里确实不知道谁是确切造谣的人。而流传谣言的人，又实在是个老实忠厚，奉公守法，不仅不会造谣，又不肯乱说的人。而且自己考虑自己罪大恶极，心想一定不能活下去了。虽然承大人多次宣称皇上智慧超人，聪明绝顶，做事不是平常事理所能限制的，也不是按平常情理所能想到的，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的生死，一定不是在事前能知道的，然而我自己考虑，万难相信我能够侥幸不死，于其在临死时又连累别人，还不如自己一死比较安心。

现在我深感是皇恩如此高厚，而且大人奉旨询问，考虑到自己一死没什么可惜，但即使死也要表明清楚我的心事。儿子触犯了父母，即使在父母盛怒之中，也要上前号哭说个明白。何况今日皇上旨意明白清楚，允许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吐露出这些人。这从我自身本分上考虑，也应该要供出传谣的人来。因为想到流水有源，从水流也可以寻找到源头。心里想起有两个流传谣言的人。一个是安仁县的秀才，姓何叫立忠。曾经听他说有个茶陵川的人，姓陈，字帝锡，传说朝廷有个人上书议论皇帝许多缺点，其中重要的是如此如此。另一人是永兴县十八都叫陈象侯的医生。也说他在一个人家看病时，听人说茶陵有个风水先生，名叫陈帝锡的人，口头传说有一个奏折，谏议皇上一些缺点，那上折子的大臣叫岳钟琪。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听这两人的话相符，就渐渐怀疑以为这是个真事。其实最初造谣的人，不知道就是那个陈帝锡，还是陈帝锡上面还有传递消息的人呢？况且陈帝锡和我从来没有见过面，不知道这个人面貌怎样，即使是“帝锡”两字，也不知是这两个字不是，问一问何立忠就知道了。听说这个人会看风水，前两年曾在安仁县盖学官，何立忠是安仁县的秀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

其实现在看皇上如天如地，怎么能够诋毁诽谤？上天被云彩隔住，对于天又有什么损害，相反因为云彩隔住而更显示出天空的高远；大地被挖凿，对于大地有什么损害，反而因为挖凿而显出大地的深厚。现在皇上的圣行，像日月在天空运行，即使远隔

万里广阔的江湖高山，也没有不共同见到听见的。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庆幸现在像盲人能看见东西，能重新见到天地日月了。

十一、这“山崩川竭”的传言到底是何等之事？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在湖南供称“山崩川竭，是传闻泰山崩四十里，至于川并未竭，因笔头不谨，弄文致诬”等语。这泰山崩四十里之说，影响全无，你将传说笔之于书，已极悖逆了，况川竭之事，并无传说，而遂连类。并及这“山崩川竭”，是何等之事，竟可以笔头播弄得么？乃仅以“不谨”二字，轻忽戏玩之词掩饰此罪，如何使得呢？但所闻必有所自，你须据实供出。

曾静供：“山崩”之说，虽有传闻，弥天重犯今日万死，记想个人不出。“川竭”之误，弥天重犯今日实实该死。盖寻常说话，犹庸言之谨，一涉不实，不惟于道理有碍。于心不能无愧，抑且当面受人诃责不小。此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如何可以轻易掠过，且以庶人小民之贱，而上议国家事体，即有实据，犹不免出位冒干之罪，况既复妄，虚中更虚。即此一项，已足粉骨莫偿了。而前供犹仅以“笔头不谨”，盖过是身陷于罪，而竟不自知其罪之大小轻重矣，今日省悟，万死何辞。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在湖南你招供有“山崩塌，江干涸，是传闻泰山崩塌了四十里，至于江，并未干涸，因下笔不谨慎，使文章出现错误”这样的说法。这泰山崩塌四十里的说法，一点根据也没有，你将传言写到书信中，已经十分狂悖逆乱了，而江河干涸之事并无传说，你却也连带一块写入。这山崩塌江河干涸是多么重大的事，竟然可以在笔头随意胡写吗？你却仅仅用“不谨”两个字，用这种不严肃的戏玩之词来掩饰你的罪过，怎

么能行呢？但是听到的消息一定有它的来源，令你从实供来。

曾静供：泰山崩塌的传说，虽有谣传，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今天死一万次也想不出那人是谁。江河干涸的误笔，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确实该死。即便是平常说话还十分谨慎，一个举措不真实，不仅在道理上说不过去，对自己亦不能做到无愧于心，况且当面受到别人如此厉害的斥责呢？这是何等大事，怎么可以轻易地一掠而过！况且像我这等低贱的小民百姓，却去议论国家大事，即使有真凭实据，还不免有越位犯上的罪过，况且既欺圣上又弄虚作假，虚中有虚。仅凭此一项罪过，已经是粉身碎骨不能抵偿了。但在前面招供时还以下笔不谨慎来掩饰过错，这是身犯大罪竟然不知道自己罪过的大小轻重呀！今天反省悟出后，死一万次是应该的。

十二、“五星聚，黄河清”的瑞 祥征兆到底是什么因缘？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以大事看来，五星聚，黄河清，某当此时如何死得。天不欲开治则止，天欲开治，某当此机会，毕竟也算里面一个，求人于吴楚东南之隅，舍某其谁”等语。从古治乱之数，必上有桀纣之君，下有生世涂炭之祸，方可谓之大乱。曾静以我朝为夷狄，为匪类，然必为君者实有昏德，纪纲法度，一切废弛，方为否极之时。

以今日海宇承平，万民乐业，以朝廷政事而论，虽不敢谓为至治之世，然苟有人心之识者，断无有诬为乱极。当治之时也。且自开辟以来，未有如曾静禽兽不如之人，而以“五星聚，黄河清”为“舍我其谁”。又云“当此机会”，所谓机会者，何所指？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许多该死该剐的话，今日反复省悟，也有个病根。盖缘自幼以来，讲解经书，讲到《孟子》“滕文公问为

国”章说，那井田法制，心中觉得快活，私地暗想，以为今日该行。由是屡去问人，却无一人说今日行得。心下听着人说行不得，甚不快活。后看见吕留良此章书文评语，竟以为行得，且说治天下必要井田封建，井田封建复了，然后方可望得治平。遂不觉赏心合意，从此遂深信吕留良的话。且执着这个死法子，放肚里。因而看轻汉、唐、宋、明之治，大不及三代，妄以为井田不复，贫富不均，其余言治，皆非至道，乃猥不自量，敢以经济抱负，超越寻常。自许一闻“五星聚，黄河清”，遂疑此必是文明开始的机会，既遇文明开治的机会，必行井田复三代，欲行井田复三代，在当身自计，竭其驽骀，亦足备一时大马之用，因而有舍我其谁之语。即所谓当此机会者，亦是望上之人用我，故曰求人于吴楚东南之隅，非是说弥天重犯当此机会，另生个别见也。只因谣言见闻，遂深疑皇躬主德未纯，所以狂悖，而有是举。

及昨自湖南一路以抵京师，所历过之地数千里，无不家给人足，薄海内外，无不化行俗，美道德，政教修举，详明较三代之井田学校，更因时损益，已精益求精，正礼明乐备之极，天开文明之盛，当此如是之道隆德至，治著功成。我皇上犹求治之念孜孜不遑，不肯一时一刻少懈。伏读谕旨，尚曰：不敢谓为至治之世。德隆心下，圣不自圣，一至于此，此所以无人感孚，瑞呈详见，“五星聚，黄河清”者，正为皇上道德纯全，超越千古，本朝治教体明，迈盛三代，大圣人兴起在位应也。

况井田疆界，自秦以来，已荡废二千余年，封恤沟渠，皆不可考。而今日承平日久，平原旷上，各成旧业，以理势论之，迹必不可行。且天下人文蔚起，不知有几千几万贤良，才智深于治体，精于治法者，用之不尽，而弥天重犯山鄙无知，禽兽不知，乃谓“舍我其谁”，其不自量，一至于此，狂妄之罪，万死何逃。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你在所写的逆乱之书《知新录》中有“以大事看来，出现五星聚会，黄河澄清的瑞祥，我在这个时候，怎么能够死呢？上天不愿天下太平就算了，上天想开始让

天下平定，我逢到这个机会，毕竟也可以算一个人，想在吴楚东南之地找到人才，除了我还有谁呢”等说法。探求古时治理乱世的规律，一定是朝上有昏庸得像夏桀、殷纣的君主，朝下有令百姓遭殃的灾祸，才可以称得上大乱。曾静认为我朝是夷狄之辈，是匪寇之徒，这样做君主的一定昏庸罪恶，国家的纲常法纪一切一定都废弛松弛，因此说形势坏到了极点。

而今天四海升平，万民乐业，从现在朝廷政事来说，虽然不敢说是最好的时代，而只要有人心有思想的人，断然没有诬蔑当世是乱极当治的时候。况且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不曾有过像曾静这样禽兽不如的人，而凭借着“五星聚，黄河清”来说“除了我还有谁”的话。又说“遇到这个机会”，所说的机会是什么？从实招来。

曾静供：犯了弥天大罪的我许多该杀该刚的话，今天反复自省，也有一个病根。因为从小以来，讲解经书，讲到《孟子》“滕文公问为国”一章，说到那井田制，我内心非常高兴，暗地里想，认为现在应该施行。因此多次去问别人，却没有一个人说现在能够行得通。听别人说行不通，我心里很不高兴。后来看见吕留良对这一章的评语，竟认为行得通，而且说治理天下一定要用井田制，分封制，恢复了井田封建制度，这样之后才能希望天下得到治理，国家太平，于是就不知不觉符合了自己的意见。从此就非常相信吕留良的话，而且在内心坚持着这个死法子，因此也轻视起唐、宋、明代的统治，认为他们大大比不上夏、商、周三代，错误地认为井田制不恢复，贫富就不会平均，其它谈论治国的话，都不是真正的道理，于是不自量力，竟自为政治才能、理想抱负超过寻常之人而自夸。一听到“五星聚集，黄河澄清”的瑞祥出现，就怀疑这一定是文明治世的机会。既然遇到了文明治世的机会，一定要施行井田制，恢复三代旧制。想施行井田制，恢复三代旧制，从我自身考虑，竭尽我低劣的才智也足够为效犬马之劳的使用，因此才有“舍我其谁”的话。即便是所说的遇到的机会，也是希望上面的人重用我，所以说到吴楚东南之

地求得人才，不是说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在这个机会起了另外一个念头。只因为常听到谣言，于是怀疑皇上道德不纯正，所以才狂妄地有了这个举动。

前一段从湖南一路上到京师去，所经过的地方几千里广大，没有人家不是丰衣足食的，四海内外，没有地方不是风俗淳厚的。道德教化，推行得非常普遍，比较起三代时井田制和学校制度，更加依据时代不同而进行增减改革，好了还要求更好，使礼乐文明完备到了极点，上天安排了这样一个太平盛世。在此时是这样的道德修明，功勋卓著，皇上还孜孜不倦地考虑治国大道，不肯松懈一时一刻。我伏身读圣谕时，上面还说“不敢说是最好的盛世”，道德高尚而内心谦虚，不自封为圣人才是真正圣人，已到了这个地步。这样才使上天感动百姓信任，吉祥征兆不断出现，“五星聚会，黄河澄清”的原因，正是由于圣上的道德纯正，超越千古帝王，本朝政治清明教化醇厚，繁荣超过了三代之时，大圣人居于帝位之时才出现的瑞祥征兆。

况且井田制的界限，从秦朝以来，已经被废除、取消了两千多年，封地时的沟渠都已不能找到。而现在经过长时间的太平，平原荒废的土地都成了老百姓的产业，从道理和现实形势上讲，也必然不能施行，何况天下有才能的人蔚然众多，不知道有几千几万个贤臣良士，对于治理国家，规范典章制度十分精通，这样的人才用之不尽。而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生长在偏远山区粗鄙无知，连禽兽都不如，还称“舍我其谁”的话，真是不自量力，竟然到了这般地步，狂妄的罪过，真是万死不为过。

十三、被曾静奉以为师的吕留良到底是何许人也？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近世晚村夫子学问足，本领济，大有为得”。又“生非其时，在今日

似恰逢其会”等语。这日留良自以其先世为前明之仪宾，不忘故国，而在本朝应试诸生，以天盖楼选刻时文，将本朝制科内名人之墨卷文稿刊板求利，致富不赀，乃包藏祸心，肆行无忌。实一反复无赖、卑污狂悖、叛逆之人，天地覆载所不容。今你乃奉为师法，心悦诚服，以为孔孟复生。你所谓吕留良之学问本领，从何处见得？吕留良之大有为，从何处知道？是你与吕留良必曾会晤，亲承指授，而信敬畏服，一至于此。且云“今日恰逢其会”，又是何解？可从实供来。

曾静供：圣人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又曰：“不知人则是非邪正莫能辨。”弥天重犯今日狂悖，一路错到底者，总因自家僻处山谷，眼孔小，见闻隘，胸次鄙陋，错认人故也。如这些话都是自家没识见，讨人底里不着，遂妄意心悦诚服，奉以为师，不惟以为师，且以他为一世的豪杰。其实当时何曾晓得他的行径大有不好处。不过就语句言话上，见得与自家僻性相投合，遂不觉好之深。好之深，遂不觉信之笃。

当时所谓学问本领者，妄意指他的说理明，论文精。谓他大有为者，期他得用，可行井田，复三代，从前谬妄信得他是如此。今日蒙圣恩开导点化，始晓得他的行事为人，到处不是，不特他当身大义背谬而已。从此回想，向日之信听他者，何啻陈相之悦许行，痛悔何及？至若谓亲承指授，实实没有。他生在浙江，弥天重犯生在湖南，近广东界，相去有数千里，且弥天重犯是康熙十八年生，吕留良是康熙二十一年死，弥天重犯只有四岁，实未曾与他会晤。至于“恰逢其会”等语，是弥天重犯胸中先有他一段看轻后世之心，又有他一段错解《春秋》之意，加以元年匪类之说在耳，而又适值永兴县那两年天雨，数月不断，遂以为世道有不好处。此全是山僻无知的识见。

直到旧岁奉拿到长沙，今岁又由长沙到京城，见得年丰时和化行俗美，太平有道，普天薄海皆然。方知圣人在位，政教修举，礼乐明备，直盛千古。从前满肚疑团，始得一洗落实。而吕留良之欺世盗名，大逆不道，蛊惑人心，为覆载难容处，弥天重

犯亦了然明白矣。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你写的逆书《知新录》中有“近代吕晚村先生，学问很高深，本领很大，大有作为”，以及“没有生在那样时期，而现在好像正好遇到了那个机会”等语。这个吕留良自己认为他的祖先是明代的仪宾（亲王女婿的称号），不能忘怀于前明王朝，而在我朝参加科举当秀才十多年。后来科考了第五等，突然削发出家，扔掉秀才不要，用“天盖楼”堂号选刻当代的八股文，把本朝科举有名之士的作文试卷，刻好印刷来赚钱，发了横财。他包藏着为祸之心，行为放肆无礼，实在是个反复无常、卑鄙下流、疯狂悖乱、大逆不道的无赖，天地都不能容他。现在你却把他奉为师长，佩服至极，把他当成孔子孟子再生。你所说的吕留良的学问本领，从哪些地方看出来的？吕留良有大的作为，从哪些地方知道的？所以你和吕留良肯定曾见过面，亲自受了他的指教，因此信服敬畏到这种地步。还说“现在正好遇到机会”又是如何解释，可从实招供出来。

曾静供：孔圣人说过：“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就怕自己不了解别人。”又说：“如果了解别人，那么是非邪正就无法辨别。”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今天狂妄悖逆，一路错到底的原因，是因为犯人我家住在偏僻山谷，眼界小，见闻不广，肚里知识浅陋，错误看待人的结果。像这样的话，都是自己没有见识，不知道别人的底细，遂错误地对他心悦诚服，把他尊为老师。不仅把他尊为老师，而且把他捧为一代的英雄豪杰。其实，当时又如何能晓得他的行为大有不好的地方呢？不过是因为看到他的语言说法上，正和自己的偏见相符合，遂不知不觉对他有深刻爱好；爱好得深，遂不知不觉就对他信仰得更深。

当时说他有学问有本领，是错误地认为他说理明白透彻，议论精辟妥当；说他大有作为，是希望他能被朝廷任用，可以实行井田制，恢复三代时的盛世。以前荒谬信服他就是因为这一点。今天承蒙受皇上开恩加以教育开导，才晓得他的做事和为人处处

不对，不仅仅是对人的立身大义解释错误而已。因此回想起来，过去所以听信他的话，这和战国时陈相放弃正路喜好许行的学说一样，实在痛悔莫及了。至于说亲自受吕留良的指教，那确实没有。他生在浙江，犯人我生在湖南接近广东的地方，相去有几千里。而且犯人我是康熙十八年出生的，而吕留良是康熙二十一年死的，犯人我当时才四岁，确实没有与他见过面。至于说的“恰好相逢在一块”等话，是因为犯了弥天重罪的我，心中先存有了他那种看轻后世的思想，又有他那一段错讲《春秋》意义的影响，加之对元朝时匪类的说法也听进去了，而又遇上永兴县那两年一连几个月大雨不断，于是就为这是世道不好而上天降灾。这完全是因住在山野荒僻地方而产生的无知见解。

直到去年奉旨被捉到长沙，今年从长沙押解到京城来，一路上看到到处年丰人和，教化和风俗都很美好，天下太平，道德深入人心，全国各地都是一样，才懂得当今有圣人当皇上，政治教化都得到很好的推行，礼乐文明都十分完备，真是千古以来未曾有过的盛世。从前一肚子疑团，至今才得以洗涤干净。而吕留良的欺世盗名，大逆不道，蛊惑人心，实是天地所不能容许的，犯了弥天大罪的我至此才算心中了然明白了。

奉旨讯问曾静口供二十四条

一、曾静等人各处行走，纠合叛逆之人的缘由如何？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敬卿、景叔西游，似亦不轻。那年二月初二日五星联珠，日月合璧。某等七月初即有是行。天上这个朕兆不应则已，若应此事，必落于我辈之手。纵不能成于我手，亦必是我家眷属敬卿、景叔之手”等语。敬卿是张熙，所谓景叔又是何人？

据你前次供云“胸中原无确见，但传闻讹言，妄生疑惑，因而遣徒上书”等语。今据书中所云，是年七月，即有是行。是你于雍正三年已令张熙等各处行走，纠合叛逆之人，至六年方于岳钟琪处上书。你平日自命以为上应联珠合璧之祥，且云：此事必落于我辈之手，则是久蓄异谋，处心积虑要叛逆。你将三年七月以后差张熙等在何处行走，纠合何人，并所谓眷属，共有多少？景叔是何姓名，他又行住何处？逐一据实供来。

曾静供：西游的话，是雍正三年事，当时并有别意。因弥天重犯所住的地最狭僻，在山谷中，左右方圆十余里，尽是耕户山农，并没有个读书识字的人相接。弥天重犯的父亲在日，曾尝有个迁居的志，而不能得遂。复因近来人多田贵，家事单寒，转移不得。后得学徒张熙、廖易在门往来，食宿安顿不得。而张熙、

廖易家事亦贫寒，因见这些去四川的传来，以为四川田贱，乃与张熙、廖易商量，思欲去四川寻采个安静的所在，以为搬家安耕之计。且与张熙、廖易同往，并可以遂其读书之志。于是打叠去四川之行。于七月二十五日起身，搭船到长沙上岸，因到长沙城中走一回。盖弥天重犯从未出门，只因考试到过郴州，余并未曾走动。

不意到长沙竟看见有一告示，上说“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话。彼时大喜，以为有好世界来，毕竟会复井田封建，复井田封建，毕竟要用人，到那会用人时，我辈的行藏就不可得知。且既有井田则到处可以安身，又何必搬家带属，走四川做甚？于是去四川志遂灰了，就要转身来。那时并没有一点别样志向，惟有心中打量，要来京城上书献策，再三不决者，苦为匪类一篇说话在胸中狐疑，乃转身到长沙岳麓山一看。由是往湘潭一路回来，并没有会着别样人物，说一句异话，到九月初三日归家。

唯回来有两年，见得这两年的收成不好，接年水荒，米贵，谷贵，百姓艰难，逃荒避水的多，乃翻疑此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兆，恐另有别应，加以传闻日密，皆与前匪类之说相印证，于是狂悖有是话。盖此话是雍正五年冬说的，乃追忆雍正三年事，一前一后，前面的志向，与后面所见大不相贴。其实并没有到别处，并未曾会半个人。所谓西游者亦是因去四川西蜀取名。景叔即今在案解到之廖易。所谓眷属，即指张熙、廖易言。除此之外，并没有别人。

总之，弥天重犯狂举的心肝肺腑，一丝一毫，点点滴滴，尽载于《知几录》、《知新录》。此两本书，虽有两个名号，确不是立意著作的书、装点的话。《知新录》乃是仿张横渠先生“心有开明，即便札记”之说。随每日所知所见，不论精粗是非，写放于此，以便自家翻阅。考其所学之得失议论，因未曾斟酌，文法亦未曾修饰，原是随便写出的口语。《知几录》不过写出叮咛张熙的话，明说与他，恐左右人听闻，且虑他未必记得，因写于纸上，到写得多了，遂取个名号，此是暗地递与他的话。

今二书俱已搜获，进呈御览矣。弥天重犯当年情事何处掩藏？况皇上圣明天纵，明睿所照，丝毫尽露，并不能掩。且弥天重犯一路感戴皇恩如此高厚，自计虽粉骨碎身，亦莫能仰报万一，到此又何忍隐？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有“敬卿、景叔去西方行游，似乎也不轻松。那一年二月初二日，天空呈现‘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祥瑞。我们七月初就有了这次出行。上天这次吉祥的征兆不灵验则罢，若能灵验，这样兆必定要降临于我们这类人手中。纵然不能成事于我手上，也必然是成事于我家的眷属敬卿、景叔的手上”这样的言语。敬卿是张熙。所谓的景叔又是什么人？

据你前些时的供词说“心中原来没有一定的主见，只是误听了传闻的谣言，胡乱生出了疑惑之念，因此才派遣徒弟去上书”等言语。如今根据你书中所说，当年七月，就有这次出行。你于雍正三年已经派张熙等人往各处行走，纠集聚合叛逆贼人，到了雍正六年才往岳钟琪处上书。你平时自命认为你上应联珠合璧的祥兆，并且说“这样兆必定要降临于我们这类人手中”，证明你是早就有谋反之念，处心积虑要行叛逆之事。你将雍正三年七月以后差遣张熙等人往何处行走，纠集聚合了什么人？并且你所谓的眷属，共有多少人？景叔的真实姓名是什么，他又行居在什么地方？要逐一按实情招供出来。

曾静供道：往西方行游的话，说的是雍正三年的事情。当时并没有其他的意图。因为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所居住的地方非常偏僻，处在山谷之中，左右方圆十多里路，都是山野农户，也没有个读书识字的人能交往。我这个弥天重罪犯人的父亲尚在的时候，曾经有想迁走的念头，而不能遂愿。又因为近来人多田贵，我家境单薄贫寒，也转移不得了。后来，收得学徒张熙、廖易在我门下，居住歇宿都安顿不好。而张熙、廖易二人家境也同样贫寒，因为看这些去四川的人传来话，以为四川的田产价低，

于是与张熙、廖易商量，寻思去四川找个安静的地方，以实现搬家前去安居耕种的打算，并且与张熙、廖易二人同住，还可以满足他们读书的愿望，于是收拾安排了去四川的出行。我们于七月二十五日起身，乘船来到长沙上岸，由于这事才到长沙城中走了一回。我这个弥天重犯的犯人从未出过远门，除了因为考试到过郴州，我并没有外出走动过。

不想到长沙竟然看见有一告示，上边说的是“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话。我当时心中大喜，认为珠联合璧，盛世到来，一定要恢复井田和封建制度，既恢复井田封建制，一定要选拔人才。到那会选用人才的时候，我们这类人的出路就难以预测了。而且，既有井田制度，到处都可以安身，又何必搬家带着，往四川去呢？于是，去四川的想法，也便心灰意懒了，就要转身返回。那个时候并没有一点别的志向，只是心中考虑，想来京城中向朝廷上书献策。之所以再三不能决定，是担心匪患的传闻，心中迟疑不决，于是转身到长沙岳麓山一游，由此往湘潭一路回来，并没有会见到别的什么人物，说一句别的什么话。到了九月初三日回归家中。已经回来有两年了，见这两年的收成不好，水患接连不断，谷米价贵，百姓们生活艰难，大多外出逃荒避水去了。于是倒怀疑这“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祥瑞之兆，恐怕是另有别的应验。如今市面上传言越来越多，都与以前匪乱的说法相符，于是才有了这些狂逆背理的言语。这些话是雍正五年的冬天时说的，是因为回忆起雍正三年的事，一前一后，前面的志向，与后面的所见所闻大不相同。其实我们并没有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也不曾会见过半个外人。所谓的西游也是因为准备去四川，才有这样的提法。景叔就是现在本案中押解到的廖易。所谓的眷属，就是指的张熙、廖易而言，并没有别的人。

总之，我这弥天重罪犯人狂妄举动的心肝肺腑，一丝一毫，点点滴滴，都记载在《知几录》、《知新录》这两本书中。这两本书，虽然题有两个书名，却并不是为明志立意而写的书，不过是为装饰点缀所说的话。《知新录》本是我仿照张横渠先生“心有

启发而通达事理时，立即记录下心得体会”的说法。随着每日的所闻所见，不论详细粗略，或是或非，都记载下来，便于日后自己翻阅查看。如考证这些通过学习而抒发的得失议论，本来未曾认真斟酌过，文法上也未曾加以修饰，原就只是随便记写下的口语。《知几录》这本书不过写的是叮嘱张熙的话。明着讲给他听，唯恐左右一旁的人听到，并且也担心他未必能认真记在心中，因此记写在纸上。到记载得多了，便取了书名，这只是些私下讲给他听的话罢了。

如今以上两本书都已经被搜获，进呈皇上亲自看过了。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当年的事情，哪儿能掩藏呢？况且皇上乃是上天降下的圣明君主，睿智明达，洞察秋毫，圣目光照之处，发丝毫末尽都显露无遗，并不能遮掩隐藏。而且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一路之上，感戴皇恩如此高厚，自己思忖就是粉身碎骨，也不能上报皇上恩德万分之一。到了此等地步，又怎能忍心隐瞒呢？

二、大清国里考生增多，如何 说是文人趋下，无耻奔竞呢？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永兴童生应县试者二千四五百人，应道试者二两千人，何曾是今文风极盛，盖缘风俗日趋日下，无耻的多，所以奔竞成习”等语。从来以人材之众多，征国家培养教育之功。是以《兔置》之诗，言化行俗美，贤才众多，未闻以人文日盛为风俗趋下者。且士人求名进取，有志观光，亦其本分当然。今曾静谓为无耻奔竞。

试问曾静，伊既以应试为无耻，则自己不该应试，何以从前名列青衿？考试多年，及考居劣等，方不出来应试。曾静自问，为有耻安静之人乎？为无耻奔竞之人乎？着伊自评品。

曾静供：这种狂悖说话，大病总坐于看轻举子，所以颠倒悖

谬，竟至于此。当年之意，盖谓国家隆重师儒，养育人材，开此科举，以为士子荣进之阶，典至重大。读书均当仰体朝廷之意。亦须看此为至尊至贵之路，必敦行励节，有廉有耻，经义明晓，文理通达，然后从此应试上进，方不负朝廷取士之意。若文理全未通，经义全未解，行谊毫不加修，而唯日以应举应试为荣。岂不是以至重至贵之路，而反为争名夺利之场！所以狂悖，遂有此说。

岂知我生之初应试少者，因明末丧乱之后，百姓流离困苦，不得安业读书所致。到后来蒙世祖章皇帝休养生息，圣祖仁皇帝至德流洽，仁渐义摩，所以盛朝人材蔚起，迥不同于先明，是这个缘故。如何当年不省？至于弥天重犯当身自问，从前未睹天日，狂妄丧心，看得一切皆不入眼，到今日得圣化，一洗从前谬妄，因翻思向之所知所行，直与禽兽无异，狗彘不如，更有何人行堪问，只有愧死无地耳。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有“永兴县的童生参加县里考试的，有两千四五百人，参加道里考试的有两千人，这哪里是如今文风极盛行的现象，主要缘故是世情风俗日趋低下，不知廉耻的人太多了，所以为了名利而奔走争竞成了一种习尚”等话。历来都是以人才的多寡，来验证国家培养教育的功绩。《诗经》中的《兔置》一诗，讲的是国家昌盛，教化实行，风俗美好，贤明而有才能的人就多，却未曾听说过礼教文化传布使人事兴盛是风俗趋下的说法。而且，读书人追求进取功名，有志于参加考试，熟悉考场情况，也是他们的本分当然之事。如今曾静认为这是不知羞耻而奔走争竞名利的行为。

试问曾静，你既然以参加科举考试为无耻，自己就不应该参加考试，为什么却考中了秀才？以后科试多年，直等到考试成绩低劣，才不出来参加科考。曾静你问问自己，你是个有耻辱之心、清静之心的人呢？还是个不知羞耻、奔走争竞名利之的人

呢？让你自己给自己下个评论。

曾静供：这种狂妄背理的语言，大的差错就是由于看轻了参加应试的读书人，所以颠倒事理，言行荒谬，到了这等地步。当年我说此话的真实意思，是说国家十分重视教育，为培育人材，开设此科举考试为读书人荣升进取的阶梯，是极为重大的典章制度。读书人都应当仰望体念朝廷的意图，把科举考试看作是很重要很崇高的进取之路。必然要使自己的行为敦厚、保持节操，有廉洁的志向，存有知耻辱的心胸，懂得经书的义理，文章条理通达顺畅，然后可参加科考，以求上进，才能不辜负朝廷开科取士的本意。如果文章的条理没有全部通达，经书的义旨没有全部理解，品行道义丝毫不加以修省，而整日以参加科举考试为荣耀，岂不是将很重要很崇高的仕取之路，转而变成了争名夺利的场所！所以我才狂妄背理说了这些话。

怎知道我年少时，参加考试的人少，是由于明末丧乱以后，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不能够安心读书所造成的。到了后来，蒙受世祖章皇帝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圣祖仁皇帝高尚品德传递广布，仁政义德逐渐浸润推行，所以兴盛之朝，人材荟萃辈出，迥然不同先前的明朝。为什么当年没认识到这些呢？对于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扪心自问，从前没看到天地日月之大，狂妄自傲，丧尽理智，看一切现象都不顺眼。直到今日得到皇上圣谕开导教化，才一洗从前的错误和荒谬。因此反转回来思忖以往的所有言行，真是与禽兽一样，猪狗都不如，又能禁得起何人的询问？只有羞愧而死，无地容身罢了。

三、著述《格物集》的刘先生， 其人其书是什么情形？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刘先生所著《格物集》，他从子光斗过宁远县任所，带得一个稿本来”

等语。这刘先生是何等样人？是何名字？他的从子光斗，于今现在何处？其所著《格物集》是何等样书呢？

曾静供：刘先生即今案内解到之刘之珩，从子刘光斗，在湖南岳州府安乡县住。《格物集》是刘之珩所著的，其中专言物理，并没说别样话。书亦不多。因刘之珩原任在永兴县做教谕，弥天重犯做生员时，曾经接见。后于雍正元年刘之珩丁父忧，遂回归岳州府安乡县居丧去了。到服满起复，改补永州府宁远县教谕。有从子刘光斗，自安乡县到宁远县学署看问伯父刘之珩，路从永兴县过，弥天重犯见他带得《格物集》，故写在《知新录》内。前在长沙，这《格物集》已经钦差大人从刘之珩家搜获进呈矣。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有“刘先生所写的《格物集》，他的侄儿光斗经过宁远县的地方，带了一个稿本回来”等话语。这个刘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名字叫什么？他的侄儿光斗，现在在什么地方？他所写作的《格物集》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曾静供：刘先生就是现在牵连在案件中押解到的刘之珩。他的侄儿刘光斗，住在湖南岳州府安乡县。《格物集》是刘之珩写的，书中写得都是些物理一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言语。书的字数也不多。只因为刘之珩原来在永兴县县学中做教谕，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做生员的时候，曾经被他召见过。后来在雍正元年刘之珩的父亲不幸去逝，于是他回到岳州府安乡县办理丧事去了。到了丧期期满后又被起用，调到永州府宁远县县学中担任教谕之职。

他的侄儿刘光斗，从安乡县到宁远县学署看望问候他的伯父刘之珩，途中经过永兴县，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见了 he 带着的《格物集》，所以把它写在了《知新录》里。不久前在长沙，这本《格物集》已经被钦差大人从刘之珩家搜查到呈送上去了。

四、如果皇帝只应孔、孟、程来做，那么汉、唐、宋、元的开国皇帝都是“光棍”吗？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末皇帝该吕子做，今都被豪强占据去了。吾儒最会做皇帝，世路上英雄他那晓得做甚皇帝”等语。

孔孟之所以为大圣大贤者，以其明伦立教，正万世之人心，明千古之大义。岂有孔子、孟子要做皇帝之理乎？孔子云：“事君尽礼。”又云：“臣事君以忠。”又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看《乡党》一篇，孔子于君父之前，备极敬畏小心。孟子云：“欲为臣，尽臣道。”又云：“齐人莫如我敬王者。”使孔孟当日得位行道，惟自尽其臣子之常经，岂有以韦布儒生，要自做皇帝之理！

若依曾静所说，将乱臣贼子篡夺无君之事，强派在孔孟身上，污蔑圣贤，是何肺肠？且自汉唐以来，圣君哲后，代不乏人。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金太祖、元太祖、世祖，或戡定祸乱，或躬致太平，皆天命所归，功德丕著。今乃概目为光棍！况曾静时切明亡之恨，而以周末局变之后，皇帝皆系光棍，则明太祖亦在光棍之列。曾静不但是本朝之叛臣贼子，亦即是明之叛臣贼子。且曾静亦知光棍应得何罪，今以开创之主，皆诋为光棍，则当时佐命翼赞之名臣，皆当治以光棍为从之律矣。又春秋至明，数千年间，曾静所谓合该做皇帝者，只有孔、孟、程、朱、吕留良五人。开辟至今，无此狂怪丧心之论。可问曾静是如何说？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了“皇帝应该是我们读书人中的大学者做，不应该让那些人生世道上的英雄们做。周朝末期，局势大变，以后在位的君王大多不知读书，都是些人生世道上的英雄，更有的甚至是老奸巨猾，也就是民谚所说的光棍之流。若要论说正其名位，春秋时期的皇帝应该由孔子做，战国时期的皇帝应该由孟子做，秦朝以后的皇帝应该由程颐、程灏和朱熹做，明朝末期的皇帝应该由吕留良做。可如今都被豪强们占据去了。我们读书人最会做皇帝，人生世道上的那些英雄他们哪里懂得做什么皇帝”这样的话。

孔孟之所以是大圣大贤之人，是因其以明确的伦常道德立成儒教，来端正万世的人心，明扬千古的大义。岂有孔子、孟子要做皇帝的道理呢？孔子说：“服事君王要尽到礼节。”又说：“臣子侍奉君王要报以忠心。”还说：“君要像是君，臣要像是臣，父要像是父，子要像是子。”看《论语》中的《乡党》一篇所描写的，孔子在君王和父亲面前，完全是非常恭敬谨慎的。孟子说：“要想好人臣，就要尽到人臣的道义。”又说：“齐国人没有像我这样敬重君王的。”上天使孔孟当时得圣贤的地位，传行圣贤的纲常伦理，尚且要尽他们做人臣的常理规范，岂有以韦带布衣的寒儒书生，要自做皇帝的道理！

如果按照曾静所说的，将乱臣贼子篡权夺位、灭道弑君的叛逆行为，强加在孔孟的身上，来污蔑圣贤，究竟是何心肺肝肠呢？而且自从汉朝唐朝以来，圣明贤德的君王历代都不缺少。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金太祖、元太祖、元世祖，有的平战祸，安定天下，有的亲身致力于太平，休养生息。这都是上天之命的归属，功德显赫昭著。如今却一概看成光棍。况且曾静时时切记明朝亡灭之怨恨，而认为周朝末期局势变化以后，皇帝都是些光棍，那么明太祖也列在光棍之类了。曾静不但是本朝的叛臣贼子，也是明朝的叛臣贼子。并且曾静也知道光棍应是什么恶名，如今将各朝开创基业的君王，都诋毁是光棍，那么当时辅佐拥戴帝王创业的一代名将功臣，也都应当治他们以光棍随从的刑

律了。再说春秋至明朝数千年间，曾静所谓应该做皇帝的，只有孔子、孟子、程氏兄弟、朱熹、吕留良五个人。开天辟地到现今，还没有如此狂妄怪诞、丧心之极的论调。可问曾静是怎样供说？

【原文】 曾静供：这狂怪的话，本是说做君的毕竟是聪明天亶，学问盖世。如前供所说，聪明睿智，仁能育万物，义能正万事，礼能宣万化，智能察万类，信能孚万邦，天下乃得而尊之亲之，奉以为君之意。

盖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君以职位言，师以道德言。必道德极天下之至，然后职位居天下之尊。其实君师原是一人做的，君之外，另有一种道德高出天下者为师。所以二帝三王之世，尧、舜、禹、汤、文、武之君，皆是深于道德之至，精于学问之极，当明天下莫得而尚之，所以为君。春秋、战国之局变，有孔孟之道全德备，而世莫能用。在上周家天子，又未闻有道德高出于孔孟者，以唐虞三代极盛之例推之，却似春秋时的大君，合该有孔子之道德，方足以当之；战国时之大君，合该有孟子之仁义，乃足以当之；宋末时的大君合该有程朱的理学，方足以当之。当日之意，不是谓孔、孟必要出来做君，程、朱亦有志于临民。乃是谓君临天下，必有孔、孟之道德仁义，与程、朱之理学精详耳。

盖敬君之至，莫如孔、孟，尊君之极，莫如程、朱。孔子事君尽礼，见于《乡党》一篇，后世人臣所少到，且不唯敬而已。推事君之诚，无所不至。为委吏则牛羊茁壮长，为乘田则会计当。举凡当官之职，尽到十分处，不肯一毫苟且者，皆是看得君命重大，所以职不敢旷耳。观孔子，则孟子、程、朱可类推矣。其所谓会做者，谓学问造到极处，成己自可以成物。《大学》讲明德，必及新民；《中庸》致中和，必到位育。盖性分中功用之全，自然贯通到此。所以说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禹为君、稷为相、颜子是个陋巷匹夫，如何做得君相的事，亦是一理相

通，修身就可以齐家，齐家就可以治国平天下。四书五经中，无一章不言及治天下的事。

【译文】 曾静供：这些狂怪的话，本来是说做君王的毕竟是睿智聪明，上天赋予了他诚信的品德，学问压倒世人的人。正如前边供词所说的，聪明睿智之人，仁爱能培育万种物质，义利能端正万种事理，仪礼能传播万种风化，智慧能明察万种偏颇，诚信能信服万千邦国，天下生民于是尊重他，亲近他，敬奉他为君王的意思。

上天将圣贤降于百姓之中，作他们的君王，作他们的师长，君王是就职权位分而言，师长道就常德性而言。必然是道常德性达到天下顶端，然后职权位分才能居天下之最尊贵。其实君王师长原来都是一人做的，君王之外另有一种道德高出天下人的为师长。所以，在二帝三王的时候，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君王，都是深解于道德的最高意旨，精通于学问的最深涵义，当时天下没有谁不崇尚他们的，因此被敬奉为君王。春秋战国时局变化，有孔孟全备的安邦治国学说思想，而世人却没有谁能采纳。在上边的周室君王们，又没有听说有道德高出孔孟的人。如果用唐尧、虞舜、夏禹三代最兴盛时期的事例推论，却好像是：春秋时期的君王，应该有孔子的道德，才足以担当；战国时期的君王，应该有孟子的仁义，才足以担当；宋朝末期的君王，应该有程朱的理学，才足以担当。当时我写此话的意思，不是说孔孟必要出来做君王，程朱也有志于抚临天下百姓，而是说做君王的临幸天下，必然得对孔孟的道德仁义和程朱的理学义旨精通详明罢了。

对君王最崇敬的，没有人能像孔孟；对君王最尊重的，没有人能像程朱。孔子服事君王尽礼尽节之事，可见于《乡党》这篇文章中。后世的人臣们很少能做到，不像他那样敬畏罢了。（从《乡党》一文中）可以推想他服事君王的诚恳之心，已达到了无微不至。他担任管粮仓的乘田小官时，将财务管理得顺顺当当；

他担任管畜牧的委吏小官时，将牛羊牧养的肥肥壮壮。无论担任何种官职，都是尽心尽责到十分之处，不肯有一丝一毫的苟且偷安，这都是因为他把君王的命令看得至高至大，所以不敢荒废职守而已。看看孔子，那么孟子、程子、朱子也就可以此类推了。那种所谓会做事的人，学问已深造到极高之处，成全了自己自然也就成全了万物。《大学》授传完美的德性必然要普及到初生的子民，《中庸》认为达到中和的境界必然是天地归位，万物发育。德性含义内“中”的功能作用达到全备，自然就贯通到最高境界了。所以说大禹、后稷、颜回换个地方和环境还都是一样。大禹为君王，后稷为相国，颜回是市井陋巷中的平民百姓，如何能做得君王相国的事情！其实这个道理是相通的。修养好自己的品德就可以调整好自己的家族，调整好自己的家族就可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四书五经中没有一篇章节不讲到治理天下的事情。

【原文】 弥天重犯此条狂怪的话，是说出做大君的，原不是别样人可做，乃是聪明睿智而精深于学问道德的，正是看得君至重至大，轻易不得。

伏惟今日皇上抚临天下，统一六合，神明天纵，睿智性成。性焉安焉，优入圣域，其实道德之微，无不经历学问之精，无不透过中和并致，方得天地位而万物育，如是岂不是圣人而精于学问，方得尊居天下之上，与尧、舜、禹、汤、文、武千载符合。

他若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金太祖、元太祖世祖，或戡定祸乱，或躬致太平，才智虽然有余，学问未免欠缺，故其发于政治，见于事功，未见得浑乎天理之正，而不能保其无一毫人欲之私。其实天下未闻有才德驾出其上，所以得而君之。

弥天重犯狂怪之说，本系以英雄比历代诸祖，而以光棍指魏、晋篡窃之主，所云：“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这三句原指汉、唐、宋、金、元诸祖说。所云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这两句乃是指魏、晋诸篡夺者言，因辞不能达意，以致混同不明，一带说了。而光棍两字，亦是楚中俗

语，山鄙无知，妄引以比例当时，立言大指原是如此。其实一种狂妄粗率，悍然无忌之罪，实有难容。况其中所举吕留良，尤为无知之极，不惟不识本朝历圣之德与尧、舜、禹、汤无异，竟把狂悖叛逆之吕留良，当孔、孟矣。从前如在云雾中，今得圣谕开导点化，不唯光天睹日，抑且自觉寸磔不足以抵其辜矣。

【译文】 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这条狂妄怪满的言论是说做君王的，并不是随便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做的，只有聪明睿智而且精通深解于学问道德的人才可以做的。正是将君王看得至高至大，轻易不得。

在下陈言，想当今皇上抚临天下百姓，统一华夏四方，明事如神，聪明睿智，德性全成，受命于天，已达到极高的境界。其实道德的细微，没有不经历的，学问的精深，没有不透明的。达到了中和并致，才得到了天地之位而万物生长发育。像这样岂不是说明圣贤之人精通于学问，才能高居于天下百姓之上，与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千年相匹配！

其他像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金太祖、元太祖、元世祖，有的戡平战祸，平定天下，有的致力于太平，休养生息。才智虽然有余，学问未免欠缺。因此他们兴起于国家之事，显现于事业和功绩，没有见他们完全成全于天理之正，因而也就不能保证他们没有一丝一毫人的欲望私念。天下没有听说有才智德性高出他们之上的人，所以能够让他们担当君王之位。

我这弥天重犯的罪人狂怪的言语，本意是以英雄来比喻历代创业君王，而用光棍来指魏、晋时篡权窃位的君王。我所说的“周朝末期，局势大变，以后在位的君王大多不知读书，都是些人生世道上的英雄”，这三句原是指汉、唐、宋、金、元诸位太祖太宗说的，所讲的“更有的甚至是老奸巨滑，也就是民谚所说的光棍之流”。这两句乃是指魏、晋时诸多篡权夺位的人说的。由于言辞不能达意，以致于混同不明，一带而说了。而这“光棍”两字也是楚湘地方中的俗语，我这山野鄙夫少学无知，妄自

引以为喻，当时我立言的实意大致就是这样。其实，一种狂妄粗率、悍然无所顾忌的罪过，实在是难以宽容。况且书中所举到的吕留良，尤其是无知到了极点了。我不但没有认识到本朝历代圣明皇帝与尧舜、禹汤没有不同，还竟然把狂悖叛逆的吕留良当作孔孟了。从前如坐在云雾之中不明事理，现今得到皇上圣谕开导点化，不只是天空明亮，看见了太阳，并且自己觉得即使是受寸磔的刑法处治也不足以抵偿我的罪过。

五、你曾静真的是可以担当“天亶聪明，乾之九五”的大人物吗？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敬卿、景叔语言文字推崇过量，把某看做莫大的人物。心心念念，望世变世革，想某乘运起来复三代。”又云：“仰观三代，天亶聪明，乾之九五，圣位莫乘。此等语在分上，固不敢当，只是他也不是一时躁率轻妄，信口说大话，抬高师长，确是他心中所见，实实如是”等语。

这敬卿、景叔丧心病狂之语言文字，岂人所可当。而云：“不是抬高师长的大话，实实见的如是。”是你自承认担当莫大的人物了。“天亶聪明，乾位九五”，这话都是你可以承认担当的么？且你如何乘运起来，你须将敢于担当大话的意思，据实一一供出。

曾静供：张熙、廖易，病狂丧心，猥以此等语，推尊弥天重犯，何异弥天重犯盲瞽瞎眼，以千古人宗推尊吕留良。虽说话轻重稍有不同，其实皆是一样无知，一样狂妄。揆之于法，不唯万剐莫辞，即问之于心，亦且愧死无地。

但当时此话下语未清，大意谓人之知识有浅有深，有大有小，浅不能骤使之深，小不能强扩之大。随所见到，以为大小浅深，如蛙居井底，所见者只井底之地，初不知井之外更有地，遂

妄以为天下之地尽在于此，岂知天地间有几多大地宽广，山岳湖海，无穷无尽在。然不到过，亲见过，如何信得过？山鄙无知，何以异是。

弥天重犯从前为谣言所惑，亦因生平五十岁人，从未见过满洲，从未见过京师、省城，又未亲眼亲耳，晓得皇上道德政教如此经天纬地，所以谣言易惑，直到旧年，捉拿到长沙，见过大人，由是心中遂疑吕留良的说话有不当。复自长沙以抵京城，耳所闻，目所见，与胸中所传闻者，不啻昼夜之相反。及至到京，又身亲皇恩如此之极，心醉圣德如此之至，乃恍然大悟从前之狂悖，该死该刚莫逃，而深信皇上之道隆德盛，直驾千古，而莫敢媿。

当时弥天重犯此条，本意说知有大小浅深，必要人见到方信得过，故末后所以敬卿、景叔异日见到，则必不肯说此狂悖之语。至若谓乘运起来，亦是谓如太公之遇文王，伊尹之受汤聘，此即张熙、廖易病狂丧心之意，而言之总之，皆到此处。皇上圣明天纵，天地包容，万万叩首，惟冀哀之怜之矜恤，其无知而已，更有何说分解得。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敬卿、景叔说话和写文章推崇过度，把我看做是一个多么大的人物。心中念念希望世局变化，政事革新，想使我顺乘世运而起，恢复唐尧、虞舜、夏禹三代时的盛世。”又说：“向上观察三代时君王，都是天赋诚信聪明睿智，乾位于九五帝王之尊。其意勉励我顺乘天地圣位。这些话在我身上固然不敢承当，只是他们也不仅仅是一时的躁率轻妄，信口胡讲大话，用来抬举拔高自己的师长，也确实是他们心中的所想，实实在在是这样的”等话。这敬卿、景叔二人丧心病狂的言语和文字，岂是平常人所可以担当的！并且你说道：“不是抬举拔高师长的大话，实实在在是这样的。”这是你自己承认你是可以担当得起多么了得的大人物了。“天赋诚信睿智聪明，乾位于九五帝王之尊”，这些话都是

你可以承当得起的吗？并且，你将如何顺乘世运而起来？你必须把敢于担当这些大话的意思，据实一一招供出来。

曾静供：张熙、廖易二犯丧心病狂，辱以这些语言推崇尊称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有不同我盲睛瞎眼，以千古师表的溢美言语推崇尊称吕留良呢有什么不同！虽然说语言轻重稍有些不同，其实都是一样的无知，一样的狂妄。依照于国法，不但治于万劓之刑没有话讲，就是问问自心，也感到羞愧至死而无地自容。

但是，当时写下此话，下语不是很清楚。大概意思是认为人的知识有浅有深，有大有小，浅不能骤然使它变深，小也不能立即它扩充变大，只能顺随自己的经历见识，确认为大小浅深。譬如青蛙居于井底，所见到的只是井底的地方，起初并不知井外边还有天地，于是妄自认为天下的地方都在井底，哪里知道天地之间有多少宽广大地，山岳湖海无穷无尽地存在着。然而，没有亲身经历过，亲眼见识过，又如何能信得过呢？山野鄙夫的孤陋无知，何不是这样！

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从前被谣言所迷惑，也因自己是五十岁的人了，从来没有见到过满洲，从来没有进过京师、省城，又没有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知晓皇上的道德政教，已达到如此天地经纬的境界，所以，谣言很容易迷惑自己。直到去年被捉拿到长沙，见过钦差大人，此时心中遂即怀疑吕留良的说法有些不当。后来从长沙押抵京城，耳闻目睹，与心中那些传闻得来的消息不啻竟像白昼黑夜一样完全不同。等来到京城中，又亲身感受到皇恩如此浩荡无边，醉心于圣德如此贤明高尚。于是，幡然悔悟从前的狂妄荒谬，实在是该杀该劓，不能逃脱。而且，也深深信服了皇上的道义德性，隆盛之极，直可凌驾于千古而无人敢媲美。

当时，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写此话的本意是说知识有大小深浅，必定要人们亲自经历见识过才能相信，因此文章末后说敬卿、景叔改日经历见识过后，就必然不肯再说如此狂妄荒谬的话了。至于所谓的顺乘世运而起的话，也是指像姜太公遇到周文王

所被重用，伊尹受商汤所聘为上卿之类的事，这便是回应张熙、廖易丧心病狂之意而讲的。总而言之，供说到这里。当今皇上圣明天纵，皇恩可包容天地，在下万万次叩首，只祈望能发哀怜之心，矜悯体恤我们这些人无知而已，又有什么言语能够分辩解释得清呢！

六、“华夷之分大于君臣 之伦”的道理讲得通吗？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如何以人类中君臣之义，移向人与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仇，孔子何故恕之？而反许以仁。盖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为域中第一义。所以圣人许管仲之功。”又云“人与夷狄无君臣之分”等语。君臣为五伦之首，断无有身缺一伦，而可以为人之理。曾静当日以人与夷狄无君臣之分，不知从前以何人为君，且到今还是甘心俯首以君臣之义，移于夷狄分用乎？抑是始终以与夷狄无君臣之分乎？据实供来。

曾静供：凡这悖逆狂妄之说，皆是雍正五年冬与雍正六年春写载的。实因见得吕留良论孔子称管仲之仁处，有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伦之说。以致推论到此。

其实，弥天重犯平昔并无此说。岂知华夷之分，圣人原不在地上论，若以地论，则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歧周，西夷之人也。都不通了。将谓大舜与文王不是人可乎？且更不是圣人可乎？况由舜、文以下，不知更有几多行为师表，道高百世，如周子、张子、陈良者，俱生于四裔之地，犹历历可数指者乎？弥天重犯当年中吕留良之毒深，所以不察其非，而狂悖发论至此。

到今日亲被皇上德化之盛，且晓得本朝之得统，全是仁义，天与人归，浑乎天理。且我皇上道隆德盛，亘古所未见，即僻处

在东海北海之隅，凡声名所到，犹尊之亲之，而无心不服。矧弥天重犯生居中土，身受抚绥之恩，而现为赤子者乎。

故弥天重犯今日之甘心俯首，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者，一为本朝得统之正，从古所少；二为皇上道德之大，生民未有其心悦诚服，乃是当身之至情，天地之大义。弥天重犯即是草木无知，到此亦当欣然向荣了，况有血气者，敢不尊亲乎？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怎么能拿人类中的君臣礼义关系移到华夏汉族与夷狄少数民族的纲纪等分上去用呢？管仲忘记公子纠被杀之恨而去作仇人的臣下。孔子为什么会宽恕他，并且反过来称赞他有仁义之心呢？这是由于华夏民族和夷狄少数民族的区分大于君王关系的伦理纲常。华夏和夷狄民族的区别就像人与物体之间的区别一样，是天下的第一道理。所以孔子称赞管仲的功绩。”还有“华夏汉族人与夷狄少数民族是没有君臣等分关系的”这类言语。君臣之礼在五伦中居于首位，决然没有自身缺少一伦，却可以做人的道理。曾静当时认为汉族与边远少数民族没有君臣等分关系，不知道你从前是以什么人为君王的，并且到现在你还是心甘情愿低头俯首地把君臣礼义关系移用到夷狄少数民族等分上呢？还是始终认为你与夷狄少数民族没有君臣等分关系呢？你要据实一一招供出来。

曾静供：所有这些狂悖忤逆的言语，都是在雍正五年的冬天和雍正六年的春天时写下的。我的确是因为看到吕留良在评论孔子称赞管仲仁义之举的文章中，写有“华夏汉族和夷狄少数民族的区分，大于君臣关系的伦理纲常”的说词。所以推论出以上的荒谬说法。

其实，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往昔并没有这种看法。不知道华夏和夷狄的区分，圣贤原来不是从地域上来论说的。如果以地域来区分，那么虞舜生在山东，是东边的少数民族，周文王生在陕西，是西域的少数民族，都讲不通了。能说虞舜和周文王不是

人类吗？并且更不是圣贤君王，可以吗？何况自虞舜，周文王以下，不知道还有多少行为端正、为人师表、道德高尚留传百世的人，如：周敦颐、张载、陈良，他们都是生在四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还可以一一数出许多这样的人来。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过去中了吕留良的毒害极深，所以不能明察他的谬误，却发出了这些狂悖忤逆的言论。

直到今日亲身被皇上用盛大的洪恩来点化我，并且晓得了本朝之所以能够一统天下，都是实行仁义的结果，是天意和人心所归向，是顺应合乎天理的。而且我朝皇上道义仁德隆盛，是从古至今所未曾见过的，即使偏处于东海到北海的每一角落，凡是皇上声威名望所传到的地方，人们都尊崇和亲近他，没有一个人不是心悦诚服的。况且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居住生活在中原，亲身感受到了皇上安抚的恩德，而现在又是皇上的赤子百姓。

所以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今天甘心情愿低头臣服，就像孔子的七十弟子诚服孔子一样。一是为了本朝统一天下的正义之举，从古至今很少见到。二是为了皇上仁备的隆盛广大，生民百姓都不能具备。我心悦诚服，就是因为自己亲身体会到了这种最高的诚信之情和像天地一样宏广的义理。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即使是一个像草木一样无知的人，到了这个时候也应当欣然向荣了，何况我是个有血有气的人，又怎敢不尊崇和亲近于皇上呢？

七、清朝得天下到底是盗窃天位的强盗呢，还是驱逐流寇的主人呢？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夷狄盗窃天位，染污华夏，如强盗劫去家财，复将我主人赶出在外，占据我家。今家人在外者，探得消息，可以追逐得他”等语。明朝天下亡于流贼李自成之手，是强盗劫去家财，赶出明之主人者，李自成也。我朝驱逐流寇，应天顺人，而得天下，是乃捕治

强盗、明罚敕法之天吏也。你等为家人者，既不能追逐李自成，索取家财，而于强盗花费家财之后，转向捕治强盗，明罚敕法之天吏，指令赔偿可乎？

且由曾静之说推之，元之主人明朝赶出，元人当索取家财于有明；而宋之主人，又为元朝赶出，宋人亦当索取家财于有元。等而类之，自唐以上，至于晋、汉，皆然矣。从古有曾静这天背理之论否？试问曾静，教他自己细想此段议论，是何如说？

曾静供：大义看错，遂总错到底。盖人身之主宰在心，心之所系在知，知上一错，凡发言行事，逆天背理，遂致不可穷诘。此等处总因错认本朝为夷狄，而不知圣人之生，原无分于东西也。且并不知明末之丧乱。生民受李自成残杀之毒，逾于水火。而本朝兴义师以除寇乱，功同天地，到今方知得本朝不唯不同于汉、唐之以智力取天下，而直过商、周之以仁兴，而不免于征诛者。且历圣相承，自有生民以来所未有之盛会。弥天重犯如何诬天诬父，至于此极。

由今日看来，本朝当日即实实取明，代明而有天下，亦有德者兴，无德者亡，天理之当然。况有明当年与本朝原为与国，而天下又早已亡于流贼李自成之手。本朝之来抚中国，又不是以智谋力制中国，而使之服，乃是仁义感动中国，筐篚争迎，而心悦诚服。

今弥天重犯误听人言，而反指以为盗窃，将明之取元，元之取宋，宋之取周等，而上之若唐若汉，以及周之代商，商之革夏，无一而不是盗窃，无一不当索回家财矣。

其背理逆天之论，自家今日也解说不出。岂止于一处窒碍而已哉。今日细思此段议论，实实无知。其无知也，总因不知本朝龙兴之故，历圣功德之隆，徒为人言蛊惑，遂致狂悖如此，嗟悔无及，更有何说？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了“四方少数民族盗窃帝位，污染我华夏，就像强盗劫

夺去家财，又将我家主人赶出在外，占据我家。如今家人在外边的，探明消息后，可以把他们这些盗贼追逐去”等言语。明朝天下灭亡于流贼李自成之手，是强盗劫夺去家财，赶出明室主人的是李自成。我大清天朝顺应天地人心而得天下，便是捕捉惩治强盗、申明刑罚、整肃法纪的天使差役。你们这些做家人的，不能追逐李自成索回家财，而当强盗们花费尽家财之后，却转身向捕捉惩治强盗、申明刑罚、整肃法纪的天使差役，指令他们赔偿，这可以吗？

并且，照曾静的说法推理，元朝的主人被明朝赶出，元人应当索取家财于明朝；而宋朝的主人又是被元朝赶出的，宋人也应当索取家财于元朝。这样类推，自唐代以上，直到。晋、两汉都一样了。从古到今可有像曾静如此逆天背理的谬论没有呢？试问曾静，教他自己细思想想，这段议论是如何供说？

曾静供：大的义理错了，也就一错到底了。人身的主宰在于心理意识，心理意识的所系在于道德观念。道德观念上的一错，凡是说话办事就必然逆天背理，没有尽头了。这段议论总得是因为错认本朝为夷狄民族，而不知道圣贤之人的生长，原来就不分东域西方。并且不知道明朝末年的动乱，百姓受李自成残杀毒害，超过了水火之灾难。而本朝兴举正义之师，清除寇乱，功绩如同天地之大。到如今才认识到本朝不但不同于汉唐的用智力获取天下，而且竟然超过了商、周的振兴仁义不得不征讨诛杀。况且本朝几代圣人一脉相承，是自从有生民以来所没有过的盛世。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如何竟诬蔑天地父母，到了这样的极点。

由今日看来，本朝当时就是实实秉承天意取代明朝得有了天下，这也是有仁德者兴起，无仁德者灭亡，自然的天理。何况明朝当年与本朝原是结盟之国，而且天下又早已经亡失于流贼李自成的手里。本朝来安抚中原，又不是用智谋武力强制中原迫使它臣服，却是用仁义感动中原，百姓们手捧盛满礼品的竹器，争先相迎，心悦诚服。

如今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误听信人言，而反将正义之举指责为盗窃，将明朝取代元朝，元朝取代宋朝，宋朝取代后周，如此等等上溯，像唐朝、汉朝，以及周朝的取代商朝、商朝的革换夏朝，没有一个不是盗窃，没有一个不应当索回家财了。

这些背道天理的荒谬言论，自己今天也解说不出道理来，岂止是一处窒碍难辩而已呢！今日细细思量这段议论，实在是出于无知。我的无知，总是没认识到本朝的天意兴盛的原因，以及本朝几代圣上功德的隆重，仅仅被人言所蛊惑，就狂妄荒谬到如此地步。嗟叹悔恨尚来不及，又有什么话可说呢？

八、到底是“中华之外，四面皆是夷狄”呢， 还是“天下一家，万物同源”呢？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天下一家，万物同源。”又云“中华之外，四面皆是夷狄。与中土稍近者，尚有分毫人气，转运转与禽兽无异”等语。既云天下一家，万物同源，如何又有中华、夷狄之分？曾静但知肆其狂悖之词，而不知其自相矛盾。

《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九州四海之广，中华处百分之一，其东西南朔，同在天覆地载之中者，即是一理一气，岂中华与夷狄有两个天地乎？圣人之所以谓万物育者，人即在万物之内，不知夷狄在所育之中乎，抑不在所育之中乎？可问曾静是如何讲，且《易经》言：“信及豚鱼。”是圣人尚欲感格豚鱼，岂以远与中国，而云禽兽无异乎？即如曾静之叛逆肺肠，真禽兽不如，然至今日可能如豚鱼之感格否？着他据实说来。

曾静供：天下一家，万物同源，此两句是从本心出的话，不杂外诱，不被人惑，所以冲口说出，与道理尚无窒碍。至若后面中华之外，四面皆是夷狄等语，总因误听人言，错解经旨之所

致。所以自相矛盾，以至于此。岂知《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者，原兼人物而言之也。盖为人心广大，原通天地，天大无外，人心之大亦无外。凡天下之大理所贯，气所通，皆在人心胞与之内。是以圣人在位，举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远，皆涵濡之，使之各遂其生，各复其性，无一物之不得其所者。亦为中外只有一个天地，心体性量所贯通，无一处不到耳。岂同然并生于天地之中，齐在覆载之内，而为人有中外之分乎？

弥天重犯从前醉生梦死，强分中外，今日蒙皇上旨意，发明此章道理，至明至当。弥天重犯到此实实如醉初醒，如梦初觉，恍然大悟从前之非。

至于《易经》所载信及豚鱼等语，弥天重犯自幼亦曾读过，既有此等诬天的说话，当时何不把这信及豚鱼等经文取来印证一印证，而竟狂悖率意，写放纸上，这就是天夺其魄了。今蒙皇上开示到此，弥天重犯便是豚鱼，亦当感格，何况人性未泯，尚有知觉乎。总之，山鄙无知，眼光小，胸次隘，道理不经点破，终看不出，今蒙皇上过化存神之德感孚，方得省悟。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天下本是一家，万物同出一源。”又说道“中原在外边，四面都是夷狄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域接近的，尚有很少一些人文气息，转向远处没开化的就与禽兽没有区别”等类的话。既然已讲天下本是一家，万物同出一源，为何又有中原民族和夷狄民族的区分呢？曾静只知道放肆乱讲狂妄荒谬的言语，而不知道自己却是自相矛盾。

《中庸》里说道：“达到了中和，天地便各归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了。”中国九州大地四海广阔，中原地域仅居其百分之一，它与外面的东西南北四方，共同在上天覆盖，大地装载之中，也就是理气相通，难道中原民族与夷狄民族有两个天地吗？圣贤所说的万物生长发育，人既然属于万物之内，不知夷狄民族是在所生长发育之中呢？还是不在所生长发育之中呢？可问问曾静，是

怎样供讲。况且《易经》里说：“信义要及于豚鱼之类”，是指圣贤还用诚义感动小小豚鱼，岂能将远离中原的民族就说是与禽兽相同呢！像曾静这样的叛逆之人的心肺肝肠，真是连禽兽也不如。然而到了今天，不知曾静能像豚鱼一样被诚信所感动没有？让他据实供说出来。

曾静供：“天下本是一家，万物同出一源。”这两句是从我本心说出的话，既不含杂外部的引诱，也没有被别人的言语所蛊惑，所以冲口说出，与道义真理没有什么障碍。至于后面所说的“中原的外边，四面都是夷狄少数民族”等言语，是因为误听信别人的谬说，错误理解了经书的义旨所造成的，所以前后言语自相矛盾到如此地步。怎知道《中庸》所讲的“达到中和，天地便各归其位，万物便发育生长”。原来就是包含了人和事物而说的。人的意识之广大，原就通经天地。上天广大没有边际，人类的意识深远也没有边际。天下之大，理气所贯通，都在人的意识胞附并和之中。因此，圣人居于帝位，对天下四海九州各个地方的人类和事物，都给予抚爱和教养，使其各自能顺利地生长，各自能回复自然的属性，没有一种事物不能得到合适的安排。也因为中原和外域只有一个天地，心体性量互相贯通，没有一处不到罢了。哪有共同生长于天地之中，一齐生活在天覆地载之内，而人类却有中外分别的道理！

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从前醉生梦死，将人类强分为中外两类。今日蒙受皇上旨意点化，指明了此中的道理，甚是明白得当。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到了此时，确实是如醉初醒，如梦初觉，恍然大悟从前的种种错谬。

至于《易经》所记载的“信义要及于豚鱼之类”等言语，我幼年时也曾读过，既然有了这样诬天蔑地的说法，当时为何不把这“信义要及于豚鱼之类”等等的经文取来考证考证，而竟然狂妄荒谬轻率地写记到纸上，这就是上天褫夺去自己的精神了。如今承蒙皇上淳淳开导宣示到这里，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就是豚鱼，也应当被感化了，何况我人性尚未完全没有泯灭，还有一些

知觉呢！总之，山野鄙夫无识无知，眼光短小，胸襟狭隘，道理不经皇上点破，到底自己难以看出，如今深蒙皇上过化存神之圣德感化而信服，才得以省悟。

九、大清王朝八十多年没有国君吗？臣民也禽兽不如吗？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君臣之义，一日不可无。天下岂有无君之国哉？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禽兽亦有君臣，蜂蚁犹如依从。如今八十多年没有君，不得不遍域中，寻出个聪明睿智人出来做主”等语。传云：“君，天也，天可逃乎？”曾静既知君臣之义不可一日无，本朝君天下八十多年，曾静之祀、父，皆是大清之子民，曾静年纪不过四十余岁，即其逆乱之谋，蓄无君之念，不过四十余年。其四十余年以前，伊祖伊父之心中，有君乎，无君乎？而云：八十多年没有君，是加其祖、父以无君之罪矣。

孟子所谓无父无君，是禽兽者。言不知有君有父也。曾静现在食毛践土，而云没有君，且加祖、父之罪，此实孟子所谓无父无君之禽兽。又曾静云：禽兽亦有君长，而云“八十多年没有君”，是又禽兽不如矣。

且孟子之所谓无君者，谓不知有君，而曾静以为没有君，不更诬圣贤之言乎？曾静又云“不怕利害辛苦，要从遍域中寻出个聪明睿智之人主来”，伊如何寻遍域中，可曾寻得个人来？曾静到今日还是要另寻个聪明睿智之人乎？抑将此寻遍域中之心歇息乎？或其心以夷狄禽兽、元凶巨恶感戴为君乎？着他据实供来。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了“君臣之间的礼义，一日不可没有，天下哪有无君主的国家啊！孟子说：没有父亲，没有君王，就象禽兽一样。禽兽

也有君臣的等分，蜂蚁尚如依附顺从。如今已经八十多年没有君王了，不得不走遍疆域海内寻找出一个聪明睿智的人出来做我们的君王”这样的言语。经传里说过：“君王就像是主宰万物的上天，上天可以脱离的吗？”曾静既然知道君臣之间的礼义不可一日没有，那么，本朝的君王已经当朝八十多年了，曾静的祖父、父亲都是大清国的子民。曾静你年纪也不过四十多岁，即使存有忤逆叛乱的图谋，心中隐藏无君王的念头，也不过四十多年，那么四十年以前，你的祖父，你的父亲心目中，是有君主呢？还是没有君主呢？而且你说“八十多年没有君王了”，是诬加于你祖父和父亲心目中无君王的罪名了？

孟子所谓的没有父亲、没有君王就像是禽兽一般的说法，是就不知道有君王、有父亲所说的。曾静现在感戴君王的恩德，却又说没有君王，并且加于自己的祖父、父亲心目中无君主的罪名，这实在就是孟子所说的没有父亲、没有君王的禽兽了。曾静说“禽兽也有君臣的等分”，却又说“八十年没有君王了”，这是你连禽兽也不如了。况且孟子所谓的没有君王，说的是不知道有君王，而曾静认为没有君主，不更是诬蔑了圣贤的话吗？曾静又说：“不怕利害得失和劳累辛苦，一定要在疆域海内寻出一个聪明睿智的君王来。”你是怎么寻遍疆域海内的？可曾找出个人来没有？曾静你到今天还是要另外找出个聪明睿智的人呢？或者是自己心中已经把本朝这“夷狄民族禽兽般的元凶巨恶”感戴为君王了呢？让他据实招供出来。

【原文】 曾静供：无君之说，实非弥天重犯的本意，因吕留良《钱墓松歌》上有云：“其中虽有数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间。”彼时闻得此说，如坠深谷，语虽为元朝而发，而引例未尝不通于本朝。始而疑，因思弥天重犯世受国恩，祖、父皆列名胶痒，而当身亦现在食毛践土五十年，如何驾阁漏空八十多年没有得君，并不算人间得？反复思索，解此缘故不得。既而言，以为吕留良是大地人宗，他的学问海内通行，毕竟他的说话有所见。

弥天重犯僻处山谷，有何知识，如何晓得这种义理，加以谣言叠叠满耳，遂妄以为人在天地间，君臣为五伦之首，今既不见得有君，如何安然自立得住。乃孟浪定志，不辞辛苦，不计利害，思想遍历域中，寻出个聪明睿智，能尽其性的人来做主。所以狂悖，激而有是举。非是当时心下另藏有别样不好意思，而甘为此谋反叛逆，以自取死地。

其实此举原是妄为当身大义起见，原是错听人言，不知本朝得统之正，不知皇上道德之隆起见，但所见一错，则无所不错。既身犯大逆之罪，而为禽兽，又诬祖、父以无君之罪，并诬及圣贤立言之旨。种种悖谬，皆因山鄙无知见错来，岂知本朝圣德神功，垂于两间，与天地同大，而皇上道德隆盛，更为亘古所未有。

弥天重犯从前妄意所云：寻个聪明睿智，能尽其性，以为当身之主者。当时虽极十分过望，亦梦想不得有这样田地，梦想不到今世有此圣明的君，而今日恭逢盛会，得近圣天子之清光，正与当年孟浪，遍历域中，不辞辛苦，不怕利害，诚恳寻君之始念相合而庆幸。且更出于望外，到此实实欢喜倒地，不惟为一身一家幸，实为天下苍生之大幸，大快事焉。得不极其尊亲爱戴之诚。至若当身从前见错，万死之罪，惟有痛哭自咎自悔而已，更有何说。

【译文】 曾静供：没有君王的说法，实在不是我这个弥天重罪犯人的本意。因为吕留良在《钱墓松歌》诗中写道：“其中虽有数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间。”那个时候听到这种说法，就像坠入万丈深谷一样迷惑不解，这种说法虽然是由元朝引发的，然而引用的事例未必不通于本朝。开始时心中还存有疑虑，因为想到自己世代代蒙受国恩，祖父和父亲都列名于学官，而我自己也感戴君王的恩德有五十年了，怎能说朝廷漏空，八十多年没有君王，并且不能算做人世间呢？经反复思索，都不能解此中缘故，于是就相信了，以为吕留良是人间一代宗师，他的学问和思想通

行海内，毕竟他的说法有所见解。

而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住在偏僻的山谷中，有什么学问知识？又怎么能够晓得这种道理？加上谣言连连不断贯满耳中，于是荒谬地认为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君臣礼义为五伦之首位，现在既然不能看到有君王，自己又怎么能心安理得地生存于世呢！于是很轻率地立下志愿，不辞辛苦劳累，不计较利害得失，寻思找遍国土疆域内，寻找出一个聪明睿智、又能发挥他的最高才能和理性的人来做君王。所以狂妄悖逆，一时激奋，才有了这种轻狂举动。并不是当时内心就隐藏有其它什么不良念头，而情愿为此事谋反叛逆，来自寻死罪。

其实这种做法原本就是荒谬的，是认为自己应当担当起寻找君王的大义重任引起的，也是原来错听信了别的谎言，不知道本朝能够统一海内是端正天地义举，不知道皇上道德品行之隆盛而引起的。一旦立论错误，所有认识也都错了。既而身犯大逆不道的罪孽，沦为禽兽一般，又诬加于祖父、父亲心目中无君的罪名，而且还诬蔑到圣贤（孟子）立言的旨旨了。如此这些种种荒谬悖逆，都是因为我这个山野鄙夫的无知，才导致大错的，怎知道本朝的圣德神功，垂立于天地之间，同天地一样博大，而当今皇上的道德隆盛，更是自古到今所没有过的。

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胡言乱语所说：“寻找出一个聪明睿智又能发挥他最高才能和理性的人来做自己的君王。”当时虽然抱有极高的期望，也梦想不到能达到这种地步，梦想不到当今世上竟然有如此贤明圣德的君王。今日有幸恭逢会见皇上盛驾，得以接近皇上的圣洁风采，正好和当年轻率鲁莽，欲寻遍国土疆域，不辞劳累辛苦，不怕利害得失，诚心诚意寻找君王的想法相符合，而且庆幸得到的收获更出于望外，到此时实实在在感到欢喜庆幸，不只因为一个人，一个家庭而庆幸，而是为普天下的百姓而感到庆幸，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我岂能不对皇上尽我尊崇爱戴的至诚之心！至于我从前铸成大错，犯下万死之罪，只有痛哭内咎悔恨，自己遣责自己罢了，又能说些什么呢？

十、科举制度仅仅是讲名讲利、 卑污苟贱而不知耻的方法吗？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科举词章之习，比阳明之害更大更广。阳明之教，虽足以害道，尚依傍道理来；科举之习，公然讲名讲利，卑污苟贱，而不知耻，直把道理一笔勾消，人类尽灭”等语。

朝廷用人，所以设立科举者，以科举之人，所习皆四书五经，诵法圣贤之道，讲求圣贤之义理故也。人能读书明理，其造诣底蕴，皆见之于举业文章。是以朝廷设立科举，以期多得读书明理之人，为国家之用。

今曾静以科举之为害，直到得把道理一笔勾消，人类尽灭，这是何说？且若不设科举，更有何法可以发明圣人之道理乎？

至人之贤愚不一，科举内卑污苟贱之人，原世所间有。惟在朝廷辨别此等卑贱之人，而不用耳。非可废科举之制，而后禁人之卑污苟贱也。

况无耻之人，即使不设科举，而别开用人之途，如或乡举里选，或征辟聘荐，或改诗赋策论，则讲名讲利者，又必于别途行其卑污苟贱之事矣。曾静又有何术，可以禁人之讲名讲利，着据伊所见供来。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用诗文词章科举取士的做法，比王阳明学说的害处更大更广。王阳明的观点，虽然损害了圣贤的道德义理，但是，还摹仿出了一些道理来。而科举这种做法，公开讲求名利、卑污苟贱而不知耻辱，竟然把道德义理一笔勾销，将人类的天性也都泯灭尽了”等这些话。

朝廷要选用人才，所以设立科举这种制度，是因为科举的学

子，所学习的都是四书五经，吟诵效法的是圣贤的道德准则，讲求追索的是圣贤的仁德义理的原故。世人能够通过读书明白事理，他的学问深浅高低，都体现于科举应试的文章之中，所以朝廷设立科举考试，希望能够多得些读书明理的人才，为国家效力所用。

而今曾静认为科举的害处，竟然到了把道德义理一笔勾销，将人类的天性泯灭至尽的地步，这是什么说法？倘若不设立科举制度，又有什么方法可以抒发阐明圣贤的道德准则呢？

世人本来就是贤愚不一，科举内存在卑污苟贱的无耻小人，原来世间就有的，只是由朝廷辨别这些卑贱之人不予选用罢了，不是废除科举制度后就可以禁止卑污苟贱行为的。

况且那些无廉无耻的人，即使朝廷不设科举而另开选用人才的道路，比如，或者让地方官推举选拔，或者征求召聘推荐，或者改为上书诗赋策论，那些讲求名利的人，必然又要在这些途径上去做他们卑污苟贱的事情了。曾静又有什么方法可以禁止人们讲求名利呢？让你根据自己的所知所见招供出来。

【原文】 曾静供：朝廷设立科举，以四书五经取士者，盖以修己治人之道尽备于四书五经，欲人童而习之素，讲明其理，理通然后发为文章。而朝廷即以考察其浅深得失，择其优者而升举之。其立法之意，原尽美尽善，无毫发可议。但在下之人，实能仰体朝廷之意者少，蒙昧不知者多。是以积之又久，不免忘其本而徒事其末。以为朝廷取士，取文字，只要文字说得失隹，即可以中有司之选。初不知文字之上，原有一层义理，当学当讲也。因妄谓文字可以乖巧习得来，于是设立方便法门，拟定程课，日以讲文为事。

其讲文也，又只是以临场描摹填凑，袭取割截，及卖弄笔头为计。而圣贤道理，当身行谊，遂置之高阁不论。且人身既有血气，营名图利，乃其常情。况乡人无知者多，能有几个晓得朝廷立法之意，原是要人通经明理，以备国家之用。只谓科场之设，

乃是生人取名取利之途。是以一有子弟，未尝不使之读书，问读书何为，则曰取科名、获禄利而已。自少小时，即横着这个俗鄙识见，在胸渐长渐大，名利之心日深，而从事于文字。到文字中式得选时，越发营名图利，而毫无忠君爱民、力图报效之心。此弥天重犯在山僻无知，不通世务，妄据蠢见，遂有是把道理一笔勾销之说。

其实到今日看来，全不如是。举业何曾无人，几多奇勋伟烈，大半多是举业家做就。且皇上天亶聪明，无法不精，无弊不彻。即如圣谕，谓无耻之人即使不设科举，而别开用人之途，则讲名讲利者，又必于别途行其卑污苟贱之事。此皆洞彻人情，深悉世务，智能察万变方得见及于此。由是看来大半总要得人，何法无弊，唯得其人而行之，弊斯可免。

如今养士之法，平昔总要教官得人，教官之品虽小，而所职之事甚大，必须择道明行修者，专使之教育其子弟。以圣贤中正直之道，孝弟忠信之行，聚讲日专，丁宁反复，其或有行谊不修者，则即许责惩。如此三年教成，然后教官具文行优劣之册，申详学政，学政核考其实而高下之，并以其果否验教官之诚伯明暗。是教官劝其行于平日，而不徒以文。学政考其文于一时，而兼察其行，文行交备而真才以得，积弊庶几得减。

抑近读圣谕，而知本朝用人，原不专恃科举一途。除科举之外，尚有选孝廉、优生、实学等法，有此诸法，庶几足以尽天下之才，而裕国家之用。便选举亦要得选举之人，方能无弊。若临考，学政独凭教官之荐举，苟教官非人，只取平日与己情文相接、酒食相征逐者，荐之举之，而闭户守正之士，仍终不得有闻，恐亦无补。故在今日国家取士用人之际，因超出千古，然欲历久成化，似当参用程明道所议宋熙宁间取士法，损益斟酌行之，方为更善。弥天重犯山鄙无知，不与人数，感佩皇恩，深重自计，衔结无由，仰承旨问，敢不剖心直供。

【译文】 曾静供：朝廷设立科举制度，用四书五经选拔人才的

做法，是因为修省自身、治理众人的道理，都完备地包含于四书五经当中。朝廷想使幼童便学习这些经书，平素授讲明白书中的道理，道理通顺明彻后便发挥为文章，而朝廷就以文章考察他的学问深浅得失，选择其中优秀的而提升任用他们。朝廷设立科举的本意，原是尽善尽美，没有丝毫不当之处可让人议论的。但是，天下世人中，真正能仰望体念朝廷意图的人少，蒙昧无知的人多。再说这种习尚积之已久，人们不免忘记了科举的根本大意而重视起它的次要方面，认为朝廷设立科举取人才取文字，只要文字写得新颖隽永，就可以被试官选中。起初并不知道文字之上，原来还有一层义旨道理应当学习应当讲求的。因此，妄自认为文字可以通过乖巧便学习得来，于是设立方便的办法和门路，拟定课程，天天以讲习文章作为自己的大事。

他们讲习文章，又只是临场描摹填凑，抄袭割裁，以及卖弄笔头生花之巧为计，而圣贤们经书中所说的道理，以及自身应具备的品行，都束之于高阁不说。而且人既然是有血气情感之躯，营求谋图名利，也是人们的常情。何况乡下人中无知无识的多，没有几个晓得朝廷设立科举制度的本意。不知科举的设立原来是要人们通晓经义明白事理，以备国家选拔任用，只认为科场的设立，是世人们谋取名利的途径。所以，家中生有孩童，未必不让他们读书。如问他们读书有何用？就回答说：为了考取科名，获得官禄利益而已。从孩童时心中就存有这些鄙识俗念，渐渐长大后，追求名利之心日益加深，并且反映在自己写作的文字中。等到文章科中选的时候，益发是营求谋图功名富贵，而没有丝毫忠君爱国爱民，力图报效朝廷的心愿了。这便是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居住在山乡僻野，无知无见，不通人情事务，妄自根据自己愚蠢的见解，于是有了科举把道德文理一笔勾销的说法。

其实今天看来，完全不是这样。通过科举成大业的人又何曾没有呢？多少奇功殊勋和伟烈业绩，大多数是通过科试举业的人才创建的。况且当今皇上天赋诚信，睿智聪明，没有不精通的事理，没有不明察出来的弊端。正如皇上圣谕所说：那些少廉无耻

之人，即使朝廷不设科举而另选人才之路，那些讲求名利的人，也必然又要于这些途径去做他们卑污苟贱的事情了。这些都是皇上洞察透彻人情、深切探悉世务、睿智观察万事变化之后，才得出的至理见解。由此看来，朝廷大半总是要选用人才，什么方法又没有弊端呢？只有选得人才后，使他克守品行，才能免除这些弊端。

如今培养人才的方法，平时总要选用学官得当。学官中学正、教谕的官品虽然小，所职事的责任却重大，必须选择明白道理、修省品行的人，专门派他们教育百姓子弟。用圣贤们中正的道德准则，孝顺父母尊奉兄长的忠信品行，天天专门讲授，反复嘱咐叮咛。学生中如果有不注意修省品行的，就立即对他责罚严惩。这样教育三年，然后教官将记录学生品行优劣的文册，申报学政，学政依据文册考核学生品行的高低，并且以事实是否相符，来检验教官是诚实还是虚假。这就是教官平时注意规劝学生的行为，而不仅是教他们文化，学政不但考核学生的文化，而又兼理考察他们的品行。文化品行具备就可以得到真正的人才，讲求名利的积习弊尚才逐渐能得到减少抑止。

近日读到皇上圣谕，才知道本朝选用人才，原来不是专设立科举一种途径，除科举制度外，尚有选举孝廉方正，优贡等以实际才学荐拔人才的方法。有了这些制度，就足以选尽天下人才，而够国家所任用了。但是，选举孝廉、优贡也需有能公正荐举的官员，才能没有弊病。如果临考时，教政官员仅仅凭依教官的推荐举选，假若这些教官不是正直之人，只选取平时与自己有私情、文章相近相接、酒食宴饮互相邀请过从密切的人推荐举送，而那些闭门苦读，守礼守法的正派学子，到头来仍然是不能被知闻选送，恐怕也是于事无补的呀！所以，今日国家选拔任用人才的制度规定，固然优点超出了千古历代，然而如想经久不变，形成教化，还应当参考采用程灏所提议宋朝熙宁年间实行的选拔人才的方法，斟酌它的优劣好坏后再予实施，才能更加完善。我这弥天重罪的山野鄙夫无知无识，不能与人数说，感戴钦佩皇恩深

重，自己思忖即使结草衔环报答皇恩也无用。如今仰承皇上谕旨询问，怎敢不剖白心迹据实情供说。

十一、你曾静为何尊敬悦服一个行 走于市井江湖的吕留良呢？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程子、朱子、吕子，如今人做官一样。程子是世袭荫补出身，朱子是由科甲出来，吕子是市井江湖钻刺打点作来底”等语。

你平日推尊吕留良及其崇奉，心悦诚服，如何又说他是市井江湖钻刺的人呢？且如为官，亦未有市井江湖之人，可以钻刺而得的道理。何况，这做圣贤也可以钻刺打点得么？且吕留良系一钻营打点的人，从前曾静如何尊敬悦服之诚，一至于此？今曾静还是尊敬此钻营打点之吕留良乎？抑忿恨此钻营打点之吕留良乎？务将心上实话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以吕留良为市井江湖钻刺打点作用来的者，是个譬喻的话。当时心下见得程明道先生天资纯和，道德粹美，浑然无一毫圭角令人摹拟得，是天生长来德器就如此纯全，人学他不得。恰似做官的样，他是个荫补世袭官，生下来是他受用的；朱子天资未甚高，生质亦未甚美，然他从持敬致知，循循做法，由下学而直造上达，今日成法俱在，令人可学而至。恰如做官的，由科举正路来，是他辛苦读书读出的，人人可以学得他。若吕留良，观他文字所传，少年本不是正路学人，下学工夫并未拈起，东剽西掠，无事不揽，到中年只以批评文字为事。因批评文字，遂得窥探程朱之奥。所以当时说他是市井江湖钻刺打点来的。盖谓他本无临政治民之学，只是办得闲杂事好，效用有功，朝廷悯其劳，亦把个闲杂的职与他做样。

此虽是当时妄意推崇他的话，其实心中天理发见，大是不满足他。可惜当时无人指破他的失处，且并未曾看过他的遗稿残编

有许多大逆不道的说话，所以终为他所迷陷。此全是自家识见浅陋，窥他不破，而一时学人文士，多以他为文章宗匠，群然向慕他。所以山鄙无知，被他枉误，竟至于此。

今日若不恭逢皇上圣德合天，洞悉致罪之有由，悯念陷罪之无知，弥天重犯之磔尸碎骨，灭门赤族，俱因吕留良之逆凶毒祸之所致也。今日使吕留良而在，弥天重犯当食其肉而寝其皮，岂但忿恨而已。此是心肝上的实话，天鉴在兹，如何欺罔得？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了“程灏、朱熹、吕留良，如同现在的人做官一样，程灏是世袭荫补祖上功德出身，朱熹是通过科甲举试及第，吕留良是从街市江湖中钻营打点出来的”一类的话。

你平时推尊吕留良，极其崇拜敬奉，心悦诚服，为何又说他是街市江湖钻营的人呢？并且，担任官职也没有街市江湖中的下人可以钻营而做得的道理，何况这为人师表的人也可以钻营打点的么？再说吕留良如果是一个钻营打点的人，从前曾静为什么尊敬悦服之诚心到如此地步？如今曾静是尊敬这个钻营打点的吕留良呢？还是念恨这个钻营打点的吕留良呢？务必要将心中实话招供出来。

曾静供：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将吕留良说成从街市江湖中钻营打点出来的人，只是一个譬喻的说法。当时心中觉得程灏先生天资纯和，品德完美，浑然没有一丝一毫圭角而令人模仿得到，是天下来德行器量就如此纯全的圣贤，人们是不能学他的，恰好他又像是做官的样子。他担任这个靠祖上功德而荫补世袭的官职，是他生下来就要由自己受用的。朱熹先生天赋不是很高，生活环境也不太很好，然而他从小便抱着谨言慎行、敬奉师长的态度去学习知识，循序渐进，由虚心向人请教开始而达到了对义理透彻的理解，今日形成了自己的学说体系，令人可敬可学。恰好像做官的，是由科举正路出来的，靠自己辛苦读书得来的正果，人人都可以像他那样学得来。至于吕留良，观看他文字所记写的

生平经历，少年本就不是个正经的学子，虚心求教学问的功夫，并不能拿得起来，而是剽东掠西，没有他不揽的事。到了中年之后只是专心写些评论文章，因撰写评论文章遂即得以了解程朱理学的精髓。所以当时说他是从街市江湖中钻营打点出来的，也是说他本没有问临政事、治理百姓的本领，只是办理闲杂事务比较得当，效力使用有功，朝廷怜悯他劳苦，也授予个闲杂的官职让他担任。

这虽是当时轻率随意推崇他的话，其实也是自己心中天理发现，对他很有不满的表示。可惜当时没有人能指出他的言论观点的过失之处，并且也没有看到他的遗稿残编中有这么多大逆不道的言论，所以终于陷于他的迷惑之中。这都是由于自己学识见闻浅陋，看不破他的虚伪，而当时的学人文士又多认为他是写文章的宗师，群起向他表示敬慕。所以我这山野鄙夫无知到极点，被他所误，竟然到了这般地步。

今日如不是恭逢皇上圣德齐天，洞察获悉我犯罪的情由，怜悯体念我陷罪的无知，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被磔尸碎骨，灭门抄族，也都是因为吕留良这个叛逆首凶毒害所造成的。今日假使吕留良还在世，我一定要吃他的肉，寝他的皮，以报深仇，岂止只是忿恨而已！这是发自我心腹的实话。天地明鉴在这里，如何能欺骗蒙蔽得过呢？

十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土建邦、割据而治真的适合大清国情吗？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封建是圣人治天下之大道，亦即是御戎狄之大法”等语。三代以前，封建之制，原非圣人以为良法美意，万世无弊，而行之也。古者疆域未开，声教未通，各君其国，各子其民。有圣人首出庶物，而群然向化，虽不欲封建，而封建之势已定。是故圣人即因其地

而封建之，众建亲贤，以参错其间。此三代以前之制，封建所以公也。后世干戈相寻，礼乐征伐之权下移于诸侯大夫，而乱臣贼子益多，至战国七雄并吞，而生民之祸极矣。其势虽欲封建，而封建之势必不可久。是以秦人乘便因势，混一天下而郡县之。封建之变为郡县者，其势不得不然也。自是以后，遂为定制。岂有去三代二千余年，而可复行封建之理乎？

如欲复行封建，则三代以来，帝王苗裔，诸侯遗胄，皆湮失不可复知，而后世之勋臣，孰可以享茅土；后世之懿亲同姓，孰可以保万民。即分疆画界，置为万国，又何从得人而封建之乎？且以塞外蒙古言之，昔者各蒙古自为部落，亦互相战伐，至元太祖之世，而统于一。越有明二百余年，我太祖皇帝神武奋兴，遐迹归诚，而复统于一。我朝幅员广大，中外一家。为千古所莫伦，盖悉惟天时人事积渐使然也。至若封建以御戎狄，则尤为不通之论。

曾静僻处东南，距边塞为远，妄意西北、中州各自为守可作藩蔽，为东南诸处假息偷安之计耳。不知前明之时，西北诸边各蒙古皆为劲敌，以天下之全力备御，而所在蹂躏，况以封建诸国，地方仅百余里，兵甲不满万人，遂能支柱门户，遏戎马之南牧乎？西北、中州诸处，既至离析残破，无以自存，则东南之人，虽欲安枕，亦何可得也？此其言至为愚陋无知，迂妄之甚者也。而叛逆之徒，动以封建为说者，盖自知奸恶倾险，不容于乡国，意谓封建行，则此国不可即去之他国，殊不知狂怪逆乱之人，如曾静辈，天地所不容，虽之海外何益？可问曾静，伊言封建之利是此意否？再如，曾静如此叛逆，天下可有容得他的国否？着他一一供来。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了“封建诸侯国制度是古代圣贤君王治理天下的大道理，也是抵御边远少数民族的大法理”这样的话。夏、商、周三代以前，封建诸侯国这种制度，原也不是圣贤君王认为可实行万

代没有弊端的优良完美体制。上古时候，国土疆域没有拓开，风俗教化没有实行，部落首领各自统治自己的国家，各爱抚自己的子民。有德行高尚的圣贤首先从万物中脱颖而出，四方生民群起敬仰归化，虽然不想封土建邦，而封土建邦之大势已成，因此圣贤君王就依据各占的地域建立诸侯邦国，将近亲贵戚参错分封安排到众诸侯国之中。这是夏、商、周三代以前的制度，封建诸侯国是为维护国家的公理而设的。到了后世，各诸侯国干戈相接，纷争不断，礼乐祭祀和征战攻伐的权利下移于诸侯、大夫手中，而乱臣贼子也越来越多。战国的时候，七雄相互并吞不让，黎民百姓遭受的祸害已到了极点。当时的情势虽然想继续实行封建诸侯之制，但封土建邦割据而治的大势，已必然不可长久了。所以，秦国乘此便利，顺其情势，统一天下而实行郡县制度。从封建诸侯国改为设置郡县治理，是大势所趋，是不得不必须这样实行的。从此以后，郡县制就成为一种固定的体制被历代所实行。如今岂有夏、商、周三代过去二千多年以后，而有再恢复实行封建诸侯国制度的道理？

如果要恢复封建诸侯邦国，那么夏、商、周三代以来，那些帝王、诸侯的后裔们，都已埋没消失于民间很久，难以恢复寻知他们的名份了，而后世历代辅佐创业立国的勋臣名将，谁还可以被授茅土封为诸侯？后世历代的皇室宗亲同姓子弟，谁又可以安抚保全千万子民百姓呢？既然是分疆划界，设置千万个邦国，又怎么能寻得人才而实行封建制呢？姑且举塞外蒙古的例子来说，过去各蒙古自成部落，也是互相攻战杀伐，到了元太祖时统一了天下，后来明朝统治华夏二百余年。我朝太祖皇帝神武奋兴，远近四方归顺诚服，再次一统天下。本朝疆域幅员广阔，中原与四方边远民族亲同一家，为千古所不能伦比，这全是顺应天时人和，日久逐渐形成的。至于说行封土建邦之制可以抵御四方边远民族的入侵，则是更为不通的理论了。

曾静居住东南僻乡山野，距边塞遥远，竟轻妄随意说要西北和中原地区各自为守，充作藩屏，无非是想使东南各地苟且偷安

罢了。他不知道前代明朝时，西北边域各蒙古部落都是强劲之敌，虽然调集天下兵马全力抗御，而边界的百姓仍然不免遭受蹂躏，何况封建诸侯之国，疆土仅方圆百余里，士兵不满万人，难道能支撑国门，遏止边远少数民族挥马南下吗？西北和中原地区既然到了离散残破、无法安然生存的境地，那么东南地区的百姓即使想高枕无忧地过安定生活，又怎么可能呢？曾静这些言论实在是浅陋无知、迂腐荒谬到了极点，叛逆之徒们动辄鼓吹游说封建制的真正目的，是知道自己的奸恶用心，难于容于故土乡里，如能实行封建诸侯国制度，就可以这个国家不能容留时，立即去到别的国家去游说哄骗。却不知道那些狂妄逆乱而像曾静一样的人，天地都不容，即便跑到海外又有何用？可讯问曾静，你所鼓吹封建制的好处是这样的意思不是？再说，像曾静这样叛逆不忠的人，天下可有容他身的国度没有？让他一一招供出来。

【原文】 曾静供：弥天重犯生处穷乡陋谷，胸次极狭，眼界极小，往昔狂妄无知，依稀影响，孟浪自信，以为窥探得管中之天。到今日蒙圣化所被，反思从前五十年发言行事，不惟如此经国大计，毫无当于事理，即寻常日用一言一动，亦不见一毫是处。是前头五十年，今已除落，不算人了。感皇恩浩荡，破格宽宥，做人当自今兹始。是前头的行，原不算人行；前头的话，亦不算人话。只为旨意问及当初立言之意，不敢不说明其实耳。

弥天重犯所云，封建是圣人治天下之大道，亦是御戎狄之大法者，只见得天下之大，一人耳目所及，心思所系，海隅之远，必有遥隔不到之处。而天生人材，有圣有贤，有贤之大者，有贤之小者，类皆有治民之责。以圣统贤，以大统小，错壤以居，事虽分于众贤，政实颁于一人，此古之王者，所以有封建之制。且其中礼乐征伐，虽出自于天子，而抚民之任，治民之责，则永属各国诸侯之长。非若郡县之此去彼来，彼此可以推委，且在任不久，视民常多泛而不亲，即有极意为民，立为法制，然政随人转，新旧交迁，实不免于朝张暮弛之叹。所以妄谓郡县不如封建

之好，其实当时何曾穷源究委，晓得自家看错事理，不是如此。

直到今日伏读旨意，乃知古圣人之制为封建者，因当时疆域未开，声教未通，各君其国，各子其民，封建之势已定，圣人不过因其地，顺其势，而封建之。初非以为良法美意，万事无弊，而行之也。后世礼乐征伐之权，下移于诸侯大夫，干戈相寻，至战国并吞而封建之势必不可久。秦人所以乘便因势，混一天下，而郡县之。是封建之变为郡县者，势不得不然也。况今日欲复封建，亦实无许多勋旧懿亲，可以保万民，享茅土，又从何得人而封建之乎？且封建之变，为郡县本积渐所至，今既为郡县矣，岂有复为封建之理。

而我朝幅员之广，中外一家，亘古未有。实因百年之内，圣德神功，亦亘古未有。所以天与人归，大成一统，无外之盛，是以今日之不可封建者，理也，势也，天命也，民从也。

至若弥天重犯谓封建以御戎狄，当日愚陋无知之论，诚如圣鉴，所谓妄意西北、中州各自为守，可作藩蔽，为东南诸处假息偷安之计之说。岂知西北诸边，各蒙古皆为劲敌，当明以天下全力备御，而所在蹂躏，况以封建之地小兵少，而能支柱门户，遏戎马之南牧乎？弥天重犯到此乃得如梦而初觉，深愧从前妄论，极为愚陋无知。而且感服我皇上聪明首出，神睿无微不昭，天下之大，何理不透；古今之远，何义不精；学问精神，卓识超越，虽极帝尧之钦明，大舜之睿哲，不是过也。弥天重犯从前狂怪逆乱，虽蒙圣朝宽宥，稍缓寸磔之死。然自知负罪弥天，无颜得立于世，久为天地所不容，尚有何地何国可以潜处，所不敢自就死地者，恐以蝼蚁之命，负天地浩大之恩，思欲留余息以图报无疆之大德于万一耳。

【译文】 曾静供：我这弥天重犯生长于穷乡僻谷，胸怀狭隘，眼光又很短浅，以往狂妄无知，外界的一点影响，我便鲁莽地信以为真，以为如管中窥天一样了解了事理。今日蒙受皇上圣德教化，反思自己以前五十余年的言语行为，不只像这些所谓治国安

民的大计，丝毫不符合事理，即使是平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也没有一点正确之处，这真是从前虚度五十余年，如今完全落得不是人了。现在由于皇恩浩荡，而被破格宽恕死罪，做人理应当从此开始了。自己以前的行为，原来就不能算是人的行为；以前说的话也不能算是人话。只是因为皇上旨意问到当初说这些话的本意，所以不敢不说明真情而已。

我这弥天重犯所说的“封建诸侯国制度是古代圣贤君王治理天下的大道理，也是抵御四方边远民族的大法理”。这些话，意思是看到天下地域广大，一个人耳朵能听到的眼所看到的、心思所想到的，由于海隅遥远，必然有阻隔遮挡不能到达的地方。而上天造就的人才，有的圣明，有的贤德，有贤德大的，也有贤德小的。这类贤德人才都有治理国家、安抚人民的责任。以圣明的人统领贤德的人，以贤德大的人统领贤德小的人，各分地域居住治理，政事虽然分于众多圣贤管理，政令实际由一人颁布，这就是古代的君王所设立的封建制度。而且其中的礼乐祭祀和征战攻伐虽然令出于君王，但安抚治理百姓的责任，就永远属于各国诸侯尊长。不像郡县制那样的你来我往，互相可以推诿搪塞；并且官吏在任时间不长，探视民情常常是泛泛而行，不能，即使有一心为民的职官，励精图治，立设法纪，然而政令随着官职调转，新老交接，实在免不了早紧晚松的忧虑。所以自己就轻妄地认为郡县制不如封建制好。其实当时自己何曾去深刻研究这二种制度的原委和区别，使自己得能明白看错了事理，实情不是如此呢！

直至今日伏读皇上旨意，才知道古代圣贤君王实行封建制度，是因为当时国土疆域没有拓开，风俗教化没有贯通，部落首领各统治自己的国家，各爱抚自己的子民，分封土地建国邦的大势已成，圣贤君王不过是根据其所占土地，顺其自然情势而实行封建诸侯国制度的。并非当初认为它是可实行万代没有弊端的优良完善体制。到了后世，礼乐祭祀和征战攻伐之权下移于诸侯、大夫手中，各诸侯国干戈相接，到了战国争雄之时，封土建邦、割据而治的大势已必然不可长久了。秦国所以乘此便利，顺

应情势，统一天下而实行郡县制度。从封建诸侯国改为设立郡县制，此是大势所趋，不得不做的事情，况且如今想恢复封建制度，也确实没有许多勋臣旧将，皇室宗亲可以保全万千子民百姓，安享被授茅土之封，又从什么地方寻得人才而实行封建制呢？并且，从封建制改为郡县制，本是日久逐渐所形成的，现在既然已实行郡县制了，岂有再恢复为封建制的道理！

我天朝疆域幅员辽阔，中原与四方边远民族亲如一家，是千古所没有的。而立国百年以来，历代皇帝的圣德神功，也是千古所没有的。天意与民心同归，终于实现了华夏统一、海内升平的空前盛世。今日之所以不能恢复封建之制，正是符合了情理，顺应了大势，至于我这弥天重犯认为封建制可抵御四方边远民族内侵的说法，也是由于自己当时愚蠢浅陋无知的偏见所造成的。正如皇上所说的：“轻妄随意说要西北和中原地区各自为守，充作藩屏，无非是想使东南各地苟且养息，一时偷安罢了。哪里知道西北边远各蒙古部落都是强劲之敌，前时明朝以天下兵马全力抗御，而边界的百姓仍难免遭受蹂躏。何况封建诸侯国地方小，兵马少，怎么能支撑国门，遏止边远少数民族挥马南进放牧呢？”我这弥天重犯伏读圣谕到此，才如梦初醒过来，深深愧恨自己从前的荒谬轻妄，实在是愚陋无知到了极点。而且深深感服当今皇上聪明睿智，出类拔萃，圣光普照，无处不到，天下广大，没有什么道理不透彻！古今遥远，没有什么义理不精通！其学问精深，卓识超群，即使说他已达到了像唐尧、虞舜那样的圣明智睿也不算过分。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从前狂怪逆乱，虽蒙受朝廷恩赦宽宥，暂缓执行寸磔死刑。然而深知自己知道身负弥天大罪，无脸面立于世上，为天地所不容，又有什么地方、什么国度可以隐藏潜伏呢？至今之所以不敢就地自裁，谢罪天下，乃是担心自己这像蝼蚁一样的卑贱性命死不足惜，但却辜负了像天地一样浩大的皇恩，自己寻思留存余生，只望能报答皇上无边无际的大恩大德千万分之一罢了。

十三、边地民族全是无耻无状的小人， 难道没有像尧舜一样的圣人吗？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中国人之诡譎反复无耻无状者，其行习原类夷狄。只是恶亦是人之恶，天经地义，究竟不致扫灭。若是夷狄，他就无许多顾虑了，不管父子之亲，君臣之义，长幼之序，夫妇之别，朋友之信”等语。

中国之人既有行习类乎夷狄者，然则夷狄之人，岂无行同圣人者乎？你说中国之人虽恶，究竟天经地义不致扫灭，今你这等逆乱君臣，上下之义荡然无存，且身罹重罪，有衰老之母，而毫不相顾；犯赤族之诛，门无噍类而不恤，殃及子孙，害及朋友，尚得谓之有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之伦理乎？曾静将天经地义，尽情扫灭，是禽兽不如之类，亦还有顾虑乎？着曾静回心细想，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此等狂悖的说话，总因生平未到外面走过，并未接见一个外境人，兀坐山谷中，意想中外华夷之分，大约是如此，遂不觉狂悖，写放纸上。直至旧年到长沙，今年奉解来京，一路见得政教美盛，万物得所；复又伏读圣谕请书，章章经天纬地，句句理精义透，不觉惊魂夺魄。始知天地之大，一理一气，无处不到。而近代之精英尽聚本土，所谓“东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者，今日方实信得。东海之圣人，其心理果与尧舜同世。若中国人物，则久已沦落不堪问。

如弥天重犯生圣明之世，而竟不知有圣明之君在上，乃听信谣言逆说，大肆诋毁，虽圣人量同天地，包容群五怨嗟而不计。然当身实已陷于极恶大罪而莫解。且不惟当身陷罪，君臣上下之伦，荡然无存，而堂有七十岁之老母，而不能顾，犯赤族之诛，门无噍类而弗知恤。若非皇上裕天地好生之德，开生民未有之

典，将弥天重犯老母幼子宽宥释放，当此炎暑气候，必禁毙狱中，而莫能顾此。弥天重犯万死万刚，粉骨难偿当身之极罪。亦弥天重犯万死万刚，粉骨难报未有之洪恩。回心细想，到此实实天经地义，尽情扫灭，直禽兽不如了。尚得有人气乎？尚得谓之有顾虑乎？尚有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之伦理乎？万死万刚，罪尚何辞。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逆书籍《知新录》里说了“中原地区民族中那些诡谲反复，无耻无状的人，其恶行劣迹原就像四方边远民族一样。只是这些恶行也是人类中所难免的，天经地义究竟不致于全部被扫灭。如果是边远少数民族，他们就没有许多顾虑了，根本不管什么父子亲情，君臣礼义，长幼顺序，夫妻性别，朋友信义”等言语。

中原地区民族中，有行为习性相同于边远少数民族的人，那么边远少数民族中，岂能没有品行同于圣贤一样的人？你说中原民族中，人们虽有恶习，究竟天经地义不致于全部扫灭，如今，像你这样的逆乱叛贼，君臣上下的礼义荡然无存，并且身负重罪，对家中衰老的母亲丝毫不顾念，犯下灭族大罪，门中没有活人存世而不怜恤，祸害已殃及到了子孙、朋友，还能说你有君臣、父子、长幼、夫妻、朋友的伦理纲常吗？曾静已将圣贤的天经地义尽情扫灭，是连禽兽都不如的人，还有顾虑吗？让曾静回心细想，据实供说。

曾静供：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如此荒谬狂妄的说法，总是因为平生从来没有到外边走动过，也没有结识过一个外地人，自己独居在山谷僻野，凭空臆想中原和边远各民族的区别，以为大约就是这样，于是不知不觉轻妄地记写在纸上。直到去年到得长沙，今年被押解进京，一路之上，看到的是政教清明美盛，万物各得其所。后来又伏读到皇上的圣谕各书，果真是每篇每章经天纬地，每字每句理精义透，不由觉得惊魂夺魄。这才知道天地无限广大，理气贯通，没有不能达到的地方，并且近代国家的精英

贤才，全都聚集于东海之地。正如古语所言：“东海有圣贤出世，和中原圣贤一样心性相同，理义相同；西域有圣贤出世，也和中原圣贤一样心性相同，理义相同。”今天才确实相信了。辽东地域出世的圣贤果然与尧舜的性理道德相同，而中原的人物，都早已沦落，不堪再说了。

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生于本朝圣明之世，竟然不知道有圣明的君王在上临政，又听信了谣言和逆说，大肆诋毁我朝圣主，虽然圣贤君王心量大如天地，可包容天下众多丑恶之徒的忿怒嗟恨而不计较，然而自己确实已经犯下万恶不赦的大罪难以解脱。并且不只是自己获罪罹狱，君主与人臣的上下伦常荡然无存，还造成家中七十七岁的老母亲无人照顾，犯下灭族抄家大罪，门下没有活人存世而难以悯恤。如果不是皇上宽宏施以天地好生的仁德，赐予自古以来所没有过的恩典，将我的老母与幼子宽宥释放，像这样炎夏酷暑的天气，必然是禁闭死于狱中而不能顾及。此时此刻，即使将我千刀万剐，粉身碎骨，也难抵偿自己所犯下的弥天大罪，同样，即使将我千刀万剐，粉身碎骨，也难报答圣上齐天洪恩。回心细想到这里，自己实实在在已将天经地义尽情扫灭，真是连禽兽都不如了。还能说自己有人的气味吗？能说自己有顾虑吗？能说自己还有君臣、父子、长幼、夫妻、朋友的伦理纲常吗？即使千刀万剐，认罪伏法，自己又有何话辩说。

十四、对于夷狄入主中原，难道一定要诛戮讨伐，而不能和睦相处、共图大业吗？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夷狄侵袭中国，在圣人所必诛，而不宥者，只有杀而已矣，砍而已矣。更有何说可以宽解得”等语。曾静今日称功颂德，极口赞扬，可问你还是要杀，还是要砍，还是可以宽解，据实供来。

曾静供：今日仔细检点，弥天重犯当身狂悖之举，狂悖之

言，该死该刚的罪，尽是吕留良之说所陷。即如此等万刚不足以蔽其辜的说话，原不是从弥天重犯本心上说出来的，实因吕留良批《射不主皮》文，有云“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圣人何故制此不祥之物？盖有所用也”句，推出这个说话，遂信以为实，而有是说。

总之，弥天重犯识见浅小，学力不到，受他的著作语言蛊惑最深。所以到今日，当身受他的害更大。

今日默自计来，凡旨意摘出所问的话，尽是弥天重犯当初错信吕留良的说话之所致。弥天重犯自己亦解说不出如何，误信至于此极，到今日亲见圣天子道德隆备，与天为一，学问高深，亘古未有，尊之如天，亲之如父，犹不足以愜其爱戴之诚，而万刚不足以蔽其辜的说话，尚敢萌之于心乎？尚忍萌之于心乎？此时此际，惟有稽顙流血，哀恳皇上终始垂怜山野无知，误受蛊惑而已，尚有何说？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了“夷狄少数民族侵犯凌辱中原，对于圣贤来说，必然是要进行诛戮讨伐而不会宽宥饶恕，只有杀他们、砍他们罢了，又有什么理由可以宽恕解脱得了”等话。曾静今天对本朝歌功颂德，极口赞扬，可问他对我们这些夷狄民族，还是要杀，还是要砍，还是可以宽恕解脱，要据实招供出来。

曾静供：今天仔细检点自己，我这弥天重犯自身狂妄荒谬的举动和言语，犯下该杀该刚的罪过，都是由于受了吕留良邪说的毒害造成的。这些千刀万刚也不能遮蔽其罪恶的言语，原来并不是从我内心中说出来的，实在是因为吕留良批注《射不主皮》一文时，从其中“锋利的弓箭，足以威慑天下，圣贤为什么要制造这些不吉祥的东西呢？是因为有所用途”的文句里，推论出这些说法，自己遂即信以为真，而有了上述那些狂妄荒谬的言论。

总之，我这弥天重犯见识浅陋，学问不精，受吕留良的著作语言蛊惑煽诱最深，所以到如今自己受他的毒害也最大。

今日自己默默算计思忖，凡是皇上旨意摘出所询问的言语，全是我当初误听信了吕留良的邪说谬论后所说的。我这弥天重犯自己也解释不出来，为何误信吕留良的邪说到了如此地步。到今日自己亲眼目睹当今皇上道德隆盛完备，可与上天合固为一，才智学问高深，是从古至今所没有过的，即使将皇上尊崇如上天，敬奉如父母，尚且不能够表达我无比爱戴皇上的诚恳心愿，而那些千刀万剐也不足以遮蔽其罪恶的言语，还敢存藏于自己心中吗？还忍心存藏于自己心中吗？此时此刻，除了屈膝跪拜，叩头流血，哀切恳求皇上始终垂怜我这山野鄙夫的浅陋无知，误受奸人邪说蛊惑，又有什么话可辩说？

十五、大逆不道的吕留良真的 能和孔子相提并论吗？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开蒙书，叙道统，只该叙到吕子止”等语。曾静以孔子比吕留良，推尊诵法，心说诚服之至，确是何见？曾静还是只就吕留良之著述文章因而信服，或是别有他故？今又极口痛斥吕留良之奸逆大罪，与前叙道统之意，迥然不作。未知是真心痛斥吕留良之大逆乎？抑伪为怨恨而始终悦服推尊乎？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从前之所以心服吕留良者，实无他为，因山野僻性，未有见闻。读书只心服三代的治体治法，尽美尽善。遂谓三代君德之大，是个体天；三代立政之本，是个为民。一切政治，皆是推本天心，为民筹画。其教养之大者，则有井田、学校之制，然世儒多以为不可复，唯吕留良的著述文章内以为可复，与僻性相合，遂不觉心悦诚服，推尊他直接孔孟之统者以此，实无他故。

是当日之推尊吕留良者，原是为他的著述文词蛊惑之所致。今日明目张胆，极口痛斥吕留良者，实因得见他的遗稿残篇内，

有大逆不道之语，甚而至于良心丧尽，天理全无，竟忍于讥诋圣祖。凡为赤子者见之，焉有不切骨痛恨之理。此又弥天重犯今日当身之大义，发乎天理，本于至情，合该如此，到此岂尚有一点伪为怨恨之心乎？

在弥天重犯今日之当身大义，固当如是，但若非弥天重犯亲见皇上之圣德、圣治、圣度，如此亘古未有，从前即使见得吕留良之残稿遗篇，亦未必至于如此之极口痛斥也。然使不得见他讥诋圣祖皇帝处，又未得至于极口痛斥，如是之甚也。引弥天重犯心肝中吐出的实语，无一字欺隐。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了“开读启蒙经书，叙述儒家的道统，只应叙述到吕留良就停止”等言语。曾静你把孔子和吕留良相提并论，推崇尊奉，诵颂效法，心悦诚服到了极点，这是什么缘故呢？曾静，你是只就吕留良的著述文章因此信服他的才学？还是另外有其它原因？今日你又极口痛斥吕留良邪恶叛逆的滔天罪孽，与前面所说的“叙述儒家道统，只应叙述到吕留良就停止”的意思，迥然不同，不知道曾静你是真心痛斥吕留良的大逆不道呢？还是伪装作怨恨，而心中却始终还是心悦诚服，推崇尊奉他呢？你要据实供出。

曾静供：我这弥天重犯从前之所以心悦诚服吕留良，实在是没有其它原因，只因为我这山野鄙夫邪僻的性情，见识浅陋，读书只信服夏、商、周三个朝代治理国家的体制和法令制度尽善尽美。于是认为夏、商、周三代的君主功德之大，是体察天意；三代立政治国的根本，是全心为民。一切政令制度，都是顺应天意，为百姓谋划。他们在教化修养方面的大建树，则是建有井田和学校两种制度。然而世间儒士们大多认为不可以恢复这两种制度，唯独吕留良在他的著述文章中认为可以恢复。这正好与我这邪僻的性情相投合，于是不知不觉心悦诚服，推崇他直接承继了孔孟的儒家道统到此，实在没有其他原因。

这样看来当日之所以推崇尊奉吕留良，原来就是被他所著述的文章蒙骗、迷惑所造成的。今日我明目张胆，极口痛斥吕留良的原因，是因为见到他著述的遗稿残篇中，写有荒谬绝伦、大逆不道的言语，甚至是丧尽了天理良心，竟然忍心去讥讽、诋毁圣祖皇帝。凡是身为朝廷的赤子百姓见到这些大逆不道的言语，哪能有不切齿痛恨的道理！这也是我这弥天重犯今日自身明晓大义所显现出的天理良心和根本的情理。本应如此，到了此时，怎能还有一点一滴伪装的怨恨心呢？

我这弥天重犯今日自己能够明晓大义，固然应当如此，但如果不是弥天重犯今日亲眼目睹了皇上高贵的品德，圣明的治理，非凡的才学，宏大的气度，是古往今来都未曾有过的，那么，从前即使看到吕留良的残稿遗篇，也未必能像今天这样对他极口痛斥谴责。然而假若不是看见了他讥讽诋毁圣祖皇帝的大逆不道的言论，也就更不能够对他极口痛斥谴责得如此深恶痛绝了。这是我这弥天重犯从心肝肺腑中吐出的真心话，绝没有一字一句的欺骗和隐瞒。

十六、你曾静自命为济世英才，你真的有“宰相之量”，还是心怀异谋，图为不轨呢？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湘湾陈梅鼎，识见气节，乡人中罕见。某为他侄婿，一日某到，他迎接某，吾岳翁出见，乃大声指某曰：‘此诗礼大家，方正君子。’又曰：‘吾老三生平作事，惟择婚一桩，眼力高过天下。’又曰：‘贤婿有济世之德，宰相之量。’又生平极鄙薄当今，屡叹先朝衣冠文物，最喜茶陵陈元章，以为大丈夫奇男子”等语。据此，则曾静平昔以济世自命，心怀异谋，图为不轨已久矣。可问曾静，伊叔岳陈梅鼎与岳丈是何等样人？茶陵陈元章又是何等人？此三个人，如今现在何处？可供来。

至若衣冠文物之语，最为谬妄。盖衣冠之制度，自古随地异宜，随时异制，不能强而同之。亦各就其服习，便安者用之耳。其于人之贤否，政治之得失，毫无关涉也。向闻无知愚妄之徒，轻诋本朝衣冠，有云“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之语，其说至为鄙陋。夫以冠言之，则周有雀弁、鹿弁，汉唐有獬豸冠、貂蝉冠、鹖鸡冠之类，以衣言之，则《尚书》云：“山、龙、华、虫作绘。”汉、唐以来，有羽衣、鹤氅，以及雉头裘、狮蛮带之类，不可胜数。皆取禽兽之名状，以为服饰之光华，岂有自古以来，用此等衣冠之人皆为禽兽可乎？

若夫治天下之道，惟在政教之修明，纪纲之备举，从来帝王全盛之时，君明臣良，朝野宁谧，万民安生乐业，不问为何代之衣冠，皆足以为文明之治。如其不然，则桀纣时之衣冠，即禹汤时之衣冠也。岂以衣冠之相似，而遂可以文明不坠，礼乐不废，不至于乱乎？如元代混一之初，衣冠未改，仍其蒙古旧服，而政治清明，天下又安。其后改用中国衣冠，政治不修，遂致祸败。即此可见衣冠之无关于礼乐文明、治乱也。且如故明之末年，衣

冠犹是明之衣冠也，而君臣失德，纲纪废弛，寇盗蜂起，生民涂炭。区区衣冠之制，礼乐文明何在世？可能救明代之沦覆乎？

我世祖皇帝统一区夏，戡定祸乱，救民于水火之中。圣祖皇帝继天出治，久道化成，海内承平，恩周万类。凡我朝之仁育义正，鸿猷善政，不及往古者何事？岂容以我朝之衣冠而有妄议乎！盖我朝起自东土，诞膺天命，本服我朝之衣冠，来为万国臣民之主。是上天大命集于我朝祖功宗德者，即天心降鉴在于我朝之衣冠，谓可表中州而式万方也。

夫衣冠既为天心降鉴之所在，则奕世相传，岂容擅为改易乎！且如曾静以山野穷僻、冥顽无知之人，尚因妄逆之见，心念故明之衣冠，况我朝席祖宗之鸿业，奉列圣之成规，历世相承，已有百余年，岂有舍己而从人，屈尊而就卑，改易衣冠之理乎？又如今之外藩各国，衣冠之制皆多不同，我朝受其职贡，亦不必强易其衣冠也。况我朝一统之盛，抚有万邦，其衣冠安可轻议乎！着并问曾静，屡叹先朝衣冠文物之语，是何意见呢？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了“湘湾陈梅鼎的见识和气节，在乡人中是很少见的。我是他的侄女婿，一天我到他家中，他出来迎接，我的岳父也出来相见。他指着我大声对岳父说：‘这是个懂得诗书礼乐的大学问家，品行端正的君子。’又说：‘我家老三平生做事，只有选择女婿这一件，眼光高于天下其他人。’又说：‘贤婿有济世助民的德行，有像宰相容纳万事一样的涵量。’他平生最是鄙薄不满当今世风，屡屡叹惋先前明朝的衣冠衣物。而最为赞许的是茶陵的陈元章，认为是个大丈夫，奇男子”等言语，从这些话看来，曾静平时自命是济世英才，心中怀有叛逆之心，图有不轨的念头已经很久了。可问曾静，你叔岳陈梅鼎与岳父是什么样人？茶陵的陈元章又是什么样人？这三个人现在居于何处？要据实供来。

至于曾静所说的衣冠文物这些话，最是荒谬轻妄。这穿戴衣冠的制度，各民族自古以来就是根据地域、时间而制定，不能强

求其相同，也就是各按自己的服饰习惯和方便穿用罢了。衣冠服饰对于判别人的贤愚和政治上的得失是毫无关系的。一向也闻知民间有些无知愚妄的人，轻蔑诋毁本朝衣冠服饰，传有“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间是禽兽”的说法，这真是卑鄙浅陋到了极点。就以冠帽来说，周朝时就有雀弁冠、鹿皮冠，汉代唐朝有獬豸冠、貂蝉冠、鹖鸡冠等各种。以服饰来说，《尚书》中写道：“山水，龙、蛇、日月、光华、虫草作绘绣图案。”汉、唐以来，便有羽衣鹤氅以及雉头裘、狮蛮带等种类，多得难以计数。并且还都绘绣以各种动物形状，才使得服饰华光流采。怎么能把自古以来穿戴这些衣冠的人们都视为禽兽？

如果说治理天下的大道理，只在于政治教化的修整清明，法纪纲常的全备和实行。历来帝王统治全盛的时候，是君王圣明，人臣贤良，朝野宁靖安谧，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不用管其穿戴什么朝代的服饰，都完全可以称之为文明盛世。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夏桀商纣时穿戴的衣冠，都是夏禹、商汤时穿戴的衣冠，哪能能只要衣冠相似，就可以使文明不会坠落，礼乐不会废弛，不至于祸乱丧国？比如元朝统一天下的初期，所穿戴的衣冠未改，仍然是蒙古民族的旧服饰，但政治清新圣明，天下安定宁静。以后改用为中原服饰，却是政治不能修整，遂即导致祸乱败亡。从此事例可以看出衣冠服饰与于礼乐文明、治国安民是没有关连的。再比如前代明朝末年，穿戴的衣冠仍旧是明朝的衣冠，但却是君王人臣德行丧失，国家纲常法纪荒废，四方盗寇蜂涌而起，黎民百姓深受欺凌涂炭，这小小衣冠制度体现的礼乐文明在哪里呢？衣冠能拯救明朝免遭沦灭倾覆吗？

当今本朝世祖皇帝统一华夏，平定祸乱，拯救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圣祖皇帝继承天命出任皇位，使道义教化久远传布实行，海内华夏各族统一和平，皇恩普施于四周万千物类。凡是本朝所实行的仁德义举和宏大的法纪政令，什么事比不上古时圣贤？难道能容忍因为本朝的衣冠服饰便妄加议论诋毁吗？有本朝奋起兴于辽东，授受于天命，原就穿戴着本朝的衣冠服饰，来做

华夏万邦臣民的君主。这就是上天将大命集于本朝列祖宗的功德，也是天心所降鉴于本朝的衣冠服饰，认为它可作为中原的表率、四方的榜样。

本朝的衣冠服饰既然是天心所降鉴之物，理应当为一代一代相延，岂能容许改变易换！即使像曾静这样生于山野僻乡、冥顽无知的人，因暗存叛逆之心，尚且念念不忘先前明朝的衣冠，何况本朝承继祖宗的鸿业，敬奉历代圣明皇帝的成规，代代相传，已有一百余年，哪能有舍弃自己原有衣冠去依从他人，屈降尊贵而去附就卑贱，改变易换衣冠服饰的道理呢？又如当今海外藩属各国，衣冠服饰制度都不相同，本朝接受他们的税赋贡奉，但也不强迫他们改换衣冠服饰。何况本朝正逢华夏统一之盛世，抚临有千邦万民，自己的衣冠难道能任人轻毁妄议吗？再问曾静，你屡屡叹惋先前明朝衣冠文物的言语，是什么意思呢？

【原文】 曾静供：陈梅鼎是安仁县的百姓，于康熙五十二年老死。弥天重犯的岳父名国衡，是陈梅鼎之弟，亦是个百姓，于康熙四十六年病死。其子贫不能自立，于康熙五十七年搬往四川去了。陈梅鼎之子，今不知其在否。陈元章是茶陵州人，不知是士，是民，不在已四十多年矣。陈梅鼎是弥天重犯的岳伯，弥天重犯十七岁娶他的侄女陈国衡之女，十八岁到他家中有是话。

弥天重犯之所以记说此话者，亦是因见得吕留良诗“稚子诧衣冠”之句，所以言得此处。这话皆是雍正五年了未岁，因张熙至浙江，传得吕留良的诗看见，序有此话。其实当年与陈梅鼎说话时，并未有别意。陈梅鼎本是个农家乡人，未曾读书学问，如何晓得别样说话！其所称许弥天重犯为“诗礼大家，方正君子”者，是因见弥天重犯在他家中比常儿厚重敦笃，不佻达耳。许弥天重犯有“济世之德，宰相之量”者，为心多慈爱而量能容受。因弥天重犯原同居有个兄嫂，因夫妻不睦，兄将嫂改嫁到陈梅鼎邻家，陈梅鼎与是妇语言之间，妇称言弥天重犯处待他好，所以说有宰相之量。妇复说弥天重犯屡劝兄不得嫁妻。陈梅鼎间得

此话，所以说弥天重犯有济世之德。

至于陈梅鼎屡叹先朝衣冠文物者，彼时有七十余岁，大抵他服过先朝衣冠来，所以叹其好。喜陈元章以为大丈夫、奇男子者，弥天重犯不知得陈元章的底里，亦不知陈元章是个什么样人，相隔有五百多里。当时只闻得茶陵州有个陈元章，因得罪州官，州官要捉拿处治他，他随聚众围城，几乎起变，当即被捉伏诛。陈梅鼎之所以称他者，大抵是喜他以匹夫而不受制于官长之故。此是陈梅鼎反常异俗狂怪的说话。弥天重犯见得吕留良前诗句，所以记忆到此。

至若谓衣冠文物之说，在弥天重犯有何知识定见，能剖决其中道理丝毫不易而有是说，此乃听得这些俗儒鄙陋议论，不察其理，遂妄有是说。今伏读旨意，广大精深，惊天动地，乃知本朝衣冠之制，原是随地异宜，随时异制，全以道为归，初未尝有意立异，亦未尝强以求同。此正所谓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而无私者也。观此则知本朝一切礼乐刑政，经天纬地之制，无一不顺天因地，因物付物，宜乎冠百王而超千古。弥天重犯得闻斯义，不惟当身喜极快极，冰释雾开，且私幸此说一出，竟足以破千古愚陋疑团。因思从前几多误听谣言处，皆是为心中愚暗，窥探义蕴理奥不到之所致。当时若有高明指示，当前妙理精义之所在，心中未有不喜悦诚服者。如今衣冠之说，从前未尝不因人言而心疑，今得旨意如此煌煌指示，虽木石也会动心点头，弥天重犯到此更有何说！只有叩首，叩首，千万叩首！将此段议论记于心，口传于当世，以解陋儒之疑。若得蒙恩宽宥，德教所被，期以数年，当身学问觊有寸进，笔传于万世，以为百王立政之准而已。

【译文】 曾静供：陈梅鼎是湖南安仁县的百姓，于康熙五十二年去世。我这弥天重犯的岳父名叫陈国衡，是陈梅鼎的兄弟，也是个普通百姓，于康熙四十六年病故。他的儿子因为家境贫寒不能自立，于康熙五十七年迁搬往四川去了。陈梅鼎的儿子，如今不知还活在人间没有。陈梅鼎是我这弥天重犯的岳伯，我十七岁

娶他的侄女，即陈国衡的女儿为妻，十八岁到他家中探问时说有这些话。

我之所以记说这些言语，也是因为见到吕留良所写有“稚子说衣冠”的诗句，就写记于《知新录》中。这都是因为雍正五年时，张熙到浙江传回吕留良的诗文，看了以后，才有这些议论。其实当年与陈梅鼎说话时，并没有其它意思。

陈梅鼎本是个农家乡里人，不曾读书识礼，如何知晓别的说法！他之所以称赞我这弥天重犯是“懂得诗书礼乐的大家，品行端正的君子”，是因为见我在他家中比寻常儿男敦厚笃实，不是轻佻非分之入罢了。他称许我有“济世助民的德行，有像宰相胸容万事一样的涵量”，这些话，意思无非是说我心底慈善而又能忍让。因为我原同兄嫂居住在一起，他们夫妻二人不和睦，兄长便将嫂子改嫁到陈梅鼎的邻居家中。陈梅鼎平日与这个妇人说话时，妇人直言称赞说我待她甚好，所以才有“像宰相胸容万事一样的涵养”的说法。妇人还说我多次劝说兄长不要休妻另嫁。陈梅鼎闻听了这些话，于是又说我有“济世助民的德行”。

至于陈梅鼎屡屡叹惋先前明朝的衣冠文物，他当时已七十多岁，大概先时穿戴过明朝的衣冠而心存留恋，所以叹赏明朝的衣冠好。再说他赞许陈元章是大丈夫、奇男子的说法，我这弥天重犯并不知道陈元章的底细，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两个地方相隔有五百多里。当时只听传闻说茶陵州有个陈元章，因为得罪了州官，州官要捉拿处治他，他便聚众围攻州府，几乎酿成事变，当即便被捉住处死。陈梅鼎之所以称许他，大概是喜欢他那甘为平民百姓而不愿受制于官府的刚直脾性的原故。这些便是陈梅鼎反常脱俗狂怪言语的真意。我看到吕留良以前的诗句后，便把这些议论记写了下来。

至于对衣冠文物的评说，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有什么知识见解，能去剖析透彻其中丝毫不易改变的道理而形成主见呢？这些都是我听了那些卑儒俗士们所乱发的鄙陋议论，没有明察其理论是否正确或谬误，就轻妄随意的说了出来的。今日伏读皇上旨

意，内中蕴涵博大精深，至理至明惊天动地，这才知道本朝的衣冠服饰，原就是根据地域时间而制，完全是因为道统归一所定。当初既没有想要标新立异，也没有想要强求相同。这正是所谓的对上顺乎于天时，对下和合于水土，并没有什么个人私见。从事例便知本朝一切经天纬地的礼乐刑典、政令法制，没有一件不是顺应天地，附合万物的，优越制度确实可称为超越了古代的圣贤帝王。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得能闻知体会这些义理，不只是自己欢喜高兴，心中疑虑冰释雾开，并且暗自庆幸此理论传出，就足够破除民间千年误传的愚陋疑团。因此想明白了从前自己多次误听信谣言，都是因为心中愚暗无知，不能窥探理解圣贤的仁德义理蕴涵奥妙所造成的。当时如果有像圣上这样高明的指示，使世人明白理解这些妙理精义的内涵，没有不心悦诚服的。这些关于衣冠服饰的评说，从前不能说不是因误听信人言而存疑心中。今日得到皇上谕旨如此明白的指示，即使是草木顽石也会动心点头的，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到这里又有什么话可说！只有叩首，叩首，千万次再叩首！将圣上这段议论铭记于心，口传于世，以解开世间陋儒俗士们的疑惑，若能恩蒙朝廷宽宥，使披服于圣德教化，希望数年后，自己学问如稍有长进，定用文字传记于万世，以作为今后众多君王立政的准则而已。

十七、程颢提出的选拔人才方法在宋代已经证明行不通，难道能够在本朝实行得通吗？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前曾静供内有“国家取士之法，宜当参用程明道所议宋熙宁间取士，损益斟酌行之方为更美”之语。查程子熙宁取士札子云：“宜先礼命近待贤儒，各以类推及百执事、方岳州县之吏，悉心推访，有笃志好学，材良行修者，皆以名闻，命州县敦遣。”朕于雍正元年，即有举贤良方正之恩诏。迩年以来，有令各省州县延访孝友端方，才可办事，而文亦

可观者，每岁各举一人之谕。又有六年选拔贡生，不拘考试名次，务取经明行修者之谕。又有令满汉内外文武诸臣，将有猷、有为、有守者，各举一人之谕。又有令中外诸臣，在京主事以上，在外知县以上，各举所知，或举贡生员，或山林隐逸，送部引见之谕。是程子所议，皆腾已行之事也。无如举贤良方正，则各省举者寥寥。惟福建巡抚黄国材荐彭鹏之孙二人，皆童稚无知，学识浅陋，不堪任用。至浙江巡抚李馥所举贤良方正，竟系积恶巨棍，夤缘荐举，后经地方大吏察出纠参，赃私累累，款迹狼藉。观此，则贤良方正之举，可尽信乎？

自三代至汉，用乡举里选之法。追其后，刺史守相，得专辟召之权；九品中正，得司人物之柄。用人之权不在上而在下，其势不可复行，于是改为糊名易书，以文艺科目取士。盖言为心声，人之文章，先由积学深造而成，尚可以略知其人之蕴蓄。若专取行谊，则必有伪为涂饰以欺世而盗名者。且心术至难窥测，每见曲谨自好之徒，一旦改涂易辙，即可无所不为。是以《汉书》史臣之论，谓“直言独行，高节沉隐之属，荣路既广，遂有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任，请谒繁兴”者，可知前代德行之选，已不足为铨衡之准则，何如科场文艺之稍有凭据乎！

宋臣郑樵谓“科甲一途，虽非古人德行之举，而犹可以得才能之士”。其言信而足征也。且朕用人之道，并未尝限于科甲一途，乃多方鉴拔，惟日孜孜，冀获贤才，以为莅政临民之选。用心甚苦，而其事甚难。此在延诸臣所共知者，又岂程子奏议一格，所能尽朕求材之意乎！

至于程子所云，取材能明达之士，受业于成德之士，其学业大明者为太学之师，其次分教天下，由州郡而县，以次而用。三岁宾兴，优者自县而州郡，自州郡而太学，以此递迁；劣者以此递降。欲以化成天下，其说迂远而难行，是以当熙宁之时，已不能见诸实用，况数百年以后乎！且今之选拔，即古贡士之法，而朕数年以来，用人之道，亦可谓详且尽矣。曾静以为当参用熙宁取士之法。试问曾静，熙宁取士之法果有实效否？今当何如斟酌

损益，方为尽美？可详悉供来。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前时曾静供词内说有：“国家选拔人才，应当参考采用程明道先生所提议的宋朝熙宁年间实行的方法，斟酌研究损益得失后再推行才为更好”的言语。经查考，程灏先生熙宁年间有关选拔人才的奏折中说：“理应先诏命朝廷中亲近的贤良学者，各往下类推到百官执事、地方州县的官吏，细心推查探访民间那些笃志好学、才能优异、品行修正的人，将他们的姓名记载成册，命令州县官员按期呈报。”朕于雍正元年，即颁布有推举贤良方正的恩诏。近年以来，颁布有命各省州县官员延聘寻访那些孝友端方，既有理事才能而文章亦可读看的学子，每年各举选一人的谕旨。又于雍正六年颁布有选拔贡生，不必拘泥于考试名次，务必选取经通义明，品行修省人才的谕旨。又颁布有命满汉内外文武大臣，将有德行、有作为、有操守的人才各推举一人的谕旨。又颁布有命朝廷内外各大臣，在京中的主事官以上，在京外的知县以上，各举荐所了解的人才，或举人、贡生、秀才，或山林隐逸饱学之士，送往吏部中引见的谕旨。凡是程灏所奏议的方法，都是我已经推行过的典制了。不想荐举贤良方正，各省却是荐举者寥寥无几。只有福建巡抚黄国材荐举彭鹏的子孙二人，都是童稚幼小无知，学问见识浅陋，根本不能任用。到了浙江巡抚李馥所荐举的贤良方正之人，竟是个劣迹斑斑的棍痞，一心攀附权贵，营求荐举仕进，后经地方官员察出其中弊端，奏明参劾，查出赃物累累，条条罪行狼藉不堪。从这些事实来看，荐举贤良方正人才的做法，能够相信吗？

自夏、商、周三代延续至汉朝，都是采用由乡里举选人才的方法。到了汉代以后，各地刺史太守，得到专持征召人才的大权；九品中正制度，具有掌管选荐人才的便利。选用人才的权利已不在朝廷而落入地方官员手中，这种典章已不能再继续实行，于是改为“糊名易书”之制，以考试文章科目选拔人才。人的言论可以反映自己的心声，人们的文章，是先由积累知识经过深造

提高才能写成的。从这些文章中又可以略知本人内心蕴蓄的志向和品德。如果专意注重于品行，就必然会出现以伪装粉饰而欺世盗名的，并且这些人的内心世界很难窥探测明。经常见到一些谨言慎行洁身自好的人，一旦改变环境和地位，便无所不为，毫无顾忌。所以，从《汉书》中史臣评论说的“敢于直言，具有独特操守的人，属于高风亮节，沉稳持重之类。等到仕进荣升的门路已广，便抛去窃取的名誉和伪装，渐渐变成奔况营取名利的人，经常住豪门贵府，攀附拍马，请谒不止”的这些话，便可知道前朝的以品行选拔人才的方法，已经不能成为为评量铨选人才的标准，怎如科场应试文章科目的做法还稍微有些依据呢？

宋朝大臣郑樵说：“科甲考试选才的途径，虽然不是古代圣贤举荐有德行的人的方法，而还是可以得到有才能的人。”他的话已被事实证明是有道理的。况且我选用人才的准则，并没有限于科甲一种途径，而是多方鉴别选拔，每天孜孜不倦，只希望能获得贤良人才，以作为莅临政务职官的人选。虽说我用心良苦，而事情实在难办。这是朝中诸位大臣人都知道的事，程灏奏议中所举的一种方法，怎能全部满足我求贤若渴的心愿吗？

至于如程灏所说的，选取能明达事理的学子，让他们先受业就教于德行已修成的学者，其中学业优异者任为太学师长，其次分别任教于天下，由州郡到县中，以学业程度不同而区别任用。三年一届，由地方官考试选拔应举的学子，学业优秀者自县中送往州郡，更优者自州郡送往太学，逐级递迁，学业低劣者就以此向下逐级递降。如果要达到仁义道德，教化天下，这种方法迂迥遥远，实在难以实行。所以，在宋朝熙宁年间，便不能付诸实际执行，何况数百年以后呢？并且，本朝选拔人才，采用的即是古代举荐的典法。我这几年以来选用人才的做法，也可以说是详尽齐全了。曾静认为应当参考采用宋朝熙宁年间选拔人才的典法。试问曾静，熙宁年间选拔人才的典法果然有实效吗？今日应当如何斟酌它的损益得失，才能尽善尽美？可详细供说出来。

【原文】 曾静供：弥天重犯本山野愚民，从前谬发狂言，因是井蛙之见，无当事理，然亦因平昔不知我皇上之所以因时立政致治政策敷猷者，其中损益变化，既详且尽，不惟非今人之谋虑所得及，并非从古圣贤之筹画所能备。直到今日，方知神化广运，无处不到。生天地之内，只有顺天地之化而已，又焉知天地之高厚哉！天地之高厚且不知，又焉知天地之大，造化之所以然哉！况当此极恶重罪之会，虽屡蒙皇上如天之仁，钦恤无知，沛生民未有之殊恩，宽宥重典。然在弥天重犯自悔自愧，惶恐战栗，自是无时无刻可释于怀，岂但感恩戴德，昊天罔极而已！又焉敢妄抒蚁见于经国大计万分中之一乎！不意我皇上宵旰图治，孜孜为民，既无一时少懈，复无一处不到，今明旨下颁，竟以前供取士之法，如何斟酌损益方为尽美，许弥天重犯详悉再供。

自古算君德之备，君道之尽，以尧舜为极。然孔子称舜为大智，在不自用而取诸人，其言曰“舜好问而好察迩言”，其所问察世，亦只曰迩言而已，未闻察及于深囚重犯，不足齿数之人言也。况弥天重犯之山野穷僻、冥顽无知更甚者乎！于此可见我皇上虚中之极，用中之精，视当年大舜更进而上无疑矣。是不惟宽宥弥天重犯之重典，为沛生民未有之殊恩，即今日许弥天重犯之再供，亦属生民未有之大德。由是看来，我皇不特为明君、圣君，继往古圣贤之绪而已，直继天立极，开万世之君统，立百王之大法，于天运再辟再造之中世。

弥天重犯虽自量愚顽，本无说可以敷奏，然当此生民未有之盛会，焉敢不竭一线之明，因前供所未详悉者而直供之，以仰副我皇上好问好察、勤求不倦之至意。因思前供所谓程子取士之法者，彼时无知，妄谓古昔帝王治天下之道，皆是争先一著之法。如欲禁民为盗，不在盗上禁，要推其为盗之源，或是为饥起念，或是为寒生心，如何设法安置，使之农桑不失业，衣食饥暖，则盗自止。又如欲士习善行，亦不专在行上引，要先使之通道德、明理义，道德通，理义明，则人自乐于为善，虽强之为恶，亦不去矣。以此推之，事事皆要争先一著，虽极之日用寻常、百工末

技、农圃医药之小，亦必要从原本上做来，方得妥贴，况治天下之大乎！所以当时妄意谓要取士，必以教士为先，教士又必以明理义、通道理为要。然欲教士明理义，通道德，必先择教官之理义明、道德通者，方可以当其职。此弥天重犯前供谬妄，谓当参用程子所议熙宁取士之法者，大意谓先要教士得法，教士得法，系于教官，又先要教官得人。

【译文】 曾静供：我这弥天重犯本是山野僻乡的愚昧小民，从前所说的谬论狂言，本是井底青蛙的浅陋之见，不符合事理。然而，也是因为那时不了解当今皇上这些顺应天时所设立的广施德行义理的政纲，其中的损益得失变化，既详尽又全备，不但当今世人的谋虑难以达到，并且古代圣贤的筹画也不能如此备全。直到今日，自己才知道上天神明的教化广大，是无处不到的，生长于天地之内，人们只是顺应天地的变化而已，又怎么能知道天地的高厚啊！天地的高厚尚且不能得知，又怎么能够知道天地的广大，造化万物的道理啊！如今正当我犯下极恶重罪的时候，虽然屡次蒙受皇上如天地般的仁德，悯恤我愚昧无知，施于我庶民百姓从没有受过的殊恩，宽恕死罪。然而在我这弥天重犯却是自愧自悔，诚惶诚恐，战战栗栗兢兢，每时每刻都放在心上，不敢忘怀，哪能只是感戴皇恩深厚无穷而已！又怎么敢对经国安邦大计中的万分之一轻妄地抒发自己这蝼蚁般的见解呢？不想我当今皇上废寝忘食，励精图治，一心为民，勤于国政，既没有一时少许的松懈，又没有一处不考虑周到。今下颁谕旨，竟问我前时供说选拔人才的典法，如何能斟酌损益得失才为尽善尽美，恩许我详细再次供说。

自古论说君王的德行道义全面完备，数唐尧、虞舜为最好。因此孔子称赞虞舜为大智，在于不主观行事而虚心地向他人求教，孔子说：“虞舜知学好问，而且好征询近旁人的意见。”虞舜所好询问的，也只说是近旁人的话而已，没听说他征询那些不足挂齿的深囚重犯们的意见，何况是像我这出之山野僻乡，更加冥

顽无知的弥天重犯呢！从此事便可看出当今皇上虚心已到了极点，用心的精细十分周到，毫无疑问是比当年虞舜更为高明了。这不仅是指宽恕我弥天死罪，施布于庶民百姓没有的殊恩而言，即是今日恩许我再次供说，也已经属于庶民百姓从没领受过的大恩大德了。由此看来，我当今皇上不仅仅是至明至圣的君王，继承了以往古代圣贤的品德业绩而已，而是承继天命登上极位，开下万世帝王一统天下的基业，吸取了古代百千代君王制度的精华，直可列于再辟再造天运的绝代英才之中了。

我这弥天重犯虽然知道自己愚顽无知，本没有什么话可以陈述于皇上，但值此庶民从没有的绝好机会，怎敢不竭尽一线希望，把前次供词中不够详尽的话再直言供说，以仰符我当今皇上好问好察、勤求不倦的至诚心意。思想前供词中所说的程明道先生奏议选拔人才的方法，当时无知，轻妄地说古代君王治理天下的准则，都是实行抢先一步的方法。比如准备禁止百姓盗窃，不在盗窃上去禁，而是要首先推究百姓为盗的原故，有的是因为饥饿起下偷窃之念，有的是因为寒冷生出盗窃之心。探明原因后，就要研究如何设法安置，使百姓各行农耕桑蚕之业，丰衣足食，盗窃自然止息。又比如想使读书人养成好的品行，也不专意在品行上引导，而是要先使他们通晓道德，明彻义理。道德通，义理明，人们自然乐于好的品行，虽然强迫他们去做坏事，也不会去做了。以此推理，任何事情都要争先一着。即使极为平常，涉及手工技艺、农耕医药的小事，也必然要从原来的根本上去安排进行，才能够妥贴得当，何况天下这么大，事物这么多呢！所以当时妄说要选拔人才，必须对这些人才施以教导为先。教导他们又必然要以明彻义理、通晓道德为主。然而想教导这些人明彻义理，通晓道德，还必须要先先从教官中择选义理明彻道德通晓的人，才可以胜任其职务。这就是我前时供词中的谬妄之言，所就应当参考采用程明道先生所奏议的，宋朝熙宁年间选拔人才的方法，大意是认为先要教导士人学子得法。而要做到教导得法，关键在于教官，所以又要先做到选用教官得当。

【原文】 今伏读旨意，方知我朝取士之典，除科举外，有举贤良方正之恩诏；有令各省州县廷访孝友端方，才可办事而文亦可观者，每岁各举一人之谕；有选拔贡生，不拘考试名次，务取经明行修者之谕；有令满汉、内外、文武诸臣，将有猷、有为、有守者，各举一人之谕；有令中外诸臣，在京主事以上，在外知县以上，各举所知，或举贡生员，或山林隐逸，送部引见之谕。猗欤！何其盛欤！此不惟当年程子所议熙宁取十一格所不能尽，且自古隆盛之朝取士之典所不能备。弥天重犯至此，因感念我皇上一忧民图治之苦心，体天求贤之至意，不觉泣下，移时不能言。其所以为我辈赤子抚绥谋者，亘古来有如是之我后乎！况监前代德行之选，不足为栓衡之准，勘出科举文章之发，尚由积学深造而成，尤无弊不彻，无隐不烛，皆历历如数家珍，若分黑白。以是思我皇上之用心甚切甚周，抑且良苦矣。

夫以取士之方，如是之广，得人之念，如是之笃，宜贤才汇登，多士济济。而天下所荐举，间多不能仰副我皇上之深愿者，固是人才难得，然亦无乃在下之有司，以他政为急，视此荐举为稍缓欤！岂知我皇上治天下以得人为先，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自古政治之休明，生民之乐利，全视乎在上之得人，即为微末之邑宰，亦必以得人为先。所以子游为武城宰，圣人不问其他必先问其得人与否。诚以人才所关于政教风俗为至大而且重也。所以谕旨煌煌，广开仕路，立贤无方者，正为得人为治天下所必选之政。而今日之少能荐举与荐举而不实者，无乃有司视为泛常，而各省督抚亦少以此为事，而责望于所属之有司，所以至此。若使督抚以及有司执事知得为政必得人为先，仰体圣心，认真职分，在外早夜不遑，悉心推访，何患人才不得！自然千中选百，百中选士，可以仰副我皇上惟日孜孜，冀获贤才，以为莅政临民之选之德意。

【译文】 如今伏读皇上旨意，才知道我朝选拔人才的制度、方法，除去科举外，还颁布有举荐贤良方正人才的恩诏；颁布有命

各省州县官员延聘寻访那些孝友端方，既有理事才能，而文章也可观看的学子，每年各举选一人的谕旨；颁布有选拔贡生，不拘泥考试名次，务必选取经通义明，品行修省人才的谕旨；颁布有命满汉内外文武大臣，将有德行、有作为、有操守的人才，各举荐一人的谕旨；颁布有命朝廷内外大臣，在京中的主事官以上，在京外的知县令以上，各举荐所了解的人才，不论举人、贡生和秀才，或是山林隐逸的雅士，送往吏部中引见的谕旨。好啊！这是多么详尽完备啊！不仅当年程灏先生所奏议宋朝熙宁年间选拔人才的一种方法不能达到如此尽全，而且自古以来隆盛之朝选拔人才的典章也所没有能达到如此完备的。我这弥天重犯写到这里，因感念当今皇上那种忧国忧民励精图治的苦心，体会其秉承天命而求贤若渴的至诚心愿，禁不住潸然泪下，一时不能言语。人世间所能够为赤子百姓抚绥安宁而日夜操劳谋划的君王，千古以来有比得上我们当今皇上的吗！况且鉴明前朝以德行选拔人才的制度，不足以作为评量铨选各级官员的准则；勘验出科举文章的抒发撰拟，是由积累知识经过深造提高才写成的。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弊端和隐秘不被其透彻明察，都如教说家珍一样，黑白分明。从这些事例中便可以看出我当今皇上的用心是多么切实周到，用心良苦了。

按理说选拔人才的制度，像本朝这样多而完备，寻求人才的愿望，像皇上这样笃实诚恳，理应是贤能的人才荟萃济济，充盈朝野。但是天下所荐举的人才，中间许多人却不能符合我当今皇上的心愿，这固然是优秀人才难得，然而也不能不说是因为下边的各级官员，将其他政务列为紧要，而认为荐举之事可以稍缓啊！却不能知道我当今皇上治理天下是把选得人才列为首先要力的。唐尧曾经把不能得到虞舜而作为自己忧虑的大事，虞舜也把不能得到夏禹、皋陶作为自己忧虑的大事。从古至今，各朝各代政治修好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全在于上层选用人才得当。即使是担任小小城邑之宰，也必然以要选用人才为先。所以言偃担任武城宰时，孔子不问其他事，必然是先问他选到合适的人才没

有，这确实说明人才对于国家的政治教化和风俗习惯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当今皇上谕旨光辉明亮，广开天下仕进之路，立设古代圣贤所没有的典章，正是把选用人才作为治理天下之先的政举了。而当前之所以很少有职官荐举人才以及荐举的人才不实，是因为地方官员将此举看作是平常小事，而各省总督、巡抚也很少予以重视，不去责问督促其所属的下级官员，所以造成这种结果。如果各省总督、巡抚以及有关的各级官员都知道为政必要以选用人才为先的道理，体念皇上的愿望，认真恪守职分，深入体察民情，无论白天黑夜都不敢松懈，悉心推查寻访，何用担心人才不得！自然能够千人中选百，百人中选十，以符合我当今皇上日日努力不息，希望获得治世贤才，以作为莅政临民人选的愿望了。

【原文】 至若谓程子所云，取材能明达之士，受业于成德之士，其学业大明者为太学之师，其次分教天下，由州郡而县，以次而用，三岁宾兴，以此为黜陟。欲以化成天下，其说迂远而难行。今日得明旨剖分，反复看来，果是迂远难行。然我朝取士之法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

惟养士之典，稍有未备。弥天重犯因古法贡士，必本于乡里，而风俗适与人材相通。曾见有蓝田吕氏乡约，经朱子斟酌增损者，其纲领甚切，其节目甚密，其联络督率之法更精详美备，有关于德教风化甚大而远。大纲有四：一曰德业相劝；二曰过失相规；三曰礼俗相交；四曰患难相恤。每纲之下，类分节目，节目所载，准古酌今，更为尽善。乡中择一老成有齿德者为都约正，其次者为副约正，更择子弟中之端方正直、通道义而能文辞者为直月。直月每岁十二人，轮流掌其事。立三籍：愿人约者，书一籍；有善，书一籍；有过，书一籍。近者每月一会，远则每季一会。择四达之处立一约所。值月先期循环纠察同约中之善行与过行。临约之日，行礼读约毕，约正及同约以次就坐，酒三行，直月举约中之善与过，告于约正。约正当众询其实状，无异

词，然后书于籍。善则约正率同约奖励之，过则约正率同约规戒之，仍将善、过两籍遍传在坐者观省，然后许各人就约所质疑问事，讲辨道理。区画家计，以及论文习射，至脯乃退。其中纲张目举，仪文度数，最为精密。

【译文】 至于程灏先生所说的，选取能明达事理的人才，让他们先受业就教于德行已修成的学者，其中学业优异者任为太学师长，其次分别施教于天下，由州郡到县，按学识程度不同而区别任用。三年一届，由地方官考试选拔应举学子，逐级荐举任用。程灏先生想把此举作为官吏进退升降的制度，以使圣德义理化成天下。但此制度因时代久远而现在已难以实行。今日得到皇上明旨剖解分析，自己反复推究，看来果然是时代遥远今日已难以实行。然而本朝选拔人才的典章制度，已经达到了最高最完备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只有对人才的教育培养，还稍微有些不够完备。我想古代选拔贡士，必然于乡里开始，当地风俗习惯的好坏与人才的优劣是息息相通的。我曾见到过蓝田吕氏家族制订的乡约，经过朱熹先生斟酌增删修改后，其纲领切合实际，条目编排严密，其中有关联络督率管理的方法更是精详完备，对于道德教化的作用深远广大。这个乡约的大纲有四款：第一款是德业相劝；第二款是过失相规；第三款是礼俗相交；第四款是患难相恤。每款纲领下边，又按类分有条目，条目所记载的，既比照了古代，又酌量了现今，更是尽善尽美。其主要做法是，选择本乡中一位处世老成，德高望重的长老做都约正，其次者为副约正。再选择本族子弟中为人端方正直、通晓道德、义理而且能写文辞的人为值月。值月每年选举十二人，轮流执掌管理本约事务。约中立有三本文册，凡是愿意入约的人，名字记载于一本文册中。约中发生的好事，记载于一本文册中；约中出现的过错，记载于一本文册中。时间短的每月召开一次本约集会，长的每季召开一次本约集会。挑选位置适中交通便利的地方设立一座约所。值月先轮流纠察本约中

发生的好事和过错。临到本月集会的日子，行礼宣读约书后，约正便领本约约民按次序就座，先饮酒三巡，然后由值月列举本约中的好事与过错，一一告诉约正。约正当众询问是否属实，如果没有异议，便命人书记于文册中。对于好事，约正率领约民给予奖励；对于过错，约正也率约民进行规劝惩戒。还将记载好事和过错的文册遗传于在坐的约民观看思省。而后允许各人就约中的事务进行质疑问答，讲辩伦理道德，计划家中生计，以及论说文章和渔猎习射，面面俱到，直到下午才散约各还各家。该乡约条理分明，纲举目张，奖罚的准则尺度很是精细严密。

【原文】 弥天重犯妄谓今日于科举取士之中，似当取此全文，恳祈我皇上天聪，参以时宜，斟酌损益，颁行天下。敕令督抚责委有司，每县视地之大小远近，多立约所。不拘士农工商，居其土者，皆许其入约。读约之会，先将圣祖皇帝上谕十六条及我皇上圣谕广训宣读毕，然后取此约大纲细目，依其仪节，次第读过，讲解一遍。或并列祖圣德神功及前后所颁政令，凡有关于风俗民事者，俱着令有司行文到乡约中宣示。盖小民不知上之德教者，由于居乡之日多，到县城之日少，或又不通文义，不能仰会上意。今各乡有约，每月一会，得约正、值月等讲明，心下自无疑团，各知上意，且记善有籍，记过有籍，民固知劝惩，而乐于为善。即异日有司荐举，亦必先察此二籍，必有善而无过，与过而能改者，然后试之以文艺，文艺可观，然后得蒙荐举。如此则不惟荐举本于乡里，善恶无毫发之爽，可绝欺罔清托之弊。而且情文密而壅睦洽，教化明而礼乐兴，道德同而风俗一，人人相勉于善。他年科甲举子之从乡约中历练来者，岂不更有可观者乎？

夫乡约本朝廷所已颁行之典，但联络无方，约束无法，彼此善恶之行不著，友朋规劝之义不行，早晚情谊不关，往来督率无人。甚至山州草县只行之于城而不行之于乡，讲之于官而不遍通于民。不唯善恶无人纠察劝戒，即宣讲亦多不能依期奉行，在官固视为泛常，而民之听之亦或作或辍，有来有不来。况居乡者

多，在城市者少，乡民离远，无人督率，虽有讲宣，如何听见？即如弥天重犯所居，离城市远，县中讲约读法之事，生平并未相逢一次。如所颁圣谕广训及我皇上斟酌取士之法，从前不惟不曾目见，并未曾耳闻。直至近日，伏读皇上圣谕，中间有圣谕广训序文，持以问人方知。从前只晓得圣祖皇帝上谕十六条而已。况乡人中之全不通文理者，如何晓得？似此法亦简单易行，但要责令有司实心奉行。若能天下之大，县县如此奉行，每县之中，到处如此宣讲行习，道德齐礼，其治效岂有极哉！况此規制既成于各县各乡之中，凡有善政善教，皆可照此仪节，遍晓民间。不惟无上行而下不效之患，且君民一体，呼吸竟可相通矣。

弥天重犯山野冥顽，本不知是非可否，但管见及此，不敢不尽情直供。伏祈圣明，取此约全文，详览規制，裁夺可否为幸。

【译文】 我这弥天重犯轻妄地认为当今于科举选拔人才当中，应寻找此乡约全文，切祈求我当今皇上以己睿智圣明，斟酌推敲其损益得失，修订增加时事要求。然后颁行天下，敕令各省督抚大员责命委派所属有关职官，每县根据地域大小远近，多设立约所。不管是读书学子，务农乡民，以及百工商贾，凡是居住在本乡本土的人，都可以他入约。本约集会时，先将本朝圣祖皇帝上谕十六条和当今皇上圣谕广训宣读，然后取出此约章的大纲细目，依照其中所规定的仪节，顺序宣读，并讲解一番。或者同时将本朝历代皇帝圣德神功及前后所颁发的政令，选出其中有关风俗民情的内容，都命令有关职官行文到乡约中明宣读。这是因为寻常百姓不了解朝廷的仁德教化，平时多是待在乡间，到县府城镇走动的机会又很少，有的又不识字，不通文义大理，不能体念领会朝廷意图。如今各乡如设立乡约，每月一次集会，乡民能得到约正、值月等人讲明各种事理，心中自然没有疑团，各人都能知晓明白朝廷和官府的政令意图，并且好事做错分别记载在册，乡民既知对过错进行规劝惩戒，也都乐于争做好事。以后即使有关职官想推行荐举之事，也必然要先察阅这二种文册，选出那些

品行好无过错，或者虽有过错而能改正的人，然后考试他们文化知识，文章达到一定水准，就能被向上举荐。这样就不仅仅荐举从本乡本土开始，对被荐的人好与坏都丝毫不能隐瞒，既可杜绝欺哄弄假相托钻营弊端，而且情文周密而使全乡百姓和睦和谐融洽，道德教育明确而礼乐兴盛，从品德高尚而形成一股良好风气，人人相互勉励为善。他年以后，从乡约中经过锻炼而考中科举的人不就更多了吗？

论说制定乡约本是朝廷已颁布的典章，但因为并没有很好的联络方法，没有严明的约束法纪，彼此是好还是坏都不明显，亲朋好友互相规劝的义理不实能行，邻里之间早晚的情谊互不关连，来往行动没有人督率引导，甚至那些边远山川荒野的州县只推行于城镇，不能推行到乡村，只宣讲于官府而不遍传于庶民，不仅好坏之事没人勉励劝戒，就是宣讲也多不能按期举行。在官府看来，既然是平常之事，而要百姓们所宣讲的时候，也是有人尽管劳作干活，有人辍停，有人来听也有人不来听。况且居住乡村的人多，居住城镇的人少，乡村百姓离得远，没有人督促率领，虽然有人宣讲，又怎么能听见？就像我这弥天重犯所居住的地方，离城镇遥远，县中官府举行讲读约法之事，平生并没有到过一次。如前边所列举的朝廷颁布的圣谕广训斟酌选拔人才的典章制度，从前不但没有见到过，也没有听说过。直至近日，自己伏读皇上圣谕，见中间有圣谕广训的序文，拿着去找别人才问个明白，从前自己只知道圣祖皇帝的上谕十六条而已。何况乡村中一点也不通文理的百姓，又怎么能知道呢？这吕氏乡约看起来也简单易行，但一定要责命有关职官认真执行，如果能使天下的县县都这样执行，每县之中，又能到处如此宣讲实行，道德礼义齐备，其治理的效果岂有穷尽！况且此乡约规制既成立于各县各乡之中，凡是有好的德政教化的举措，都可以依照乡约的仪程礼节，使民间百姓遍能知晓，不仅免除了上行不下效的忧虑，并且君王和百姓全同一体，连呼吸都可相通了。

我这弥天重犯原山野冥顽之人，本不知道事理的对错，但

自己的这些浅陋见解，不敢不尽情快说出来。伏祈我当今圣明皇上，能传诏寻取此乡约全文，详细查阅其规则条目，裁夺可否实行，是最大的幸事啊！

十八、雍正钱发行不久，不能普遍流通，你便造谣“雍正钱，穷半年”，是居何用心？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即观铸钱一事，自癸卯到今六年，尚铸个钱不顺。勉强铸就的，糊糊涂涂，不明不白，民间无人肯受。谣曰：‘雍正钱，穷半年。’若身上有一个雍正钱，即投之沟壑”等语。

制钱为民间日所必需，务宜轻重适均，流通无弊，方于民生有益。钱字画之清楚与否，皆关铜铅之多少，此人人所知者。向年圣祖皇帝时所铸制钱，以铜六铅四搭配，虽钱字画清楚，而铜多于铅，遂有奸民销毁制钱改造器皿者，因而钱价日昂。康熙四十五六年间，每银一两仅可兑钱七八百文。朕在藩邸时，深悉其弊，是以令钱局以铅铜各半搭配鼓铸，使奸民无销毁之利。又严黄铜器皿之禁，方得钱价渐平。今银一两，可兑制钱一千，小民并受其利。其钱字画虽未甚精工，然惟铜铅相半，方能禁止销毁，而制钱可得流通便民，并非吝惜铜斤而多加铅两也。且铸钱由模范而成，其样钱谓之祖钱，轮廓匀厚，字画完整。由祖钱套出，谓之母钱，即逊于祖钱。再由母钱套出，是谓铸钱，今民间日用之官钱也。较之祖钱，更不逮矣。盖即一板之内，所铸二枚之钱，下沉者必重，在中者适均，在上者必轻，而字画亦因之而不能一式完美。此从来铸钱皆然，非独今日之雍正钱为然也。

乃曾静不知钱法，信狂妄之说，遂肆讥议，任意蛊惑咒诅，何殊昏梦中之呓语乎！至云投之沟壑，尤为可笑。民间所有之钱，必以银两兑易而来，岂有以银易之物而委之沟壑乎！至于贸

易之人，当其受钱之时，必细视钱文而后交易，若以雍正钱为不祥之物，孰肯收受！况既以货物售卖，人虽至愚，孰肯以银与货物换得之钱而轻弃之沟壑也！今直省内外，果不肯用雍正钱文乎？即如曾静之家，至为贫薄，然囊篋中亦必有制钱收贮，然后可以易米买薪，何以不投而弃之乎？

江南地方，因雍正钱文尚少，元年、二年间，有以旧钱十文易一雍正钱以为宝玩者。其重雍正钱文何以又如此？向湖南之人情与江南迥别乎？至于铸钱未能流通普遍，此则事理之常，明而易见者。圣祖皇帝在位六十余年，康熙铸钱尚有流行未到之处。又如广东高、雷、廉等府，至今尚用宋时旧钱，并元、明代之钱亦流通未至。自雍正元年以来，甫及七年，所铸钱文，欲令遍及天下并荒僻之处，亦有是理乎！曾静所闻谣言，确系何人传说？曾静果否亲见投钱沟壑之人？其人系何姓名？确在何处？可据实供来。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了“即使看铸钱这件事，自癸卯到如今六年之间，尚且铸个制钱都不顺利。勉强铸造出来的，也是糊里糊涂，不明不白，民间没有人肯接受。民谣说：‘雍正钱，穷半年。’若是身上有一个雍正钱，便即刻投扔到沟壑里去”等言语。

制钱是民间日用所必需之物，务必应当轻重均匀适宜。只有流通交换顺畅，才对百姓的生活有益处。制钱上边的文字图案是否清楚，都与铜铅含量的比例多少有关。这是人人知道的事理。当年圣祖皇帝时所铸造的制钱，以铜六铅四的比例搭配，因此制钱的价格日益升涨。康熙四十五六年间，每一两白银仅可总换七八百文制钱，我在雍亲王府邸时，就深深知道它的弊端。因此后来命钱局以铜铅各半搭配铸造，使得奸民无法销毁取铜获利，而后再严令禁止制作黄铜器皿，才使得制钱价格渐渐平抑。如今一两白银，可兑换制钱一千文，百姓平民都得到了好处。这些制钱的文字图案虽然不是很精细工整，然而只有铜铅各半搭配，才能

禁止乱加销毁，而使制钱能够流通便民。并不是为了吝惜铜斤而多搭配增加铅两的。况且铸造制钱先要制作模型，其样钱便是祖钱，轮廓形状均匀厚薄，字面图案完整清晰。从祖钱套模制出的，就是母钱，已经比祖钱稍差一些了。再从母钱套模制出的，叫做铸钱，是当今民间日常所用的官方发行的制钱。其质量如果与祖钱比较，就更不如了。哪怕是在一块铸板之内，所铸造的二枚制钱最下边的一枚肯定稍重，中间一枚适宜均匀，上边那一枚就稍轻了，而字面图案也因此不能一样的完美、清晰。这是历来铸造制钱都一样的道理，并不是只有今日的雍正制钱是这样的。

像这曾静，并不懂得铸钱之法，轻信狂妄荒谬的传言，便大肆讥讽议毁，任意蛊惑咒诅，何不同于昏睡中的呓语呢！至于说要投掷于沟壑，更加可笑。民间所有的制钱，必然是用银两兑换而来，难道能有把银两易换的东西而投掷于沟壑中去的吗？至于做买卖的商贩，当他接受制钱的时候，必然是认真仔细的点看钱文后再交易货物，若是认为雍正钱是不祥之物，谁肯接受！况且既然已经售卖出货物，人就是再愚蠢，谁又肯把货物换来的制钱轻易地抛弃到沟壑中去呢！如今直隶省内外果然不肯用雍正钱文吗？再如曾静的家庭，虽然很是贫寒，然而箱柜中也必定存有制钱，以用来换米买柴，为什么不投弃它呢？

江南地方，因为雍正制钱发行得还有些少，雍正元年、二年间，曾经有用十文旧制钱易换一枚雍正制钱作为宝玩的事情。他们又为何如此看重雍正制钱呢？为何你湖南的人情世故就与江南不同呢？至于铸造的制钱不能普遍流通，这也是很正常的事理，明显经常可以看到的。圣祖皇帝在位六十余年，康熙制钱尚且有流通不到的地方。又如广东的高、雷、廉等府，到现在还在使用宋朝时的旧钱，连元朝、明朝的制钱也没有流通到那里。从雍正元年以来，不到七年的时间，朝廷制造的铸钱，便想让它遍及天下并且荒僻的地方，也有这样的道理吗？曾静所听到的谣言，是什么人传说的？曾静果然亲眼见到过将制钱投掷到沟壑中的人没有？其人名叫什么？现在何处？可据实招出来。

【原文】 曾静供：此等狂悖说话，弥天重犯当时无知，听得人言如此，遂不穷究其事理，信以为实，随手写记放在纸上。其实到今日看来，无论人言己言，皆该杀该刚，尚有何说分解得！盖缘弥天重犯所住之地离城市远，无交易买卖，即间有买卖，亦是用稻谷，不惟不使钱，竟少有用银子。穷民无所出息，亦无处交易得银子，所用者只有谷耳。惟富户积得稻谷多，方以谷去卖得银子用。至若钱，则无论康熙钱、雍正钱，皆未用。皇上御极之初，雍正元年、二年、三年，雍正钱流通未遍楚疆。弥天重犯彼时心下常想求雍正钱一看，以为此是新天子的通宝，以此去问人，而人间有自城市中来者，遂妄传以为雍正钱铸不成。后又逾年，心下实要想求雍正钱看而不可得，又去随便问人，谣传遂以为如今新皇帝因铸钱不成，杀了几多铸匠。弥天重犯此话固不肯信，然无奈乡愚小民，不通钱法，每多如是说。后弥天重犯偶得一二雍正钱，细验其钱文字画，果不十分清楚。先疑以为模范新制，恐是初铸，所以未甚精工，后来再看，亦复如是。那会雍正钱少，到街市上用康熙钱熟识，又见得雍正钱文字画不完美，不知从何处遂造出这个谣言来。无知小民听得此言，遍传于乡里，弥天重犯心中渐次受了谣言悖论之毒，又加以不通钱法，解这钱文字画不清楚的缘故不出，遂不察而信以为实。直至雍正六年春，狂悖将萌，竟把此事做一个验证。

其实到今日伏读我皇上旨意，方晓得钱文字画之清楚与否，原关铜铅之多少。康熙钱文字画清楚者，由于铜六铅四，铜多于铅；雍正钱文字画未甚精工者，由于铅铜各半。其铜多于铅，则致奸民销毁制钱，改造器皿，而钱价日昂；其铜铅各半，则奸民无销毁之利，而制钱可得流通便民。细思到此，全是我皇上一段爱民苦心，经天纬地的学问，方能鉴别物理之所以然，察照民间之积弊，直从源头整理下来，此岂寻常之智虑所能窥测万一！况钱有祖钱、母钱、铸钱，即一板之内，所铸二枝之钱，下沉者必重，在中者适均，在上者必轻，而字画亦因之不能一式完美。小民不知其由，竟以钱文字画未甚精工，遂从此妄生议论。而弥天

重犯不知钱法，亦妄信而附和之，万死万劓，自如何辞！

但念小民虽顽，天性亦难泯绝，未有不知爱戴君亲者。其所以狂悖如此者，实由于心中无知，不知圣天子之德意。其所以不知圣天子之德意者，又由于宣传之未遍。即如我皇上禁取黄铜一事，弥天重犯耳闻，亦有几多说话。山野无知，不解取铜禁铜之故，甚有谓我皇上欲取尽中国之铜，解往满州地方，熔铸以为宫殿者。弥天重犯虽心知谬传，然亦无话可解答。离县城远，未见衙门所张挂告示如何说，在外只有取铜禁铜之令，中间并未说出取铜禁铜之由。小民无知，焉得不妄生拟议！拟议出于一二人之口，传者遂遍递于千百人之耳。直至今日伏读圣谕，方晓得禁铜为防奸民销毁制钱，改造器皿，钱价日昂；禁铜不用，则钱无所毁，而价可渐平，民得利用。是我皇上几多深仁厚泽，为民善政：远鄙百姓，皆为心中不知，糊涂浪过。此弥天重犯前供乡约内，所以说到朝廷所颁政令。凡有关于风教民事者，须要在乡约中宣示，正为此类也。至若谓投之沟壑。从前不深究其事理，遂误所以为果有是说。今得明旨，反复推勘，而复心下思索，不惟信得无是理，且天地间并无是事，何其诞妄一至于此极耶！

【译文】 曾静供：这些荒唐的言语，都是因为我这弥天重犯当时浅陋无知，听到人们传说是这样，也不推究其是否符合事理：就信以为真，随手记写成了文字。其实在今日看来，无论是别人说了或是自己讲了这些荒谬言论，都是该杀该劓，还有什么话值得辨说解释得呢！我这弥天重犯所居住的地方离城镇非常远，没有商贩进行交易买卖，即使偶尔有些小买小卖，也是用稻谷交换，不但不用制钱，竟也很少有用银两的。这是由于山村贫困的农户没有什么出息，也没有地方能交易得银两，所能交易的仅有稻谷而已。只有富户积聚的稻谷多，才能把稻谷运到城镇卖得银两来用。至于制钱，则无论是康熙钱、雍正钱，都没用过。皇上即位之初，即雍正元年、二年、三年时，雍正制钱发行流通尚没有到达楚湘地区。我当时心中常想找一枚雍正钱看看，认为它是

新天子发行的通宝，可是以此话问别人，有来自城市的人却妄说雍正制钱铸造不成。又过了一年，自己心中生有非看看雍正钱不可的念头，又去随便找人询问，市人中间传言说是如今新皇帝因为新钱铸造不成，已经杀了不少铸造工匠。我固然不肯相信这些话，然而无奈乡村愚昧的小民百姓，不懂的钱法，大多都是这样传说。后来我又偶然得到一二枚雍正制钱，仔细验看其文字图案，果然不是很清楚。先时心中怀疑这是新制作的模型，由于初期铸造，所以不是很精细工整，后来再看，也都是这样。那时雍正钱发行的少，人们到街市上用康熙钱习惯了，又见这雍正钱文字图案不精细完美，便不知从何处造出了这个谣言来。无知的百姓听到这些谣言，遍传于四方乡里，我这滔天重犯心中渐渐受到这些狂妄荒谬谣言的毒害；加上自己又不懂钱法，解释不出雍正钱文字图案不清楚的缘故，便不去明察而信以为真。直到雍正六年的春天，自己狂妄逆乱之心将要萌生，竟然把此事做为一件例证。

其实到今日伏读我现代皇上谕旨，才明白制钱的文字图案是否清楚，原来与铜铅的搭配比例有关。康熙制钱文字图案清楚，是由于搭配铜六成铅四成，铜量多于铅量，雍正制钱文字图案不是很清楚，是由于铜铅各搭配一半铸造。制钱中铜的含量多于铅量，就会造成世间奸民将制钱销毁取铜，改制黄铜器皿售卖获利，从而使制钱的价格日益升涨。制钱中铜与铅的含量各半，奸民便不能销毁获利，而制钱也就可以流通便利百姓使用了，细细到这里，全是我当今皇上的一段爱民苦心，只有经天纬地的学问，才能鉴别出事物道理的所在，明察出民间积之已久的弊端，直接从源头上规整下来、以平常人的智虑岂能窥测到其中的万分之一！况且制钱有祖钱、母钱、铸钱之分，即使是一板之内，所铸造的二枝钱，最下边的一枚必然稍重，中间一枚适宜均匀，上边那一枚就必然稍轻，而文字图案也因此就不能一样完美了。百姓们不知道这个原由，竟然以制钱的文字图案不很精细工整而轻妄地生出各种议论。我这弥天重犯不懂得钱法，也轻易地相信并

且附合这些议论，即使万死万刖，自己知道又有什么可说的！

但是体念百姓虽然愚笨，天性也难泯灭绝尽，没有不知道拥戴皇上的。他们之所以狂妄荒谬到这等地步，实在是由于心中愚昧无识，不知道当今皇上的恩德意愿。他们之所以不知道当今皇上的恩德意愿，就是由于宣传的不够普遍，比如我当今皇上诏谕禁取黄铜一事，我听见的便有几种说法。山野村夫浅陋无知，不了解取铜禁铜的原因，乱加议论，甚至有人说我当今皇上想取尽中原地区的黄铜，运往满洲关外，熔炼铸造宫殿。我心中虽知道这是谣言，然而也无话可解答清楚。离县城较远的人，没有见过衙门张贴的告示是怎么说的。另外，只颁有取铜禁铜之令，文告中并未说明取铜禁铜的原因。小民百姓无知，岂能不乱发议论！虽然议论出自于一二个人的口中，可传话者遂即就传遍于千百人的耳中。直到现在伏读圣谕，才知道这禁铜的原因是由于奸民销毁制钱，取铜改铸各种器皿，造成制钱价格日益升涨。禁止铜器不用，制钱就不会被毁，而价格也可以逐渐平抑，便利百姓流通使用。这是我当今皇上深厚的仁德恩泽，一心为民利民的善政之举，可边远鄙野的平民百姓，却都因为心中不知道，竟糊里糊涂浪费时日而过。我以前供词中讲到乡约时，所以说到朝廷颁布政令，凡是有关风化教育百姓的事情，须要在乡约中宣告，正是为了解决这类朝廷政令不能宣传普及之事。至于所谓将制钱投弃于沟壑的说法，从前没能深究其中道理，便误听认为果有此事，今伏读皇上明旨，心中反复推勘思索，自己不仅相信的确没有道理，而且天地间也不会有这样的事。谁会至于荒诞轻妄到如此地步呢？

【原文】 总之，愚民类多无知而悖谬，实非有心以肆妄。况毁谤讥议出于小民无知者之口，本无损于圣天子明德，而御极初年之毁谤，尤是以圣德神功之远大。盖有非常之主，必有非常人所得知之猷谋。众见未尝不惊，不知者未尝不疑，惊疑交集。此谤之所由生也。是以帝尧承帝喾之后，自唐侯而陟践帝位，始三年

而谤作，又三年而颂兴，又三年而谤颂悉泯，乃得“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况我皇上初潜之时，韬光养晦，无求无欲，只尽己性分之当然，并未尝稍露一毫声光于人间。龙德中正，不惟非天下所得知，并非在廷诸臣所能识。惟我圣祖皇帝聪明未纵，本父子之亲，以圣知圣。早知我皇上天稟贵重，蕴蓄美富，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然亦只以是存之于心，而不肯扬之于众。直至圣躬不豫，委以南郊大礼，方知我皇上圣德神谋久为圣祖皇帝所深契。所以当我皇上御极之初，一切政治，经天纬地，天下莫能仰测高厚之所以然，加以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奸谋，散布流言于山陬海隅，小民无知误听而起疑生谤者。以今看来，实属理势之所必至。

如此等说钱的话，亦是二年、三年事，到雍正五年、六年来，实无人如此说。今若究问传说的姓名，此是深入多愚，只听人如此说，亦依口学舌如此说，原是不识不知，随声妄和，今日如何记得哪一人说？指得哪一人姓名出？在弥天重犯固冥顽无知，然尚稍识得一两个字，稍通得丝毫义理，且不免以讹承讹，传妄踵妄，按其罪过，该杀该剐。其实在今日就杀就剐，浑身寸磔，亦抵当弥天重犯许多罪过不得；况蚩蚩之众，较弥天重犯之无知更甚乎！我皇上德量同天，明睿并日，今日实是弥天重犯万死万剐罪不容逭。其余传说，同在覆冒涵育之内者，惟愚矜之恤之，悯念小民之无知陷罪而已，如何妄扯得别人！

【译文】 总之，百姓们是由于愚昧无知而轻妄荒谬乱加议论，并非故意肆意毁谤朝廷，况且这些毁谤讥议出于平民百姓愚昧无知之人口中，根本无损于当今皇上的圣贤明德，而皇上即位初年的毁谤议论，更足以显现皇上圣德神功的远大。凡是有超常的圣贤出世，他必然具备有超常的雄才大略，宏渠远虑。众人见了不得不惊奇，不理解的人不能不疑惑，惊奇疑惑交集，毁谤便由此产生了，所以，帝尧继承帝喾之后，由唐侯高登帝王之位，初始三年，谤言毁议大作；又过三年，歌功颂德之辞兴起；再过三

年，谤言和颂辞全都止息，才有“不了解不知道，依顺在帝王旁边”的说法。何况我皇上过去潜龙之时，韬光养晦，没有过分的追求和欲望，只是尽自己性理分内当然之责，并没有稍微露出一声光锋芒于人中。卓越的才能和品行，不仅天下百姓们不知道，连朝中的诸位大臣也不了解，只有我圣祖皇帝秉承天命。智慧超群，与当今皇上本是父子之亲情，自然是圣明了解圣明。早知我当今皇上天赋圣体贵重，内心义礼蕴蓄丰厚，又睿智聪明，有远见卓识，足能承担君临天下之大位，然而也只是存念于内心，而不肯轻易张扬于众人。直到圣祖皇帝龙体欠安，委托我当今皇上代行南郊祭天大礼，世人才知道我当今皇上的圣德神谋久已投合圣祖皇帝的心意而深受器重。因此我当今皇上登临皇位之初，一切政令治举，经天纬地，世间没有人能观测出深厚高低之所以然，加上阿其那、塞思黑等乱臣贼子久蓄逆反奸谋，散布谣言蜚语于山隅海疆，平民百姓愚昧无知，误听谣言，心中起疑而妄生谤毁议论，今天看来，也是属于事理所必然的结果。

像这议论制钱的流言，也是雍正二年、三年间的事情，到雍正五年、六年以来，已经没有人这样说了。如今若是究问传说人的姓名，这都是些泛泛的乡中愚昧百姓，只是听到人们这样传说，也跟着学舌说嘴。原来就是不了解不知道，随声附和而已，今日怎么能记得哪一个人说的？又怎能指出哪一个人的姓名？像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虽然冥顽无知，但是也稍稍识得几个字，稍微通得一点义理，何况免不了误信人言，以讹传讹，按所犯的罪行，是该杀该剐。其实在今天就杀就剐，浑身受寸磔之刑，也抵偿不了我的许多罪过，何况世间那些熙攘忙乱的众多寻常百姓。比我更加愚昧无知呢？我当今皇上德量齐天一样广大，明睿同太阳一样光亮，今日确实是我弥天重犯万死万剐罪难推诿，其他传说议论的人，都是在皇上圣恩覆盖涵育之内的平民百姓，只有恳求皇上广施大恩，怜恤惻念百姓的无知陷罪而已，又怎敢随意扯进别人！

十九、为什么山西百姓争先恐后为国效力，忠诚爱戴朝廷，而湖南竟有你这样猖狂悖逆之徒？

【原文】 奉上谕：据山西巡抚石麟奏称：“晋省绅士百姓，愿将军需应用之驼屨、苦毡、绳索三万副，从本地自备车骡运送，至归化城交收。臣等遵旨，令地方官给价雇送。而各属士民、挽车策骡，争先装载，给以脚价，感激涕零，稽首称谢，不肯领取。急公效力，旷古所稀”等语。着将此折令杭奕禄发与曾静看，并讯问曾静：湖南、山西同在戴天履地之中。何以山西之民踊跃急公，忠诚爱戴，实能视朕为后；而湖南之民，乃有猖狂悖逆、肆恶扰乱之徒如曾静等，至于视朕如仇？此朕所不解。着讯取曾静口供具奏。

曾静供：弥天重犯稟性愚顽，不知天高地厚。然圣人在上，恩深德大，感化到至处，虽木石亦知倾向起舞。是以数月以来，感恩被化之深，白昼对人。虽是无言可以称述，然梦寐恍惚，对人言及皇恩圣德，惊惶感泣，几次流涕痛号至醒，犹有不能自止者。以是知秉彝之良，原未尝尽绝，特从前偶为外诱浮言所惑乱，不知圣德高深万一之所致，非本性与人异也。

今蒙恩旨，以山西巡抚所奏，奉旨动用正项钱粮，制造骆驼绳屨等以备军需。抚臣遵旨，动银给发通省。而通省士民咸称我皇上宵旰勤民，爱养百姓，直如赤子，安享升平。无以为报，情愿自备骡车，各从本地运送，期效犬马之劳，感激涕零；稽首称谢，不肯领受脚价折奏等情，命弥天重犯阅看。

弥天重犯因思君臣一伦，至大至重，分虽有尊卑之别，情实同父子之亲，本于天命之自然，无物不有，无时不在，通古今，遍四海而未尝有异也。民之乖戾，不供顺其上，因是民之无良，然亦半由在上者不以民为子，或子焉而德惠偶有未洽于民，或及民而有司不能宣扬上意，以致民或不能以君为后，即或后戴其

君，而不能至诚赤忠，实尽我赤子之道者，往往有之。若能以民为子，食思民饥而为之谋其饱，衣思民寒而为之谋其暖，痲痺一体，每念不忘其民。则君民一体，民自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不敢恤其力。虽赴汤蹈火，亦不肯避矣。然此虽有其理，从古未见有其事，不惟汉、唐、宋、明如文景、贞观、熙宁极盛之时所无，即三代邕隆之世，亦所少见。惟文王上承十五王之积累，下开八百年之太平，太和融洽，至德深仁，沦肌浃髓，见于经者，方有“庶民子来”之事。不然，以尧舜之德，亦难期此圣神功化之极救也。

今我皇上子惠元元，时时刻刻以爱养抚绥为念，至德深仁，无隐不入，无处不到。所以天和萃聚，丰稔频登，民心爱戴，顶踵思捐，以期踊跃争先报效万一者，将遍宇内而皆然矣。何况山西省近京都，感德被化，尤为最先而更亲者乎！惟有湖南隔远，民习又夙浇漓，加以奸党犯罪充发广西，往来通衢，布散流言，传闻道左。致使圣德声称，湮郁未洽，然到今云开日丽，快爽欢欣，輿情谅是不同寻常爱戴。况我皇上治化，已几刑措而道德齐礼之教，犹时疹念远方，已蒙差使往湖南观风整俗矣。

今又蒙思旨，着弥天重犯往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听用。弥天重犯虽愚陋不堪，然数月以来，被我皇上德教，耳闻目见京都风景，亦颇粗知圣教之万一。纵不能有所赞助裨补于观风整俗使之前，然以当身所感我皇上之德，被我皇上之恩，尽心竭力，以直道实，逢人说项，亦得期赎重罪之毫末。但念犯罪蝼蚁，自揣不足职信于人。所赖者，惟我皇上大德至诚，既可感召天和，屡奏成效，必能孚及豕鱼，而四方风动，从欲以治。自是家喻户晓，人人咸思尊君亲上，民情必不减山西爱戴之隆矣。

【译文】 奉皇上谕旨：据山西巡抚石麟奏折中所说的“山西省的士绅百姓，愿将军队所需用的驼屨、苦毡、绳索三万副，从当地自备车马运送，到塞外归化城交收。臣等遵昭皇上谕旨，命令地方官支付雇运的费用。而各地所属的士民百姓，拉着车，赶着

骡马，争先装载军品。官府给他们脚力银钱，却都是感激涕零，跪拜地下，拱手称谢，不肯领取。众人争取为国家效力的热情，真是自古以来所少见”等言语。让将此奏折命抗奕禄抄给曾静观看，并要讯问他：湖南、山西同在本朝天覆地载之中，为何山西的民众踊跃争先为国效力，忠诚爱戴朝廷，能把我看成是他们的君主，而湖南的百姓竟有猖狂悖逆、肆意恶毒谋乱之徒像曾静等人一样，达到了把我视为仇敌的地步，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事情，命讯问取回曾静的口供报奏上来。

曾静供：我这滔天重犯生性愚顽无知，不知天高地厚。然而圣贤在上，恩德深远光大，感化到至深之处，虽然是草木山石也知欣然倾向起舞。因此，数月以来，感戴皇恩教化深切，白天对人们无法用言语叙说，可是到夜间睡梦之中恍恍惚惚对人谈及皇恩圣德，惊惶感泣，几次是痛哭流涕直到醒来还不能止息。从这些就可以知道自己遵循常理的天良，并没有绝尽，仅仅是从前偶然被外边的浮言流语引诱惑乱，连当今皇上万分之一高远深厚的圣德都不了解造成的，并不是自己的本性与常人有什么不同。

今日蒙读皇上恩旨，言说山西巡抚所奏，奉皇上谕旨动用国库钱粮，制造骆驼绳屨等物品以备军需所需。抚臣遵从旨意，拨出银两发放到全省。而全省的士坤百姓都称颂我皇上日夜操劳，勤政为民。抚爱百姓如孩子一般，使其安居乐业，得享太平，百姓无法报答皇恩，情愿自备车马，各从当地运送至塞外营中，以向朝廷报效犬马之劳。并且还都是感激涕零，跪拜在地，拱手道谢，不肯领取官府发放的运费等折奏的情况，令我阅看。

我这弥天重犯想，君臣这一伦常，至为重大要紧，虽然有尊卑的分别，实际情同父子之亲。这本来就是天命自然的所在，没有什么事物不舍此情，没有什么时间不存此理，贯通古今，遍传四海而未曾有什么不同的。百姓违背常理，不供奉顺从自己的君王，固然是百姓的不对，但是也有一半的原因是由于在上的君王不能把百姓视为自己的子民，或者视为自己的子民，但偶然又有德惠施予不到的地方，或者施予百姓德惠，但下层职官们又不能

完整宣扬君王的意愿，以至于百姓们有的不把帝王看成自己的君主，即使有的拥戴帝王为自己的君主，而又不能至诚忠义，尽我赤子百姓的道义纲常，这样的事往往是有的。如果能把百姓视为自己的子民，饮食时思虑百姓的饥苦而能为他们谋取饱腹，穿衣时思虑百姓的寒冷而能为他们谋取温暖，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中，每时念念不忘，那么君民如同一体，百姓自然不敢爱惜自己身体，不敢吝啬自己的财产，不敢保留自己的体力，虽然是赴汤蹈火，也不肯回避了。这些话虽然深有道理，可从古至今，却没有见过这种事情。不只是汉朝、唐朝、宋朝、明朝，如文景、贞观、熙宁等极盛时代没有，就是夏、商、周三代极为隆盛之世，也很少见。只有周文王上承十五位君王的积累，下开八百年周朝太平盛世，太和融洽，其至高深厚的德行仁义，浸浃于百姓的肌肤和骨髓，后来被记载于经书之中，才有了“庶民百姓像子弟一样而来”的说法。不然，即使具有唐尧、虞舜的德行，也难达到这样圣神功化的最大收效。

现在，我皇上爱抚庶民百姓如子弟，时时刻刻以爱养抚绥为念，至高深厚的德行仁义，没有任何隐僻的地方不能浸润到达。所以上天和气萃聚，五谷频频丰登，百姓倾心拥戴，愿献纳全部身心，希望能踊跃争先报效朝廷万分之一思德的人和事，将遍布华夏大地而都是一样了。况且山西省邻近京都，感于圣德，广受教化，尤为最先而更亲近的呢！只有湖南山隔路远，百姓风气习惯又浇薄强悍，加上奸贼乱党获罪发配往广西，往来经过湖南通衢要道，传播流言传闻于路旁道左。致使皇上圣明贤德的声名，塞阻不能遍广流传，然而到今天已是云开日丽，快爽欢欣，众人爱戴我皇上的心情大约已不同往常。何况我皇上治理教化，已经几次搁置刑法不用而施教以道德礼义，还时时辗转思念远方臣民，已诏谕差使官员前往湖南观风整俗了。

而今又蒙受恩旨，让我前往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听差使用。我这弥天重犯虽说是愚陋不堪，然而数月以来，受我皇上圣德教化，耳闻目睹京城中的风光事物，也粗略地了解了皇上圣教义旨

的万分之一。纵然不能赞助补益于观风整俗使之前，但是一定要用自身所感戴我皇上的大德，披受我皇上的洪恩这件事例，尽心竭力，将事实真情，逢人便讲叙，也希望能够抵销自己所犯重罪中的点滴一二了。但想到自己是身获重罪的蝼蚁之人，自己猜想所讲的话不能取信于人。所依赖的，只有我当今皇上的至诚大德，既然其可以感动上天，屡奏成效，也必然能将信诚施与猪鱼之类，一旦四方闻风而动，立即予以大加治理。从此，自然是家喻户晓，人人都心想的是尊奉亲近皇上，民情必然不会逊色于像山西那样爱戴朝廷的盛况了。

二十、有人诬蔑你的父亲有盗窃的劣迹，母亲有淫乱的行为，你能不加审查便将父母唾骂一番，甚至著书立说到处宣扬吗？

【原文】 奉旨讯问曾静：你看了山西巡抚石麟奏折，供称“君臣一伦，情同父子，四海未尝有异，湖南民习浇漓，奸党犯罪，充发广西，往来通衢，布散流言，致使圣德声称，湮郁未治”等语。

夫“扶我则后，虐我则仇”，古有是语，朕于普天之下，一视同仁，湖南、山西之民，固皆抚之如子也。山西民俗醇良，感召天和，连年丰稔，无待朕之大加恩泽。湖南民俗浇悍，乖戾之气，上干天谴，以致浸间作，荒歉屡告。朕叠沛恩膏，所以子惠而抚绥者，不一而足，尚不得为抚我之后乎！

朕揣山西之民，所以趋事赴功者，盖因圣祖仁皇帝六十余年深仁厚泽，浃髓沦肌，是以一遇国家公事，即输诚效力，踊跃争先，如此肫切。试问湖南之民，独不受圣祖六十余年之恩泽乎！即据曾静前供，圣祖宾天之时，亦尝哭泣尽哀，持服拜祭。夫既感圣祖之深恩，顾不念及朕躬乎！

人情于亲戚朋友，素相契厚者，或闻其子孙有过失，则必曲

为之掩护；或闻其子孙被谤议，则必力为之辨白。况于君臣之间乎！伊之于朕躬，万无忍于排斥之理，况以毫无影响之流言，不察真伪而便肆为诬蔑，敢行悖逆，尚得谓有人心者乎！伊既知君臣之伦，情同父子，今有人诬曾静之父有盗名，捏其母有淫行，曾静闻之，忍不与之辩乎？忍不察其言之虚实乎？抑不问其虚实，遽将其父母丑诋唾骂，且著书立说以扬播之乎！

伊称往来奸党布散流言，被其煽惑。夫奸党充发往来之所，不止湖南一省也，即山西地方岂无此等逆党之流言！乃从无一人被其摇惑煽动者。独湖南奸民如曾静之辈，一闻奸徒之蜚语，即起叛逆之心，谓非其性与人殊者乎！

且“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之语，亦非正论。夫君臣、父子皆生民之大伦，父虽不慈其子，子不可不顾其亲；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戴其后。所谓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者，在人君以此自警则可耳，若良民必不忍存是心，唯奸民乃是以借其口。然人虽甚无良，亦断无有以抚为虐者，朕于湖广已实尽其抚民之道，而不意曾静辈犹视朕如仇也。至曾静蛊惑于华夷之辨，此盖因昔之历代人君，不能使中外一统，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见耳。

朕读洪武宝训，见明太祖时时以防民防边为念。盖明太祖本以元末奸民起事，恐人袭其故智，故汲汲以防民奸；其威德不足以抚有蒙古之众，故兢兢以防边患。然终明之世，屡受蒙古之侵扰，费数万万之生民膏血，中国为之疲敝。而亡明者，即流民李自成也。

自古圣人感人之道，惟有一诚，若存笼络防范之见，即非诚也。我以不诚待之，人亦以不诚应之，此一定之情理。是以明代之君，先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视为一体，又何以得心悦诚服之效！先有畏惧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统之规！虽当时蒙古之人，亦有人中国者，然皆闲散不足数之辈耳。若因此遂谓蒙古之人臣服于中国，则当时中国之人，亦有人蒙古者，是中国亦曾臣服于蒙古矣。

至于我朝兴自东海，本非蒙古，向使明代之君果能以至诚之

道，统御万方，使我朝倾心归往，则我朝入中国而代之，亦无解于篡窃之名矣。乃我朝自太祖、太宗以来，浸昌浸炽；明代自万历、天启而后，浸微浸熄。明代久已非我朝之敌，彼自失天下于流民，上天眷佑我朝为中国主。世祖君临万邦，圣祖重熙累洽，合蒙古、中国一统之盛，并东南极边番彝诸部俱归版图，是从古中国之疆域，至今日而开廓。凡属生民皆当庆幸者，尚何中外，华夷之可言哉！曾静有何辨说？据实逐一供来。钦此。

【译文】 奉皇上谕旨讯问曾静：你看了山西巡抚石麟的奏折后，供词中说了“君与臣之间的伦理关系，情深犹如父子一般，四海天下没有不同的。湖南百姓习性强悍，乱贼奸党犯罪被充发广西，往来经过湖南通衢要道，散播流言蜚语，造成朝廷圣德声名阻塞郁结，不能遍布沾润”等言语。

所谓“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古时候就有这样的说法。朕对于普天之下的臣民，一视同仁，湖南、山西的庶民百姓，本来都是抚爱亲如子女一般。山西省百姓民俗醇厚善良，感动上天理气相和，连年五谷丰登，不需朕再多施恩德。湖南百姓习性浇薄强悍，乖张怨嗟之气，干冒上天而被谴责，招致灾患常常发作，荒歉屡屡降临。朕多次施加恩泽，像子女一样安抚的百姓，不可尽举，还不能把朕视为抚爱自己的君王吗？

朕揣量山西省的百姓，所以争先起赴官府公差，是因为圣祖皇帝六十余年的深仁厚泽，已浸润于骨髓、肌肤之中，所以，一遇国家公事，都是献纳忠心，竭诚效力，踊跃争先，如此忠诚恳切。试问湖南的庶民百姓，就独自不曾蒙受圣祖皇帝六十余年的恩泽吗！即使根据曾静前番供词中所述，圣祖皇帝归天之时，也曾经哭泣悲哀，持丧服跪拜祭奠。那么，既感念圣祖皇帝的深恩厚德，能不顾念到朕的身上吗！

世间人情在亲戚朋友之间，平常是相互投契，而情义深厚，有的闻知其亲朋的子孙犯了过失，就必然曲意为他遮掩袒护；有

的闻知其亲朋的子孙被人诋毁议论。就必然全力为他辨白解说。何况是君与臣之间的关系呢！你对于朕，绝对没有忍心于指责贬斥的道理，更何况是听了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没有察辨真假便肆意诬蔑、毁谤，竟敢妄行悖逆之事，还能说有人的良心吗！你既然知道君臣之间的伦理纲常，情深如父子关系，如今假使有人诬蔑曾静的父亲有盗窃的行为，有人捏造其母亲有淫秽的行为，曾静闻知后，能忍心不与他们辨说吗？能忍心不去察问流言的虚实真伪吗？或者是不察问其事的虚实，便将自己的父母亲诋毁唾骂一番，并且著书立说到处传扬吗？

你说自己被往来湖南的乱贼奸党所散布的流言蜚语煽诱迷惑，可奸党乱贼发配往来的地方，不仅是湖南一省，即使是山西地方，岂能没有这等逆贼奸党的语言！但却从没有一个人被他们煽诱迷惑的，独有湖南的奸民如曾静之流，一听到乱贼奸党的流言蜚语，立即萌生叛逆之心，莫非其理性与常人不同吗？

并且所谓的“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这种说法，也非正确的理论。君与臣、父与子的关系都是世间生民中大的伦理纲常，父亲虽然不慈爱自己的儿子，儿子不能不孝顺自己的父亲；君王即使不能抚爱自己的臣民，臣民不能不拥戴自己的君王。所谓“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这句话对于做君王的来说，以此自警自律就可以了。若是良善的百姓，肯定不忍心存有这个想法，只有奸民才可能把它作为借口。然而世人再有不良善者，也断然不会有将抚绥作为虐害的。我对湖广等地已尽了抚爱化育的心愿，而不料想曾静之流竟象仇敌一样看待我。至于曾静被中原和边远夷狄各民族的辨别之说所诱惑，是因为往昔历代的君王，不能使中原和夷狄统一为一体，而自作这个区域那个地界的浅薄见解罢了。

我曾读明代洪武皇帝的训典，见明太祖时时以防护百姓、防护边患为自己的心念。由于明太祖本是元朝末年由奸民起事而兴盛的，心中唯恐有人沿袭自己的老计谋，所以急切于防护奸民；由于明太祖声威德望不能安抚蒙古部众，便小心谨慎防护于边

患。然而明朝末年，多次遭到蒙古侵扰，耗费了数万万民间的财富，全国为此疲敝不堪，但灭亡明朝的，是流民李自成。

自古圣贤之人感化别人的做法，只有一个诚字，如果存有笼络和防范之心，便是没有诚意。我既然以不诚对待别人，别人也以不诚回应于我，这是必然的情理。就以明朝的君王来说，先存有猜疑臣民之心，而不能视君王与臣民为一体，又怎能得到臣民心悦诚服的收效呢！先怀有畏惧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中原和近远各个少数民族为一家，又怎么能形成中原内外一统的规制呢！虽然当时蒙古人也有来到中原的，但都是些不值一提的闲散之辈而已。如果因此便说蒙古人臣服于中原，那么当时中原之人，也有前往蒙古的，是中原人也曾经臣服于蒙古了。

至于我朝，兴起于辽东海隅，本不是蒙古部族。假若过去明朝君王能以精诚至信的准则，统御天下，使我朝倾心归往，那么我朝入主中原而代之，也不会被理解为篡夺窃位的恶名了。我朝自太祖、太宗以来，愈益昌明炽盛；明朝自万历、天启以后，却是愈加微弱熄灭。明朝早已不是我朝之敌，它自失天下于流民，是上天保佑我朝成为华夏君主。世祖皇帝君临万千邦国，圣祖皇帝累世升平昌盛，合蒙古、中原成为一统之国体，并东南极边远的番彝各部族都收归版图之内。自古以来，华夏中国的疆域，直到今日才如此开闢广大。凡是生民百姓都应该庆幸庆贺。还有什么中原内外、华夏与夷狄民族之分的言论可讲呢？曾静有什么辩说的话，要据实一一招供出来。钦此。

【原文】 曾静供：弥天重犯山野无知，于人事无一得通，自犯罪以来，只有惶恐战栗，万死待罪而已，更有何说可以分辩？今承高厚之恩，复降谕旨诘问。反复细读，字字句句皆发从古圣贤所未发，义蕴精深弘博，已到至处极处。在弥天重犯实无一言可以分疏、解免其罪，但自计当初狂举之念，处处皆从不知圣德高深，错执人言起见。

因念人之五伦，虽有人合、天合之分，其实皆本天而出，根

性而具，所以圣人谓之达道。惟其谓之达道，所以通古今、遍四海而不异。五伦之中，又惟君臣、父子为更大。君臣虽从义生，而人以合；父子虽从仁出，而以天合。其实君臣之伦，大过父子之亲。盖以父则对子，其尊只在子一身之上；君乃天下万物之大父大母，其尊与天配，在万物之上，故五伦以君臣为首。而所以处之者，彼此有当然各尽之道，本不相期待。在君之职以大自处，所以一切寒暑怨咨有不屑计；而为臣为民者，一身之生杀，唯君所命，不敢以私怨生怙叛之心。虽圣人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两边平放，其实不相期待。臣之忠君，乃天命之自然，不是因君使臣以礼而后臣得事君以忠，所以朱子注云：“二者皆理之当然，各欲自尽而已。”玩“理之当然”四字，见得臣之忠君，原从天出，不是报答君恩。君加恩于臣，在臣固当忠君，即不加恩于臣，而臣亦当忠。诚如圣谕所示：“父虽不滋其子，子不可不顺其亲；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戴其后。”盖臣之忠君，乃天命之当然，所性之自然，岂计君恩之轻重哉！

试看文王遭纣之昏乱而不改小心服事之节，圣人称为至德。曾子作《大学》传，释“止至善”章，引文王作榜样，以为止善之极则，曰：“为人臣，止于敬”，而不及汤武者，正为此个缘故。今谕旨谓“抚我则后，虐我则仇”非正论，正合文王、孔、曾之旨。盖“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乃武王将伐纣而誓师之权词。汤武之事，本非圣人之得已，但所遇之时不同，究其极而仍合于义耳。初非其所乐为，而可以为法于天下后世也。故必有汤武之至德深仁，而又遇桀纣之昏乱失德，以汤武而遇桀纣；又要看天命，验民心，方可行得。然在圣人心中，终是不满，终不免以此为惭，岂后世莽、操等所得借口乎！盖圣人处此，只为常经到此穿绝、理势不得不变，所以就时地上裁制。不得已而为古今之通义，以持续天理耳。故此一种道理，非大圣人不能用。所以圣人说个未可与权，虚悬此理于天地间，而未敢轻以许人耳。今我皇上因父子之亲则剖析分示，推出此理，兼使弥天重犯得以闻所未闻，此诚不幸中之大幸事也。

【译文】 曾静供道：“我这滔天重犯本是山野无知之人，对人情事理没有一件可以通达的，自从获罪以来，只有战栗惶恐，等待以万死之刑抵罪而已，还有什么话可以分辩？今日承蒙我皇上高厚的恩德，再次降谕旨讯问。反复细读旨意，字字句句讲得都是古代圣贤所未曾阐发过的道理，内中义旨蕴含精深弘博，已经达到最高最广的境界。对我这滔天重犯来讲，实在没有一言一语可以分疏，解免自己的罪过。但自己考虑当初的狂妄举动，处处都是因为不了解皇上圣德高深，错听信别人流言而造成的。

论说人间的五种伦常，虽有合于人性合于天理的分别，其实都出自于本来的天性，是人的根本性理所应具备的。所以圣贤认为这是达道。只有其认为达道，因此贯通古今，遗传四海而没有不同。五伦当中，又只有君臣，父子的伦常为更大。君与臣的关系虽然生自于义理，而合于人性；父与子的关系虽然出自仁德，而合于天理。其实君臣之伦理，超过了父子的亲情。父亲对自己的儿子，其尊贵只在儿子一人之上。君王本是天下万物的大父大母，其尊贵与上天相匹配。在万物之上。所以五伦中以君臣的关系为首要、而各自处于不同的地位，彼此都有自己应该尽的职责，原本不能互相期待。居君王的职位以天子自处，世间一切寒暑怨咨不屑于计较。而作臣民的自身的生杀命运，只有君王的命令所能决定，不敢因私念而生怨恨叛逆之心，虽然圣贤说过，“君子差使下臣要以礼相待，下臣侍奉君王要报以忠心。”两边似乎平等，其实不可互相期待。为臣的忠于君王，是天命的自然之理，不是因为君王差使下臣以礼相待之后，下臣再侍奉君王报以忠心，所以朱熹注疏说：“二者都是天理当然之事，各应该尽到自己的职责罢了。”推究“天理当然”这四个字，可见得下臣效忠于君王，原就出自于天理，不是为了报答君恩。君王施加恩德于下臣，做下臣的固然应当效忠君王，但即使君王不施加恩德于下臣，下臣也应当效忠君王，就如同皇上圣谕所说的：“父亲虽然不慈爱自己的儿子，儿子不能不孝顺自己的父亲；君王即使不能抚爱自己的臣民，臣民也不能不拥戴自己的君王。”这下臣的

效忠君王，本是天命的当然之理。又是人性的自然之理，怎么能计较君王恩德的轻重呢！

试看周文王遭到殷纣王昏乱对待时而不变小心服侍的事例，圣贤把称赞为至德。曾子作《大学》传注，在“止至善”一章的注释中，引用周文王的事例作榜样，认为是达到了善行的极点。他说：“作为人臣，要做到恭敬忠诚。”世间凡是不如商汤、周武王德行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如今皇上谕旨说：“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这句话并非正确的理论，这正符合周文王、孔子、曾子言行的意旨。所谓“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本是周武王准备讨伐殷纣王时誓师的权宜之词。商汤，周武王讨伐夏桀、殷纣王，本不是圣贤认为可行之事，但他们遇到的时机不同，推究其本源仍然是合乎于义理而已。当初也并不是他们乐于要做此事，而认为可以效法于天下后世的，所以必然要有商汤，周武王的至德深仁，而又遇上夏桀，商纣王的昏乱失德，即使象商汤、周武王而遇上夏桀、商纣王，又要看天命，验人心，才能行得犯上讨伐之事。然而，圣贤心中，到底是不满意这种行为，始终难免以此而惭愧，岂能是后世王莽、曹操之辈所得到的借口！因为圣贤当时的处境是正常的，经义到此已经穷绝，事理的趋势不得不发生变化，所以就顺其天时地利时对昏君实施裁制，不得已而为之，以使古今的通义接续上天理罢了。因此，这种道理，不是大圣大贤的人不能应用。所以圣贤对此也没有说个可否，空悬此理于天地间，而不敢轻易许上学用而已。如今我皇上因父子的亲情而剖析分示，推论出这个道理，也使我这弥天重犯闻知了从没有听说的事理，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原文】 因回思我皇上子惠元元，尽六合而皆然，所以抚绥我辈赤子者，本元间于山西、湖广，而山西之民醇良，湖广民俗浇悍，几烦圣虑，叠沛皇恩，以尽抚我之道。今圣德谦光，圣教诚笃，深仁厚泽，归美圣祖。于此见湖南之民，不唯沐我皇上之深

恩，当思忠顺，以事其上，即推想圣祖至德，亦无不当输诚尽分以竭其忠。况为民当身正义，处覆冒之下，既食毛而践土，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仰戴其君者乎！思量到此，弥天重犯虽粉身碎骨，不足以偿万刚之罪，更有何说可以解脱！况弥天重犯既知感圣祖之深恩而持服尽哀，独不思推圣祖大德于我皇上而思忠孝顺？

今明旨请问及此，虽木石亦当动心，况弥天重犯身带血气，有不割肝泣泪者乎！所痛恨者，只为自居山谷，我皇上御极初年，大德尚未遍洽，即为奸言先人，以此递叠叠闻，遂尔步步生疑。唯其有元年之流谤在心，是以后此之谣传得以入耳。而奸党造谤之大，皆与圣祖皇帝为仇为敌之事。以弥天重犯当日看得君父之伦重大，痛当身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吃紧此义，不觉透骨彻髓，只思报效于圣祖，思为圣祖皇帝之忠民义士，于义合当为圣祖皇帝舍身致死，以是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诛而不辞耳。

即谓惑于吕留良之悖论，在当时尚属第二、第三义。逆书虽有其说，然亦是看得君父之伦重，故以是劝岳钟琪耳。其实多为感圣祖皇帝之深恩大德起念，所以圣祖宾天，弥天重犯持服尽哀，发于至性。在当时悲思，竟有不堪对人者，每暗地流涕拭泪，在己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是。原无意于人知，以为忠孝是读书人本分事，为各人自尽之道，岂敢希冀人知！一著人知之念，即为伪矣。尚得有忠孝乎！

【译文】 现在回想我皇上爱民如子，四方天下均是一样，对我们赤子百姓抚爱安绥，本来就不分山西、湖广，而山西百姓民风醇厚善良，湖广百姓民俗浇薄强悍，多次烦劳皇上圣虑忧患，屡屡施沛皇恩厚德，以尽安抚百姓的懿行。如今我皇上圣德谦光，圣孝诚笃，深仁厚泽，都归美于圣祖皇帝。于此可见湖南的百姓，不但是沐受我皇上的深恩，应当思量忠顺事从朝廷；哪怕是推想圣祖皇帝的大德，也应当奉公献纳。尽守职分，以尽自己的

忠心。况且作臣民的要自身正义，处于朝廷覆盖之下，既蒙受皇恩，君王即使不抚绥其臣民，臣民却不可不敬仰拥戴其君王呢！想到这里，我这弥天重犯即使是粉身碎骨，也不能够抵偿万刷之罪，又有什么言语可以解脱辩解！更何况我已感知圣祖皇帝的深恩而持丧服尽哀奠祭，能不思量推想圣祖皇帝的大德于我皇上之身，而尽忠孝顺呢？

今皇上明旨讯问到这里，虽然是木石也应当动心。何况这弥天重犯身存血气，能不割肝泣泪吗！心中所痛恨的，只由于自己身居山野僻谷，我皇上登极初年，大德尚未遍布浸润，即被好党流言所先传入，从此谣言接连不断，逐渐生有疑心，只有雍正元年的流言谤语暗存于心，才使以后的各种谣传入耳中。而乱贼奸党们造谣毁谤，多是些与圣祖皇帝为敌为仇之事。我这滔天重犯当时把君王和父亲的伦常看得重大，痛感自身蒙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的恩德，认准此义理，不觉透骨彻髓，只思念报效于圣祖皇帝，要做圣祖皇帝的忠民义士，于义理也应当为圣祖皇帝舍身致死，于是轻妄地萌发了悖逆的念头，甘愿赴蹈灭门之极刑而不加推辞。

就是被惑于吕留良的谬论，在当时还属于第二、第三层含义。我自撰的叛逆书籍中虽然有些说法，然而也是把君父的伦常看得重要，因此，用这些理由劝说岳钟琪而已。其实多为自己感戴圣祖皇帝的深恩大德起念，因此圣祖皇帝升天时，我持丧服尽哀祭奠，发自天性良心。在当时悲哀思念圣祖皇帝，竟然不堪于公开众人面前，只是暗地里流涕拭泪，自己也不知道为何竟然悲哀至深。原来自己也不想使别人得知，认为忠孝是读书人的本分之事，是各人应尽的职责，怎敢希望别人知晓！一有使人知晓的心念，是虚伪了。还能说有忠孝之心吗！

【原文】 前供所以说到此处者，只为弥天重犯犯此大罪，心事未易明白，故缘此以为证据耳。其实当日一片赤心肫切并未说到。故在当时，非弥天重犯全然死心，只为谰言流毒，多切紧圣

祖皇帝身上。岂意我皇上大孝大德，为圣祖皇帝同德嫡体而更有光者乎！

倘若弥天重犯以毫无影响之流言，不察真伪，而使肆为诬蔑。揆以君臣之义，情同父子之亲，彼人有诬弥天重犯之父以盗名，捏弥天重犯之母淫行，在弥天重犯情必不安，必察而辨之，且为之掩护之。而人于我皇上之诬捏，则遽信以为实，漠不加察，较之父子之情，相去悬绝，弥天重犯万死之罪，实无所逃。但当初之狂举妄动，而误信以为实者，亦以圣祖皇帝之恩德在人者深，为民者无不冀圣子圣孙之继其统。

当时心中所期，以为处今日，即皇上偶有德不及圣祖处，在民间亦必为之掩护，不忍宣扬。今所闻如此，且以为言出于京城往来道路人口，并非起于民间，因妄疑圣祖皇帝非有仇于人者，而今日所闻如是，必有其因。况天子本四海之共主，人只有爱戴颂扬，谁甘不良而肯造言讪谤！是以弥天重犯当日，一为从未历过世路倾险，识透人情有此变诈；二为从未到过京师，得闻奸党如此阴毒；三为圣德高深，湖山万里，未得骤闻。因此三事来谗，以致潜谤流言得以乱听。况阿其那、塞思黑、允禩等之奸党，流布民间，本非一处一种。除充发广西外，尚有诡名变迹，借游学为名者，而其所诋诬圣德，多由谈文论学引入。山野螻蚁，从何窥测其底里？因此不觉为之摇惑煽动。

若奸党充发，所过省郡极多，不止湖南一省，即山西地方，岂无此等逆党流言？独不能惑人之听，而唯湖南奸民一闻蜚语，即起叛逆之心？夫奸人有心造谤，每乘人之虚而避人之实，诚以虚则吾言易入，实则吾言易识。故其不肯在山西、河南等近处传布者，以山西、河南等省离帝都近，往来者多，皇上之至德声称，人人所习闻，心中实而有主故也。惟湖南离帝都远，往来者少，我皇上之至德声称，未得遍洽，山谷知之者少，心中虚而易惑故也。非山西与湖南之民全异，实所处之地有不同也。

【译文】 前番供词之所以说到这些，只因为我犯下如此滔天重

罪，心事没能轻易表明，因此讲出这些话作为证据而已，其实自己当初的一片赤诚恳切之心并没有说到。因此在当时，不是我已经全然死心，只因为受谰言流毒所害，忠心多贴紧于圣祖皇帝身上了。哪能想到我皇上大孝大德，本就是圣祖皇帝的同德嫡体并且更有光采呢！

如果像我这样以毫无影响的流言蜚语，不察问真伪，便肆意诬蔑毁谤，揆度于君臣的义礼，本就同于父子的亲情、他人诬蔑我的父亲有盗窃的行为，捏造我的母亲有淫荡的行为，我的心情必然是不安，一定要询问清楚，为父母辩解，并且为他们掩护。而有人对皇上进行诬蔑捏造，自己却信以为真，漠然不予察问，比起对父母的情义，相差悬殊，我这弥天重犯万死的罪行，实在是不可逃脱。可是，当初的轻举妄动，误听信谣言而认为是实情，也是因为圣祖皇帝的恩德已经深入了人心，作臣民的无不希望朝廷圣子圣孙能继承其大统。

当时心中所想，认为处在今日，即使我皇上偶然有德行不如圣祖皇帝之处，民间的百姓们也必然会为其掩护，不忍心加以宣扬。今所闻听的这些传言，认为都出自于往来京城的人口中，并不是起于民间，因此妄自疑惑圣祖皇帝对人并没有仇怨，今日听到传闻的这些事，必然有其缘起，况且天子本是四海天下的共同君主，世人只有爱戴颂扬，谁甘心冒不良的名声而肯造谣毁谤呢！这样我在当时，一是从来未经历过人世道路的倾险，不能识透人情有如何的变换诡诈；二是从未到过京师，不能闻知奸党乱贼如此阴险歹毒；三是皇上圣德高深，但湖山万里隔阻，不能及时遍传知晓。因为这三件事不熟悉了解，以至于误信了谰谤流言。况且阿其那、塞思黑、允禩等乱贼奸党，流布于民间，也不是一处一路。除去充配发放广西的罪犯外，还有化名变迹，借巡游讲学为名的人。而他们诋毁诬蔑皇上圣德，多是从谈文论学入手的。山野愚民，又从哪里可以窥测清楚他们的底细来历呢？因此不知不觉中便被他们蛊惑煽动。

至于奸党乱贼获罪发配，所经过的省郡很多，也不湖南一

省，即使是山西地方，岂能没有这些逆党的流言？却独自不能惑人是听，为何只有湖南的奸民一听到蜚语，即生起叛逆之心？这奸党乱贼有心造谣惑众，多是乘人之虚而避人之实，若其心中空虚，流言就容易传入，若其心中踏实，流言就容易被识破。之所以奸党不肯在山西、河南等近省地方四处传布流言，是因为山西、河南等省离京都很近，来往的人较多，我皇上至高的德行和声名，人人都能闻知，心中踏实而有主见。只有湖南离京都遥远，往来的人少，我皇上至高的德行和声名，未能遍布浸润，山野僻谷闻知圣德的人不多，心中空虚，自然就容易被蛊惑煽诱了。这不是山西与湖南的百姓性理全然有分别，实在是所处的地理不同。

【原文】 至若谕旨以华夷之辨，推原于昔之历代人君不能中外一统，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见。且谓明祖以元末奸民起事，恐人袭其故智，故汲汲以防民奸；其威德不足以抚有蒙古之众，故兢兢以防边患；以及先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视为一体，又何以得心悦诚服之效？先有畏慎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统之规？大哉皇言！既与天地同体，复与天地同用。于穆天也，而我皇上配对之，不见其个足；我皇上也，而天全体之，不见其有余。况见透汉、唐、宋、明几多英主隐曲作用，直同儿戏。不唯德量同天，心公到至处；而且眼界高出日月之上，明察到极处。此等境界，自古帝王所少到，而此等议论，自古圣人所未发。苟非我皇上身亲历到，焉能辨别到此至处，焉能包容到此极处，焉能阐发到此至微至细处！况复以感人之道，总归一诚，尤俨然活露天体之大矣。

盖惟天至诚，惟其至诚，所以覆冒无外，感而遂通。故《中庸》言：“诚”，必推极于天，惟其诚能合乎天，所以高明光大，博厚悠久，与天无异世。此我皇上所以合蒙古、中国成一统之盛。几天所覆冒者，俱归版图，凡属民生，皆当庆幸，岂有华夷中外之间哉！理到至处，行到极处，虽尧舜复起，亦不能赞一

词。而我皇上不惟规模弘远，开中天之隆会；抑且道德广大，立万世之成规。人君不能修身配天，强分中外华夷，到此直堪耻无地矣。况欺世盗名，假窃圣言余唾以混理学之正者，逆天不亦甚欤！至是而益信我朝名义之正，德业之隆，诚极生民所未有世。猗欤盛哉！

【译文】 至于皇上谕旨所说的华夏夷狄民族的区分，推论原因就是由于往昔的历代君王不能实现中原内外一统成规，而自作这个区域那个地界的浅薄见解。并且指出明太祖本是元朝末年由奸民起事而兴盛起来的，心中惟恐有人沿袭自己的老计谋，所以急切于防护奸民；其声威德望不能抚绥蒙古部众，便小心谨慎防护于边患。先存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将君王与臣民视为一体，又怎么能得到臣民心悦诚服的收效呢？先怀有惧怕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中原和边远各少数民族为一家，又怎么能形成中原内外一统的规制呢？皇上所言真是英明伟大啊！既与天地同为一体，又与天地所共用。对于上天，我皇上的圣明与其相配对，不见得有什么比不上的；对我皇上，以上天全部的德理与其相比较，也不见得有多余的。况且我皇上见解透彻汉、唐、宋、明几代诸多英明君主隐蔽委屈的作用，如同儿戏一般。不仅是德量齐天，出天公心到最高之处；而且眼界高出日月之上，秋毫明察。此等境界，自古以来的帝王都少见到，而此等议论，自古以来的圣贤都没有阐发过。如果不是我皇上所亲身经历，怎么能辨别到如此至明之处！怎么能包容到如此极深之处！又怎么能阐发到如此至微至细之处！况且又将深入感化别人的道理，归结为一个“诚”字，更俨然显露出天体的伟大了。

只有上天至诚至信，只有我皇上至诚至信，因此覆盖不分内外，感化而通达四方。因此《中庸》评说“诚信”时，必然推论其可高于上天，只有诚信可合乎天意，所以光明正大，博厚悠久，与上天一致。我当今皇上所以合蒙古、中原成一统之盛世，凡上天覆盖之地，俱归于版图，所有的臣民百姓，都应当庆幸庆

贺，怎么能再有什么华夏夷狄内外之分！其义理到了最为精深之处，品行到了最为高尚之处，虽然是尧舜复生再起，也不能被赞颂于同样的言词，而我皇上不只是规模弘远，开创中天之隆盛，并且道德广大，立设万事之成规。作为人君，如果不能够修省自身，德行配天，而强要分出中原内外华夏夷狄，到此只怕是难堪羞愧，无地自容了。何况欺世盗名，假窃圣贤片言只语以混淆理学正论的人，悖逆天意不也是太过分了吗？因此我更加相信本朝名正义顺，德业大隆，真正是人间所没有，多么兴盛啊！

二十一、自称忠民义士的曾静，你为什么 要甘愿赴蹈灭族死罪而谋反呢？

【原文】 奉旨讯问曾静：你供称“身居山谷，我皇上御极初年，大德尚未遍洽，即为奸言先入，遂尔步步生疑，后此人耳谣传，皆与圣祖皇帝为仇为敌之事。因身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思为忠民义士，是以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诛”等语。

你自雍正元年以来，讹传逆党之言，是朕之失德备闻于耳，而阿其那贤孝之名，及圣祖皇帝欲传位于允禔之事，亦入于耳。你既感圣祖皇帝之恩，即以朕为君父之仇敌，不克继承大统，则亦当劝岳钟琪世受国恩，当仰承先帝之志，辅佐阿其那、允禔等以继先帝之基业。何以竟将叛逆之事，掀动岳钟琪？况你道书内分别华夷，直指圣祖皇帝为夷狄，如何尚说感戴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思为忠民义士乎？可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狂悖之举，按其罪，触处皆是，本无一线可生。苟非大圣人在上，德量同天，精明并日，本大公无我之怀，虚心体察，使顽逆隐情毕露，虽磔尸磨骨亦不足以偿当身莫大之罪，尚有何说可以疏解！今承恩旨讯问，前供所称身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思为忠民义士，则当劝岳钟琪仰承先帝之志，辅佐阿其那、允禔等，以继先帝之基业，何以竟将叛逆

之事，掀动岳钟琪？况逆书分别华夷，直指圣祖皇帝为夷狄，如何尚说感戴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思为忠民义士？

究问及此，弥天重犯惶恐战栗，万死何逃！不惟无说可以仰答天聪，即自问亦无说可通了。今亲观圣德之高深，极生平所未有，感被皇恩之浩荡，彻骨髓而融洽。此所以心悦诚服，而痛悔当年狂悖之举，切齿于阿其那、塞思黑、允禩等之奸党造言流谤者以终天也。然苟非我皇上之德量同天，精明并日，亦只有杀而已矣，剐而已矣。今承旨问，从肝滴出一字一泪，实无半语只字可以仰答天聪，理屈辞穷，自如万死万剐莫偿，只有惶恐战惧而已矣。

【译文】 奉皇上谕旨讯问曾静：你前番供词中说了“我身处于山野僻谷，当今皇上即位初年，朝廷圣恩大德尚没遍布露润，就先被奸言邪说蛊惑煽诱，于是便渐渐心中生疑，此后传入耳中的谣言，都是些与圣祖皇帝为仇为敌之事，因自己蒙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的大恩，一心要做忠民义士，于是狂妄地萌生了叛逆的念头，甘愿赴蹈灭族死罪”等言语。

你自雍正元年以来，讹传道贼奸党的言论，是因为说我失德无道的很多语言传入你耳中，而且，阿其那贤孝的名声，以及圣祖皇帝想传帝位于允禩之事，也传入你耳中。你既然感戴圣祖皇帝的恩德，将我视为我君父的仇敌，不配继承帝位，那么，也应该劝说岳钟琪感念世受国恩，应当仰承先圣祖皇帝遗志，辅佐阿其那、允禩等继承先帝的基业，却为什么竟以叛逆不道的言论，去鼓动岳钟琪谋反？何况你在所写作的叛逆书籍中，将华夏民族与夷狄少数民族进行区分，直言指明圣祖皇帝是夷狄民族，予以诋毁诬蔑，又为何要说感戴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大恩，一心要做忠民义士呢？可据实供出来。

曾静供：我这弥天重犯狂妄荒谬的举动，要说论罪，到处都是，本来没有一线生机。如果不是大圣大贤的皇上在上，德量同天地一样宽广，精明如日月一样光亮，本着大公无私的崇高胸

怀，虚心体问察勘，使愚顽的逆贼隐情毕露，虽然是磔尸碎骨也不能抵偿我自己天大的罪过，又有什么话可以分辩呢！今承蒙皇上恩旨讯问，前番供词听说自己身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大恩，一心要做忠民义士，就应当劝岳钟琪仰承先圣祖皇帝遗志，辅佐阿其那、允禩等人，继承先帝的基业。为什么竟以叛逆不道的言论，去鼓动岳钟琪谋反？况且在自己写作的叛逆书籍中区别华夏民族和夷狄民族，直接指明圣祖皇帝是夷狄少数民族予以诋毁诬蔑。为什么还说感戴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的大恩，一心要做忠民义士？

皇上谕旨究问到这里，我这弥天重犯惶恐战栗，千万死罪怎么能脱逃！不但是没有话可以仰答我圣明皇上，就是自问自己也没有话可解释得通了。如今亲眼目睹我皇上圣德高深，是世人生平所没有过的，感受浩荡的皇恩，直深透骨髓而融通浸润，如今所以能够心悦诚服，并痛悔当年的狂妄荒谬举动，切齿增恨被阿其那、塞思黑、允禩等乱贼奸党造谣毁谤所蛊惑而貽误了自己的终身。然而，倘若不是我皇上德量同天地一样广大，精明如日月一样光亮，也只能杀剐死去罢了。今日承蒙谕旨询问，从肝肺间滴出一字一泪。实在没有片言只语可以仰答我圣明皇上，理屈辞穷，自己知道虽万死万剐也不能抵罪，仅能惶恐战栗而已了。

二十二、山西嘉祥兆瑞迭现，湖南

连年水灾，这些说明什么？

【原文】 奉旨讯问曾静：前因山西绅士庶民运送军前骆驼鞍屐，自备车骡，不肯领价，踊跃急公，争先恐后，已将晋民情节输你。今不旬日间，晋省保德州等处，遂有庆云呈献之瑞。据巡抚、学政、布政使三处奏报前来，特将奏折发与你看。

朕从来不吉祥瑞，但天人相感之理，实捷于影响。晋民怀尊君亲上之心，是以连年丰稔，今又蒙上天特锡嘉祥，以昭示福佑

万民之象。可见从前湖南地方屡被水灾者，实因民风浇薄，又有你与张熙辈心怀悖逆，以致乖戾之气上于天和。此理显然昭著。但朕凉德，不能化导湖南百姓，亦不能辞其咎。你从此更当猛醒，知天之不可欺矣。你今仍怨谤朕一人乎？

曾静供：自古称圣王励精图治，虽不言祥瑞，然到治定功成，而祥瑞自然协应；必到祥瑞协应时，而后称得治定功成。此《中庸》推学问之极功，圣神之能事，而必归到“天地位，万物育”上去者，此诚以大君之身，与天相配，其精神运量，与天相通。君能心与天心融通无间，而克符合一，则和气致祥，自然云日辉煌，藻彩缤纷，以及河清海晏，万物顺成，百福骈集。若君心稍有一点与天心不相符合，则戾气致异，一切反是，此理之大致一定不易者。

但其中不能尽同，亦微有辨。盖有君尽其道，而臣庶不能仰体君心，此又以君为天，君心为天心，臣庶之心不能仰体君心，即与天心相违，所以亦能致异。此普天之下，所以有嘉祥灾异之不能尽同也。恭惟我皇上克体天心，克肖天德，励精图治，仁恩厚泽，遍浴寰宇。其效至于薄海内外，物阜民康。皆歌乐育，礼陶乐淑，共被洪钧。惟圣心与天心合一，君德与天德无间，所以天和见彩，地灵垂祥，大者如五星聚、黄河清、嘉谷蕃芒，百瑞叠呈。我皇上天人感孚，成自古未有之治功，以致获自古未见之瑞征，此理之捷于影响而无疑者也。

至于近者晋省庆云捧日，外绕三环，光华四射，藻彩缤纷，与湖南数年歉收，旱涝叠闻，灾异间见，其理复异者，何也？诚以晋省民心醇厚，知恩感戴，民心能仰体君心，一切输诚奉公之事，无不踊跃争先。故于办理驼屨之会，而天垂祥瑞，以协人心之顺。若湖南虽同处覆冒之下，而民俗浇漓，不能仰体我皇上之心，加恩而不以为恩，被德而竟忘其德。加以弥天重犯等之狂悖丧心，不惟不知我皇上之大德合天，而竟不能安业顺化。是湖南庶兆之心多与我皇上之圣心相违。即与天违，所以厉气致异，而灾寝独屡见于湖南也。但此理甚显示甚微，非我皇上精通性命之

源，素能默契乎天，而复能与天合一，焉能知之！

弥天重犯到今日读所报闻诸嘉祥奏折，并我皇上所讯问谕旨之理观之，不惟信我皇上之至德毫无瑕累，实实与天合一。在弥天重犯将插翅遍飞遍传，破潜除谤之不暇，岂尚复为潜谤的惑之理！抑且自痛当年狂悖之举，诚得罪于天，而不意今日戴天广大之德，推原致罪之由，宽宥以至于此极也。

【译文】 奉皇上谕旨讯问曾静：前时因山西士绅百姓运送军需骆驼鞍屐，都是自备车马，不领运费，为官府公差踊跃向前，争先恐后，我已将山西百姓这些热心奉公献纳的情节传谕于你。如今不过旬日，山百省保德州等地方，便有祥云呈现的瑞兆出现，现据该省巡抚、学政、布政使三司衙门奏报上来，特将这些奏折抄发给你阅看。

我从来不说祥瑞征兆，但上天与人的理气相互感通，是双方相互给予的影响造成的。山西百姓怀有尊奉君王亲近朝廷之心，因此年年五谷丰登，如今又蒙上天特意赐与嘉祥兆瑞，以昭示福佑万民的景象。由此可见从前湖南地方屡次遭受水灾，实在是因为民风浇薄强悍，又有你与张熙这些人心怀叛逆之心，以至于乖张抵触之气上干冒犯了天和，这个道理是十分显明昭著的。不过因为朕才德凉薄，不能感化导育湖南的百姓，也不能推辞自己的过失。曾静你从此更应当猛醒，要知道上天是不可欺骗的。你如今仍然怨恨谤毁朕一人吗？

曾静供：有古圣贤的君王励精图治，虽然不讲祥瑞征兆，但是到了国家长治久安，功德告成之时，祥瑞征兆自然和谐而生；也只有祥瑞征兆显现时，才能称得上是国家长治久安，功德告成。这就是《中庸》所推断道德学问的极大功力。圣明神化的非凡能量，而必然归到“天地正气充盈，万物才生长发育”上去。这的确是说君王之身，与上天相互配合。其精神运量，必与上天相互感通。君王之心能与天帝之心融通无间，而能够彼此一致，那么天地和气而生祥瑞，自然云日辉煌，五彩缤纷，以及江河湖

海清澈，万物顺利成长，千百福佑汇集。如果是君王之心稍有一点与天帝之心不相符合，便使乖张抵触之气造成灾异，一切都是相反的结果，这个道理大致上是不会变化的。

但是其中又不能完全相同，也稍稍有些区别，比如有君王能尽自己的道义准则，而臣子庶民不能体念君王之心。这又好比以君王为天帝，君王之心为天帝之心，臣子庶民之心不能体念君王之心，就是与天帝之心相违背，因此也能造成异化。这便是普天之下，因此出现有嘉祥和灾荒的不同结果。只有我当今皇上能够体念天帝之心，能够类似天帝之德，励精图治，仁恩厚泽，遍布浸润天下，其功效已达到四海内外，物质丰富，庶民安康，都是歌舞升平，乐于圣德抚育，谦恭礼让，乐于贤淑善良，共同接受上天的福佑。也只有我皇上之心与天帝之心合一，我君王德行与天帝德行无间相同，所以才能有上天和美显现彩光，大地灵气垂降吉祥，盛兴时出现五星联珠，黄河浊水变清，嘉禾灵芝茂盛，千百种祥瑞迭起纷呈。我当今皇上为天帝和世人所感念信服，建成自古以来从没有过的丰功伟绩，以至于获得自古以来没有见过的吉庆瑞征。毫无疑问，这是由天帝与我皇上相互给予的影响而形成的。

至于近来山西省彩云捧日，环绕三层而光华四射，五彩缤纷，但湖南省却是连年农田歉收，旱涝灾害迭起不断。出现这些事理不同的原因在哪里呢？确实是山西省百姓心底醇厚，知恩感德，百姓心中能体念君王之心，一切向朝廷献纳诚心奉公之事，无不是踊跃争先。所以在办理运送军需驼屨之际，上天垂降祥瑞，以协调人心之顺和。像那湖南省虽然同处在朝廷皇恩覆盖之下，但百姓风俗浇薄，不能体念我皇上抚爱的心愿，施以圣恩而不认为是恩，接受厚德而忘记其德。加上我这弥天重犯等人狂妄荒谬丧尽良心，不仅不知道我皇上的恩德齐天一样盛大，还竟然不能安心乐业顺化朝廷。因为湖南省庶民之心多与我皇上的圣心相违背，所以祸患造成异化，而灾荒独自多次出现于湖南省内。但是这个道理既明显又很轻微，若不是像我皇上这样精通人性天

命的渊源，平时能与天心默契相和，而达到与天心合而为一，怎能知道这个道理所在！

我这弥天重犯今日从这些读到的各地所呈报观睹嘉祥瑞兆的奏折，并加上我皇上所讯问谕旨中的义理看来，不但信服我皇上至高无上的德行毫无微小瑕疵，而且实实在在是与天帝合而为一了。对我这弥天重犯来说，即使插翅遍飞遍传，破除谗言毁谤还顾不及，岂能有再被谗言谤议所惑乱煽诱的道理！况且自己痛悔当年的狂妄荒谬举动确实是失罪于上天，而不想今日能蒙戴天地一般的广大恩德，推察出我犯罪的原因，以至于宽宥到了这样的极点。

二十三、云贵两地民风淳厚，服教乐善，以至感召丰收大稔，正是天人感应昭著啊！

【原文】 奉旨问曾静：湖南地方，人心诈伪，风俗浇漓，而督抚大吏又不能宣朕之威德，化导愚民，以致风雨不时，灾祲屡作。云贵总督鄂尔泰实能体朕之心，教养百姓，而民风淳厚，又能服教乐善，以此感召天和。云南连岁大稔，而贵州今年通省丰收，所产嘉谷，岐穗繁多，颗粒硕大，为从来所未见。今将贵州巡抚张广泗奏本，及所进嘉谷图样与你看，天人感应之理，显然昭著如此，你再有何说？

曾静供：天人感应之理，捷于影响，弥天重犯已曾供过，不敢复赘。今观贵州巡抚所进献瑞图，共四十六种。稻谷粟米之多，有一茎两穗至十五六穗不等；稻谷有每穗四五百粒至七百位数之多者；粟米有每穗长一尺八九寸至二尺有奇者。不惟从来目所未见，实从古耳所未闻。此必贵州人民被服圣教，革面涤心，输诚向化，熙皞乐利，一团忠顺太和之气，上应我皇上励精图治之苦心，于我皇上之大德无不洽，至教无不通，道德齐礼之化，无不顺应协从。所以与云南、山西等省同一尊亲爱戴之诚，

上召天和，是以或垂天锦以示祥，或著地灵以呈瑞。其事虽异，其理则一也。

惟湖南虽与山西、贵州、云南等省同居覆冒之下，同受生成之恩，而数年以来灾异屡见者，何也？实因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禵等之奸党将圣德诋诬，遗言惑乱，而湖南之民无知轻听，妄以我皇上之德，果如奸人之谤，各怀不平而怨咨嗟议，反以数年灾侵为皇德之亏所致。岂知我皇上以亘古未有之至德深仁而湮郁远鄙，是以上天震怒，屡示灾异，以谴责湖南之民。则湖南之民乃不知省，反听信奸党之谤而致怨乎上，故怨愈深而灾愈厉。盖湖南之多灾与贵州、云南、山西等省致祥，其中事虽殊，其理实同，同一上天眷佑我皇上之大德所致。

贵州、山西、云南等省之致祥，是贵州、山西、云南等省之民，能仰体我皇上之大德，各尽忠顺之道而乐业安化，皇上至德舒畅四达而无隔碍，所以和气融通而能致祥。湖南之多灾，是湖南之民不能仰体我皇上之大德，胸存悖逆之念，不肯安业乐化，皇上至德间隔湖山而多郁结，所以戾气否塞而能致灾。所谓同一上天眷佑我皇上之大德，实因我皇上之大德亘古未有，所以既有此等应处，又有此等异处。

今弥天重犯得见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禵等及伊等平日所蓄养之匪类等所供谤议，恰与湖南百姓所闻无异，于此见得奸党上误国家，下害生民，蓄心狠毒，一至于此。若非我皇上仁孝诚敬之至，上格于天，素孚于祖，感通默相，焉能使诸奸尽行败露，恶迹如此昭彰！而我皇上之大德，转因此光明显烁，焜耀中天。所谓“仲尼，日月也，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此理至今日而益验矣。到此实实信得我皇上之德，超越古今，与天、与圣祖一而二，二而一，并无毫发彼此之间，故能为圣祖所笃爱，上天所眷佑，而天理响应如是，报验如是。

【译文】 奉皇上谕旨讯问曾静：湖南地方，人心伪诈，风俗浇薄，而总督、巡抚大员们又不能宣示朕的声威和恩德，教化导育

愚昧无知的庶民，所以造成风雨不断，灾患屡次发生。云贵总督鄂尔泰着实能体念我的心愿，教化养育百姓，而民风淳厚，又能感服教化，乐于行善，所以感召了上天祥和，云南连年庄稼丰稔，而贵州今年是全省丰收，所产的嘉禾稻谷，枝穗繁多，颗粒硕大，从来没有见过。现在将贵州巡抚张广泗的奏章，以及所进呈的嘉禾稻谷图样给你观看。上天与世人感通应和的道理，如此明白显著，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曾静供：上天与世人感通应和的道理，是互相给予的影响形成的，我这滔天重犯已经供说过，不敢再重复赘述。今日观看贵州巡抚所进献的祥瑞图，共四十六种。稻谷粟米之多，有的一根叶茎上长出两穗至十五六穗不等；稻谷有每个穗上长有四五百粒至七百粒数之多的；粟米长有每穗长一尺八九寸至二尺的，让人惊奇不已，不只是从来没有见到过，也实在是从古代以来就没有听说过。这必然是贵州庶民百姓披服圣德教化，革面洗心，诚心归化，到处光明快乐，一团忠顺太和之气，上应了我皇上励精图治的良苦用心。也在于我皇上的圣恩大德无处不滋润，至理的教化无处不通达，道德礼义的感化育导，无处不顺应听从。因此与云南、山西等一样的尊亲爱戴的诚心，感召了上天祥和之气，因此，或者是垂降天锦以示吉祥，或者是显出地灵以呈现瑞兆。其事情虽不一样，但道理却都相同。

只有湖南虽与山西、贵州、云南等省同居于朝廷覆盖之下，同受天地生成之恩，而多年以来灾患屡次发生，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禵等乱贼奸党对皇上圣德诋毁诬蔑，造谣惑乱。而湖南的百姓愚昧无知，轻听偏信，妄自以为我皇上的德行，果然就像奸党的毁谤一样，各怀着不平之心怨恨嗟叹，却认为多年的灾患是皇上德行有亏所造成的。怎么能知道我皇上这亘古没有的深仁大德被塞阴于远乡鄙野，所以上天震怒，多次示以灾患，以谴责湖南的民众。而湖南的百姓又不知反省，反听信奸党的谤毁言论而怨恨于朝廷，因此怨恨越深而灾患越重。这湖南的多灾与贵州、云南、山西等省的呈现祥瑞，事情

虽然差别悬殊，其道理实际相同。这是同一上天神灵眷念护佑我皇上的大德所施与的不同反应。

贵州、山西、云南等省呈现祥瑞，是贵州、山西、云南等省的庶民百姓，能敬仰体念我皇上的大德，各尽忠顺之道而安居乐业，皇上的高尚德行舒畅四达而没有什么阻碍遮隔，所以气理融通而能呈现祥瑞。湖南的多灾多患，是湖南的庶民百姓不能敬仰体念我皇上的大恩大德，胸中存有叛逆之心，不肯安心务业乐于教化，皇上的高尚品德被江湖山川阻挡郁结不能遍传，所以抵触怨咨之气阻塞而引来了灾患。所说的同一上天神灵眷念护佑我皇上的大德，是因为我皇上的大德亘古没有，所以既有这样应和之处，又有这样的不同之处。

现在我这弥天重犯见到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禵以及他们平日所蓄养的亲信党徒谤言论供说的，刚好与湖南的百姓们所闻到的说法一样，于此事可以看出奸党乱贼上误国家，下害百姓，居心险恶，已达到这样狠毒的地步。若不是不是我皇上最仁孝，最诚敬。上感格于天帝，素常又被圣祖皇帝信赖，圣心相互默默感通，岂能使这些奸党乱贼尽行败露，劣迹如此昭彰呢！而我皇上的大德也因此更加光辉闪烁，明亮中天。古语所说的“孔子，像日月一样，有人虽想自绝于上天，又怎能伤害于日月呢”！这个道理至今是日益被验证了。到了如今实在相信我皇上的德行，已经超越了古今，与上天、与圣祖既是二者，又是一体，并没有一点的彼此之分，所以能被圣祖皇帝笃爱器重，上天神灵施以眷念护佑，而天理响应是这样，报验也是这样。

二十四、孔庙失火和庆云出现是礼乐制度遭受厄运的灾异呢，还是文明光华的祥瑞呢？

【原文】 奉旨讯问曾静：你以前逆书内云“于今正值斯文厄运，

是以孔庙焚毁”。今据督修庙工之通政使留保奏报“十一月二十六日午刻，正当孔庙大成殿大梁之前二日，庆云现于曲阜县。形若芝英彩凤，五色缤纷，正南、东、西三面拱日朝阳，历久益加绚烂。万目共睹，无不称庆”等语。今将留保所奏之折及庆云图发与你看，这是斯文厄运之灾异？还是文明光华之祥瑞？你今又如何说？

曾静供：道之在天下，本无处不有，无人不备，特凡民为气稟所构，物谷所蔽，是以有的不适如其有，备的不能果见其备。故聪明睿智之资，气稟清明，义理昭著，生知安行，千万人中无一见焉，甚或数千年无一遇焉。然一有之，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所谓“稟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是君与师原属一道，并未尝有岐，此尧舜、禹汤、文武之世，所以只有君之重，并无师之名，盖以君职原兼师职故也。

唯至春秋战国，二帝三王之道熄，时有孔子生安之圣，厄而在下，当时仁义之风微，功利之习兴。一时功名之士，以治天下为另有一种权谋术数之学。于是群指孔子为师道，而称君德者，视此则有彼此之分。而孔子之所谓仁义道德者，每多置而不讲。历汉及唐以至于明，二千余年，孔道晦塞，未有能明能行。孔道不明不行，又安望其有虞、夏、商、周之治效乎！

惟我朝圣祖皇帝得尧舜、孔子之心传，是以六十余年，深仁厚泽，遍及薄海内外，已媲美于虞、夏、商、周。我皇上以天璽之聪，生安之资，加以初潜四十余年，研深味道之功，其于尧、舜、孔子之道，合圣祖家学精蕴而久已集其大成。不惟与尧、舜、孔子之心传无二，抑且于圣祖一切政治而更有光矣。此所以天人感应，随时随地莫不信而有征。盖有亘古未有之道德，自能成亘古未有之治功；有亘古未有之治功，斯能备亘古未备之休征，此理之一而不易者。

兹因山东孔庙大成殿庙上梁之前二日，而庆云五彩捧日，光华融露于曲阜县，此盖孔子之圣，浑全一团天理，孔子之心即天

心。今圣心与孔子之心为一，即是与天心为一。而祥瑞见于曲阜，适在兴修圣庙之会者，乃上天所以嘉于圣心与孔子之心为一处，比泛见于云、贵、山西等省，其庆幸为更大，其盛德之合于孔子，而感孚上天者为更极其至。此所以为一无之中，文明光华极盛之会，而为生民所未有也。

弥天重犯从前无知，并不知天之高，地之厚，所以以为流言摇惑，而为是万刚之说，悔恨无及。今既含生被化于天高地厚之中，自验知之比他人更深，信之比他人更笃，到此只有尊之亲之，爱之戴之，传颂以为亘古未有此文明光华之圣德神功而已，更有何说。

【译文】 奉皇上谕旨讯问曾静：你从前在所写作的叛逆书籍中说：“现在礼乐制度正遭逢厄运，所以孔庙被焚毁。”如今据监督修复孔庙的通政使留保奏报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午时，正当孔庙大成殿临近上梁的前二日，祥云突然出现在曲阜县上空，形状就像是灵芝花草，彩色凤凰一般，五彩缤纷，在正南、东、西三面拱托着大阳，持续了很长时间后并且更加绚丽灿烂。万民都目睹了这一情景，没有不为此祥云瑞兆而称颂庆贺的”等言语。今日将留保所呈报的奏折及祥云瑞兆之图发给你看。这是礼乐制度遭受厄运的灾异呢？还是文明光华的祥瑞兆？你今日又怎么解说？

曾静供：道行义理在天底下，原来就是无处不有，无人不具备，但是平时百姓被稟受的天地之气所限制，以及受物质的欲望所遮蔽，所以有道行义理的不能依照其道行义理，具备道行义理的又不能真正理解其具备的道理。所以，天资聪明睿智，稟受天地清明之气，道德义理昭著明显，生而知之，安然行之的天才，在千万人中也不能见到一个，甚至数千年也不能遇到一个。但是，一旦有了这样的天才，那么上天必定授命他为亿万庶民的君王师表，所说的“天赋诚信聪明可以作君主，君王可以作庶民的父母”，又说“上天降至贤于民间，做他们的君王，做他们的师

长”，是讲君主与师长原就属于同一道统，并不曾有不同。在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时代，之所以只注重于君王的权位，并没有显明师长的名望，是因为君王原就兼有的师长职责的原因。

只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二帝三王的道行义理渐渐消亡，而生而知之，安然行之的圣贤孔子又正在民间遭到苦难。当时，仁义道理教化的风气渐渐衰败，追逐功名利禄的习尚日益兴起。一时间，追求营取功名的人们，认为治理天下另有一种道理谋略学问，于是众人指出孔子的学说只是为师之道。而称颂君王德行的人，便认为君王与师长有彼此之分，对孔子所说的仁义道德理论，常常是置于一旁不讲。历经了汉、唐各代以至于到了明朝的二千余年间，孔子的仁义道德理论被昏暗阻塞，没有被阐明实行。孔子的仁义道德理论不阐明不实行，又怎么能希望有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时代的治国安民功效呢！

只有我朝圣祖皇帝承继得尧舜、孔子道统的真谛相传，所以，君临天下六十余年，深仁厚泽，遍及于四海内外，已经可与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相媲美。我当今皇上以天赋诚信聪明睿智，生而知之，安然行之的才质，加上当初在藩第四十多年，深刻研究道德义理的功效，已从尧舜、孔子的道统，汇合圣祖皇帝家教的精蕴义旨而集其大成，不仅与尧舜、孔子的道统真谛相传没有不同，并且比圣祖皇帝的一切安邦治国策举更有光彩了。这就是上天与世人感通互应，随时随地没有不被信诚而验证的。如果具有从古到今所没有的德行义理，自然能成就自古到今所没有的治国安民的丰功伟业，具有了从古到今所没有的治国安民的丰功伟业，也就能具备从古到今所没有完备的吉祥征兆。这个道理是一定不会变化的。

这次因山东孔庙大成殿上梁之前二日，祥云五彩斑斓，拱扶捧日，光华融露于曲阜县上空，这都是因为孔子的圣心与上天浑然成为一体，相互通融，孔子之心就是天心。今日皇上之心与孔子之心相融合一，就是与天心融合为一。而祥云显现于曲卓上

空，适逢在兴修圣庙之时，这是上天所以赞许皇上之心与孔子之心融合一体的体现，比起显现于云南、贵州、山西等省的祥瑞兆，更值得庆幸。皇上的圣德融合于孔子，而感动信服于上天更是到了极点。这就是在海内全国之中，文明光华极盛际会，而在民间百姓中是没有的。

我这滔天重犯从前愚昧无知，并不知道天高地厚，因此被流言所煽诱，而轻妄地发出万刚不赦的逆说狂言，如今追悔莫及。现在既然一切生命都被化育于天高地厚之中，自己感受认识的比别人更深刻，信服的比别人更诚笃，到如今只有尊奉皇上，亲近皇上，爱护皇上，拥戴皇上，传颂这从古到今所没有的文明光华之圣德神功而已，又有什么话可解说。

曾静供词五条

一、皇上嗣位以来，是五谷丰登，人民乐业？还是四时易序，五谷少成？

【原文】 问曾静：你书内云“五六年之内，四时寒暑易序，五谷耕作少成，恒雨恒暘，荆、襄、岳、常等郡，连年洪水，吴、楚、蜀、粤，到处旱涝时闻”等语。皇上嗣位以来，阴阳和顺，风雨时调，五谷丰收，人民乐业。各省之内，间有数州县旱涝不齐，即动帑赈济，民获全安。

今你所说四时易序，五谷少成，确是何年、何月、何地呢？吴、楚、蜀、粤到处旱涝，确有何见呢？至于荆、襄、岳、常之地，有你这样狂背逆乱之人，伏藏匿处其间，乘幽险乖戾之气，致阴阳愆伏之干，以肆扰天常为心，以更弃人理为志，自然江水泛涨，示傲一方。灾祸之来，实因你一人所致。你知道么？有何说处？

曾静供：这是弥天重犯僻处山谷，正如坐井议天模样，不知天壤内如许广大，见偶尔一处旱涝，遂谓旱涝时间，不知时序调和，丰收乐业，不早不涝者，此外遍地皆是。此正不得事体之实，而其根实由眼孔小，不通世事之故也。且当时实不知皇上深居九重，视民间疾苦直如赤子痲痺，一遇偶尔旱涝，即动帑赈救，且免其赋供。弥天重犯今日始知圣恩高厚，虽尧舜不过如此，则愚顽无知之罪，实所甘受。一民狂背，皆足致灾，此则非

精通天人之际者不能知，弥天重犯闻之，豁然如大寐初醒，虽朝闻夕死，亦实幸矣。

【译文】 问曾静：你在书里写的所谓“五六年之内，四时天气寒冷变化异常，五谷耕作少成，不是常常阴雨连绵，就是常常干旱不断；荆、襄、岳、常等郡县，连年暴发洪水；吴、楚、蜀、粤等地区，到处可见旱涝灾害”等语，是什么道理？当今皇上即位以来，阴阳和顺，风雨得时，五谷丰登，人民安居乐业，各省之内，即使有少数州县，有点旱涝不均，朝廷立即给以赈济，使问题及时得到了解决，人民生活获得安定。

而你所说四时易序，五谷少成，到底是何年、何月、何时、何地？吴、楚、蜀、粤到处有旱涝灾害，有什么证据呢？至于荆、襄、岳、常之地，我看有你这样反叛朝廷、狂背逆乱之人隐藏其间，心里时常怀着不满，阴谋违法作乱，致使天常被扰乱，人理被灭弃，阴阳失调，四时易序，所以才有江水泛涨之类的灾害发生。这是天常人理在警告你这种人。这些灾祸的出现，完全是因为你一人所致，你知罪么，你有何辩解？

曾静供：这是弥天重犯住在偏僻的山谷野村，就像青蛙坐井观天一样，不知天高地厚，偶尔见一处旱涝就说成是旱涝经常可见，而不知道到处是时序调和，五谷丰登，百姓安居乐业的情况。这都是因为小民不了解全国总体实情，根源在于目光狭窄，不懂世间事物的发展规律。况且当时确实不知道皇上虽深居皇宫深院，也能体恤民情，一遇偶尔的旱涝灾害，便立即动用府库的钱粮，对灾区给予救济，并及时减免赋税劳役的真实情况。

弥天重犯今天才知道皇恩浩荡，虽尧舜再世也不过如此。小民的愚顽无知之罪实在不小。一个小民狂妄背叛朝廷，足以导致当地发生灾害，这个道理若不是精通天人感应的玄奥之人，是不会理解的，弥天重犯今日才豁然开朗，如大梦初醒，即使像孔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也是万分幸运的。

二、雍正皇帝是励精图治，爱抚百姓， 还是谣言所传的虐待百姓呢？

【原文】 问曾静：你书内云“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等语。我皇上夙夜孜孜，勤求治理，爱养百姓之心，无时不切于寤寐，无事不备其周详。屢年来大沛恩泽，薄海黎庶，莫不均沾。旧欠钱粮，蠲免几及千万，江浙等处浮粮，每年减免六十余万；至于赈恤蠲除，以及豁免之处，其数至多；南北黄、运河堤工，兴修水利，开种稻田，察吏安民，弭盗除奸，一切实心实政，日昃不遑。

其所以抚天下之百姓者，洵乃养育诚求，如保赤子，所以抚之者至矣。海宇内外，无不深元后之戴。今你不以为抚，而以为虐；不以为后，而以为仇。此是何肺肠？且虐民者何事？你将所见实说。

曾静供：皇上至德深仁，遍及薄海内外，其用意于民，固可谓亘古少媲。弥天重犯住在远方，不晓世事，不知天高地厚之恩，但见承平岁久，生齿繁多，远方之民，富者田多，而贫者或至无田。皇上屢年大沛恩泽，蠲免旧欠，减免浮粮，动计几百万，扶养非不极其至，然只有田业者，饱饫其惠，而无田业的，多致憾于雨露之不均。

直至旧年到省，今年来京，方知皇上有几多爱养善所，有几多扶绥经画，端拱深宫，忧勤惕厉，无事不周，无微不到，且无时无刻不以天下苍生为念。功德昭然在目，传颂哄然满耳。

自古圣帝贤君，用意加惠于民，称元后，颂父母，载之史册，垂之经典。以今准古，实所罕闻。此今日海宇内外，所以共深元后之戴。以弥天重犯如此狂诋，如此触冒，尚有几多钦恤，几多宽仁，恩惠频施，被服愧悔，直不啻如天如地之感。则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广，无一发一物不在涵育生成之内，尤不等言矣。

弥天重犯前之所以不以为抚，而以为虐者，总为谣言所掩隔，遂使帝德难名，食其力者忘其力，王道同天，蒙其化者自不知其化耳。

【译文】 问曾静：你在书里所谓“抚育我的就是我的君主，虐待我的就是我的仇敌”等话是什么道理？当今皇上自即位以来，勤于治理，常常是夜不能寐，批阅奏章，每每是呕心沥血，爱养百姓之心，处处都可以体现出来。这些年来，四海百姓无不承受圣上的恩惠。对于过去欠纳的钱粮，减免了几乎一千万两银子，仅江浙等处浮粮，就每年减免六十余万两。至于赈济抚恤，减少取消，以及豁免之处，更是不计其数。浚筑河堤，兴修水利，开种稻田，察吏安民，缉盗除奸，一切政务之事，都真心实意，一天到晚忙个不停。

皇上对天下百姓的抚慰、爱护是备至的，所以普天之下，无不颂扬为父母，爱戴称为天子。今你不以抚慰为恩德，反而认为是虐。不以皇上为父母，反而认为是仇人。这是何种心肺，何样肝肠？你认为朝廷虐民，都有什么事可作凭据，你把你的所见如实说出来。

曾静供：皇上的恩德、仁义，遍及海内外，他对天下百姓的体恤之意，可以说自古以来少有的。弥天重犯住在偏僻的远方，不明事理，不知天高地厚之恩，只是片面地看到远方之民，贫富悬殊，富者田多，贫者无田，而皇上历年来普降恩泽，豁免旧欠，减免浮粮，动不动就是几百万，抚养爱恤百姓，真是周详备至，然而只有那些有田产的人家，饱受其惠，而没有田产的人家，大多感到雨露不均。

直到去年到省城，今年来京城后，才知道皇上有这么多爱养善政，这么多抚慰计划，才知道皇上虽深居皇宫，但对天下百姓的事却关怀得无微不至，没有一刻不以天下苍生为念，真是功德昭然在目，传颂哄然满耳。

自古以来，圣帝贤君恩泽于民，百姓把他们称为天子，颂扬

为父母，记在史册之上，载在经典之中。拿今日同过去相比，实在是非常少见，今日四海之内，就已经可以看到百姓爱戴皇上，已经颂扬真命天子了。就说以弥天重犯我这样狂妄地诋毁、冒犯，还受到皇上这样宽大对待，真是非常惭愧和后悔，总感到皇上的恩德比天大，比地厚。其实，四海九州，天下生灵，没有一民一物不时刻在皇上的恩德涵育之中，这是不用说的。

弥天重犯我过去之所以不以为抚，反以为虐，主要是听信了谣言，没有看见皇上的恩德，所以恩将仇报。现在想来，这真是王道如天一样，高深莫测，蒙受它的感化而自己却一点也不知道。

三、皇上调拨粮食是平抑物价， 还是倒卖粮食做生意？

【原文】 问曾静：据你在湖南供称，有“皇帝使人从四川贩米至江南苏州发卖”，又云“广东、广西发卖水银”等语。这卖米事情，乃外省督抚条奏：江浙地方人多米贵，请动帑项于产米省份，采运平糶以济民食。此是古人移粟之道，且此项运到米石，皆减价糶卖于民，于正项钱粮尚有亏折。如何说贩米石争小民之利呢？至水银之事，乃因原任贵州巡抚金世扬亏空库努，不能完交。署巡抚石礼哈奏称：金世扬有动帑收贮水银，可以变价完公。皇上以其所请，令于广东发卖，乃系保全金世扬身家性命，实出宽大之特恩。你如何说为争民之利呢？但此二事皆有其因，你在何处听来？须将传说之人供出。

曾静供：弥天重犯于这些事，当时都不晓得皇上神奇作为，经纬妙用。从四川贩米至江南苏州发卖的事，这等谣传，是这些往来搬家去四川的百姓回来说；广东发卖水银，是因走广东往永兴县过，弥天重犯是永兴县人，虽住居离县城百数十里，而乡间常有人在县来往，传得此说，并非远方人说。岂知卖米是移此就

彼，乃酌盈济虚，圣人裁成辅相之能事，而平糶与减价尤一视同仁，万物各得其所之献谋。至变卖水银完公，则又体恤群臣，使法无犯而事得济，且有以见天地含弘之量，物各因物，而无伤于其中也。

此皆帝王之运量，小民不知皇上苦心，遂至妄传，以为卖米、卖水银。而弥天重犯彼时莫知圣虑高深，遂误信以为争民之利，不知此乃利民之大者也。诬上之罪何逃！

【译文】 问曾静：据你在湖南的供词中有“皇帝使人从四川贩米到江南苏州发卖”、“广东、广西发卖水银”等言语。

这卖米的事情，是外省督抚上奏皇上时向皇上建议：江浙一带人多米贵，请求动用国库里的银钱，从产米的省份收购之后，再运到江浙，平价卖给百姓，以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办法，况且，又减价卖给百姓，朝廷还亏着本哩，你为什么说贩卖米石争夺小民之利了呢？

至于水银的事，是因为原任贵州巡抚金世扬在任时，由于各种原因，落得府库亏空，不能完满交接，所以新任巡抚石礼哈向皇上报告了此事：建议将金世扬原来动用府库的银两收贮的水银，变卖后充公平账。皇上允许他的请求，令他在广东发卖，这不但解决了国库亏空的问题，而且也保全了金世扬的身家性命，这是特别宽大的恩惠。你为什么说这是与民争利呢？不过，这两件事既然流传，必有原因，你是在什么地方听到的？你要供出传说之人。

曾静供：弥天重犯对于这此事，当时不知道这是皇上的经纬谋划和恩赦安排。从四川贩米到江南苏州发卖这件事，是往来搬家去四川的百姓回来说的；广东发卖水银的话，是那些行走广东的人路过永兴县时说的。弥天重犯是永兴县人，虽然居住地离县城一百多里，但是乡里常有人在县城来往，所以听得此说，不是直接听远方人说的。那里知道这是移此就彼、酌盈济虚的办法，况且平糶与减价一模一样。变卖水银完公，确实又是体恤臣下，

这是皇上办法得当，气量宽宏，小民不知皇上的苦心，妄加指责。弥天重犯当时确实不知圣虑高远，错误地相信人言，以为朝廷与人民争利，今日才知道完全相反，而是利民益民的好事，诬蔑皇上之罪，真是难以逃脱。

四、雍正皇帝是有好生之德，还是草菅人命，滥杀无辜？

【原文】 问曾静：你在湖南供内有“极好杀人，京城凛凛”等语。我皇上如天好生，自元年以来，凡矜恤民命之案，不可枚举。即今四月十一日以后，现有督抚及刑部拟定之案，如云南之黑夜杀人八十二岁老妇何氏一案；广东之殴伤服叔谢伯达一案；江西之不知情奸妇刘氏一案；安庆之误伤兄命郭国正一案；浙江之误伤妻命曹道生一案；山西之父为代首之劫盗查声闻一案。凡有一线可生者，皆令九卿详议，从宽减等。

又逃纵之窃盗赵玉等一案，私铸钱文之张仙等一案。或以愚人未知定例，或情罪稍轻，俱从宽减。至同殴庶母之曹霖一案，以情罪尚轻，不忍处以极典，命确查定议。其廷臣所议，如定捕役治罪之例，符咒作奸之例，皆以未曾议及通行晓谕，及与以遵奉之期，敕部另行详议。

此数日之内，成谏具在，可逐件与你详看。难道曾静未到之先，皇上预知你来，特为此详刑之事，以示宽大之恩么！这传说纷纷，“极好杀人”之说，确有何人枉杀？确于何年何月日滥杀一人？并传说何人？你须一一据实说来。

【译文】 问曾静：你在湖南时的供词里承认说过“极好杀人，整个京城都感到寒气逼人”的话。我皇上像天地一样，有好生之德，自元年以来，怜悯体恤民命的案件，不可胜举。就说今年四月十一日以后，督抚及刑部已经拟定的现有案件，如云南的黑夜

杀人的八十二岁老妇何氏一案；广东的殴伤服叔谢伯达一案；江西的不知情奸妇刘氏一案；山西的父为代首之劫盗查声闻一案；安庆的误伤兄命郭国正一案；浙江的误伤妻命曹道生一案等等。凡有一线生存的希望，皇上都是令九卿大臣详细再议，从宽减罪。

又有逃纵的窃盗赵玉等人一案，私自造钱的张仙等人一案。有的因为愚鲁，不知道国家规定的条例，有的是因为情节稍轻，一律从宽处理。至于共同殴打庶母的曹霖一案，因他的情节尚轻，不忍心处以极刑，命臣下查定确实之后最后议定。根据廷臣所讨论决定的，例如规定捕役治罪之条例，利用符咒诈骗的处罪条例，都因为过去未曾向天下讲明，让有关部门另行详议。

这几天以内，现成的文案材料具在，可以逐件拿给你详看。难道说你曾静没有到来之前，皇上预知你来，故意作假给你看的吗？这传说纷纷“极好杀人”之说，到底有哪个人被枉杀？何年、何月、何日滥杀过一人？传说杀了什么人？你必须一一据实说来。

【原文】 曾静供：弥天重犯始以不知人情世事，误听谣言，发狂作悖，而身陷极恶大罪。自事发到长沙，及今大半年，旁听市井传颂，历睹当世休嘉，乃知圣德渊深，光被四表，原无丝毫瑕类，久为普天所共仰。到京以来，无一时一刻不痛悔感泣，惶愧悚栗，不惟无面见人，抑且无地自容，加以皇恩屡颁，更觉受恩愈重，罪过愈深。古从来有这样圣天子抚绥万方，直及于禽兽不如之重罪者乎！复蒙谕旨下问，于本月十一日，大人仰承旨意，恭捧皇上御批九卿所奏民间重案，国典条例，弥天重犯跪伏阶前，敬读感服，不觉惶恐汗背。虽圣虑高深，不能仰测毫末，而一种体天好生之德，焦劳爱养之念，盎然见于御批之下，实足令人感泣无穷。

如云南所奏之黑夜杀人，以主谋造意，归于八十二岁之老妇，拟斩。复将其子何汪、何世逵、何永杰为同谋拟绞。盖妇人

夫死，义当从子，何汪何故不谏止其母，而轻从八十余岁之老母以杀人，且开场下手打伤，何汪已有明供，似难更扯别人拟抵罪，而黑夜抱草烧尸，尤非八十余岁之妇人所能，今以何氏拟斩，复以三子拟绞，似伤人命太多。又广东之殴伤服叔，此因争祭田，县断银田，两未交清，谢日习亦不合持棍至谢伯逵门首詈骂，与平昔越分无礼，强悍而殴尊属致死者，必竟不同。又江西之不知情奸妇，此通奸在前，谋杀在后，两事不相涉。光离居又已多年，刘氏夫妻之义未绝，且有子八岁，岂肯弃夫以从奸！律之所谓“奸夫自杀其夫，奸妇虽不知情，绞而监候”者，此正就通奸时看，非若刘氏之别居有年，此时并无奸意萌发也。此三条圣虑通微，照及民隐，所以不肯依拟，而敕九卿议奏也。

【译文】 曾静供：弥天重犯开始不知人情世事，误听谣传，发狂作乱，使自身陷入罪大恶极的境地。自从小民的案发到长沙至今大半年之间，旁听市井传颂，历睹当世美好，才知道圣德渊深，光被四表，原没有一点过错，久为普天之下所敬仰。自从到京城以来，无时无刻不感到痛悔，不但觉得无脸见人，而且也感到无地自容。加上皇上一次又一次宽大处理，更觉得受恩越重，罪过越深。古往今来，哪有这样的圣明天子，不但抚慰万方，而且对一个禽兽不如的重罪之人，这样恩赦有加。

现蒙谕旨下问，于本月十一日，大人曾仰承旨意，恭捧皇上亲手批示的九卿所奏的民间的那些重要案件及国家条例，典章制度，让弥天重犯跪伏阶前，直接目睹敬阅，真是万分感服，惶恐汗背。虽说圣虑高深，不能仰测毫末，但是皇上的体天好生之德，操劳爱民之念，明明白白地见于御批之下，真是令人感慨，让人激动得流泪。

就说云南所奏的黑夜杀人一案，把主谋定为八十二岁的老妇判以死刑，又把她的儿子何汪、何世逵、何永杰也当作同谋判以绞刑。其原因是妇人的丈夫已死，按三纲五常之义，老妇应当听从儿子的，这样何汪为什么不谏阻他的母亲，而轻率地顺从他的

八十余岁老母去杀人，而且当场下手打伤，何汪已有清楚的供词，好像难以再拉扯别人抵罪，然而黑夜抱草烧尸，这不可能是八十余岁老妇所干得了的。这个案件把何氏判以死刑，又把她的三个儿子处以绞刑，好像的确伤民命太多。又有广东的殴伤服叔一案，因为祭田引起争执，县衙已经断了银田，双方交清，但是谢日习也不该手持棍棒至谢伯逵门前大骂，这与平日那种越分无礼，恃强凌弱殴打长辈致死人命的情况不同。又有江西的不知情奸妇一案，通奸之事发生在前，谋杀之事发生在后，两者并没有牵扯。况奸妇与其夫分居已有多年，刘氏夫妻的情义未绝，而且还有八岁的孩子，哪肯背弃丈夫而去从奸杀人？法律中有关于“奸夫自杀其夫，奸妇虽不知情，绞而监候”的条文，这正按通奸来看，不因为刘氏别居多年，此时不可能萌发奸意。这三个案子，皇上考虑的真是细致周到，明察秋毫，着意关照民间的隐情，所以不肯依照原来的判决，而令九卿再行复议，尽可能处理得当。

【原文】 又江西之误伤兄命，此郭国正、郭国宾兄弟相好，素无嫌隙，因催丁钱小事，拂意生怨，且先是郭国宾以酒壶掷国正不中，而郭国正拾原壶反击郭国宾，以致殒命。初非立意杀兄，执凶向前殴击致死，是以改应斩监候。又曹道生之妻汪氏不循妇道，夫索茶不与，嗔责不受，反拾石还击，以头撞夫。道生气忿，乃用柴片连殴，以致殒命。此是汪氏自失三纲大义，非本无犯而道生有意欲杀，律当拟绞也。皇上从宽枷责完结，不惟使夫妇之义正，而钦恤之恩，益觉有加而无已矣。又查声闻虽盗首，实非本意行劫，乃误听李瞎子之言，志在焚毁契券，以图复占。此愚民无知，情有可原，所以一经伊父代首，圣心病痲之念切，意许原例从宽免死，此皆一线可生，我皇上不忍置之死地也。

又如赵玉、田群、刘五以犯盗监禁逃纵，例当加倍治罪。圣虑谓此本系行窃愚人，未必知有逃纵加倍治罪之例，其所犯罪，仍照旧拟。且敕部颁飭天下衙门，将新例张示禁门，使犯罪囚

人，入监即知。又私铸钱文，律斩立决。张仙等私铸，睿照分出张仙以造卖铜器为业，因禁止黄铜器皿，遂将所存之铜私铸钱文，其罪与公行私铸者有间，着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是不惟钦恤民命到至处尽处，并分出小民犯科到公私之极处，所谓茧丝牛毛辨析精微，竟至如此。

【译文】 又有江西的误伤兄命一案，因郭国正、郭国宾兄弟相处很好，平常本来没有一点隔阂，只因为催要丁钱小事，产生了怨恨。开始是因郭国宾拿酒壶砸郭国正，没有打中，而郭国正拾起对方砸过来的酒壶反击郭国宾，以致杀伤人命。最初并不是故意杀害其兄，一时上前反击致死，所以改为应斩监候。又如曹道生的妻子汪氏不循妇道一案，丈夫要喝茶，她不给端，丈夫责怪她，她不但不接受改正，反而用石头还击，并且用头撞她丈夫。曹道生一怒之下，用柴片连连殴打汪氏，以致殒命。这是汪氏自己有失三从四德，而导致的命案，并不是本来道生有意杀害，按法律判的是绞刑。皇上让从宽枷责结案，不但使天下夫妇之义正，各循其道而且体察抚恤民情的恩德，真是太大了。又有查声闻的盗窃一案，他虽为盗首，其实并不是有意去行劫，因为误听了一个叫李瞎子的话，目的在于烧毁文契证券，以图复占。这种情况是愚民无知所致，情有可原，所以一经他的父亲代为首，皇上关怀百姓疾苦如圣心真是殷切，准许从宽处理，免去死刑。这些事例都说明了，百姓的案件中，只要有一线生存的希望，皇上都不忍心将其置之死地。

又如一些案件如赵玉、田群、刘五因犯盗窃罪而被监禁后又逃跑，按律当加倍治罪，圣上考虑他们是无知愚民，未必知道监禁后逃跑还要罪上加罪，所以仅按盗窃罪维护原判。并且把犯罪监禁后逃跑要加罪的条例明文颁发给天下衙门，公开张贴在监牢门口，使那些犯罪的囚徒，入监的时候就让他们知道这些规定。又有私铸钱文，律斩立决一案，张仙等人私铸钱币，由于他以前以造卖铜器为业，因公家禁止用黄铜器皿，所以就把他所存下的

铜私自铸成了钱币，其罪与公家造钱部门私铸有些区别，所以也改为死缓，等到秋后处斩。这不仅说明圣上钦恤民命到至处尽处，而且对小民犯罪与公家犯罪也区别得这样细致，这真如茧丝同牛毛混在一起，也能辨别出来一样，竟是细致入微到如此的程度。

【原文】 又如曹霏同殴庶母，照律拟凌迟，似亦当罪。御批乃谓当孙氏挑唆曹霏怪，共殴狄氏之时，曹霏先不在旁，孙氏差使女小春唤至。曹霏听从父母之命，助殴狄氏，而狄氏至九日殒命，是曹霏虽行殴击，原无致死之心。曹霏著改应斩监候，秋后处决。盖因案呈有“孙氏差使女小春往唤曹霏”句，从此一句，遂推原曲谅，恰当其情，恰合其事。我皇上神明照烛，无微不至，又至如此。又如周元伯与周见南比屋而居，因春米争碓，彼此詈骂，而周见南遂为周元伯殴伤。部议应斩立决，而旨下九卿议奏，不忍遽尔依议。

看来皇上抚育天下苍生，纯是以道，并无一点用法之迹。盖道无定体，随时随地，变易无常，非大圣人之智虑精微，明聪天纵者不能用；法虽从道出，然一落乎法，就拘泥执滞，不能活变了。所以先儒谓三代以道治世，后世以法把持天下。如后世贤君算汉文、景，然文、景得黄老之术，全是以法，故谓黄老清静，流于惨刻。如犯死者，依法即以死抵，并不肯留心于其中推原曲谅其致死犯罪之由，任天下事来，皆以成法成例断之，所以得以清静无为。岂若皇上仁心恳至，全副精神尽用在民身上，宵衣旰食，至劳至勤，有几多斟酌裁制，权度时中，大用在其中，卓然与尧舜、禹汤同归一致。

又如御批捕役治罪之例，符咒作奸之例，必须通行晓喻以遵奉之期。凡有改定科条，俱宽其期限，悉令家喻户晓，如此而犹有不率教者，加以严惩，始为不枉。今法司更定律例，而不示以遵行之期，则彼无知之人，冒昧而犯重辟，是谓不教而杀，于心忍乎！看到此处，觉得一种念切生民之隐，此文王之视民如

伤，更切更笃，惟恐民之无知，而自陷于法，这就是个天了。盖皇上宸宫，浑同天体，天之元气流行，直贯四时，故当秋肃，未尝不寓春生之机于其间，所以皇上用刑，亦有几多宽仁慈惠的苦心流贯于其中。故未事之先，既有许多善政善教，以移民恶而迁于善；万一偶入于刑，所以体恤而原谅之者，又无所不极其至。即今四月十一以后，数日之内，略举数端，莫非“肫肫其仁”之发。况前乎此者，不知几万千；所经纶裁制神运无方，常情不可得知者，又不知几万千。由是看来，皇上之好生德治，施及薄海，困难以数计矣。

【译文】 又如曹霨同毆庶母一案，按照法律应凌迟处死，也没有什么说的。皇上的批示中根据情况分析了孙氏挑唆曹霨怪，共同毆打狄氏之时，而曹霨最初并不在旁边，是孙氏指使使女小春去把曹霨叫过来的。曹霨听从父母之命，帮助毆打狄氏，致使狄氏伤势严重，到第九日就死去，此案中曹霨虽行毆打，但原本没有要把狄氏致死之心。因此把曹霨改为死缓，秋后处决。这个案呈中只因有“孙氏差使女小春往唤曹霨”一句，就引起了皇上的高度重视，马上推究原由，恰当定案，改判从轻。以此看来，我皇真是神明照烛，无微不到，用心良苦。又如周元伯一案，周元伯与周见南是邻居，两家房屋紧挨着，因为舂米争碓，两人互相谩骂起来，后来又打起来，周见南遂被周元伯打伤。刑部议案判为应斩立决，而皇上下旨又让九卿再议，不忍因一次打架致伤而判为死刑。

看来皇上抚育天下苍生，纯粹是以道德教化，并没有一点用法的迹象。大概“道”这个理十分玄妙、深奥。没有一定的形体，混然于天地之间，随时随地变化无常，不是大圣贤、大智慧之人是掌握不了的，也不能运用灵活的。法律虽然根据道来制定，但是一旦落到具体法规，就有些死板，局限，不灵活了。所以先儒已经讲过，三代以道治世，而后来则以法把持天下了。如后世贤君要算是汉文帝、汉景帝，然而文、景得黄老之术，全是

以法，所以说黄老清静，但流于惨刻。他们也没有把道用活，没有真正领会其精神，如果碰到犯死罪之人，依照现成的法而让他抵命，并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管其中有什么原因，都是按现成的死板条文、死板条例去断，就可以清静、无为、省事。哪有像当今皇上这样仁心恳切，全副精神、全副精力都用在百姓身上，日理万机、废寝忘食，凡事斟酌权衡，处处体谅下情，真是与古代圣君尧舜、禹汤没什么两样。

再比如说御批捕役治罪之例，符咒作奸之例，由于事先没有告诉百姓的条文，百姓犯了这方面的罪，也给以宽宥，不予治罪，等颁布了条文规定，公布给百姓之后，再有犯者，才加以严惩，这样才不使百姓冤枉，决不忍心于不教而杀，不教而惩。看到这里，感觉得皇上那种爱护百姓之感情。比文王对待百姓的心情更切更笃。唯恐百姓无知，而犯了法度遭受苦痛，这就是个天了。大概皇上的宫殿，如天体一样，大自然的元气周流四时，无所不包，即使当秋天处于肃杀寒冷季节时，也无不包含着、孕育着春天的生机，所以许多事情发生之前，就已经有了许多善政善教，使许多人改恶从善，如果是万一犯了刑科，也仍然根据具体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查根追由，有的得到体恤，有的得到原谅，有的得到从轻发落。这真是仁至义尽了。就说近期从四月一日以来，短短几天，略举几例，没有一件不体现出皇上的仁德，何况这以前呢，更不知有几千几万。还有那些常情不可得知者，又不知有几千几万。由此看来，皇上的好生之德，普及四海的仁政，确实是难以用数字来表示的。

【原文】 况皇上勤民之下，敬天之念，尤无一时少懈，一时放过。如御批圣衍公孔传铎之奏贺卿云本章，江南学院李凤翥之奏贺瑞芝本章，一字未安，一义未当，亦所不受，皆不肯以臣工颂扬之词略过。而圣谕所颁，谓“朕之事天，亦犹臣之事君也。臣之视君也，以为九重之尊；而以人君视天，其相越之分，又不啻九重而已也。设以属员颂其上官，而称为‘上所崇奉’，或称为

‘福与君齐’，彼为上官者，能安受而不战栗乎！今以‘效灵齐天’等语见诸奏章，其背理慢神，何以异是？”细玩此段，虽皇上德隆心下，谦光自贲，其实理正义大，至精至当，至实至透，为自古圣君哲后所少到，自当永为万世之法程。

况皇上敬德之至，心细之极，一字之讹落，皆为睿鉴所洞照。如李凤翥贺本内，讹“贲”字为“赆”字，总督示其倬题参蔡国骏本，案呈内有“勒索官兵饷银二三两”句，落“两”字，经历多少衙门对过，多少大臣用心看过而不及，到今皆为皇上摘出、指出。自古帝王一日万机，多听内阁分理，即所阅览臣工本章，亦只看贴黄，贴黄尚虑不能周，何暇及于案呈！况案呈已经许多官员查照不出，而能知之乎！即此不惟见皇上留心国政，至周至密，抚育苍生，至劳至苦，而且见圣学主敬之纯。盖所谓敬者，无一毫苟且，无一事轻忽，神聚到极处，心细到至处，无一不极其精，无一不尽其详而已矣。故帝尧称圣以钦德为先，孔圣修己以持敬为本，而《中庸》归宿学问到尽头处，亦曰“笃恭而天下平。”今我皇上细密如此，正所谓“先圣后圣，同揆合符”者也。

【译文】 皇上不但勤于民事，而且敬天之念也没有一时一刻懈怠，没有一时一事放过。如御批衍圣公孔传铎之奏贺卿云本章，江南学院李凤翥之奏贺瑞芝本章，都是因为一个字不准确，因为一个意思不确切，而不随便接受。而且都不肯有大臣的颂扬之词而忽略不问。如皇上在圣谕里批道“朕的事奉上天，就如臣下事君那样，臣把君看作九重之尊，而人君看待上天，也同祥看作九重之尊。假如各级官员称颂他的上司，说成是‘上所崇奉’，或者称成是‘福与君齐’，那么那个上司能心安理得地接受而不感到害怕吗？今在奏章中把皇上赞扬为‘效灵齐天’其不是违背理义、轻慢神灵、陷朕于不义吗？”细细地体会这些话，真是十分实际也十分透彻，可以说是自古圣君贤后所达不到的见地，自然应该永远当作后世的法规格式。

皇上敬仰道德到了极点，心细也到了极点，臣下呈上来的奏章，即使出现一个字的错误，也能发现并及时地指出来，例如李凤翥的贺本之内，误把“赉”写作“賚”字；总督高其倬题参蔡国骏本，案呈内有“勒索官兵银有在二三两”的句子，句子落掉“两”字，这已经经过了多少衙门校对过，多少大臣用心看过，也没有发现，结果皇上一看就指了出来。从古至今，作帝王的政务繁忙，日理万机，大多是听听内阁大臣的现成意见和结论，即使阅览一些臣下的奏章，也只是仅仅看看贴黄，有的时候恐怕连贴黄也顾及不到，哪有时间去细看案呈文件。况且案呈文件已经有许多官员层层把关都发现不了问题，一般情况下皇上怎么能知道呢？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皇上留心国政，真是太周密太细致入微了。关心天下苍生，真是劳累，真是辛苦，同时也可以看到皇上的学问渊博精深，对国事敬业负责。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一点马虎，一点轻视，都是聚精会神地处理问题，没有一件竭尽心思，没有一件不做得周详。所以帝尧称圣人是以钦佩德政为先，孔圣人修养自身是以坚持敬天为根本。而《中庸》一书的主旨也是“笃恭而天下平”。今天我皇上处理政务如此地细致和周密，真可以说是“先圣后圣，同揆合符”了，同过去的圣君没有什么两样了。

【原文】 弥天重犯山野庸鄙，毫无知识，岂能仰测天地的广大！但今日蒙旨下问，直据所见而心悦诚服如此，其实皇上经纬大用，参赞弘漠，弥天重犯何人何物？从何得知？况从前僻处深山，全未识睹天日，即有意见，亦属蝼蚁度天，何处测其高深？所以谣言一入于耳，即信以为实。今承大人捧出本章，有说马廷锡讹传说：皇上因钦天监启奏，紫微星落在福建地方，为此特差大人赴闽，凡三岁以上，九岁以下男子，尽行诛灭。现有巴兰泰一同听见可据。若使弥天重犯当日听闻，一定以为实事而笔之于书矣，小民无知，大率多同，况弥天重犯尤处深山穷谷中，为小民无知中之无知者！必到今日，一路所听闻如此，所目见如此，

身亲被皇恩如此，今日又亲眼看见皇上用意于民如此，焦劳于治政如此，方实信得皇上德同天地，明并日月。从前在长沙，蒙三位大人屡将圣德宣传，心下虽亦信服，而犹未脱夫旧惑之深也，至今方拨云雾而睹青天，朗然日月之当心，自是知之明、见之切矣。但憾身陷法网，不能旋归故里，宣传皇上大德遍覆，如天如地；圣哲精明，如日如月；洪慈爱养，如父如母。使亲戚故旧，邻里乡党以及沿途所过市井都邑，共传圣神文武，共庆有道天子，共歌太平盛世。且使山陬海澨，共愤共恶造言流谤者之奸，而憾不共食其肉而寝处其皮，未免死难瞑目，深痛无以报皇上之万一耳。

【译文】 弥天重犯是山野之间的庸俗卑鄙之辈，没有一点知识，怎么能仰测天地之大呢！但是今日既蒙旨下问，根据自己的一点所见就心悅诚服，其实皇上有经纬策略，远大规划，弥天重犯算什么，怎么能够了解呢？而且从前僻处深山好像未曾见到天日一样，就是有点意见，也不过是像蝼蚁那样，而以此揣度广大的天地，怎么能够知道他的高深呢？所以一听到谣传，就信以为真。就拿近来的一件事说，承蒙大人捧出本章，上面讲到马廷锡讹传消息说：皇上因听信管天文的官员钦天监启奏，说紫微星落在东南福建那个地方，会有帝王出现，危及本朝，所以特派大人赴福建一带，把凡是三岁以上，九岁以下的男童，全部处死。现有巴兰泰一同听见可以为证。这个事，若让弥天重犯当时听到，一定会以为是真事，并且写到书里去的。小民无知，大概都是差不多一样，况且弥天重犯处于深山穷谷之中，可以说是无知小民中最无知的。不到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经过一路上所见所闻，而且亲身感受到皇帝的如此恩惠宽宥，并亲眼看到皇上对百姓这样悉心爱护，对政务这样操劳。才实实在在地信服皇上仁德同天地一样广大，同日月一样光明。从前在长沙时候，承蒙三位大人多次对小民宣传皇上圣德，虽说也信服，但是还总有些疑惑，并不全信。到今天为止，才真是拨开云雾见了青天，心里才

豁然开朗，这一切都是这样地明明白白，真真切切！但遗憾的是，自己陷入法网，不能回到老家，去宣传皇上如天地一样的恩德，像古代圣君那样的明哲，像父母一样慈爱百姓，以便使亲戚故旧，邻里乡党以及沿途所过之地，共庆圣神文武，共庆有道天子，共歌太平盛世。同时使山角海边，都痛恨和反对那些造谣诽谤的奸人，恨不得吃其肉，寝其皮。虽死亦难以瞑目，即使如此，也痛感不能报答皇上万分之一的恩德啊。

五、雍正皇帝是霸嫂为妃，还是按照惯例让她们居在别宫呢？

【原文】 问曾静：你在湖南供内，有“将二爷的妃嫔收了”等语。当日密亲王之妃，于康熙五十七年内已经病故。其余宫人等，密亲王病故之后，皇上念理郡王难以养贍多人，或至少有失所，于密亲王甚有关系。是以特降谕旨，令理郡王之生母分别区处，并传旨询问诸人，若有仍愿居宫中者，悉如圣祖皇帝之老妃居守寿宫之例。于时宫人有愿居宫中者，皇上令其另居别宫，厚加康给以贍养之。此是皇上加恩密亲王宫人之盛德，凡宫中之人及廷臣所共知者。今你这话从何处来？又你以密亲王为三爷，语虽讹传，必有乱说的人，你可据实供出。

曾静供：收妃嫔的话，是雍正五年五六月内，往来路上人传说，衡州路上押解一个犯官过，他如此说。弥天重犯听得此话不察，妄以为此话自犯官说出，毕竟是实事。其实到今日，万万记想个传说的人不出，亦不知是个什么犯官，查朝中那年那月，有什么犯官往衡州过就晓得。

直至旧年到长沙，所得舆论，方知皇上清心寡欲，励精图治，至勤至劳，非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者，那得如此精明为国，如此焦劳为民！后复闻钦差大人宣传圣德无瑕，又伏读圣谕，表里无憾，恰与在长沙舆论符合。

弥天重犯到此，益信得从前传闻，全无影响，况加恩官人，厚赐贍养，乃圣主仁民爱物，发政施仁，必自亲亲托始之意，而谣言竟传以为收宫妃，岂不深可痛憾！

凡此十余供，非弥天重犯畏死幸生，故为此语，实因奉拿出谷，见闻渐广，实见得皇上道德政教，从来未有，感戴奋兴，自愧不得为圣世之良民，故痛憾至此。其实自供自吐处，内多理屈词穷，义失气馁，所以语言无序，不成说话，且山野愚夫，从未知拜奏陈词，体式不免乖讹错谬之失。而自到京以来，又懊悔切心，感泣耗神，四肢整顿不起，惶恐战栗，手指颤震，点画并不成字，千万叩首，仰请圣照。

【译文】 问曾静：你在湖南时的供词之内，有“将二爷的妃嫔收了”等话，这是从什么地方说起？当时密亲王的妃子，于康熙五十七年内已经病故，其余的官人，因密亲王病故之后，皇上想到理郡王没能力养活那么多人，同时与密亲王关系密切的也感到不得其所，所以特降谕旨，让理郡王的生母，对这些官人分别做出安排。并且皇上传旨对每个人逐个进行询问，如果有人想仍留在官中，那就按圣祖皇帝的老妃可以居住宁寿宫为例子办。这时候有人愿意仍居住官中，所以皇上就让她另住别宫，并且给以丰厚的待遇。这件事是皇上对密亲王官人的恩德，凡是官中之人和朝臣都是知道的。今你这话是从什么地方听到的？你又把密亲王叫做三爷，消息虽为误传，但必竟有乱说之人，你可据实供出来。

曾静供：收妃嫔的话，是雍正五年的五六月间，往来路上人传说，衡州路上押解一个犯罪的官员，是他这样说的。弥天重犯听到此话后，没有仔细分析，辨别真伪，以为既是从犯罪的官员口里说出，一定是真事。到现在一点也记不得传说谣言的是个什么人，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犯官，但只要朝廷上查一查那年那月，有什么犯官从衡州过就清楚了。

直到去年到长沙，听到正道舆论，才知道皇主清心寡欲，励

精图治，至勤至劳，不是完完全全地合乎天理，而没有一点人欲的圣君，那能这样精明为国，那会如此操劳为民？后又听到钦差大人宣传圣德毫无瑕疵，并且又使小民伏读圣谕，真是表里无憾，完全与在长沙听得的正道舆论相符合。

弥天重犯到此，更加相信，从前那些谣传全都是假的。况且皇上加恩于官人，对她们给以优厚待遇，是圣主的仁慈善政，而谣言却传为是皇上把那些妃嫔纳为己有，真是使人痛感遗憾！

这十多份的供词，不是弥天重犯怕死贪生故意这样讲，确实是因为朝廷把小民缉拿出深山穷谷后，见闻渐渐地开阔，认识渐渐地提高，实实在在地看到皇上道德政教，从古未有，感戴兴奋，自愧自悔为什么不做一个盛世良民，所以痛心遗憾到这种程度。其实自己所供出和谈吐的很多地方，都是理屈词穷，言语无序，不成词句。而且山野愚夫，从来不知道上奏陈词的规矩，言词文体的格式免不了有许多错误。加上自从到京城以来，惭愧后悔的心情很沉重，感慨涕泣消耗了精神，四肢疲惫难以抬起，惶恐战栗，手指也打颤震动，一点一画不像个字，千万叩首，仰请圣上明鉴光照。

雍正上谕

忠诚报国、公正无私的岳钟琪与叛逆曾静有鲜明的对照

【原文】 雍正七年六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朕从前所批岳钟琪奏折，偶检几件，发与曾静看。朕与岳钟琪，君臣之际，一德一心。在岳钟琪之忠诚报国，公正无私，实自古大臣中所罕见；而朕以至诚御下，恩眷大臣，亦极倚任之优崇。洵为上下交孚，明良盛事。且朕所批岳钟琪奏折甚多，此不过百分中之一分，而折内加恩岳钟琪之处，亦不过百分中之一分，而曾静乃欲上书劝之谋反，岂非醉生梦死，冥顽无知之人乎！此乃天道不容，令其自行败露也。

查曾静逆书内，有传闻岳钟琪两次进京陛见，俱不允行，岳钟琪深自危疑，因而上书等语。曾静平昔夷狄之见，横介于胸中，又闻此无根之语，不觉其逆心之愈炽，遂为此孟浪之举。但此传闻之说，必有所自来，著曾静确实供出。以曾静之所犯如此大罪，今尚蒙朕之宽宥，则传说浮言者，若能悔改，亦必从宽贷，况传说者未必即为造言之人，若由曾静供出之人，转究造言之缘起，则此事可得归结。着杭奕禄、海兰详悉宣示曾静。钦此。

【译文】 雍正七年六月初二日，内阁大臣接到皇上的谕旨。谕旨道：朕从前所批示的岳钟琪奏折，随便检出几件，拿给曾静看看。朕和岳钟琪的君臣关系，可以说间不容发，一德一心。在岳钟琪方面，忠诚报国，公正无私，实在是自古以来，大臣中所少有；而朕这方面，也完全以至诚对待下属，恩眷大臣，同样是非常信任和倚重。这确实是上下互相信赖，非常明显的盛事。朕批示岳钟琪的奏折很多，这不过是十分之一，而折内加恩于岳钟琪的地方也很多，也仅仅是其中的百分之一，曾静却派人送书信劝他谋反，怎么能不说真是个醉生梦死，冥顽无知之人呢！这也说明天道不容，让他自行败露罢了。

查阅曾静的逆书之中，有传闻岳钟琪曾两次进京见朕，都没有允许，岳钟琪深感自危，所以就向他上书，期望他能谋反等话。曾静平时怀着夷狄成见，耿耿于怀，加上又听到这些无根无据的话，就禁不住产生了叛逆之心，遂作出狂妄的举动。不过既有这些传闻，定有来历，务必让曾静如实供出。按曾静所犯这样大的罪行，今还受到朕的宽大处理，而那些传说浮言的人，如果能够悔过自新，也必然给予宽大处理。况且传说的人不一定是造谣的人，若能够根据曾静供出的人，转而顺藤摸瓜，追究到造谣的人及其原因，那么此案才会有个圆满结果。着杭奕禄、海兰详悉宣示曾静。钦此。

曾静、张熙供词二条

一、我曾静这个文弱书生 是怎样成为弥天重犯的？

【原文】 曾静供：弥天重犯幼承父训读书，粗知仰体朝廷作养人材之意，不肯虚度岁月，自了其生。平常有志于圣贤《大学》之道，期勉强躬行实践，以副朝廷之望。无奈身处幽僻山谷，名人文士足迹不到，而慈父弃世又早，且家贫力单，势不能出外远游，就正有道。直到中年，得知吕留良为文人所宗，而其议论，亦间有几处与本心相合者，遂不觉好之，妄引为修身之助。其中有论《论语》上问管仲两章。以为此乃论圣贤出处节义之大，且有说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义等语。遂妄听其说，以为士子立身，必先从出处起脚。初不知本朝列圣相承，备极礼乐文明之盛，亘千古所未有，与《论语》当时所指，何啻天悬地隔。

因先错看此文在胸，适值雍正四、五两年，湖广、广东等处百姓搬家到四川，往还间有从弥天重犯门前过者，传说西边有个岳公，甚爱百姓，得民心，西边人最肯服他。那传说的百姓也不知道岳公是什么名字，是甚官职。后到雍正五年冬，弥天重犯前次所供何立忠，传说陕西有个总督，其肯尽忠爱民，当今皇帝每每过疑他，防他权重，屡次召他进京，要削夺他的兵权，杀戮他。那总督畏惧，连召几次不敢进京，皇上见得他守死不肯进

京，转疑得深了。继而因这总督原是朝中大臣朱軾保举的人，皇上随遣大臣朱軾亲到陕西召那总督，那总督不得已，同朱軾一齐进京陛见，奏说皇上用人莫疑、疑人莫用等语。皇上听说如此，也就如此轻带过，又见他亲身来了，前疑稍释，乃复遣他回陕西去。那总督不肯去，要人保他方肯去。皇上问朱軾，朱軾不肯保，又问九卿大臣，九卿大臣亦不敢保，皇上乃亲自保他去了。出京门方四日，又有个大臣奏本，说那总督与大臣朱軾，内外阴结党援，观皇上屡次召那总督进京，那总督不肯进京，则他目无君命可知。乃朱軾到他任上，他又不疑，而欣然进京，则他与朱軾为心腹又可知。今日回归陕西，朱軾是原保举的人，理应保他，乃又不保，此是朱軾脱身之法，明晓得那总督将来必有变志，所以不保他，期后日皇上责备他不得。于是皇上翻悔无及，前疑愈坚，乃差姓吴名荆山的朝官去赶追那总督，那总督不肯转身，这朝官吴荆山就在路上自刎了。于是这总督到任，随上本章，说皇上有如许不是处。此是何立忠在永兴县十九都石视税，低声独自告诉弥天重犯的话。

在何立忠当日，竟记不得那总督的姓名，他也只听说有此事。弥天重犯闻得此话，以为那上本的总督，毕竟晓得宫中事情的确，方敢如此直言。后又闻得弥天重犯前次所供陈象侯说，茶陵州有个陈帝锡，传说有个本章，其上本的臣子，姓岳名钟琪。弥天重犯到此方知前所传甚爱百姓之岳公者，即岳钟琪也，岳钟琪即何立忠所传之陕西总督也。其实当时发狂作悖，因先吃紧吕留良华夷之谬论在胸，复闻得何立忠、陈象侯传说陈帝锡所说有个本章如此，又正值四五两年收成不好，遂孟浪有是举。谁知事与所闻如寒暑昼夜之相反，而身徒犯一个极恶莫大的罪过。

【译文】 曾静供：弥天重犯从听从父亲的训戒用功读书，也大略地知道朝廷重视人才，所以不肯荒废岁月，虚度人生。平时立志学好四书五经，打算将来躬身实行，报效朝廷。但无奈何身处幽僻山谷，名人文士足迹不到，而慈父又早早去世，况且家里贫

穷，力量单薄，没有条件和机会出外远游，开阔视野，增长见识，走上正道。直到中年，才知道吕留良被文人所尊崇，在他的那些议论之中，因有一些与本心相合，就不自觉地爱好上它，荒谬地把它当作修身的旁助了。他的言论中有论《论语》上门管仲两章，认为这是讲圣贤出在何处具有重要意义的正确论述，其中还有说重华人鄙夷人的民族意识大于君臣之义等话。所以就不加思索，妄信他的说教，以为名士君子立身处世，必先以民族意识为重。原先不知道本朝列圣相传而继承，已经是文明盛世，千古未有。与孔子在《论语》里讲的，何至是天地悬殊，不相符合。

因为有这样的错误认识，又加上当时正值雍正四、五年间，湖广、广东等处有百姓搬家到四川，往还间有从弥天重犯门口过的人们。传说西边有个姓岳的大人，很爱百姓，很得民心，西边的人都很尊敬佩服他。那些传说的百姓也不知道岳公是什么名字，是什么官职。后来到了雍正五年冬天，还是弥天重犯前面几次所供的何立忠，又传说陕西有个总督，非常尽忠爱民，而当今皇帝却常常怀疑他，怕他威重权高，对朝廷形成威胁，所以屡次召他进京，要削夺他的兵权，并想杀掉他。那位总督非常害怕，连召几次，都不敢进京。皇上见他死守任上，不肯进京，反而对他疑忌更深了，后来又听说这位总督是朝中大臣朱轼推荐保举的人，皇上就派遣大臣朱轼亲自到陕西召那总督，那总督不得已，只有同朱轼一同进京陛见，并向皇上奏说用人莫疑，疑人莫用等语。皇上听到这个谏议，也就从轻带过消除了疑虑，又见他亲自来了，也就不忌前嫌，仍派他回陕西继续任职。但是这时候那总督不肯去，要求有人保他他才肯去。皇上问朱轼，朱轼不肯保了，又问九卿大臣，九卿大臣也不敢保，皇上就亲自保他去了。出京门才四天，朝中有个大臣就向皇上奏了一本，说那总督与大臣朱轼，暗结私党，里应外合，纵观皇上屡次召那总督进京，那总督不肯进京，说明他目中无君。等到朱轼到他任上，他才消除疑虑，欣然进京，这又可知他同朱轼的确是心腹了。今日回归陕西，本来朱轼是原保举之人，照理还应保他，可是却不保了，这

是朱軾脱身的方法。他深知那总督将来必有反志，所以不再保他，以防备皇上日后对他责备。于是皇上十分后悔，对那总督疑忌更深，马上派遣一位叫吴荆山的朝廷官员前去追赶那总督，但是那总督不肯转身回京，这朝官吴荆山没有办法，就在半路上自刎了。于是这总督到任之后，随即上了一道本章，说皇上有许多不好的地方。这些话是何立忠在永兴县十九都石枳村，低声独自告诉弥天重犯的话。

在何立忠当天说这些话时，竟然没有想起来那总督的姓名，他也不过是听说有这件事。弥天重犯听到这些谣言以后，就以为那上本的总督，必定了解朝廷中的情况，所以才敢大胆直言。后来又听到弥天重犯前几次供出的陈象侯说，茶陵州有个陈帝锡，传说有个本章，其上本的臣子叫岳钟琪。经过这多方传言，弥天重犯到此时才知道所传的很爱百姓的岳公，就是岳钟琪，岳钟琪就是何立忠所传的陕西总督。其实当时发狂作乱，因为受了吕留良华夷尊鄙谬论的影响，又听到何立忠、陈象侯传说陈帝锡所说有个本章，又正值四五两年收成不好，就做出了这个鲁莽的举动。谁知事实与谣传完全相反，使自己白白地陷入罪恶的泥潭。

【原文】 到今日弥天重犯伏读皇上朱批岳钟琪奏折，方知皇上之至诚御下，并无一点疑贰之心，而大德感人，恩礼又复两极其至。而岳钟琪之仰体圣心，委身报国，亦无一点避嫌之迹，而其赤忠血诚，一片敬事之念，到此也无以复加。即此处张熙一事而论，夫论道义到至精至当，不可毫发移易，而其谨慎周密，小心精详，不动声色，不露形迹，而自然使人献诚抒悃于其前。此非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不能到，况其聪明睿智，更多神武而不杀者乎！此所谓君圣臣贤，元首股肱，同称一体；而上下交孚，一德一心，不啻如父之视子，子之事父之切。且于此有以见得我皇知人之明，用人之当，委人之专，任人之诚。渊衷至虚至明，处事至中至正，亘千古而罕覩。此天下之贤良才俊。抱道蓄德之儒，焉得不共聚一朝而乐为之用，各尽其力，各致其身哉。弥天

重犯到此，翻思从前以犯悖之举，献议于岳钟琪，实为醉生梦死，冥顽无知，更有何说！

但当时虽是弥天重犯罪大恶极，天道不容，所以自行败露至此；其实弥天重犯此举，莫之为而为，觉得有个人在身后催促之使动一样，此不是今日方敢如此说，当时《知几录》上亦略言及此意，难逃圣明洞鉴。所不解者，弥天重犯自反，当身虽为禽兽，其实平日并无半点过恶得罪于天，而祖父以来，历世积善，常言三代行善人家，在弥天重犯的祖父，可称得一句十代积善人家，不知如何流到弥天重犯的身上，竟犯一个赤族磔尸的大罪。且事发奉拿之会，弥天重犯闻得此信，自料当身固不免于寸磔万剐，而且遗祸于家门，忧愤填心，决计自尽。此时思欲望火投火，望水投水，以求速死，以免株连，然竟不能得死，彼时解此缘故不得。

【译文】 时至今日，弥天重犯伏读皇上批复的岳钟琪那些奏折，才知道皇上对待臣下，以至诚的态度处事，毫无半点疑心，真是大德感人。而岳钟琪也十分体谅皇上的心情，以献身的精神报效国家，其忠心赤诚的态度，也是没有一点可怀疑的。就拿处理张熙一事来说，不说道义上多么正确，单讲他的处理办法，就可以知道忠心为事的程度，每一步都谨慎周密，小心精详，不露声色，不显形迹，而自然赚取人向他吐露真情。这不是那种临事害怕，好算计却不能成事的人所能做到的，况且也体现了他的聪明智慧、神武英贤。这就叫做君明臣贤，元首股肱，同为一体。上下互相信服，君臣同德同心，好像父亲对待儿子，儿子孝顺父亲那样。从此处，也可以看到我皇上知人之明，用人之当，委人之专，任人之诚。心地光明，处事中正，真是千古罕见。这样，天底下那些有德有才的人，怎么会不被朝廷所任用呢？怎么会不尽忠效命于朝廷呢？弥天重犯到这时，反思从前的狂妄的举动，向岳钟琪献议谋反，真是到了醉生梦死、冥顽无知的程度，实在是没有任何可说的！

但当时弥天重犯的举动，今日想来，倒是无为而为，坏事反而变成了利国利民的好事，成为反面教员而昭示于天下。当时就隐隐觉得，好像有个人在冥冥当中促使自己那样去做。这种感觉今天清醒过来以后，才敢这样说。当时《知几录》上也大略有这种意思，结果到底难逃圣明洞鉴。自己所以想不开的只有一点，弥天重犯自身反叛朝廷，本身虽为禽兽，可是平时并没有半点过错、半点罪恶得罪老天爷。自我祖父以来，累世积善，可以称为三代行善之家。而在弥天重犯的祖父那一代，可以称得上十代积善之家，不知落到弥天重犯身上，竟不知不觉犯下了一个诛灭九族的大罪。而且事情败露的时候，弥天重犯一听到凶信，自己预计会被千刀万剐，而且祸及全家，当时忧愤填胸，决定自尽。真是达到了看到火就想投火，看到水就想投水的地步，只求马上死去，以免株连他人，可是想死却死不了，实在无法解释其中原因。

【原文】 到今日想来，若使弥天重犯当时即死，不惟皇上不得洞鉴弥天重犯致罪之由，且皇上深居九重，又何由知得外面许多奸回造访，有许多悖义兴讥？且事到今日，以弥天重犯如是之罪，蒙皇恩如是之宽宥，今又传旨释放弥天重犯之老母幼子，并悯念弥天重犯等炎暑过伤，命医调和，惟恐不得其所。然若弥天重犯生民未有之大罪，亦无以显皇上生民未有之大德。由是看来，弥天重犯无为而为，当年有此狂悖之举，求死不死，今日得蒙宽宥之典。皆因皇上道隆德盛，以天理言之，不当妄诋；本朝名正言顺，以天道方之，不可轻议。所以皇天笃佑，故默使弥天重犯之山鄙无知，冒昧上书于皇上一德同心之大臣，以显皇上的大德如天于山陬海澨，表本朝得统之正于地久天长。不然，湖山万里之外，奸党之流谤，何由得知？穷乡陋儒之胸，吕留良之逆说，何由得解？岂不全是天在此主持默使！至若谓传言之人，弥天重犯以如是之罪，尚蒙皇上宽赦之典，则传说浮言者，若能悔改，亦必从宽贷。况传说者未必即是造言者，谕旨煌煌，早已

体恤及隐，弥天重犯何所顾虑？而敢于隐匿，忍于隐匿，以负我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乎！除前此所供外，实实别来有人传说。

【译文】 到今天想来，也可能是天意，假如弥天重犯当时就死去，不但皇上不能知道原因，而且不会了解皇宫之外竟有那么多奸人造谣诽谤朝廷，散发反叛悖论。而且事情发展到今天这步，像弥天重犯这样的大罪，还能得到皇上如此宽大。近来又传旨释放了弥天重犯的老母幼子，还怜悯弥天重犯怕炎暑过伤，命医调和，惟恐得不到妥善的照顾。如果没有弥天重犯这样未有的大罪，也无法显皇上爱护百姓未有的大德。依此看来，坏事变成了好事，弥天重犯无为而为，当年有此狂妄之举，求死不死，今日又受到皇上宽宥的恩典。这全部是因为皇上道德圣明，按天理来讲，就是不得妄自诋毁的缘故。本朝名正言顺，从天道这个角度讲，不可以随便地毁誉。所以上天护佑，暗中使弥天重犯这山鄙无知之人，去冒昧上书给与皇上同心同德的大臣，来显示皇上大德恩泽于四海之内，天命所归于地久天长。不然，湖山万里之外，那些奸党流言诽谤，怎么能够知道？像穷乡陋儒吕留良那些叛逆的言论，又怎么能够公开？这不完完全全是老天爷在这里暗中指使吗？至于那些传言的人，像弥天重犯这样的罪，还受皇上的宽赦恩典，何况他们呢，如果能悔改，也必然从宽处理。况且那些传言的人，未必就是造谣的人，皇上的圣旨就如光照四方的旭日一样，早已对这方面体恤备至，弥天重犯还会有什么顾虑呢？怎么能再隐瞒，忍心隐瞒，而辜负皇上的天高地厚之恩呢？除了前几次所供出的人外，确实再没有听到别人传说。

二、我张熙久居僻壤穷乡，怎么会误入歧途，随师造反呢？

【原文】 张熙供：重犯愚暗浅陋，生长山隈，如蛙囿井。但身

处光天化日之下，少小颇知以读书从学为大，然竟不知读书之错，从学之误，其害一至于此也。盖因重犯家世寒微，人文科第，寂寞无闻；僻外穷乡，无缘得见贤士大夫，以正其趣而发其蒙。迨后年二十五，始见有郴州永兴县曾静人学文字，原评为湖南第一卷，心窃慕之，遂欲负笈从游几席之下。在重犯只知学问是务，并不知有所谓人间事；彼时犯师曾静亦闭门扫轨，甘穷守寂，惟日以前言往行及近世文章道德指授。

后因乡穷无书可读，于前岁承犯师曾静命，以四书五经之大全，以及朱子语类文集，隔于河山之险阻，要重犯往各省购求。因至浙江吕留良家买书，偶见其家有诗稿一本，重犯素闻犯师曾静说，吕留良评选时文论头批语，说理据章句集注，为近世名儒。因此即以其诗为必高，遂求取以归。犯师曾静看见其中有《钱墓松歌》及《题如此江山图》，始而怪，即而疑，继而信。以为吕留良生长江浙大地，其议论文章为天下人宗，夫岂有差？又限于素来不识本朝得统之正远迈商、周之盛，因此华夷之见横介于中心，加之当今皇帝之龙德贤于尧舜者，无由得知于云山万里之僻壤。而犯师曾静，初以错会华夷之分，而误听谣言蛊惑，既以误听谣言蛊惑，而大昧夫君臣之大伦。

是以于去岁戊申之秋，忽有犯师书，命上陕西总督岳钟琪。重犯无知，属在弟子，遂误听师命，冒然前往。及到投递后，岳公始而严审。重犯以受犯师曾静“只去献议，不必告以姓名里居”之命，且彼时无知之见，误信师说，尚固执为事关天经地义之所在，舍生可以取义，所以宁受三木之重刑，至晕绝不变。岳钟琪知重犯死不肯供，不能改移，旋即放夹，许重犯为好汉子，且慰之谢之，以宾客礼待之。于逆书所言事理，无不盛称以为实，复告以其家亦有《屈温山集》，议论无不与道书相合。既见重犯坚不告犯师姓名，乃呼天以示之信，乃言当身所处之危险，甚至垂泪以示其诚；且具书具仪时，告以必欲聘请曾静以辅己。命侄整装，即欲与重犯同行，更以长安县李知县扮作亲信之家人王大爷时刻相陪伴。无一不极其机密而浑然无迹。以重犯当时之

固执师说，虽死不肯摇夺者，卒乃使重犯实情毕露，然后具折奏闻。

【译文】 张熙供：重犯愚昧无知，生长在偏僻的山区，像井底之蛙。但必竟身处光天化日之下，小时候也知道以读书从学为立身大事，可是竟然不知读书之错，从学之误，这害处竟这样大！主要因重犯家境贫寒，人文科第方面见识太少；处在穷乡僻壤，没有机会见得贤能之士，而得到应有的正确启发或引导。一直到二十五岁那年，才知道郴州永兴县曾静的考秀才试卷，曾被评为湖南第一，心里非常仰慕，也就产生了拜他为师的念头。对重犯来讲，只知道研究学问，并不过问世事，当时犯师曾静也闭门谢客，甘守穷困，只是每天以古人的文章和故事以及近代的一些文章道德教授弟子。

后因地僻乡穷，没有多少书可读，于前年遵照犯师曾静的指派，让重犯到外省去求购五经四书大全以及朱子语录等文集。因为来到浙江吕留良家买书，偶然看到他家的书里有诗稿一本。重犯平时常听犯师曾静说，吕留良的评选时局文章论头批语，道理根据朱熹章句集注，很有名气，可以称的上是近代名儒。因此就认为他的诗也必然很好，遂就向其家人求购带了回来。犯师曾静看到其中有两首题目叫《钱墓松歌》和《题如此江山图》，开始觉得奇怪，后来感到有些疑惑，最后就完全相信其说了。以为吕留良生长在江浙大地，他的议论文章为天下人所推崇，哪会有什么差错？又因为认识局限于平时不了解本朝的盛世甚至超过商朝、周朝，因尊华鄙夷的偏见耿耿于胸，加上当今皇上的龙德虽然超过尧舜，但因是处在偏山僻壤，了解太少。而犯师曾静，一开始错误地理解华夷的区别，而且又误听谣言煽动。由于听了谣言的煽动，所以就昧了良心，无视了君臣的大义。

因此去年戊申年秋天，犯师决然修书一封，命我投书给陕西总督岳钟琪。重犯无知，因为身为弟子，应遵师命，所以就误听了师命，没有仔细思考，就冒然前去。结果到那里，投递了书信

之后，岳公开始严厉审讯，重犯因为受犯师曾静“只去献议，不必讲出姓名和住址”的嘱咐，加上那时抱着无知偏见，误信师说，固执地认为所办之事关系重大，宁可承受重刑，舍生取义，以致昏厥过去也没有改变初衷。后来岳钟琪见重犯死不肯说出实情，随即不再用刑，称赞重犯是英雄好汉，并且给予礼遇和安慰。对重犯所投之书里的言论事理，十分赞同，并且告诉重犯，他家也有一本《屈温山集》，书中的议论也同重犯所投之书相合。因见重犯坚持不肯告诉犯师姓名，便对天发誓使重犯确信无疑，还谈到他的危险处境以及作难处，甚至垂泪以表示其诚意，并举行立下字具的仪式；后来还告诉重犯决定聘请曾静作导师以辅助自己成就大业。特别是还有一些实际的举措，命令他的侄子整装，准备与重犯同行，又以长安县李知县扮作家人王大爷相陪伴。这每一步安排都非常周密而且不露一点痕迹。最终使重犯实情毕露，报告给了朝廷。

【原文】 由今看来，事固属上天笃爱皇上，故冥漠中默使此逆举败露于重犯之手，然使岳钟琪不备极其智虑之周密，则重犯之冥顽，只知拼一死以全义信于犯师曾静，则逆情亦未轻易得显著。凡此，皆岳钟琪之忠赤贯日，精诚动天，出其素蕴经济弘猷，为国家攘除奸凶，是以顽钝者莫逃其鉴，奸宄者自献其诚。然岳钟琪之尽心为国，而能至于此极者，实由我皇上知人之明，用人之当，虚公下应，至诚感孚之所致也。重犯从前毫不解其故，直至今日得蒙皇上之高厚洪恩，深被德化，又见旨意发出所批岳钟琪奏折数十通，重犯跪读越日，仰见皇上惟以至诚恩眷大臣，备极礼际之隆盛，恩意之周密不啻如父之视子，诚为亘古之所未有；而岳钟琪赤忠图报，不避嫌怨，只知有国，不知有身，不啻如子之事父，亦为自古名臣所罕见。

以此回想，重犯前此之妄承犯师使令，冒昧上书者，实实醉生梦死，冥顽无知之极也。当此益觉愧死无地，痛恨追悔之莫及，敢不剖析隐曲，输情服罪，哀恳皇上之矜恤于万一乎！重犯

之背逆心肝，实尽于此。至于传说浮言之人，俱在犯师曾静所供内，重犯实另无见闻。若稍有传闻，重犯当此时深沐皇上千古未有之殊恩，虽粉身碎骨，亦不足以仰报，何敢忍心昧理，为他人讳罪，以负我皇上天高地厚之恩哉！

【译文】 由此看来，固然是上天保护皇上，冥冥之中使事情败露于重犯之手，然而这也说明，若不是岳钟琪知虑周密，依重犯只知保全同犯师曾静的信义而宁可一死的顽固程度，这件事也不可能轻易暴露出来。这都是由于岳钟琪的忠心赤胆感动了天地，由于他平时就具备济世经邦的谋略，为国除奸的才干，所以顽冥愚昧的人不会逃过他的眼睛，奸诈的坏人自己会前去暴露。然而岳钟琪之所以能尽力为国，而达到这个境界的原因，实在是由于我皇上有知人之明，而且用人之当，至诚感化所致，重犯从前一点不明白其中的缘故，直到今天得到皇上的高厚洪恩，也深深地被感化了；又见旨意发出所批岳钟琪的数十篇奏折，重犯整日跪读深思，从中看到，皇上以至诚对待大臣，以至礼对待大臣，恩德情意十分周到，就如父亲对待儿子那样关心，实为千古少有。而且从岳钟琪这方面讲，他的忠诚报国，不避嫌疑，只知有国，不知有身的态度，不仅如儿子对待父亲那样效忠皇上，而且在名臣中也千古罕见。

因此回想起来，重犯狂妄地按照师命，冒昧上书这件事，实在是醉生梦死，冥顽无知到了极点。愈想愈觉得痛悔莫及，愧死无葬身之地。哪里还敢不彻底坦白，哀求皇上宽恕万一呢？重犯违心行事，确实就这个情况。至于传说浮言的人，都在犯师曾静的供词之内了，重犯实在再没听到其他的。确实没有一点隐瞒，重犯这样受皇上的恩德，就是粉身碎骨也不足报答，哪还敢忍心隐瞒，为他人掩盖，以辜负我皇上天高厚之恩呢？

曾静供词二条

一、皇上不是有意遵循守孝三年的古制， 不过是为了尽心尽孝才安心罢了

【原文】 曾静供：经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又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是古之帝王治天下，其大本大根，必在于孝。诚以孝为百行之源，万化所从出之地，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必根盛而后望得叶茂，源深而后可得流长，必亲亲无亏，而后德足以仁民，仁民量满，而后功足以覆物。是德教加于百姓，乐利普遍环区者，皆由一孝所致，即《论语》所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是也。然理虽一定而不易，其实躬行实践者少。至于三年之丧，虽曰“自天子达于庶人，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然新主当万机综理之下，苟非仁孝诚敬之至，实有难行。此不唯三代以下罕见，即三代以上之圣君哲后，从头算来，亦未闻历历有几。古称大孝，首推虞帝，然当上世浑噩，风气未开，礼制未备，三年之丧，未经记载，其详不可得知。继算武王为达孝，礼制略述于《中庸》。其中丧葬之制，春秋祖庙之修，继志述事之绩，与夫追王之礼，享帝之仪，可谓千古郁郁之盛。然在当时，武王亦不能独成其美备，大事多资周公之力，定于周公之手。其余只有高宗，书载谅阴三年，所以卒推商朝中兴贤圣之首君。然在当时，孔门高弟亦

疑其势有难行，后儒注疏亦多疑谅阴之制为心丧，未必能实居庐被素也。后世以日易月，虽自汉文帝，然战国时，滕文公欲行三年之丧，访于孟子，父兄百官，皆不欲，谓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则是短丧之制，自春秋战国时，已视为泛常矣，岂独自汉始乎！即在诸侯素称秉礼之国，亦不能行，况无子乎！自是以来，历代帝王因无有能行者，即向有一二好礼之君，仁孝之主，则有欲行而势不能行者，有勉强行之者，而不终者；有徒循其名，而不能尽其实者，求其实能尽礼尽制，出于至情，发于本心，表里无间，始终如一日者，则绝无焉。

【译文】 曾静供：经文上说：“先王有至上的道德礼义，以顺应治理天下。”又说：“谨慎地处理先人的临终之事，百姓的归顺之心就会淳厚。”所以古代帝王治理天下，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在于孝。确实应该把孝作为人的立根之本。所以说有：“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必根盛而后才可希望枝繁茂，水的源头深广而后才可以使水流悠长。必亲亲无亏，而后才算德足，才能仁爱百姓；仁爱百姓的器识满盈，然后功足才能包容事物。凡是百姓得到教化，天下得到治理者，都是由孝所致，也就是《论语》讲的“孝悌，是仁义的根本”。一点也不错。然而道理虽然是这样，真正身体力行的也真是太少。至于三年之丧的制度，虽说从天子到百姓，在这个事情上不分什么贵贱，然而新的皇上正当日理万机的时候，如果不是特别的仁孝，十分的诚敬，实在难以实行。这不单是三代以来所少见，即使三代以上的圣君贤哲，甚至从开天辟地以来，也没有听说有几个。古代称孝顺的，第一就算是虞帝，可是那时候没有文字记载，其详情人们不知，无法考证。周朝的武王可以说达到了至孝的程度，但《中庸》记述的也并不多。不过其中丧葬的缺席，春秋祖庙的修建，记述功绩，追尊帝王的仪式，可以说超过千古的盛况。然而在当时，武王虽然功业显赫，但也不能独自享有全部誉美之词，他也在很多方面是得力于周公的帮助和打基础的结

果。另外商朝还有位高宗，也可以称的上是中兴的圣贤之君，史书记载他守孝三年。然而即使在当时，孔夫子的的重要弟子也怀疑他难以真正实行。后来的德士在记述古史的时候，也怀疑他搭个简陋的棚子，住里边守丧的办法是心情过于悲伤而形容出来的情况，并不真的会那样做。后世有些变通，例如战国时，滕文公想实行三年之丧办法，去问了孟子，并向父兄辈及百官也征求看法，都认为不必要，都说本国宗主国鲁先君没有那样实行，我国的先君亦不必那样实行。因此那种短时间守灵的制度，从春秋战国时，已经被看作非常正常了，并不是后来的汉朝才开始的，即使在非常讲究礼仪的诸侯之国，也无法实行，何况后来的天子呢？可以说历代帝王并没有真正身体力行的人。其中即使有一两个好礼的君王，仁孝的诸侯，虽亦想实行而不能实行；中间受阻的人是一种情况；还有勉强去实行，都没有坚持到底的情况；另外还有的只是真正形式上实行了，但徒有虚名。真正是尽礼尽制，出于至情，发乎本心，表里如一，始终不移者则绝无仅有。

【原文】 我皇上至孝至仁，至诚至敬，超越万古帝王。自圣祖仁皇帝升遐之后，继以孝恭仁皇后宾天，共历三十五个月，悲哀极至，感慕之诚，久而弥笃。抚时生悲，触绪增伤，僦见汽闻，追思永慕，无时或释于怀。每朝夕共奠，朔望殷祭，哀痛迫切。至扶送梓宫，瞻拜山陵，惨怛号呼，一时万众感泣，不能仰视。即听政临朝，总理万机之下，偶有感触，辄歔歔流涕，哀情所发，忘不自胜。群臣日侍左右，仰瞻天颜，无不吞声哽咽。因诸王大臣援引古典，再三奏请，于天地宗庙之大祀，恭行典礼。皇上虽勉从所请，仍于养心殿斋居素服，以尽思哀思慕之诚，三年谅阴，恪遵古制。乃圣德谦让，却而不居，屡下谕旨，谓情不容以自禁，心不能自觉，遑论其合于古制否乎！细思旨意，正得制礼之意，适合礼制之至，非精通性命之微者不能到。且当圣祖仁皇帝服阙之时，将近孝恭仁皇后大祥之候，群臣奏请释哀即吉，我皇上谕以“臣民固有不同，朕于所生，何有二视！朕非有意遵

循古制，但行其心之所安而已”。逮后诸王大臣屡疏恳慰，而明旨屡颁，反复晓谕，不允所请。仍素服斋居，触物生悲，感念孝恭仁皇后，即复追思圣祖仁皇帝，怙恃交慕，历久弥深。

【译文】 我皇上可以说至孝至仁，至诚至敬，超越了历代古帝王。自从圣祖仁皇帝升天之后，接着孝恭仁皇后去逝，共时三十五个月，在这期间，皇上表现得非常悲哀，极其孝敬，守灵哀悼，扶棺安葬，悲哀痛哭，一时间万众感应，不能仰视。即使在听政临朝，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有时想起先皇也是失声流涕，哀不自胜。群臣整天侍立左右，看着皇上那样地伤心，也免不了感伤落泪。所以诸王大臣就引经据典，再三奏请，说已于宗庙恭行典礼，不必太过伤心。皇上虽勉强听从意见，但是仍然整天在养心殿斋居素服，以尽哀思追慕的心诚，依照守孝三年的古制实行。并且屡下谕旨，向臣下表明守孝的心情。细想皇上的旨意，非常复合古代的制度，不是精通生命的微妙的人是做不到的。等到圣祖仁皇帝孝服期满接近孝恭仁皇后去世三周年之时，群臣上奏请结束守孝换上吉服，而我皇上却说：“皇帝和百姓虽然有所不同，但人之父母所生，没有两样。朕不是有意遵循守孝三年的古制，不过是因为尽心尽孝才能安心罢了。”此后，诸王大臣多次奏请皇上节哀，而皇上却屡次晓谕，不允所请。仍是素服斋居，看到他们的遗物便感到悲伤，时刻在追思感念圣祖仁皇帝和孝恭仁皇后，历久不变。

【原文】 夫丧服本以期断，三年为加隆，所出古人制礼仪节以渐而减，诚以历时既久，人子之孝思，有所易匮故也。至若前丧未除而遭后丧，三年有加，为日益长，非仁孝诚敬之至，安能持久而不懈！况兼服行之母后，历三年始终如一日者，尤为仅见之事。此无论自古帝王所未有，即史册所载，士大夫中，秉礼之家，笃行之士，亦未闻有尽哀尽礼，初终不渝如是者也。况自古帝王，当丧则多废政之累，而临政又不免忘哀之咎。而我皇上于

斋居永慕之中，孝思所及，无一事不体圣祖之心以为心。是以敬天法祖，大孝至诚，旰食宵衣，勤求民隐，扬清激浊，整饬官员，蠲数百万惟正之输将，开亿万无疆之乐利；推继志述事之孝思，行存亡兴废之盛典；事事默契天心，念念感通圣祖。岂但徽号之仪，协万世之人心；配天之典，冠百王之隆会。与夫晨昏之瞻拜，朔望之祭享，守陵之致敬，庙寝之告虔，无一时不思哀思敬，无一事不尽礼竭诚而已。此所以至诚至孝，感通天地。当圣祖仁皇帝禘祭之时，合璧联珠，即悬象于苍昊；迨孝恭仁皇后祥禫之候，一荃九穗，复呈瑞于郊圻。域中河清四省，孝陵菁草丛生。非仁孝诚敬之至，与天无间，曷克臻此！此岂三代以下之贤君，所得仿佛其万一！进而上之，虽极虞帝之大孝，武王之达孝，其精详亦未闻是过也。

弥天重犯从前僻居山谷，以谣言惑乱，何知圣德万分之一！今伏读《大礼记注》，不唯信从前之听闻出于诽谤，如坠深谷，而且信得我皇上之至孝纯仁，亘万古之圣帝明天子所不到。是以数日以来，不觉痛心割肝，刻刻泣流湿襟。一面感圣德之纯诚，思得法以宣传于穷乡海隅，并及故乡间里；一面痛老母之衰独远离，期遂志复亲音容，得详告圣天子如是之大恩大德，俾临年得以欢喜瞑目。夫以弥天重犯冥顽无知之极，今闻见圣主之至仁至孝，至诚至敬，如此极至弗加，尚有以感动其天良，触发其至性，泣流湿襟，不觉欣欣戚戚，有归厚之思。况天下闻之，焉有不夫昭于变之休，咸登比户可封之域乎！

【译文】 丧服本来以时间来决定，三年就是最隆重了。所以古人制定的礼仪，具体的内容渐渐减少，确实因为时间太长，做人子的虽有孝心，但也容易淡漠了。如果说前面的服丧期还没有结束，又遭到丧事，就必然要增长守孝时间，不是非常孝敬的人，哪能坚持下去呢？今皇上历三年如一日，真为仅有之事，像这样，是自古帝王所没有的，即便史书上所记载如士大夫中，秉礼之家，笃行之士，也没有这样尽哀尽礼，始终不渝的。况且自古

以来，帝王服丧则不得不废弛政事，而临政又有影响哀孝的问题。而皇上在斋居之中，没有一事不体现了孝敬之心，真是敬天法祖，大孝至诚，废寝忘食，勤政爱民，给后世作出了典范。事事与天心相会，念念同圣祖感通。徽号和礼制，必然影响万代。特别是早晚瞻拜，定时享祭，虔诚守陵，没有一事不思哀思敬，没有一事不尽礼尽诚。这至诚至孝，感通天地。圣祖仁皇帝三周年大祭时，天空吉星高照；孝恭仁皇后孝满时，一棵稻子出现九个稻穗的征兆；中土四个省的河水澄清，孝陵上的菁草繁茂丛生。不是仁孝诚敬之至，与天地没有区别，哪会这样。这岂是三代以来的圣君，所能做到万一的！再往上说，虽说虞帝武王都十分仁孝，其细致周到，也没有听说有这完备。

弥天重犯从前僻居山谷，以谣言惑乱，哪里知道圣德万分之一。今伏读《大礼记注》，不但相信以前的传闻出于诽谤，而且深信我皇上的仁孝程度，自古以来少有。所以几天以来，常常痛心裂肝，不禁流泪。一面有感于圣德的纯真赤诚，能够有机会向故里乡亲宣传宣传，一面痛感家有老母，希望能够再见到母亲，向她老人家详细告诉皇上的大恩大德，到百年后也能使她欢喜瞑目。像弥天重犯这样冥顽无知之极，今天看到皇上为至仁至孝，至诚至敬，达到了极点，感动了自己的天良，触发了人的本性，痛悔流泪，又高兴悲戚，产生了回家敬母的念头。若天下百姓听到皇上大孝之事，怎能不大大影响风气的变化，共同达到户户仁孝的境界呀！

二、雍正皇帝勤政爱民，与天理浑然 一体，神功伟德实在是顶天立地

【原文】 曾静供：弥天重犯读书浅少，如何晓得天地高厚？况属山鄙狭隘，负罪弥天。一旦身近圣天子之光，忽睹广大精深，胆寒心裂，愈觉窍口难开。只有圣德神化，感通于变，其效甚

速。是以弥天重犯昔虽冥顽，同于禽兽，今得被化，幸转人胎。以此心下犹具蚊知蚊见，稍得窥于高深于万一。

窃闻天以好生为德，而好生中有无限因时制宜，至当不易之法。在天不能运量裁制以成其能，尽举而界之于聪明睿智，能尽其性，合其德者为之。是君之心即天之心，君之德即天之德。凡天所欲为者，君体天之心为之；天所欲行者，君体天之德行之。君未尝参一毫己意于其中，事事仰承天命而已。所以大君之号曰天子，言善继善述，与天不分两体，实一气贯注，如子之承父也。但天隐而难见，其本体之流露者，惟理而已。故先儒曰：“天即理也”。人君政刑德礼，浑然从一，理运量发，露于两间，斯方称得是天践形合德的肖子，而为大君当身之职分。以是粤稽历代帝王，虽代不乏英伟贤智，而求其运量裁制，浑乎天理之公，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得天之有子者，历数千载而罕见。

今伏读圣谕，而知我皇上浑然一理，泛应曲当，其施之于政刑，见之于德礼者，无一处不知之极其精，无一事不处之极其当。神明尽化，化裁尽变，推行尽通，圣德神功，蟠际天地。而究其归，皆因物付物，初未尝稍存一毫成见，介于虚明应物之天也。只见得念念从民设想，处处体天定趋，所以无事无时不以圣祖皇帝为怀。盖圣祖皇帝乃天笃爱之肖子，圣祖皇帝之心即天心，圣祖皇帝之德即天德，一而二，二而一，怀想圣祖皇帝即是体天地。

况敬天之至，至诚肫恳，本于性生，而儆戒乾惕之切，尤天一时或释于怀。所以天人交孚，呼吸相通，而感应之理，不惟见之最深最切，抑且屡试屡验，捷如影响。自是以敬天之念勤民，深宫几多经纬天地的筹画，神运无方的猷谋，无一时一刻，不以爱养天下苍生为念，为斯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即安。是以忧勤惕厉不退宁处，凡可以利生民之安，除生民之若者，思无不到，到无不行，行无不实。知民之艰难在食，蠲租减赋之典，无年不颁，赈灾救患之泽，无处不遍。偶闻一处旱涝，即恻念忧形，不惟减膳，甚或饮膳不御，殫竭精诚，为民祈祷，多修人事，以格天

心。率至祷雨雨通，祈晴晴应。复以食乃民天，农为食本，每岁躬耕藉田，以重农事。而老农之勤劳俭朴者，亦岁举给以品秩荣其身。思明刑原以弼教，而群德期于好生。法虽一定，心本宽仁，稍有一线可生，则因事原情，时生恻隐之念。诚以民命至重，宁过乎仁，毋过乎义也。知察吏所以安民，而惩贪兼得以养廉，宵旰忧勤，无非为国计民生，思久安长治之策，所以隐微之中，疑似之间，辨析精详，秋毫不爽。如谕公私二字，关系甚重，不可不辨。而公中有私，私中有公者，尤不可不时时警戒。与夫论因循苟且，一味求悦于人，称赞之者甚多，即如阿大夫之誉言日至也；杜绝私情，不肯取悦于众，谤议之者甚多，即如即墨大夫之毁言日至也。又如辨武断乡曲者非是武断，揽权者实非揽权，此毫厘千里之间，帝尧亦以为难，今皆剖决明晰，如丝过扣，毫发不混。此所以用赏用罚，忽用忽舍，无往而不得其公正之至者，为渊衷虚而权度精明也。

【译文】 曾静供：弥天重犯读书很少，缺乏知识，怎么能知道天高地厚呢？况且属于山野村夫，又犯了弥天大罪，因为接近皇上，受到光明的照射，忽然看到博大精深，胆寒心裂，越发感到难以表达心中的感慨。认为圣德对人的感化是特别快的，所以弥天重犯虽然以前冥顽无知，如同禽兽，今天得了感化，幸投人胎。所以还有点良知，如蚂蚁或蚊虫的见解，仅仅能够窥见这博大世界的千万分之一。

听说上天有好生之德，然而好生的道理中，有无限因时制宜，至当不改的法则。在天来说不能运用他的能量进行制裁以成其所能，完全发挥他的聪明才智；而人呢也应该尽其天性，合其道德者才有作为。所以君王之心就是天的心，君王之德就是天的德。凡上天所要施行的，那么君王就能体会到并去施行。君王没有掺一点个人的私欲在其中，不过是事事按上天的旨意办罢了。所以了不起的君王，人们称为天子。同天为一体，同天为一体，就像父子的关系那样。但上天的意志是难以知道的，它怎样体现

出来呢？只有以道理来体现罢了。所以，先贤讲过：“天就是理也。”人间的君王，在政治、法律、道德、礼仪等方面，浑然为一气，称得上天子和大君的身份。所以查看历代帝王，虽然也有不少英伟贤明之君，但其中真正在治理天下过程中同天理合一，而毫无个人私欲的可以说千载罕见。

今日拜读了皇上的圣谕，明白了我皇上与天理浑然为一体，无论是制订政策，处理政务，都合乎道德礼法，没有一个方面不精湛，没有一处不得当，如神明一样，变化通顺。神功圣德顶天立地，而究其原因，都是按照事物的规律去办事，没有任何偏见，处处顺应天理，为百姓着想，并且时时事事都遵循圣祖皇帝的遗训。因为圣祖皇帝是上天的爱子，圣祖皇帝之心就是天心，圣祖皇帝之德即是天德，怀念圣祖皇帝就是怀敬天地，况敬天诚意没有一时一刻放松，所以天与人互相感应，互相影响。

以敬天的心情来勤于民事，不管朝廷有多少经天纬地的筹划，都以爱养天下苍生为念。同时也使万物各得其所。特别是表现了皇上对天下百姓的关怀，凡是对百姓有利的，解决百姓痛苦的事情，无不考虑的很周到，无不行动得很及时，无不办得很实在。知道百姓最艰难的问题就是食物，所以减租减税的恩典，年年颁发；赈灾救患的恩泽，遍及各处。偶然听说有一处旱涝，便十分同情，不但减少了自己的膳食，而且为民祈祷，务修人事，以合天心。遂出现求雨下雨、求晴天晴的情形。由于民以食为天，因此朝廷就以农为本，大力发展农业。对农民勤劳俭朴的户主，也像每年选举人那样，给以品位，使其光荣显耀。由于君德好生，所以在明确刑法的同时以德化进行辅助治理天下，法律虽然有一定之规，然而人心本来宽大仁厚，稍微有一线可生，就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谅解同情。因为把民命看得至关重要，宁可过于仁慈，而不过泥于现成的规定。皇上深知治理好官吏才能安民，惩治贪酷才能保持廉政。那样地勤劳政事，无非是为了国计民生，图长治久安，所以每件事都办得都十分周详，如圣谕讲公私两字，关系十分重要，不可不加以分辩，而公中有私，私中有

公，这样公私混淆的情况，应时时警戒提防。如果是在公私方面不够严格，只知取悦他人，就会有很多人赞誉皇上。正因为皇上杜绝私情，不肯轻易取悦于众，所以毁谤的人就多。又如辨别武断乡曲之事上，并不是武断，揽权者也不是揽权。此是差毫厘失之千里之间，所以帝尧也以为很难。今天都剖析决断得十分明白，如丝丝入扣，毫不混淆。所以就皇上赏罚分明，用舍得当。没有不公正的事情。没有不精明的安排。

【原文】 盖皇上渊衷为止水，如明鉴，万物之过其前者，妍自然毕露而不容掩。原非鉴与水留恋于当前之物，而后得照见，若稍留一毫意见去照物，则鉴与水虚明之本体，反为此意见所掩蔽，而照物不见了。必浑乎天理之公，而不杂一毫人欲之私，方有此种境界。故举凡用人理财，养老恤幼，崇师训士，以及撰文奋武，皆开千古所未开之盛典，而实极千古所未到之至善。且诏诫所颁，反复丁宁，区画详密。内自大臣群僚，外及军民童叟，务期天下群登乐利之域，共享升平之福。其中旨意周切，理熟义精，一言一字，皆可与二典三谟并垂天地而不朽。是不惟仁天下之心，安天下之学，超越天下之才识，亘万古之圣君哲后莫与媲。而即比自朝至暮，一日万机，件件御览，字字御批。一应上任官员，无论内外大小，每日必逐一引见，谆谆告诫以爱民扶绥之至意，事至物来，随到随应，不留一毫不周不密、不精不当之憾。直至二三更，方得览批各省督抚奏折，竟不用一人代笔，其焦劳如此。此种历练天下之精神，亦亘古励精图治的至君哲后所不到。尚犹圣不自圣，每以为君难为虑，并以不及圣祖之圣德神功为忧。是以德合天地，至诚感孚。数年以来，诸瑞齐见，万福骈臻，而且道不拾遗，蔼然成周太和之盛，唐虞熙皞之隆，亘千古而再覩者。

弥天重犯身犯寸磔之典，自痛生圣人之世，竟生不得为圣人之氓，庶几死为圣世之鬼。岂料圣德同天，生民未有之殊恩，既超禁处厦，复给食赐衣，今蒙恩旨，又复开锁，皇德皇恩已极荡

荡难名。弥天重犯抢地呼号，痛心挖髓，此时即置之极刑，亦王法人情所当然，死亦知思感德，甘心瞑目。况蝼蚁百姓，当此皇恩无涯，何敢言报？只愿插翅遍飞字内，凡人力所能到、足迹所可及，逢人逢地，宣扬圣德同天之大，无间内外，申明本朝得统之正，直近商周，一洗从前谣言之谤，共知吕留良为圣世之逆贼，共歌太平之世，共祝有道天子，万寿无疆，以赎补当身万死蒙赦之罪，斯幸耳。深情结胸，重义透髓，一字一泣。谨供。

【译文】 由于皇上的心像潭水一样深邃，像明镜一样光亮，对任何事情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是如天理那样的公正，才能有这种境界。皇上在用人理财方面、养老恤幼方面、崇师训士方面、掌文用武方面，都是千古少有的完善。况且每一次诏书的颁布，都要反复交待，筹划详尽。从内部的大臣群僚，到外部的军民童叟，都务求能符合大家的利益，共享天下太平之福。旨意中字字句句意准词切，可谓不朽之作。不仅具备仁慈之心，而且超越天下之学识，是万古以来圣君哲后所不能比的。皇上一天到晚，日理万机，件件都要过问，奏文都要字字批示；一切上任官员，不管大小，每天都要接见，谆谆告诉大家，要爱民，要尽职尽责。任何事情，随有随时解决，都十分周密十分精当。有时直到二三更，还要批阅各省督抚奏折，竟不用一人代笔，真是操心到这种程度。这种对待天下治理天下的精神，也是千古以来圣哲君主所做不到的。但是仍十分自谦，常常感叹做皇上的艰难，并且以赶不上圣祖的神功为忧虑。这种德行可以说同天地相合。几年来，到处呈现吉祥的兆头，而且道不拾遗，这真是比古代最好的盛世还盛。

弥天重犯自犯重罪，自己痛感生在圣人世，竟然不能成为圣人的一个普通百姓，也许可以做个盛世之鬼吧。没想到圣德同天，给重犯特别的恩遇，不但不囚禁，给以宽敞的住处、衣物，今蒙恩旨又被释放。皇恩皇德真是达到了极点，难以加以表达。弥天重犯抢地呼号，十分痛心，此时即使受到极刑，也是理所当

然，死也感德，甘心瞑目。况且做为蝼蚁一样的百姓，对这样大的恩德真是无法言极，只希望插翅飞遍天下，凡人力所到处，足迹所至，逢人便大力宣传圣德，一洗过去的谣言诽谤，使大家都知道吕留良为圣世逆贼，同时使天下都传颂圣人之德，共喜为盛世的百姓，共歌太平之世，共祝有道的天子，万寿无疆，以赎补当身万死却蒙受宽赦之罪。这样，则十分幸运也。激动的心情难以表达，是在一字一泣中写出的这篇供词。

内阁九卿奏本

曾静等即使是一失足铸千古恨，也应该殃及九族人牢狱

【原文】 刑部等衙门奏为遵旨复加讯问事。上谕：“曾静一案，前命侍郎杭奕禄、副都统海兰详加审讯。据曾静逐款回供，俱是悔过感恩之语，此等奸险之徒，语言诈伪，或畏惧诛戮，故勉强作此认罪之词；抑伊自知罪大恶极，愧耻悔恨，出于本心。著大学士、九卿詹事、翰林、科道，将从前诘问各款，逐一再加讯问，确取口供具奏。钦此。”臣等将杭奕禄等遵旨审讯曾静口供，逐款复讯，据曾静供出，与从前口供俱各相符，俯首认罪，甘服上刑。

又据供：“弥天重犯罪案，今日蒙知大人逐款勘讯，自知万死万刚，更有何法可解！所痛恨者，实因住在深山穷谷，愚昧无知，是以吕留良之逆说情论，得以迷心。惟其有吕留良之悖论在心，所以阿其那、塞思黑、允禩之党羽匪类，并发遣广西人等之奸谋流谤，得以感听。抑惟其有阿其那等之流谤在心感听，而吕留良之邪说悖论，愈得以固志。二者交乘，相因为害，遂致酿成亘古未有之极恶而不自知。直到后来，实见得我皇上之至德同天，与我朝得统之正，直迈商周，方知从前之错谬，自悔自愧，自咎莫及。

“盖我皇上之大德，弥天重犯自旧岁到今，饱饫已周年矣。不惟目睹耳闻，深仁厚泽之在天下，为自古所未有，即弥天重犯以蝼蚁之微，冒犯九五之尊，万死不足蔽辜，而当亲皇恩，尚容留苟延残生以到今日。虽尧舜之对，亦未见有此出格殊恩至于如此，又岂汉高之宽、唐太之明，所能拟似于万一！况我朝得统之正，治化之隆，并非泛说‘远迈商周’一语所能尽。盖我朝龙兴，不由中土而起于满州，由满州而至中国，地之相去数千余里，而德化之盛，及于中土，薄海内外，无不倾心爱戴。由是天与人归，使大统一朝而成，不劳而得，并非汤武之居中渐化，而后民心乐从，始有天下者可比。其规模更大更远，所以为亘古莫及。

“凡此皆是弥天重犯旧岁一路来，亲被我皇上的德化，亲见熙皞景象，颂德歌功，欢声载道，不觉倾心悦服至此。则前之狂悖，由于无知，后之爱戴，出于有见。前后虽异，其实皆发于本心。此固不是巧说以偷生，亦非旁人所能代为指拨开导而有是说话，实字字句句皆从一片良心发出。且弥天重犯从头一路细思，实由列祖列圣之功德，在天地间极其大，我皇上之圣仁，迈古今而极其至。故皇天默使弥天重犯传其害道悖义之论，露其奸党谤毁之行，以显圣德于深山穷谷，申名义于千秋万世，使天下之大，万世之远，人人悦服，处处倾心耳。

“所以弥天重犯到今日感德被化之余，愿置身极典，以求其心之所安。且使天下万世，共知我皇上至德深仁，透民骨髓，即在无知悖逆之民，犹切被化改过，自愿伏罪以至如此。所以弥天重犯到今日，惟有仰恳众大人转奏，将弥天重犯速正刑典而已，更有何说！”等语。

【译文】 关于刑部等衙门对曾静一案又遵照皇上旨意重新加讯问的记载。皇上的谕旨道：“曾静一案，前几次命令侍郎杭奕禄和副都统海兰等详加审讯。据曾静的各条回答和供词，都是些悔过感恩的语言。这种奸险之徒，语言欺诈虚假。或是由于他怕

死，所勉强作出的认罪之词；或是由于他自知罪大恶极，愧耻悔恨，真的发自内心。请大学士、九卿詹事、翰林、科道，把从前诘问他的各条各款，逐个再加讯问，取得确实的口供再报上来。钦此。”臣等将杭奕禄等遵旨审讯曾静口供，又逐条复讯，根据曾静供出，与从前口供相符，俯首认罪，甘服死刑。

又据曾静供道：“弥天重犯的案件，今天蒙众位大人逐条再审，自知应该罪该万死，还有什么可以说的！所痛恨的是，实在是因过去住在穷山深谷，愚昧无知，也因为看了吕留良的逆说悖论，迷了心窍。首先是因为有了吕留良的谬论在心，所以阿其那、塞思黑、允禩之党羽匪类，以及朝廷发配遣送去广西的奸谋之人流传诽谤，才可能迷惑视听。因为有邪论和流谤的有害影响，才酿成了千古未有的极恶和无知。直到后来，确实见到我皇上为仁德像天一样大，我朝的应天顺民，超过商、周那样的盛世，才领悟到从前的错谬，愧悔莫及。

“弥天重犯感受到皇上的恩德已有一年了，不但耳闻目睹，皇上的厚泽及于天下，千古少有，就从自身说起，一个小民如蝼蚁之微，冒犯了九五之尊，还能受到如此的宽大。即使尧舜，也不会施以这样的殊恩；就是汉高祖的宽容、唐太宗的圣明也不能比的。况且我朝是天命所归，并不是用‘超越商、周’这样一句话所能概括的。再说我朝的兴起，并非源于中原而是由满州遍及中国的，从满州到中原几千里之遥远，但德化恩义早已遍及中原，甚至天涯海角，人民无不倾心爱戴；不像汤武那样居于中原，而渐渐教化民众，使民心慢慢归向，才有天下的。而是天人同归，不劳而获。其规模也更大更远，所以为千古所莫及。

“这都是弥天重犯旧岁一路而来，被我皇上的德政感化，亲眼看到盛世景象，到处歌功颂德，欢声载道，不觉受了感化所心悦诚服讲出的内心话。相比来说，以前的狂悖，出于无知，这后来的爱戴，出于有了真知灼见。前后虽异，都发自本心。这不是为了偷生怕死才花言巧语，也不是旁人经过开导后才觉悟的言词，确实字字句句都从一片良心发出。况且弥天重犯从头细想，

感悟到是列圣之功德神灵，在天地间极大，而且我皇上的圣仁，超过古今达到了极点。所以皇天默使弥天重犯传播那些害道悖义的谬论，暴露奸党谤毁的行迹，以显示出皇上圣德，申名义于千秋万世，使天下人人悦服，处处倾心。

“所以弥天重犯到今日感德被化之余，愿受极典，以求得心安。而且使天下万世，共知我皇上至德至仁，甚至透民骨髓，即使无知顽民，也能被感化改过，自愿伏罪到这样程度。所以弥天重犯到今日，唯一的就昰仰恳众大人转奏，将弥天重犯速速正法，再没有任何说的”等话。

【原文】 该臣等看得曾静狂逆凶狡，罪大恶极，妄信逆贼之悖论及奸党之流言，胆肆凶逆，辄敢诋毁本朝，诬蔑君上，编造逆书。从湖南至陕西，劝封疆大臣以反叛，欲构乱于升平之世。核其情罪，法无可宽。且曾静以一山野细民，戴高履厚五十余年，忽谋为叛逆之事，从古以来，乱臣贼子中无有其比。臣等审讯之下，无不切齿恨愤，咸愿食肉寝皮，虽寸磔族诛，不足以蔽其辜。

查律内谋反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正犯之祖父、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男十五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正犯财产入官；若女许嫁已定，归其夫；正犯子孙过房与人，及正犯聘娶未成者，俱不追坐等语，曾静应照此律，即凌迟处死。

行文湖南巡抚，查明曾静之祖父、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照律皆斩立决；男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解部，照律付功臣之家为奴。所有财产，查明入官，伏乞皇上允臣等所请，将曾静立正典刑，以彰国法，以快人心。至张熙与曾静共谋不轨，听从曾静指使，赴陕投送这书，思欲构乱。亦应照“共谋者皆凌迟处死”律，即凌迟处死。为此，合词谨奏。请旨。

【译文】 我们几位大臣，看到曾静狂逆凶狡，罪大恶极，妄信逆贼为反叛谬论及奸党的诋毁谣言，肆无忌惮，诋毁本朝，诬蔑君上，编造反叛的书信；从湖南远至陕西，劝封疆大臣反叛朝廷，想在太平之世制造混乱。反复核实其罪行，是法律所不可宽容的。且曾静以一山野小民，受我朝之恩有五十余年，竟然反叛朝廷，自古以来，乱臣贼子也没有如此严重。臣等在审讯当中，已痛恨万分，真愿食其肉寝其皮，虽诛其九族，碎尸万断，都不能赎其罪过。

法律规定，“凡谋反大逆案件，不论首从，都要处以死刑，主犯的祖父、父、子、孙、兄弟，以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的十六岁以上，不论患病或有残疾，都处以死刑；男的十五岁以下，主犯的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都送到功臣的府上当奴隶；主犯的财产没收归公；如果女的许嫁了别人，归其夫不论；主犯的子孙有过房给别人的，以及主犯聘娶没有实现的，都不追究”等条文。曾静应按此项条款，凌迟处死。

行文湖南巡抚，查明曾静的祖父、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应照法律处以死刑，立即执行；男的十五以下，以及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押解刑部，按照法律送到功臣之家当奴隶使用。所有财产，查明归公。伏乞皇上恩准臣等的请示，将曾静立即正法，以快人心。至于张熙与曾静共谋不轨，听从曾静指使，到陕西投送逆书，阴谋制造反叛，也应按“共谋者皆凌迟处死”为条款，当即正法。特此共同谨奏。请皇上谕旨。

雍正上谕

一、我雍正是将遗诏的“十”改成“于”字而谋取皇位的吗？

【原文】 奉上谕：自古凶顽之徒，心怀悖逆，语涉诋诬者，史册所载，不可枚举。然如今日曾静此事之怪诞离奇，谤张为幻，实以古所未见，为人心之所共忿，国法之所断不可宽者。然朕往复思之，若伊讪谤之语，有一事之实，在朕有几微不可问心之处，则不但曾静当蓄不臣之心，即天下臣民，也应共怀离异之志；若所言字字皆虚，与朕躬毫不干涉，此不过如荒山穷谷之中，偶闻犬吠鸱鸣而已，又安得谓之讪谤乎！

上年此事初发之时，朕即坦然于怀，实无丝毫仇怒之意，笑而览之。此左右大臣皆深知之。嗣令侍郎杭奕祿、副都统海兰，前往湖南拘曾静到案，明白晓谕，逐事开导，动以天良，祛其迷惑。而伊始豁然醒悟，悔过感恩。其亲笔口供，不下数万言，皆本于良心之发见，而深恨从前之误听浮言，遂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诛也。盖其分别华夷中外之见，则蔽锢陷溺于吕留良不臣之邪说；而其谤及朕躬者，则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禵等之逆党奸徒，造作蜚语，布散传播，而伊误给以为实之所致。自上年至今，已将一载。朕留心体察，并令内外大臣各处根究，今日案内著邪书、造谤言之首恶俱已败露，确有证据，并不始于曾静者，尽明白矣。与朕初意毫无差谬。则曾静之误听，尚有可

原之情，而无必不可宽之罪也。

据曾静供称，伊在湖南，有人传说：先帝欲将大统传于允禩，圣躬不豫时，降旨召允禩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宾天之日，允禩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其他诬谤之语，得之于从京发遣广西人犯之口者居多等语。又据曾静供出，传言之陈帝锡、陈象侯、何立忠之人，昨从湖南解送来京。朕令杭奕禄等讯问，此等诬谤之语，得自何人？陈帝锡等供称：路遇四人，似旗员举动，憩息邮亭，实为此语。其行装衣履是远行之客，有跟随担负行李之人，言中京师王府中来，往广东公干等语。查数年以来，从京发遣广西人犯，多系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禩门下之太监等匪类，此辈听伊主之指使，到处捏造，肆行流布。

【译文】 奉皇上旨意：自古以来，那些凶顽之人，心怀反叛之意，用言论诋毁朝廷，这种情况，史册上可以说是很多的。但是像今天曾静这件事的古怪离奇程度，是自古以来所罕见的。为人心之所共仇，国法也万万不可宽容的。但是我经过多次考虑，如果他所说的诽谤之言，有一件属实，那么对我个人来讲也值得有扪心自问之处，而曾静则不但应当有反叛之心，而且天下百姓也应该共怀离异之志，大家反对我，我无话可说；如果他的诬谤之词全都不是事实，与我毫不相干，这样的话，那就不过是荒山穷谷之中，偶然听到几声兽叫禽鸣罢了，又怎么能说是诽谤呢？

去年这个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我的心情就十分坦然，没有一点忿怒之意，含笑而审阅这个案情。这是左右大臣都知道的。后来令侍郎杭奕禄、副都统海兰，前往湖南把曾静缉拿归案，对他讲明道理，进行开导，以天良感化他，使他解除了迷惑。而他也开始豁然醒悟，痛悔过错。他的亲笔口供，不下数万字，看来都是出自他的良心发现，深悔自己从前误听谣言，而做出反叛的举动，因此他甘心受到严刑处置。他鄙视少数民族的观点，大概都是因为受了吕留良邪说的影响。他对我个人的诽谤诬陷，完全

是因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禴等述党奸徒作谣言到处传布后，他误信所致。从去年到现在，已将近有一年时间，我留心体察，并且命令内外大臣到各处调查，追究原因。那种暗着邪书，造谣诽谤的首恶，都已经败露，确有证据，并不是从曾静开始的，这已经很明白了。与我一开始的判断一样。那么曾静的误听，还是有情有原的，而没有必要非治他的罪不可。

根据曾静的供词中所言，他在湖南听有人传说：先帝本来想将大位传给允禴，然而皇上生命垂危的时候，降旨通知允禴从边关回京，圣旨被隆科多所隐藏。先帝去逝之时，允禴不到，隆科多传旨就立了当今皇上。其它诬蔑诽谤的话，是从一些自京城发遣到广西的犯人口中得知的等等。又根据曾静的供词中讲到的传言之人陈帝锡、陈象侯、何立忠等，昨天从湖南将他们解送来京，我令杭奕禄等人讯问他们：这些诬谤谣言，从什么人那里听到的。陈帝锡等供道：“在路上遇到四个人，好像是旗人的举动，在邮亭休息时说的话。他们的衣着打扮，是行远路的客人，另外还有几名跟随担行李的仆从，他们说从京师王府中来，去广东出差等等。”经查，这几年来，从京城发遣去广西的人犯，多属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禴门下的太监等匪类。这些人听从他主子的指使，四处捏造，散布流言。

【原文】 现据广西巡抚金鉉奏报，有造作逆语之凶犯数人，陆续解到。讯据逆贼耿精忠之孙耿六格供称，伊先充发在三姓地方时，于八宝家中，有太监于义、何玉柱向八宝女人谈论：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禴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又云：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随将允禴调回囚禁。太后要见允禴，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皇上又把和妃及其他妃嫔，都留于官中等语。又据达色供，有阿其那之太监马起云向伊说：皇上令塞思黑去见活佛，太后说：“何苦如此用心！”皇上不理，跑出来。太后甚怒，就撞死了。塞思黑之母亲，亦即自

缢而亡等语。又据佐领华贲供称，伊在三姓地方为协领时，曾听见太监关格说，皇上气愤母亲，陷害兄弟等语。八宝乃允禩管都统时用事之鹰犬，因抄抢苏克济家私一案，圣祖皇帝特行发遣之恶犯；何玉柱乃塞思黑之心腹；太监关格系允禩亲给之太监；马起云系阿其那之太监；其他如允禩之太监马守柱、允禩之太监王进朝、吴守义等，皆平日听受阿其那等之逆论，悉从伊等之指使。是以肆行诬捏，到处传播流言，欲摇惑人心，泄其私仇。昨据湖南巡抚赵弘恩等一一查出，奏称：查得逆犯耿六格；吴守义、达色、霍成等，经过各处，沿途称冤，逢人讪谤。解送之兵役，住宿之店家等，皆共闻之。凡遇村店城市，高声呼招：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我们已受冤屈，要向你们告诉，好等你们向人传说。又云：只好问我们的罪，岂能封我们的口！等语。是此等鬼蜮之伎俩，一无所施，蓄心设谋，惟以布散恶言为煽动之计，冀侥幸于万一而已。

夫允禩平日，素为圣祖皇考所轻贱，从未有一嘉予之语。曾有向太后闲论之旨：“汝之小儿子，即与汝之大儿子当护卫使令，彼也不要。”此太后宫内人所共知者，圣祖皇考之鄙贱允禩也如此。而逆党乃云，圣意欲传大位于允禩，独不思皇考春秋已高，岂有将欲传大位之人令其在边远数千里外之理！虽天下至愚之人，亦知必无是事矣。只因西陲用兵，圣祖皇考之意，欲以皇子虚名坐镇，知允禩在京毫无用处，况秉性愚悍，素不安静，实借此驱远之意也。

【译文】 现在根据广西巡抚金鉷的报告，抓住了几个造谣凶犯，陆续解到。经审讯，据逆贼耿精忠之孙耿六格供称，他原被发配到三姓地方的时候，在八宝家中，有两个太监于义和何玉柱向八宝女人谈论道：圣祖皇帝本来是把天下传给十四阿哥允禩，皇上把“十”字改为“于”字，又说：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了一碗人参汤，不知什么原因，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后来马上把允禩调回来囚禁。太后要见允禩，圣上

大怒，太后撞铁柱自杀。圣上又把和妃及其他妃嫔，都留到自己宫中享用等等。又根据达色供词说，有阿其那的太监马起云向他说：皇上令塞思黑去见活佛，太后说：“何苦如此用心！”皇上不理，跑出来。太后十分忿怒，就撞死了。塞思黑的母亲，也即自缢身亡等等。又根据佐领华赉供道，他在三姓地方为协领时，曾听到太监关格说，皇上气死了他的母亲，杀害了他的兄弟。八宝是允禩管都统时用的鹰犬走狗，因抢劫苏克济家私一案，圣祖皇帝时特行发遣边远的恶犯；何玉柱是塞思黑的心腹；太监关格是允禩亲信小太监；马起云是阿其那的太监；其余如允禩的太监马守柱、允禩的太监王进朝、吴守义等，都是平时吸取阿其那等叛逆论调，并且受他们的指使。所以肆意进行诬蔑捏造，到处传播流言，想迷惑人心，发泄私忿。不管是押送的兵士，或者沿途的容店，都听说过这些谣言。特别更为严重的是，他们一遇到城市，村店人群多的场合，就高声招呼人们：“你们都来听呵，新皇帝的新闻，我们已经蒙受冤屈，要向你们告诉，希望你们向大家传说传说。又说什么，他们只能制造我们的莫须有的罪名，他们是封不住我们口的”等等。像这种鬼域伎俩，是他们在没有办法情况下，想以散布谣言达到他们的目的的卑劣行径。

圣祖皇考在世的时候，平时就对允禩十分轻贱，从没有说过他一句褒奖的话，并且曾在同太后闲话时说：“你的小儿子，就是给你那大儿子当护卫、当传令兵，他都不要。”这些都是太后宫内的人知道的。圣祖皇考对允禩这样鄙视，而其逆党却说，圣意想把皇帝之位传给允禩，他们却没有看到，皇考到了老年，难道有把他把要传位之人放在几千里之外的边远地区的道理呢？天下再傻的人，也知道不会有这种事哩！只因为西部边疆用兵打仗，圣祖皇考的本意，是想以皇子的名义在那里坐镇，其实知道允禩在京没一点用处，况且秉性粗鲁，从不安静，不过是个借口，把他赶到远处罢了。

【原文】 朕自幼蒙皇考钟爱器重，在诸兄弟之上，宫中何人不

知！及至传位于朕之遗诏，乃诸兄弟面承于御榻之前者，是以诸兄弟皆俯首臣伏于朕前，而不敢有异议。今乃云皇考欲传位于允禩，隆科多更改遗诏，传位于朕，是尊允禩而辱朕躬，并辱皇考之旨，焉有不遭上帝皇考之诛殛者乎！朕即位之初，召允禩来京者，彼时朕垂涕向近侍大臣云：痛值皇考升遐大故，允禩不得在京，何以无福至此！应降旨宣召，俾得来京以尽子臣之心。此实朕之本意，并非防范疑忌而召之来也。以允禩之庸劣狂愚，无才无识，威不足以服众，德不是以感人，而陕西地方，复有总督年羹尧等在彼弹压，允禩所统者，不过兵丁数千入耳，又悉皆满州世受国恩之辈，而父母妻子俱在京师，岂肯听允禩之指使，而从为背逆之举乎！其以朕防范允禩，召之来京者，皆奸党高增允禩声价之论也。及允禩将到京之时，先行文礼部，询问见朕仪注，举朝无不骇异。及到京见朕，其举动乖张，词气傲慢，狂悖之状不可殚述。朕皆隐忍宽容之。朕曾奏请皇太后召见允禩，太后谕云：我只知皇帝是我亲子，允禩不过与众阿哥一般耳，未有与我分外更亲处也。不允。朕又请：可令允禩同诸兄弟人见否？太后方谕允。诸兄弟同允禩进见时，皇太后并未向允禩分外一语也，此现在诸王阿哥所共知音者。后允禩于朕前肆其咆哮，种种不法，太后闻知，特降慈旨，命朕切责允禩，严加训诲之，此也官中所共知者。允禩之至陵上，相去太后晏驾之前三四月，而云太后欲见允禩而不得，是何论也？

且何玉柱等云，太后因闻囚禁允禩而崩；马起云向伊妹夫达色又云，太后因闻塞思黑去见活佛而崩。同一诬捏之语，彼此参差不一者如此。且塞思黑去西大同，在雍正元年二月，朕将不得已之情，曾备悉奏闻太后，太后是而遣之者，并非未请慈旨太后不知不允之事也。即允禩之命往守陵，亦奏闻太后，欣喜嘉许而遣之者，亦非太后不知不允之事也。雍正元年五月，太后升遐之时，允禩来京，朕降旨封伊为郡王，切加教导，望其省改前愆，受朕思眷。后伊仍回陵寝地方居住。其间阿其那在京，塞恩黑在陕，悖乱之道日益显著。是其逆心必不可折，邪党必不肯

散。而雍正四年，又有奸民蔡怀玺投书允禩院中，劝其谋逆之事，朕始将允禩召回京师拘禁之。是允禩之拘禁，乃太后升通三年以后之事，今乃云太后因允禩囚禁而崩，何其造作之舛错至此极耶！

【译文】 朕从小受皇考的钟爱器重，在各位兄弟之上，官中众人皆知！至于说传位于朕的遗诏，是众兄弟当时在御榻都看到了的，当时众兄弟都臣服于朕的面前，没有任何人有异议。而现在，他们却说皇考想传位于允禩，隆科多更改了遗诏后，传位于朕，这是尊敬允禩而污辱朕，并且也是对皇考圣旨的极大污辱。那有不遭皇考在天之灵的愤怒呢？朕刚刚即位时召允禩来京，当时朕垂泪向近侍大臣说道：“正值圣祖皇考升天大故之时，允禩却不在跟前，为何他竟这样没有福气。应立刻降旨宣召，让他赶紧回京来尽子臣的孝心。朕的本意就是这样，并不是为了防范疑忌他而召他来的。允禩庸劣狂愚，无才无识，威不足以服众，德不足以感人；而陕西那个地方，有总督年羹尧等人在那里镇压。允禩统兵不过几千，这些人又都是满州族人的子弟，世世代代都受朝廷的恩惠，他们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城，那肯听允禩的指使而做叛逆之举呢？那种说朕为了防范允禩，才召他来京，都是允禩的奸党为了抬高允禩的声价罢了。允禩将到京时，先行文礼部，询问见朕仪注，满朝无不惊骇。到了进京见到朕时，举动乖张，语气傲慢，狂悖之状不可细述，朕都隐忍宽容了他。朕曾奏请皇太后召见允禩，太后谕旨说：“我只知皇帝是我亲儿子，允禩不过与众阿哥一样罢了，没有同我有特别亲密的地方，因此没有允许。”朕又请示：可令允禩同兄弟们一起进见吗？这时太后才允许了。诸兄弟同允禩进见时，皇太后并没有多跟允禩说一句话，这是现在诸王阿哥都知道的。后来允禩在朕的面前大肆咆哮，种种不法，太后听说后，特降下慈旨，命朕批评允禩，严加训诲。这也是官中人都知道的。允禩去陵上之事，是太后晏驾之前三四个月的事，而有人说太后想见允禩而见

不到他，这是什么话呢？

并且何玉柱等人说，太后是因听到囚禁了允禩而驾崩的；马起云向他妹夫达色说，太后因为听说塞思黑去见活佛而驾崩的。同一诬蔑之语，前后如此矛盾。况且塞思黑的去西大同，是在雍正元年二月，朕把不得已的心情，曾详细地奏闻了太后，太后同意后派他去的。并不是没有请示太后，也并非太后不知不允的事情。即使命允禩去守陵，也是先奏闻了太后，并且是太后对此事很高兴，而并非什么太后不知不允的事情。雍正元年五月，太后升天之际，允禩来京，朕降旨封他为郡王，切加教导，希望他改正错误，接受朕的恩眷。后来他仍回陵寝地方居住。这期间阿其那在京，塞思黑在陕，谋反的迹象一天比一天更加明显。这是因为他们的道心必不可以折服，奸邪之党必不肯散的原故。雍正四年，又有奸民蔡怀玺向允禩投书，劝他谋反。这时朕才将允禩召回京师拘禁起来。允禩被拘禁之事，是太后升天三年以后的事，今天他们却说太后是因允禩被朕囚禁而崩的。他们的谣言竟错到这种程度。

【原文】 又马起云云，塞思黑之母亲自缢而亡。现今宜妃母妃，朕遵皇考遗旨，著恒亲王奉养于伊府中，而道贼等以为昔年自缢，真鬼魅罔谈也。

前康熙四十七年，圣祖皇考圣躬违豫，朕与诸医同诚亲王等，昼夜检点医药，而阿其那置若罔闻。至圣体大安，朕与之互相庆幸，而阿其那攒眉向朕言：目前何尝不好，-虽然如此，但将来之事奈何？是阿其那残忍不孝之心，不觉出诸口矣。朕曾将伊不是处，对众宣扬羞辱之，而伊深为愧恨。今乃以六十年之进奉汤药，加恶名于朕，可谓丧尽天理之报复，无怪乎遭神明之诛殛也。至于和妃母妃之言，尤为怪异莫测。朕于皇考之宫人，俱未曾有一见面者，况诸母妃辈乎！七年来，如当年皇考宫中之人，即使今女子辈，若曾有一人在朕左右，朕实不对天日以君临兆庶也。

又曾静供称，伊在湖南时，传闻皇上令浙江开捐纳之例，欲将银六百万两修造西湖为游幸之地。彼时为其所惑，今乃知皆奸党造作，毫无影响之语，无所不至。夫西湖所有昔年地方官盖造之行宫，朕尚皆令改作佛宇矣，而奸党云，欲捐纳银两修造西湖为游幸之地，不知出自何论。

又三姓地方，有人造播流言：皇上在芦沟桥盖造官房，收往来客商之饭钱等语。朕因应试士子来京者，桥上查检行李，不免风雨露处之苦，是以特发帑金，盖造房舍，俾其住歇。令管理税务之人，到店验看应试文凭，即令放行。在士子辈既有投足之地，又可免奸商冒充应试之人，致于漏税之咎。此朕之仁政，直省举子感恩颂德之事，而奸党以朕为欲收容商饭钱，作此等诬谤之语，实为可笑，亦可怪也。

【译文】 还有马起云说，塞思黑之母亲是自缢身亡。现在的宜妃母妃，朕遵照皇考的遗旨，让恒亲王把他们奉养在他的府里，而逆贼们却造谣说，他们过去已经自缢，真是鬼话连篇呐。

前康熙四十七年，圣祖皇考圣躬得病。朕与几位御医和诚亲王等人，昼夜检点医药，而阿其那却置若罔闻。到了圣体康复，朕与大家相互庆祝，而阿其那却皱眉向朕说道：“虽说目前没有什么不好，但将来的事情怎么办？”这是阿其那残忍不孝之心，不觉说出来了。朕曾把他的不是处，对众人宣扬并羞辱，而他深感愧恨。现在他们又以六十年进奉汤药的话，给朕加一恶名，真可以说是丧尽天良的报复，无怪乎神明也不容忍哩。至于和妃母妃之言，更是怪异莫测，朕对皇考的官人，都从没有见过一面，何况诸母妃之辈呢！七年来，如果当年皇考官中之人有一个曾在朕的左右，就算朕对不起天日，也可以说不应该君临天下百姓。

又根据曾静供称，他在湖南的时候，听说皇上令浙江百姓额外捐款纳税，把所得六百万两银子，用在为自己在西湖修造游幸之地。当时人们被他们所迷惑，现在都已澄清事实，知道那是奸党的造谣。即使西湖过去地方官所盖造的那些行宫，朕还令其改

作寺庙呢！而奸党却说欲捐纳银两修造西湖游幸之地，不知这出自何种论调。

还有三姓地方，有人传布谣言说：皇上在芦沟桥盖造官房，收来往客商的饭钱等等。朕因应试士子来京的问题，桥上查检行李，不免有风雨露宿之苦，所以特发帑金，盖造房舍，让他们有地方住宿和休息，令管理税务的人，到店里查看应试文凭，即令放行。对于士子们来讲，既有投宿之处，又可免奸商冒充应试之人，造成漏税的问题。这些都是朕的仁政，受到举子们感恩戴德之好事，而奸党们却造谣说，朕想收客商的饭钱，造这种诬蔑之言，真是可笑，也是极为怪诞和荒谬的。

【原文】 阿其那、允禩纵酒无忌，而加朕以酗酒之名。阿其那等蓄心阴险，存倾陷国家之念，怀与皇考为仇之心，而反一一加之于朕。总因阿其那等平日之逆谋不遂，畜养匪类者久矣。播散讹言，分门立户，各各收买党羽，欲以蛊惑人之耳目，俾素蓄逆念之蠢动而起，然后快心，祖宗之社稷所不顾也。夫加朕以凶暴恶名，其罪犹轻，独不念圣祖皇考六十余年之丰功懋烈，而作如此归结，岂为人子者所忍为乎！阿其那、塞思黑等之罪，实万死不足以赎矣。伊等之奸谋若此，目今败露者，即不胜其数，其他匪类邪党之听其驱使者，奚止数千百人！造作种种诬谤之语，已流散于极边远塞，则宇宙之内，乡曲愚人，为其所惑者，岂止曾静数人而已哉！即如三姓之协领华贵，身在地方，有稽查之责，乃伊将所见所闻，俱行隐瞒，不以人告。朕在九重内，何由而知之？何从而究之？又何自而剖晰开示，使天下臣民共晓之？

今蒙上天皇考俯垂默佑，令神明驱使曾静自行投首于总督岳钟琪之前，俾造书造谤之奸人一一呈露，朕方得知若辈残忍之情形，明目张胆将平日之居心行事，遍谕荒陬僻壤之黎民，而不为浮言所惑于万一。亦可知阿其那、塞思黑等蓄心之惨毒，不忠不孝，为天祖之所不容，国法之所难宥处。天下后世，亦得谅朕不得已之苦衷矣。此朕不幸中之大幸，非人力之所能为者，即此则

曾静不为无功，即此可宽其诛矣。

从来奸究凶丑，造作妖言，欲以诬民惑众者，无时无之。即如从前妖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此语已流传三十余年矣。又如广西张淑荣等言：钦天监奏紫微星落于福建，今朝廷降旨，遣人至闽，将三岁以上九岁以下之男子，悉行诛戮。又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系前明后裔，遇星士推算伊有帝王之命，似此诞幻荒唐，有关世道人心之语，往往地方大臣官员希图省事，目为疯癫，苟且掩护于一时，而未念及其迷惑之害，日月渐远，传播渐多，遂不能究问其所自来，转令无辜之人，受其牵累。此皆庸碌无能，视国家利害于膜外之大臣等养痍之害也。

【译文】 阿其那、允禩纵酒无忌，而反给朕加上酗酒之名。阿其那等人用心阴险，企图反叛朝廷，怀着与皇考为仇之心，反而一一强加在朕的身上。总之是因为阿其那等平日的阴谋作乱没有实现，所以畜养匪类已经很久了。他们四处散布讹言，分门立户，各有收买党羽，想以蛊惑人心，让那些有逆念的人们蠢动而起反对朝廷，他们然后却幸灾乐祸。他们哪里为祖宗社稷着想。加到朕身上的恶名，还算不重的；而不顾圣祖皇考积六十余年的丰功伟业将毁于一旦，这难道是为人子的忍心做的事吗？阿其那、塞思黑等人的罪恶，实在是万死都不能赎其罪过。他们的奸谋涉及的败露人员今天已数不胜数，那么其他匪类邪党或听其驱使的人，何止千万人。所造种种诬谤之语，已经流传到极远的边塞，则普天之下，乡曲愚人，被他们迷惑的，岂只是曾静几个人而已。比如三姓那个地方的协领华赛，身在地方，有稽查之责，他还把所见所闻，尽量隐瞒，不进行报告。朕在九重内，如何能够得知呢？怎么能够追究呢？又怎么能够说明清楚，使天下臣民都明白呢？

今蒙上天皇考的在天之灵暗中保佑，令神灵驱使曾静自行投首于总督岳钟琪的面前，使那些造谣诽谤的奸人一一暴露出来，朕才得以知道他们残忍的情形。他们明目张胆地把平日的居心行

事，告诉荒山僻壤的百姓，而不被浮言所蛊惑的则成为了少数人。从此，可知阿其那、塞思黑等皆存心不良，狠毒惨忍，不忠不孝，为天祖所不容，国法也难宽大处理。天下后世，也得原谅朕不得已的苦衷啊。这是朕不幸中的大幸，不是人力所能及的。根据这个看情况来，曾静不能说没有功劳，就凭这就完全可以宽大处理，免其死罪。

从来奸贼小丑，造作妖言，想以此诬陷人民迷惑众人，没有一个时期不存在。比如从前有句妖言说道：“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这句话已经流传三十多年了。又如广西张淑荣等说：钦天监奏有紫微星下落到福建一带，朝廷将降下圣旨，派人去那个地方，把三岁以上九岁以下的男童，尽行杀戮。又如山东人张玉，谎称自己姓朱，是前明后裔，碰到星相人士推算，说他有帝王之命。像这些荒唐言语，往往是那些地方大臣或官员为了省事，把其看成疯癫之人的疯话，总想掩盖过去了事，而没有想到它的害处，是迷惑人心，时间一长，传播慢慢多起来，便无法追问原因，使那些无辜之人，受到牵连。这也是那些无能之辈、对国家利害漠不关心的大臣等造成的养痍之患。

【原文】 又如村塾训蒙之人，本无知识，而又穷困无聊，心怀抑郁，往往造为俚鄙怪妄之歌词，授于村童传唱。而不知者遂误以为童谣，转相传流布。此皆奸民之欲煽惑人心，紊乱国法者。地方大吏有司，视为泛常，不加稽察惩创，以防其渐。可乎？前年，有人捏称侍郎舒楞额密奏八旗领米一事，欲以摇惑旗人之心。舒楞额闻之，据实入奏。此时朕随降旨根究，即得其造言之人，加以惩戒。凡属流言初起之时，若地方大臣能肯悉心穷究，必得其根由，使奸宄不至漏网，庸愚无知亦不至拖累，其有裨于人心世道者，良非浅鲜。

今因曾静之事，而查出首先造谤之渠魁，盖以此案发觉尚早，易于追寻，故可递推而得其根源也。且朕之宽宥曾静，非矫情好名而为此举也。《虞书》曰：“宥过无大，刑故无小。”曾静

之过虽大，实有可原之情。若我皇考时时训海子臣曰：“凡人孰能无过？若过而能改，即自新迁善之机，故人以改过为贵。但实能改过者，无论所犯之大小，皆不当罪之也。”朕祇承圣训，日以改过望天下之人。盖过大而能改，胜于过小而不可改者，若曾静可谓知改过者矣。朕赦曾静，正欲使天下臣民，知朕于改过之人，无不可赦之罪，相率而趋于自新之路也。且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曾静狂悖之言，止于谤及朕躬，并无反叛之实事，亦无同谋之众党。彼跳梁逆命之人，果能束身归命，畏罪投诚，尚且邀赦宥之典，岂曾静独不可贷其一死乎！

【译文】 再比如，有些村中私塾先生，本来没有多少知识，再加上穷困无聊，心中怀着郁闷压抑之情，往往编造一些俚俗怪妄的顺口溜，教给村中不懂事的儿童传唱。而不知道原因的，误以为是什么童谣，继而相传流传开去。这些都是那些奸民想煽动人心，扰乱国法的行为。地方上的大吏有司，负责法制的官员或部门，不当回事，不加以惩处，不防止它的蔓延。这是不可以的。前年，有人捏造说侍郎舒楞额密奏八旗领米一事，想以此来扰乱迷惑旗人之心。舒楞额听到后，马上向朝廷报告，此时朕随即降旨追究，立即找到了造谣之人，加以惩戒。凡是流言初起之时，如果地方大臣能详细认真予以追究，必然能够找到根源，不致使奸人漏网，那些庸俗愚蠢的人不知道，也受不了牵连，这样对人心的净化，世道的治理，是非常有益的。

今因曾静的事，而查出首先造谣的首恶，这是因为这个案件发觉的早，容易追查，所以顺藤摸瓜便找到了根源。朕的宽待曾静，不是因为他说了几句奉承的话而才如此的。《虞书》曰：“宥过无大，刑故无小。”曾静之过错虽大，实在是情有可原。过去我皇考时时教导子臣说：“凡是人，谁没有过错？有了错误而能改正，这是重新做人的机会，所以人以能以改正错误为贵。凡是确实能改正错误者，不论他的错误大小，都不应当把他当成罪行

去处理。”朕坚信圣训，希望天下人犯了错误都能改正。所以错误大而能改正，比错误小而不改正要好的多。像曾静可以说是知道改正错误的人。朕赦曾静，正想让天下人都知道，朕对于能改错的人，都可以赦免其罪，使大家都能走上自新的道路。况且朕治理天下，不以个人的喜好行事，不因为喜欢某人而奖赏他，也不以个人的恼怒而惩罚他。曾静过去那些诽谤之言，仅仅对着朕个人本身。他并没有反叛整个朝廷的实事，也没有什么同谋党余或组织，属于不安分守己的跳梁小丑。他果能束身归命，畏罪投诚，而且想获得赦宥的恩典，那怎么不能免他一死呢？

【原文】 且曾静之前后各供，俱系他亲笔书写，并非有所勉强逼勒，亦并非有人隐受意指，实由于天良感动，是以其懊悔之心迫切诚恳，形于纸笔。此及可原之情，并非以其为谄媚颂扬之词，而欲宽其罪也。若今日喜其谄媚而曲宥之，则从前即当怒其诬谤而速诛之矣。况曾静今日颂扬之词，较之从前诬谤之语，其轻重悬殊，何止千百？论其情罪，岂足相抵！若有人议朕喜曾静之谄媚而免其罪者，则与曾静从前之犬吠鸱鸣无以异矣。然朕亦不论。除造作布散流言之逆党，另行申明正法外，著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并将伊之逆书及前后审讯诘问之语，与伊口供，一一刊刻颁布，使天下人共知之。

湖南省地方大小官员等，平日既不能宣布国恩，敷扬朕训，化诲百姓，尽去邪心，致有此等愚昧狂乱之人，实有罔忝于父母斯民之责，此则深当愧耻者。今若以羞忿怨恨之心，或将曾静、张熙有暗中贼害情形，朕必问以抵偿之罪。曾静等系朕持旨赦宥之人，彼本地之人，若以其貽羞桑梓有嫉恶暗伤者，其活罪亦然。即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盖曾静之事，不与吕留良等。吕留良之罪，乃皇考当日所未知而未赦者，是以朕今日可以明正其罪。若曾蒙皇考赦免之旨，则朕亦自遵旨而曲宥者辜矣，特谕。

【译文】 并且曾静的前后供词，都是他亲笔书写的，并不是逼他说出违心的话，也没有人暗中授意指使他，确实是由于天理良心受了感动，所以他的悔罪之心急切诚恳，形成了文字。这是 he 可原之情，更不是因为他说了些谄媚颂扬之词，才对他加以宽大处理的。如果说今日因喜其谄媚而宽宥他，那么为何从前不因怒其诬蔑诽谤而马上杀掉呢？况今天曾静的颂扬之词，比以前的诬蔑诽谤之语，可以说轻重悬殊的程度，相差千百里。论他的情罪，是两者不能相抵消的。如果有人议论朕是因为喜欢曾静的谄媚而免其罪，那就与曾静从前的犬吠鸱鸣没有区别了。即使如此，朕也不以罪加以论处。除了造谣布散谎言的逆党，另行申明正法外，还是要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并把他的逆书及前后审讯中答问之语、各种口供，一一刊刻印刷，颁布天下，使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件事情。

湖南省地方的大小官员等，平日既然不能宣传朝廷恩德，公布朕训，教育人民，除去邪心，致使出现这种愚昧狂乱之人，实在有失职之责任，此时应该深深地感到有愧。现在如果在他们羞忿怨恨之心的驱使下，有暗地里把曾静、张熙杀害之事，朕必然让其抵命。曾静等系朕特别下旨赦免罪行之人。当地之人，若因为丢了乡土人的面子而对他们加以暗伤者，其罪也要严肃处理。纵然朕的子孙，将来也不得以其诋毁朕躬之名，而追究杀害他们。总之，曾静之事，与吕留良不同。吕留良之罪，是皇考当天不知道而且也没有赦免的罪行，所以朕今天可以治其罪。若曾蒙皇考赦之旨，则朕也自然遵旨而对其宽大处理，特谕。

二、朕诸兄弟不可以德化，不可以理喻，不可以情感，不可以恩结，而其悖逆妄乱，的确是百折不回。

【原文】 又奉上谕：从来善恶之报，纤毫不爽。凡罪大恶极之

人，虽一时宽宥，免于诛戮，而伊辗转行回，仍复自投法网，若有驱逐之使然者。即如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禩门下同恶共济之徒，潜蓄邪谋，阴怀逆志，实国家之巨贼，貽宗社之隐忧。朕既洞烛其奸，本应将伊等置之于法，以绝根株。只以一时不忍，思古人“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之意，予以宽典，发遣边方，保其性命，以为此辈稍有人心，或能感发天良，悛改夙恶。岂料逆天造孽之人，不可化诲，毒忍之性，愈益猖狂，上干天地，皇考之怒。委曲婉转，假手于曾静辈，使奸党匪类之罪状一一呈露，不容漏网。天道昭著若此，能不令人毛骨悚然，倍加警惕乎。

朕即位之初，召诸兄弟于养心殿，朕以肝隔肺腑之言，痛哭向诸兄弟劝谕之曰：朕蒙皇考付托之重，于诸子之中，传朕以大位。不比前代继统之君，先后序立，父子之间，各成其是；非如禹汤之后而有桀纣，天下不得因其子孙之不善，而掩禹汤之功德。若朕之于皇考，则是非得失，实为一体。朕躬若是，则皇考之付托为是；朕躬若非，则皇考之付托为非。以皇考六十余年之圣德神功，超越千古，朕断不敢苟且怠荒，甘于自弃，使天下后世，共论皇考付托之误，致掩六十余年功德之崇隆。朕之此心，上天、皇考实鉴临之。凡我兄弟，均受皇考生成顾复，数十年天高地厚之深恩，当仰体皇考之心，并思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之义，各抒忠荃，协赞朕躬。于朕所不能者，辅之助之；于朕所错误者，规之谏之；朕便有过失，亦当谅之隐之。同心匡弼，让朕一个是字，使朕为一代之令主，以成皇考之是，即请兄弟所以报皇考罔极之鸿慈也。

似此谆谆劝告，乃阿其那、塞思黑等置若罔闻，而悖逆妄乱之念，百折不回。不可以德化，不可以理喻，不可以情感，不可以恩结。即如阿其那方封亲王时，伊即向人出怨望愤激之语，且向在廷大臣云：“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其目下施恩，皆不可信。”又当大庭广众，咒诅朕躬，则其他可知矣。朕初即位时，塞思黑谓其左右人等曰：“不料事情竟至如此，我

辈生不如死。”此伊太监王应隆亲口供出者。及令伊居住西宁时，伊则以多金邀买人心，以致奸民令狐士仪等人密投书札，劝其构逆。

【译文】 皇上的谕旨又说：自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非常灵验的。凡罪大恶极之人，虽一时宽大了他，免了死罪，而他们都旧罪重犯，再投法网，好像有神明暗中驱使他们这样做的。比如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禩门下那些同他们一心一意作恶的奸徒，暗怀逆志，实在是国家的大奸贼，给国家留下了巨大隐患。朕既洞察出他们的奸情，本来应该将他们绳之以法，斩草除根。只因一时不忍心这样做，考虑古人有道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对他们宽大处理，遣送到偏远的地方，保全他们的生命；满以为他们只要有一点点良心，便可以改恶从善。那想到逆天违命之人，不可教诲，恶毒之性，更加猖狂，招致了上天和皇考之灵的愤怒，以曲折的形式，借曾静等人的手和口，使他们那些奸党罪行一一暴露。天理报应这样灵验，能不令人毛骨悚然，小心谨慎吗？

朕即位的之初，把诸位兄弟召到养心殿，以肺腑之言，哭着向众兄弟劝说道：“朕受皇考的重托，于诸子之中，传朕于大位。不比前代继统之君，按先后次序而立，像禹汤之后传给桀纣那样，天下不会因他的子孙不善，而掩盖禹汤的功德，而朕与皇考之间，所有是非得失，有着很密切的联系。朕如果对，就说明皇考的传位也对；朕若不对，那么说明皇考的传位就是错误的。就凭皇考六十多年的圣德神功，超越千古的业绩，朕断不敢苟且偷安，自暴自弃，而使天下后世议论皇考传位为错误，以致磨灭六十多年的功德圣绩。朕的这番苦心，上天、皇考都是看得着的。凡是我的兄弟，都受过皇考几十年天高地厚的深思，应当理解皇考的心情，并且知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道理，各自尽力，协助朕躬。对朕能力达不到的地方，进行弥补帮助；对朕的错误，进行谏阻；对朕的过失，进行谅解，同心同德，承认朕是应该承

继之主，也就承认了皇考传位的正确，这也算是诸位兄弟报答父皇鸿恩的具体行动。”

像这样的谆谆劝告，可是阿其那、塞思黑却置若罔闻，而且反叛的思想，仍是百折不回。不能用德来感化他们，不能以理来使他们明白，又不能以兄弟之情打动他们，不能以恩宠团结他们。比如阿其那刚开始封他亲王时，他反而向人发泄怨恨之词，并且向在朝的大臣说：“皇上今日加恩，谁知道他明日会不会加以诛戮！他目前施恩，都不可信。”又当着大庭广众咒骂我，其他也就可想而知了。朕当初即位时，塞思黑对他左右的人说：“不料事情竟是这种结果，我辈生不如死。”这是他手下的太监王应隆亲口供出来的，到叫他居住西宁时，他则用金钱收买人心，以致奸民令狐士仪等人密投书信，劝他谋反。

【原文】 又如允禔依傍景陵居住，尚有奸民蔡怀玺投书院中，称伊为帝，而伊藏匿之。是伊等之逆心，断不改除；伊等之逆党，断不解散。朕早夜筹思，总无可以料理措置，以全顽梗，以安宗社之良法。万不得已，将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禔分别拘禁，而不料阿其那、塞思黑相继皆伏冥诛。朕之办理此事，皆默告天地，虔对皇考，熟思审慎，量其轻重为宗社国家之大计，置此身于度外之举，此心可以对上天、皇考。至于众口之褒贬，后世之是非，朕不问也。

从前储位未定时，朕之兄弟六七人，各怀觊觎之心，彼此戕害，各树私人，以图侥幸。而大奸大恶之人，遂乘机结党，要结朝臣，收罗群小，内外连属，以成牢不可破之局。公然以建储一事，为操权于己，垂手可成，不能出其范围。此等关系宗社国家之大患，朕既亲见而深知之，若苟且姑容，不加以惩创儆戒，则凶恶之徒，竟以悖逆为寻常之事，其贻害于后世子孙者，将不可言矣。况古人云：“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是君民、上下之间，有天冠地履之义，尚言施报之情，岂有臣下之分，作乱犯上，显然昭著，只因系出宗亲，遂可纵恶长奸，置宗社大计于不问乎！

故以在下言之，则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而以在上言之，则曰：忠我则臣，背我则敌。此一定之情理，千古之通义也。且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夫与君与社稷相较君尚轻于社稷，则兄弟宗亲，更不待言矣。若但务敦睦九族之虚名，而不计宗社苍生之大患，岂不本末混淆，轻重倒置耶！

今不必远引古昔之事，即以我朝与明代近事言之，我太祖、太宗刚毅明决，预烛机先，不以私情而存姑息之见，是以成大一统之规，貽世世子孙太平之福。明之建文优柔寡断，不知大义，不识极变，意欲保全骨肉而酿成永乐之祸，卒至国危身丧，为祖宗之罪人。永乐虽幸而事成，祖宗天下不至落他人之手，然俯对臣庶，能不赧颜乎？传之后世，能免讥议乎？且扰乱海内，荼毒生灵，宗社之危，臣民之厄，未有甚于此时者。又如明宸濠之乱，亦由于姑息酿成，可为天下后世之鉴戒也。总之，人君不幸遇此等之事，若见之既真，知之既确，则当权其利害之轻重而毅然决断，勿存小不忍之见，顾己身之毁誉，以貽祸患于无穷。

倘见之不真，知之不确，而冒昧行之，或更有所怨参乎其间，则为天地祖宗之罪人，亦不能逃于谴责也。朕于阿其那等结党构逆之情，知之真确，而其显然背叛之迹，又大庭广众之所共见共闻者。彼时诸王大臣等屡次合词陈奏，请将阿其那、塞思黑等即正典刑，朕召人面见堕泪，复切谕之曰：“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禵乃圣祖皇帝之子，朕之亲弟，骨肉手足。尔等皆受圣祖皇帝及朕深恩之人，今所奏如此，若稍有情罪不符之处，陷朕于不义，或稍有心口相违之处，抱歉于隐微，则得罪于上天、皇考者，莫大乎是。其能逃于天谴乎！”此时诸王大臣异口同声，无不以为阿其那、塞思黑等悖逆之情罪，断断不容宽宥。朕复逐一询问，人人皆言陈奏之处，实出于公心。朕犹降旨询问各省督抚、提镇等，其所奏亦复雷同。只因尚有数处未曾奏到，朕未降旨，各令拘禁，仍欲详加斟酌而定之意。而二人乃相继而死，朕尚未将伊等明正典刑也。此京师亿万臣民所共知之事，不待朕之晓谕者。

【译文】 又如允禩到景陵居住，也有奸民蔡怀玺投书他的院中，称他为帝，而他将书信隐藏起来，这是他们反叛之心，断不改除；他们这些逆党，也断不会解散。朕早晚思考，总觉得没有办法处理，找不到既可以保全他们又能对社稷有利的办法。迫不得已情况下，把阿其那、塞思黑、允禕、允禩分别拘禁起来，而不料阿其那、塞思黑都相继病死，朕办理此事时，都默默地祷告了天地和皇考。深思熟虑，量其轻重，此心可以对上天、皇考，至于众人如何说，后世如何论，朕不管他了。

从前太子之位没有确定的时候，朕的兄弟六七个人之间，各怀异心，彼此相残，各树自己的人，以图能得到皇位。而大奸大恶之人这时便乘机结党，邀结朝臣，收罗群小，内外连属，以造成牢不可破的形势。这种关系到社稷国家的大隐患，朕既然发现了，若苟且纵容，不加惩戒，那么凶恶之徒就会以反叛为家常便饭，随随便便，其贻害于后世子孙的严重程度，将是不能用言语加以表达的。况且古人说：“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君、民，上、下之间有区别，君上施恩，臣民报答。哪有以臣下的身份，犯上作乱，并且又明显昭著。仅仅由于出自宗亲，就可以胡为作恶，不顾国家社稷的方针大计吗！所以作为臣下来讲，他可以说：抚我则后，虐我则仇；那么作为君上来讲，他可以说：忠我则臣，背我则敌。这是很正常的道理，千古的通义。况且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拿君同社稷相比较，君还比社稷为轻，那兄弟、宗亲就更不用再说了。如果是为了同族的和睦相处，而不顾国家利益，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今天不必远引古代的事例，就说我朝与明朝的近代事情来比，我太祖、太宗性格刚强决断，不以私情而迁就问题，所以才成就天下大事，给后代子孙创造了幸福。而明朝的建文优柔寡断，不知大义，不识权变，为保全骨肉而酿成了永乐之祸，成了丧身危国对不起祖宗的罪人。永乐虽说幸运成功，祖宗天下不致落入他人之手，然而下对臣民，又有什么颜面呢？后世之人怎么能不讥笑呢？而且扰乱了天下，荼毒生灵，宗社受到了危机，臣

民遭到了祸殃，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又比如明朝的宸濠之乱，也是由于姑息迁就造成的，可成为天下后世应记取的教训。总的来说，人君不幸遇到了这类事情，如果当时已经发现问题就应当机立断，而不能有什么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想法，而且也不能为了顾及自身的名声的好坏，而留患于后世。

假如说没有看清，没有发现，没有把握，就冒昧而行，或者把私怨参入其间，那就是天地祖宗的罪人，也不能逃过天下人的谴责。朕对于阿其那结党的情况十分了解，而且他们又有明显的背叛迹象，又是大庭广众许多人所亲眼目睹的事实。当时，诸王大臣都屡次上书，请求把阿其那、塞思黑等立即正法。朕把他们召进宫，见面时流泪谕之道：“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禴、乃圣祖皇帝之子，朕之亲弟，骨肉手足，尔等皆受圣祖皇帝及朕的深恩。今天大臣们所奏我也有所考虑，如果稍有情罪不符的地方，就会陷朕于不义，或稍有口心相违的地方，也会隐隐感到抱撼；那么就会得罪上天，得罪皇考，这是多么重大的事情，恐怕会得罪上天的惩罚哩。”这时候，诸王大臣都异口同声，不容一点宽宥。朕又一个一个地问大家，人人都说，所奏之处，完全是出于公心。为了慎重，朕又降旨询问各省督抚、提镇等官员，他们的意见也是如此。只因还有几个地方的意见没有报上来，因此朕没有马上降旨，先把他们拘禁起来，仍然想再详细考虑后再说。但是那两人却相继死去，朕还没有对他俩判刑呢！这是京师亿万臣民所都知道的事情，不需要朕来表明。

【原文】 若天下之人，必欲以朕诛戮二人为言，据伊等罪情、朝廷法律而论，朕也不以诛戮二人为讳。盖有此一番惩创，使天下后世宗亲不肖之辈，知大义之不可违越，国法之不可幸逃，循理安分，以受国家宠荣，则所以保全骨肉宗亲者大矣，多矣！此遵古帝王“刑以弼教”之意，实尽敦睦九族，端本之道者。观今日阿其那、塞思黑已死，而其逆党匪类等仍不肯歇心，更加摇唇鼓舌，到处诬捏布传，冀惑天下民人之听，为构衅报复之端。若

非上天、皇考俯垂默佑，使之败露，则传之天下后世，倘貽疑似之端，不但朕抱不白之讥，可惜皇考六十余年际天蟠地之功勋，上天六十余年锡福凝禧之恩眷，俱付之流水矣。

朕又自幸抚躬内省，实毫无几微瑕疵之可指摘，理直气壮，因曾静此案，得以明目张胆，向薄海内外亿万臣民剖析而畅言之。不然则口将言而嗫嚅，岂能免于瞻顾回护，又何颜以对廷臣左右近侍之人乎！朕蒙皇考俯鉴拙忱，于众弟兄中，惟许朕以“诚孝”二字。朕时时自问，不但用人行政，起居出入之间，事事效法君父，即隐微之间，偶举一念，必思此一念果合于我君父，始敢存于胸臆，否则必屏去之。朕虽不敢自谓尽孝，然生平一片爱慕诚敬之心，实可对天地神明。是以仰蒙上天、皇考照察，保护提携，每显彰景象，而发奸摘伏之处，实非人力所能为者。朕惟有以手加额，感激项戴，刻骨铭心，益加黽勉而已。朕因匪类诬捏浮言，故明白剖析前后，降旨十数道，以示臣民。倘朕言有一字虚捏，是亦如若辈之居心，必遭上天之责罚也。特谕。

【译文】 若天下之人，一定要对朕诛戮他二人加以非议，根据他们的罪行和朝廷的法律而论，朕也不以诛其二人之为忌讳为过错。由于有这一番事故，会使天下后世宗亲中那些不省之辈，知大义之不可违背逾越，国法不可违犯，应当安分守己，受国家宠荣，就可以保全骨肉宗亲的人，从中受益的就太多了！这就是遵照古帝王“刑以弼教”之意，以刑法来辅助教育臣民，使大家和睦生活的道理。如今阿其那、塞思黑已死，而他们的余党仍贼心不死，更加摇唇鼓舌，四处造谣，以图蛊惑天下百姓的视听，制造煽动人们造反叛乱的借口。如果不是上天皇考俯垂默佑，暗中使其败露，那么天下后世，就会抱着疑惑的态度，分不清是非，不但使朕本人蒙不白之冤，受人讥笑，而且皇考六十多年的功勋，上天六十多年的恩眷，都会付之东流。

朕又自己加以深思反省，确实感到没有一点错误可以指摘，

而是理直气壮，名正言顺。由于曾静的案件，使我能够明明白白，大胆地向四海百姓进行剖析，畅所欲言。若不是这样，那就使朕有口难言，这如何能够避免瞻前顾后地辩解，又有什么脸来面对大臣们和朕身边的人呢！朕蒙受皇考体察信任，在众多兄弟之中，单单许朕“诚孝”两个字。朕时时自问，不但在用人、政务、起居等事上，是否学着皇考的样子去做了。即使在一些小事上，偶尔有一个念头，我都想到，这个想法确实符合父亲的心愿，才敢拿定主意。否则，一定要去掉这个念头。朕虽不敢自称孝顺，可是生平一片爱慕诚敬之心，可以说是天地神明可以看得见的，所以仰蒙上天和皇考的关照、保护和提携，每件事都不是朕个人所能做的。朕只有以手加额，感激顶戴，刻骨铭心，越发努力勤政而已。朕因那些匪类捏造谣言，所以明白分析这件事的前后过程，十几道降旨，告诉天下臣民。如果朕的话有一字是虚假捏造的，那也会像那些叛逆一样，必然会遭到上天的惩罚。特谕。

三、朕之“屠弟”，正是为了不负皇考付托之重，顾及宗社之安危

【原文】 又奉上谕：前曾静逆书，诬谤朕躬诸条，离奇荒唐，即梦寐中亦无此诞幻怪异之境，惟有加朕屠弟之名一切，朕不辩亦不受，已于前谕中述其梗概。但朕之苦衷，尚有未曾详析宣示者。

当日阿其那阴险狡狴，实逆党之渠魁，塞思黑、允禩、允禵皆听其指挥，愿出死力，而不顾伦常之大义，其举动甚不可测，若阿其那果肯省愆悔过，革面革心，则其他断无有不效法梭改者。朕是以令塞思黑等分别居住，而留阿其那在京，所以加恩厚待，冀其感激醒悟者，无所不极其至。且披肝露胆，诚切劝告，至于泣下，所少者惟下跪恳求耳。岂知伊悖逆不臣之念，百

折不回。前诸王大臣等所参恶迹数十条，皆举朝共见共闻之实事。及至拘禁之后，不但不知畏惧，转欢跃加餐，横肆之态，不堪枚举。是岂尚有悔改之日耶？塞思黑居住西宁，逆状种种，无丝毫畏惧之心。及令其来保定时，岂但无微惕之意，一路谈笑自如。其解送人员，向伊称述朕即位以来所办政务，伊笑曰：“他从来伶俐。”全无臣弟之道，而其悖逆之念更炽，又何可望其悔改耶！

允禩拘禁已四年有余，至今倨傲如昔。允禩在拘禁之地，尚为镇魔之术，被伊太监出首。朕遣大臣询问情由，并从前结党等事，伊云：“我若说出，只恐杀我，如果皇上免我从前重罪，则便一一实供。”所遣大臣云：“皇上原有旨意，汝若据实供出，丝毫不隐，必宽宥汝罪。”于是伊将从前阿其那、塞思黑、允禩等朋比作奸，阴谋秘计，暨朕即位后所怀逆议，一一供吐，且自认镇魔不讳。是以诸王大臣立请正法，朕仍将伊宽宥。看伊近来似稍有感愧之意。

【译文】 皇上谕旨：以前曾静背逆之书中诬蔑诽谤朕个人的那几条，荒唐离奇，就是做梦也没有那样的境地。唯有说朕杀弟这一条，朕不辩解，也不接受，已经在前面的几次话中讲过。但朕的苦衷，还有不曾详细告诉大家的地方。

当日阿其那阴险狡诈，确为逆党的头目，塞思黑、允禩、允禩都听他的指挥，愿意替他卖力，而不顾伦理纲常的大义，他们的举动诡密。如果阿其那真的愿意痛改错误，重新做人，那其他几个人是不会顽固到底的。朕所以令塞思黑等分别居住，而留阿其那一人在北京，是为了对他加恩厚待，希望他能感激并且有觉悟的打算，真做到了仁至义尽。并且披肝沥胆，诚心劝告，以至于垂泪，只是没有向他下跪罢了。谁知他反叛不臣的思想一点也不改变。前诸王大臣等人向朕参他们恶迹有几十条，都是全朝都知道的事实。到他被拘禁之后，不但不知害怕，反而欢乐跳跃，放肆之态，不堪枚举。这哪有想改悔的迹象呢？塞思黑居住

西宁，逆状种种，也没有一点畏惧之心。到了令他来保定时，不仅没有悔改之意，反而一路上谈笑自如。解送他的人员，向他讲述朕即位以来所办的朝廷政务，他却笑道：“他从来都很伶俐。”全无臣弟应遵之道，而且他反叛的思想更加激烈，又哪里能希望他改过自新呢？

允禩拘禁已有四年多了，至今还是那样凶悍傲慢；允禩在拘禁之地，还干些镇魔的妖术，被他的手下人举报出来。朕遣大臣询问原由，并让他供出从前结党的罪行，他说：“我说出来，恐怕处死刑，如果皇上免我从前的罪行，我都一一实供。”所派遣去的大臣告诉他：“皇上原有旨意，你若据实供出，一点不再隐瞒，必然宽大处理。”于是他把从前同阿其那、塞思黑、允禩等朋比为奸，阴谋诡计，以及朕即位后他们的各种逆议，都一一供了出来。并且对镇魔之妖术也承认不讳。所以诸王大臣力请正法，但是朕仍然原谅他，看他近来好像稍有愧过之意。

【原文】 至于阿其那、塞思黑从来之恶迹，其彰明较著，为朕所知者，不可胜数；而其处心积虑，鬼域之行踪，为朕所不知者，不知凡几。伊等自意为朕必皆悉知，料无可幸免之理，是以残毒之念，日益加深，妄乱之行，愈无忌惮，拼一死以累朕，逆志坚定，不可拔矣。似此万无可姑容之罪情，而朕尚未忍即置于法，仍令拘禁，以待天下督抚大臣公奏到日再行酌定。不料旬日之间，二人相继俱伏冥诛，实奇事也。此时朕垂涕谕全朝大臣曰：“朕原欲为十全之令主，以报答我君父之恩。今有二人之事，便龟勉十分之善，亦减去其半矣。此朕所遭之不幸，岂非朕父子前因夙劫之冤孽耶！”

总之，此等立心与国家君父为仇之人，暗结死党，潜蓄奸谋，不将国家至于扰乱倾危，其心不肯止息。朕既洞烛其逆情，若不先期防范，及彼谋成事就而后应之，则朕之力不能胜，彼时身死无名，为天下后世笑，不但负皇考付托之重，而宗社之安危，正不可必，天下生灵皆遭涂炭之厄矣。幸朕每事洞烛几先，

伊等之伎俩，全无所施，惟力造作恶言，以为煽惑报复之计，由今日之事观之，虽渠魁数人被诛，而其同党胁从，至微至贱之人，仍复怀藏逆志，传布大逆之语。以此情形观之，然则朕之留心防范，早为经理者，岂非上天、皇考默启其心，使宗社苍生享太平之福耶！

从来仇敌之人，造为谤议以泄其忿者，往往有之。朕从前未忍将逆党悉行正法，而充发边远时，亦料此辈奸邪匪类，必有怨望之词，想亦无人听信。但不料其诬蔑诋毁，怪诞奇特至于此极，亦并不料有曾静、张熙辈遂信以为实，而便生背叛之心也。所幸薄海之外，亿人兆人，受皇考圣祖六十余年深仁厚泽，浹髓沦肌，不为匪类流言摇惑于万一者，岂人力之所能哉！则皇考之留遗于朕者岂止天高地厚而已哉！今日不但雪朕不白之冤，而皇考又安宗社苍生之功德愈加彰著矣。挥泪书此，再示臣民，天下也可以知朕之心矣。

【译文】 至于阿其那、塞思黑过去的恶迹，其中明显的，为朕所知道的，数不胜数；然而他们暗中的诡秘行踪，为朕所不知道的就更多了。他们以为朕对他们的罪恶已经全部知道，料到不会宽大处理，因此就更加残毒，企图作乱，准备拼上一死来连累于朕，真是逆志坚定，难以改变呐。像这种严重的罪行，朕还不忍进行处置，只是仍令将他们拘禁起来，以等到争求罢各地督抚大臣的意见后再行处理。

不料，十几天之内，二人相继死去，真是奇事。此时朕流泪告诉全朝大臣说：“朕原想当一个十全十美的君主，以报达我皇父的恩德，今天二人之事，使我再十倍努力，功德也大大减少了。这是朕遭到的不幸，岂不是朕父子过去留下的冤孽呢？”

总之，这种处心与国家君父作对的人，暗结死党，潜蓄奸谋，不将国家弄到大乱，他们是不会甘心的。朕既然已查明其奸情，若不进行防范，到了他们阴谋得逞时，朕的力量无法获胜，到那时死了也不明不白，将被天下后世人所讥笑，不但辜负了皇

考的重托，而且使天下生灵涂炭，社稷倾危了。幸亏朕每个事都事先明察，使他们的伎俩，无法施展，只得去造谣惑众，作为报复。从今天这件事来看，虽然为首的罪犯被诛，但是他的同党胁从，那些下贱之人，仍然心怀逆志，四处传播谣言。从这种情况来看，朕留心防范，早做处理，岂不是上天、皇考对联在暗中启发，使国家苍生享太平之福呢？

从来心怀恶意的人，造谣诽谤以泄私忿，往往是不不少的。朕从前不忍把逆党都加以正法，而是把他们发配边远地区。也料到这类奸邪匪类，必怀怨恨之心，会四布谣言，想来也不会有人听信。但是不料其诋毁到如此严重程度。并且有曾静、张熙等人还信以为真，而且生出背叛之心呢！值得庆幸的是四海内，全国人民，受皇考圣祖六十余年深仁厚恩，大多数人不信谣言，这是人力所达不到的效果。而皇考留给朕的恩德岂能用天高地厚来形容？今日不但雪了朕的不白之冤，并且又暗示了皇考对社稷苍生的功德更加显著了。挥泪写到这里，再次告诉臣民，使天下都知道朕的心情吧。

诸王大臣奏请

应将诽谤皇上的曾静按律处决，
碎尸悬首，以昭国宪，以快人心

【原文】 和硕亲王等题为滔天之罪恶难宽，率土之同仇甚切，恳祈乾断，明正典刑，以昭国宪，以快人心事。

臣等伏读上谕，宽宥曾静，仰见我皇上大度包涵，如天之无不覆，如地之无不载。虽恶兽毒蛇，魍魅魍魉，不忍以雷霆歼灭，欲使之改面回心。自尧、舜、禹、汤以至于今，未闻此宽大之典也。

但臣等伏思我朝创业垂统，列祖圣圣相承，圣祖仁皇帝御极六十余年，丰功骏烈，炳耀日星，厚泽深仁，浹洽宇宙。皇上嗣统建极，大孝大德，至圣至诚，宵旰勤民，仁育义正。躬行节俭，仰藏富间阎；广沛恩膏，以普寒黎庶。蠲赈动盈亿万，教养溥遍遐荒。数年以来，年岁丰登，民气和乐，嘉祥骈集，风俗阜成。举凡含齿戴发之俦，靡不沐浴皇风，歌咏帝德，山陬海澨，僻壤穷乡，咸顺则怀恩，心悦诚服。

乃有曾静者，性与人殊，谤张为幻，蛊惑于逆贼吕留良之反书悖论，复道听阿其那、塞思黑门下之奸徒匪类散布诬捏毫无影响之流言。辄敢編集蜚语，缮写谤书，令其徒张熙从湖南远至陕西，赴总督岳钟琪衙门投递。虽不能为反叛之事，实素蓄反叛

之心。是以恶贯满盈，神明驱遣，令其自行败露，身服典刑，以消异类之邪说，以正天下之人心也。经年以来，中外臣民闻其嗥吠，皆切不共戴天之忿，思食其肉而寝其皮。今皇上沛如天之仁，悯其始由误听，今已悔悟，情有可原，特加宽宥。

臣等伏读圣谕，以改过望天下之人，过大而能改，胜于过小而不改，若实能改过，则无不可赦之罪。又念跳梁逆命者，畏罪投诚，尚邀赦宽之典。大哉皇言！宽仁好生之德，度越千古。但曾静枭獍性成，阴谋不轨，诬谤悖逆，罪恶弥天。查律例开载十恶，凡谋反叛逆及大不敬，皆常赦之所不原。是曾静之罪在十恶，乃三宥之所不及。而张熙与曾静共谋不轨，赴陕投递送书，思欲构乱，亦所难宽。仰祈皇上俯允臣等所请，敕下法司，将曾静、张熙按律处决，碎尸悬首；查其亲属逆党，尽与歼除；以明朝廷之宪章，慰臣民之公愤。臣等无任恳笃激切之至。为此，谨题请旨。

奉旨：宽者曾静等一案，乃诸王大臣官员等所不可赞一词者，天下后世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皆朕身任之，于臣工无与也。但朕再四详慎，所降谕旨，俱已明晰，诸王大臣官员等不必再奏。倘各省督抚提镇有因朕宽宥曾静复行奏请者，著通政司将本发还。

【译文】 和硕怡亲王等人共奏，为滔天之罪恶难以宽恕，全国人同仇愤慨之至；所以特此恳请皇上明断，以正典刑，以昭国法，以快人心。

臣等伏读上谕，对宽宥曾静一事，真感到我皇上大度包涵，如上天那样，无一样事物不在其覆盖之内，如大地一样，无一样事物不受到它的承载。即使是那些恶兽毒蛇，恶鬼恶魔，也不忍心用雷霆歼灭它们，还想让他们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自从尧、舜、禹、汤以至到今天，也没有听说有这么宽大的处理。

但是，臣等回顾我朝创业艰难，列祖相承，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余年，丰功伟绩，与日同辉，深泽厚仁，充满环宇。皇上继

位以来，又体现了仁孝大德，至圣至诚，勤政爱民，仁义正派，艰苦朴素，普济百姓。对百姓受灾，动不动就是赈济上亿上万的府库银钱，使几年以来，年岁丰登，人民安乐，祥瑞纷呈，风俗淳和。凡是全国百姓，没有不受到皇上的好处的，天涯海角，僻壤穷乡，无不歌功颂德，心悦诚服。

然而唯有曾静，性情与众人不同，捕风捉影，深信逆贼吕留良的反论，道听阿其那、塞思黑门下奸徒匪类散布的流言，竟敢编写流言蜚语，制造叛逆书信，令其徒张熙从湖南运至陕西，到总督岳钟琪门下投书。虽然没有形成反叛的事实，可以看出他已蓄谋反叛已久。因此恶贯满盈，遭神明驱使，让他自行败露，身服典刑，以消除那些异类的邪说，以正天下的人心。一年来，中外臣民听到此事后，都同其有不共戴天的仇恨，甚至想吃他的肉，睡觉也盖他的皮。今天皇上的仁德如天大，可怜他本来误听人言，并且已经悔悟，情有可原，特给宽大处理。

臣等伏读圣谕，皇上希望天下之人自新，指出过大而能改，比过小而不改要强，如果真的能改正错误，那么，再大的罪也能赦免。并且又念他是小小的跳梁逆命之人，畏罪投诚，而且又要求宽赦，所以就予以宽大。伟大呀，皇上的言语！宽仁好生的品德，真是超越千古。但话说回来，曾静阴毒成性，阴谋不法，诬谤叛逆，罪恶滔天。根据法律所载对十恶的处理条款中，凡是谋反叛逆以及对圣上大不敬的，都是不能按照常规赦免的。所以曾静的罪行属于十恶不赦之列，即使三倍地惩处也不为过。同时张熙与曾静共同图谋不轨，亲赴陕西投递送书，企图制造叛乱，也不能予以宽大处理。仰请皇上同意臣等意见，下令司法部门，把曾静、张熙按照法律判以死刑，碎尸悬首；并查其亲属逆党，全部依法惩办；以昌明朝廷的法律，以平臣民的公愤。臣等恳切要求。为此，谨以此议题请皇上批示。

皇上的圣旨道：宽宥曾静一案的问题，诸王、大臣以及全体官员等都认为不可宽大处理。以朕想来，不管天下后世，说对也罢，说错也罢，都由朕一人承担，与大家没有关系的。即使如

此，朕也再三再四地考虑，已降之旨，都很明白了，也是定了的，诸王大臣以及各省官员不要再说了。如果下面各省的督抚、提镇等官员有对宽宥曾静有不同意见的奏折和请示，由通政司把他们的奏折仍旧发还本人。钦此。

雍正上谕

吕留良怎么得罪了圣祖皇帝在天
之灵，而落致残尸梟首的下场？

【原文】 上谕：我朝肇造区夏，天锡人归，列圣相承，中外景从。逮我圣祖仁皇帝，继天立极，福庇兆民，文治武功，恩施德教，超越百王，亘古罕有。此普天率土，心悦诚服。虽深山穷谷，庸夫孺子，以及凡有血气之伦，亦莫不尊亲者。

诂意逆贼吕留良者，悍戾凶顽，好乱乐祸，自附明代王府仪宾之孙，追思旧国，愤懑诋讥。夫仪宾之后裔，于戚属至为疏贱，何足比数。且生于明之末季，当流寇陷北京时，吕留良年方孩童。本朝定鼎之后，伊亲被教泽，始获读书成立，于顺治年间，应试得为诸生。嗣经岁科屡试，以其浮薄之才，每居高等，盗窃虚名，夸荣乡里。是吕留良于明毫无痛痒之关，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节也。乃于康熙六年，因考校失利，妄为大言，弃去青衿，忽追思明代，深怨本朝，后以博学宏词荐，则诡云必死；以山林隐逸为荐，则剃发为僧。按其岁月，吕留良身为本朝诸生十余年之久矣，乃始幡然易虑，忽号为明之遗民，千古悖逆反复之人，有如是怪诞无耻，可嗤可鄙者乎？

自是著邪书，立逆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其实不过卖文鬻书，营求声利，而遂敢于圣祖仁皇帝任意指斥，公然骂詈，以毫无影响之事，凭空撰造。所著诗文以及日记等类，或镌板流

传，或珍藏秘密，皆人世耳目所未经，意想所未到者。朕翻阅之余，不胜惶骇震悼。盖其悖逆狂噬之词，非惟不可枚举，抑且凡为臣于者，所不忍寓之于目，不忍出之于口，不忍述之于纸笔者也。今姑就其中数条，略为宣示内外诸臣，庶天下后世共知其谤张，感愤之荒唐，犬吠狼嗥之忿戾。自生民以来乱臣贼子，罪恶滔天，奸诈凶顽，匪类盗名理学大儒者，未有如吕留良之可恨人也。

【译文】 皇上谕旨：我朝建国统一中华以来，承受天命，人民归心。几代皇上继承大业，得到中外景仰拥护。到了我圣祖仁皇帝（康熙）之时，继承天命而登上皇位，为亿兆人民降下了福泽，无论在文治或武功方面都取得巨大的功绩，给百姓带来恩惠和用礼义道德教化百姓，都超过了历史上的所有君王，实在是自古以来罕有的圣主。所以整个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不心悦诚服的人。哪怕在穷乡僻壤的深山中，普通百姓以至小孩，以及有点血气的人，都没有不敬服皇上的。

却不料逆贼吕留良这人，性情隐暴顽固，嗜好捏造祸乱。自称是明代王府仪宾的族孙，怀念过去的明朝，而满怀怨恨的诋毁我朝。这仪宾的后代，从与明朝皇族的亲戚关系上来说，是非常远的，算不得什么。况且吕留良出生于明末，当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吕留良还仅仅是个小孩子。我朝建国以后，他受到我朝的哺育恩典，才得以读书成人，顺治年间参加考试，得了秀才身份。以后经过多次的岁考，科考，他仗着自己小有文才，常常考得优等，才借此获得了一些虚名，却以此为资本来夸耀于本乡地方。以此看来，吕留良和明朝的关系，实在毫无痛痒，而他本身的经历，也谈不上有什么保持明朝遗民的高气亮节。只是到康熙六年（1667），他因为考试失利，才狂妄地口出大言，抛弃秀才身份，忽然思念起明朝，而埋怨我朝起来。后来地方官又用“博学宏词”来推荐他到京师，他用寻死来吓人；把他作山林隐逸来推荐，他便削掉头发去当和尚。如果按他生平岁月来算，吕留良身

为本朝秀才达十几年之久，却又忽然转变思想，自称起明末遗民起来，真是自古以来悖逆反复的人，也没有他这样怪诞无耻的说法，实在是可鄙可笑之至！

自此以后，他便著作荒谬的书籍，宣扬忤逆的言论，竟达到丧心病狂，肆无忌惮的程度。其实他不过是为了卖文卖书，追求名利罢了，而竟敢以此来对圣祖仁皇帝任意攻击，公然谩骂诅咒，用根本没有的事，凭空捏造。他所著作的诗文以及日记等，有的刻版印成书到处流传，有的则秘密保存手稿。他记述的都是世人所没听到过没见过过的，是人们所意想不到的。朕翻看这些著作，不胜惶恐震惊。因为他这些著作当中，悖逆狂咬的言论，不但举不胜数，而且凡是作为臣子的人，都不忍看在眼里，不忍说出口去，不忍写到纸上的。现在姑且把其中几条，略略摘出来宣示给京师和各地方的各位巨子，以便天下和后世都能知道他嚣张的程度，愤慨他的荒谬，认识他犬吠狼嚎的暴戾。自从有人类以来的乱臣贼子当中，罪恶滔天，奸诈隐顽的坏人，而假冒理学大儒的，从来他没有像吕留良这样可恨的人！

【原文】 其文集有云：“德祐以后，天地一变，亘古所未经。”又其行状云：“有故人死于西湖，为位以哭，坏墙裂竹，拟于西台之拗。”又云：“将以小庄为桃花源，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人。”又云：“遂削发为僧，苟延性命。”又辞山林隐逸之荐，答友人书云：“有人行于途，卖饧者唱曰：破帽换糖。其人急除匿，已而唱曰，破网子换糖。复匿之。又唱曰：乱头发换糖。乃惶遽无措曰：何太相逼！留良之剃顶，亦正怕换糖者相逼耳。”又示诸子戒庆生辰云：如其有重于生也，则偷息一日，一日之耻也。世有君子曰：夫，夫也，何为至今不死也。则其谬严于斧钺，又何庆之有？使以辱身苟活者为庆，将置夫年不满三十，义不顾门户，断脰飞首，以遂其志义者于何地也。”又日记内诗句云：“若论五百年间事，紫色蛙声总正传。”又云：“麻喇吉出城，送者填塞，饥渴易为饮食如此，观我民狼狈不知所归，可怜可痛

也。”又云：“李雯，华亭人，甲申后入北幕，《与史道邻书》及《下江南诏》皆其笔也。中有‘六合一而泰阶平，礼乐兴而干戈息’之句，人传嗤之。”又云：“沈天彝为其妹求旌贞节，且云其尊公弃车先生遗命，不请有司之旌。予曰：‘尊公之识高，其命正当尊也。’弃车先生遭变后十余年，闭门不见宾客，颠毛全好，天彝忽以酒灌醉，尽髡之。醒为号痛而已。所著述将及栋，天彝尽取焚之，恐其有刺触累己也。嘻，亦异矣！”又祭友人云：“斯文将丧，逆天者亡，顾我逆天，死反得后”等语。此即其梗化不臣，明目张胆，指我朝为闰统，托吠尧以自文者，皆此类也。夫吕留良食本朝之粟，履本朝之土，且身列胶庠，深被本朝之恩，何得视如仇敌，而毫无顾忌，普蜂蚁之不若乎？

又文集有云：“人心恶薄日甚，即杀运所开，聊避睹闻，窃恐不免。”又日记云：吴三桂乞撤之语，甚有愤懑不平之气。三桂老不足虑，其下恐未必安。”又云：“滇中于甲寅元日寅时即王位，取四寅也。今按其时正彼中日食云。”又云：“董允珩出其新作，乃《平平凉颂》也，予不看，曰：先须改题目，去首字改颂作叹。”又云：“闻吴三桂死，有吴国贵者立，清遣人往讲，割云贵罢兵。”又云：“闻闽乱为范承谟激成，承谟亦死于闽。”

又其行状内云：“夙兴夜寐，终日乾乾”等语。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有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平日之谓我朝皆任意指名，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至于与逆藩吴三桂连书之处，亦曰“清”，曰“往讲”，若本朝于逆藩为邻敌者然，何其悖乱之甚乎！且吴三桂、耿精忠乃叛逆之贼奴，人人得而诛之，吕留良于其称兵犯顺，则欣然有喜。惟恐其不成；于本朝疆域之恢复，则怅然若失，转形于嗟叹。于忠臣之殉难，则污其过失，且闻其死而快意；不顾纲常之倒置。惟以助虐迎寇为心；不顾生民之涂炭，惟以兵连祸结为幸。何吕留良处心积虑，残忍凶暴之至，此极也。日乾乾夕惕，《易经》传注，皆以为人君之事，而其子孙公然以加吕留良之身，

不更肆且妄乎？

【译文】 他的文集里说：“自南宋恭帝德祐年以后，天地就发生了一个变化，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另外，他在一篇记述他一生事迹的行状里也说：“有个故旧朋友死在西湖，他便设下这朋友的牌位，祭奠哭泣，手中拿竹酌敲打墙壁，以至墙坏竹裂，他把这比做元朝谢翱在西台痛哭文天祥一样。”又说：“要把自己所住的小庄园作为桃花源，做不知道有汉朝，更谈不上知道魏、晋的人。”又说：“遂剃去头发当了和尚，以勉强维持自己的生命。”他又辞掉地方官把他当作山林隐逸向朝廷的荐举。他在回答友人的书信里说：“有一个人走在路上，遇见一个卖麦芽糖的吆喝：‘破帽子换糖！’那人急忙把帽子藏了起来，不一会儿，卖糖的又吆喝：‘破网子换糖！’他又急忙把发网去掉藏起来。一会卖糖的又吆喝：‘乱头发换糖！’那人手脚失措地说：‘为什么这样逼我呀！’留良所以把头发剃光当和尚，正是怕换糖的逼迫我呀！”又告诉几个孩子制止他们给自己庆贺生日说：“若有比活着更重要的事，那么苟安偷生一天，就增加了一天的耻辱。世上有道德君子，称之为丈夫，为什么他不去死呢？那么他受到的侮辱比受刀斧砍杀还难受，又有什么值得庆贺？如果为受着侮辱而苟安偷生的人去庆贺生日，那么又把年龄不到三十岁，为了大义不顾家庭，不怕砍断脖子杀掉头颅，以遂自己志愿和道义的人放到什么位置去呢？”又在日记里写的诗句说：“如果要评论五百年以来的时事，披着紫袍的青蛙也叫着自己是正统了。”又说：“麻喇吉（清初抚蛮寇酋将军兼广西巡抚，今译为麻勒吉）出城的时候，为他欢送饯行的人把道路挤满了。转眼之间，饥渴变成了饮食，百姓的态度改变得竟如此之快。看他们惶惶不知何去何从的样子，真是令人可怜可痛呵！”又说：“李雯是华亭（今上海松江）人，甲申年（公元1644年）后到北军中作幕僚，《与史道邻（即史可法）书》和《下江南诏》都是他写的。其中有‘天地四方融合而天下太平，礼乐兴盛而战争平息’的句子，人们传看后都嗤

之以鼻。”又说：“沈天彝打算向官府申报他妹子的贞节，想请求立牌坊表彰。但又说他父亲弃车先生有遗嘱不让向官府申请旌表，而迟疑不决。”我说：“您父亲的见识是非常高的，他的遗命是应当遵守的。”弃车先生自朝代变更以后几十年，关着大门不见客，头发生长得很好。有一次天彝把他灌醉，趁机把他的头发剃去，弃车先生醒来以后，只好痛哭流涕而已。弃车先生的著作手稿，堆积得快要碰着屋梁了，天彝尽数把它烧光，恐怕其中有诋毁的语言连累自己。哈哈，也真是件怪事！”又祭吊朋友的文章里说“读书人将要丧亡，违背天意的就得死去，而我就是违背天意的，反而死在后边”等等的话。这都是他顽固不化，不肯臣服我朝，明目张胆地攻击我朝不是正统而是“闰统”，依赖桀犬吠尧来作文章，皆是这类东西。这个吕留良吃的本朝给的饭，生活在本朝的土地上，而且身为学校的秀才，深受到本朝养育的恩德，却为什么把本朝看成仇敌，而毫无顾忌地加以攻击，连蜜蜂、蚂蚁都不如吗？

他的文章里又说：“人心险恶轻薄一天比一天厉害。这就开启了杀运，虽然有意躲避视听，我认为恐怕也是难以避免的。”又说：“吴三桂曾要求清兵撤退到关外等话，很有些气愤不平的样子。虽然吴三桂已年老不足忧虑，但他的部下恐怕未必肯安心。”又说：“吴三桂在云南，于甲寅年元旦寅时登基称帝，是取寅年、寅月、寅日、寅日四寅交会的吉利。今考查这时却正是出现日蚀的凶象。”又说：“董允瑀拿他的新作文来请我指教，题目是《平平凉颂》，我根本不看，说：应先把题目改一下，去掉第一个字，把颂字改成叹字。”又说：“听说吴三桂死后，有个吴国贵族继承他的王位，清朝派人去给他讲，把云南、贵州一带地域割给他，双方停战。”又说：“听说福建耿精忠反清暴乱，是福建总督范承谟激起来的，后来范承谟也死在福建。”

他的一生行述里还说“早起晚睡的勤劳，终日自强不息”等话。凡是普天下的土地，没有一块不是属于君王的，凡是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是君王的臣下。吕留良靠我朝恩惠

和土地生活，才建立起他的家园，养育他的子孙有好几十年，可是却不懂得中华大统一的道理，平时称呼我朝任意指名，或叫“清”，或叫“北”，或叫“燕”，或叫“那边”。至于遇到本朝和叛逆的藩王吴三桂连写的地方，也称作“清”、称“往讲”，好像本朝和逆藩是相邻的敌国一样，真是违背道理到极点了！况且吴三桂、耿精忠乃是叛逆的贼臣，人人都想捉而杀之，而吕留良对他们兴兵叛乱却非常高兴，惟恐他们失败；对于本朝收复了疆土，便惆怅得好像失去了什么，愁眉苦脸地叹息。对下殉难的忠臣，便去污蔑他们的过失，并且因听到他们死亡而心中愉快；不顾纲常伦理的颠倒，惟以助纣为虐，迎合叛贼为心愿；不顾天下百姓生灵涂炭，只希望天下大乱打起仗来就好。这个吕留良怎么存心思虑，残忍凶暴到了这种地步。况且表示日夜勤劳的“乾乾夕惕”这句成语，在《易经》的注解中，都解释为指君王治理天下的勤劳，而吕留良的子孙，却把这句话公然用到吕留良身上，岂不更是放肆和狂妄吗？

【原文】 又云“永历帝被执时，满汉皆倾心，东宫勒马前行，以鞭梢东指，则东边满汉兵皆跪，西指则西跪。弑之日，天地晦霾，日月失光，百里之内，凡关壮纓庙皆被雷击”等语。查伪永历朱由榔本窃立于流寇之中，在云贵广西等处，其众自相攻剿劫夺，贻害民生，后兵败逃窜缅甸。顺治十八年，定西将军爱星阿领兵追至緬城，先遣人传谕緬酋，令执送朱由榔，否则军临城下，后悔无及。大军随至城下，緬人震惧，遂执朱由榔献军前，杀伪侯王维恭等一百余人，于是全获朱由榔眷属以归。此永历之实迹，乃中外人所共知者。朱由榔穷蹙无归，为我朝满汉大兵所共擒，岂有擒寇贼之人，转于其马前行跪之理乎？其时之汉人兵丁，亦耻而不为之事，况于满人乎！此等誓说，荒唐鄙谬，无中生有，不知何自而来也。至云关壮纓庙皆被雷击，尤为荒诞之甚。朱由榔之死，实系上天诛殛，而人力岂能强为耶！关圣帝君与雷神皆为奉天司命之正神，何以有几关庙皆被雷击之事？于理

亦甚为不顺。

且本朝用兵以来，事事皆仰荷上天眷佑之恩，百神呵护之德。即如我兵之守永兴也，士卒不过千人，贼以重兵相攻，势甚危急，蒙真武之神，显化神兵，布满岩谷，狂寇寒心褫魄，众遂溃逃而散。此有御制碑文，详纪其事者。其克复云南城也，则有金马飞腾之兆，而贼寇即日荡平。此皆见之志乘，万目共睹之事，天下所共知者，然此不过举一二事而言，其它不可枚举，吕留良独闻之乎？总之，逆贼吕留良，于本朝应有征应之事迹，则概为隐匿而不书，而专以造作妖诬，欲快其私愤。伊之妄诞伎俩，能逆天乎？

【译文】 又说：“南明的永历帝被擒获的时候，满汉官兵对他都十分敬仰，东宫太子骑在马上前行，用鞭梢往东一指，东边的满汉兵都跪下去，往西一指，西边的满汉兵也都跪下去。杀朱由榔那天，天地阴暗，日月无光，一百里以内，凡是关帝庙都遭受雷击”等话。考查朱由榔经历，他是在李自成攻占北京后，在南方乘机自立为王的，盘据于云南、贵州、广西等地，他们那一伙人内部，互相攻打抢夺，危害人民，后来兵败逃窜到缅甸。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时，定西将军爱里阿领兵追到缅甸，先派人传告缅甸国王，命令他把朱由榔擒送到兵营，否则就要兵临城下，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我朝大兵随着便到了缅甸城下。缅甸人十分惊惧，便把朱由榔缚住，献到大营，又杀了朱由榔部下的侯爵王维恭等一百多人。于是我军便把朱由榔和他的家属全部擒获班师回国，这是南明永历王朝结局的事实，是中外人士共知道的。朱由榔急迫到无地可去的地步，而被我朝满汉大兵擒获，岂有擒贼的人，反而在贼人马前跪下的道理呢？当时的汉人兵丁也不会干这种羞耻的事，何况满洲兵了！这种瞎话，实在是荒唐浅鄙，无中生有，实在不知是从何处传来的。至于说关帝庙都被雷击，尤其荒唐得很。朱由榔之死，实际上是上天注定了他必然要被杀，这不是人力所能强行去做的。关圣大帝和雷神，都是奉天

帝命令掌管职责的正神，怎么能有凡是关帝庙都被雷击的事，这在道理上也讲不通。

况且本朝自从兴兵以来，事事都得到上天的保佑和恩惠，一切神灵都对我朝有袒护的恩德。比如我兵保卫永兴县城时，只有守兵不过一千人，而贼兵有重兵来攻，形势十分危急，这时受到真武大帝的显灵，点化出了无数神兵，布满山谷，使贼寇心惊魄散，遂即纷纷溃败。有皇上亲自写的御制碑文，详细地记述了这件事。又有克复云南省城时，则有金马飞腾的吉兆。而贼寇当天就被荡平了，这事都记载在志书里面，是万人亲眼所见，天下人都知道的事实。但这也仅仅是略举出一二件事作例子来说，其它的事多得无法枚举，难道只有吕留良一个人没有听到过吗？总之逆贼吕留良，对于本朝的一切祥瑞征兆的事，一概隐藏而不记，而专门在书上传播那些谣言和攻击的话，打算发泄他的私愤。他这种荒诞和狂妄的伎俩，难道真的能逆转天运吗？

【原文】 又文集内云“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等语。夫明末之时，朝廷失败，贪虐公行，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至于流寇肆毒，疆场日蹙，每发糜饷数百万，悉皆出于民力，乃斯民极穷之时也。我朝扫靖寇氛，与民休养，于是明代之穷民，成有更生之庆。吕留良岂毫无耳目，乃丧心昧理，颠倒其说，转言今日之民穷乎？况逮我圣祖皇帝爱育黎元，海内殷庶，黄童白叟，不见兵革，蠲租减赋之政，史不胜数。民何由而穷，至为羲皇以来仅见之穷乎？试问之吕留良，如我圣祖皇帝六十余年，久道化成，休养生息，物阜民安，内外升平，兆民乐业，即自羲后以来，史册所纪屈指而数。蒙上天之眷佑，可以比并我朝之盛者，果可多得乎？而乃云：“羲皇以来未有之穷”，不太甚乎？即如吕留良怀不逞之心，动云万金结客，而其刊刻我朝时文，货卖牟利，富仍不悛。观其日记所载米盐琐碎，算及粪壤，营营求财之心，惟日不足，尚得谓之穷乎？

又日记内云：“四月末京中起怪风三日，其色大红，著人面

皆红。”又云：“石门镇堰桥水忽立二丈许，舟中芦席，有飞至高桥，复还原舟者。”又云：“有大星如碗，后有细星随之，如彗。”又云：“十二月二十九日夜雨甚大，燿然大电，随发震雷，甚响而长，不知明年作何运数耳。”又云：“初五日午后，日光磨荡，有黑日如斗状。”又云：“日有三枚，日旁有一差小者，色白不甚动；白日旁又一小者，色赤而动甚。”又云：“河南郊县有凤至，百鸟朝会数日。有二赤鸟，长丈许，以身蔽凤，凤身五色陆离，鸣如策韶。邑人怪之，驱牛厌胜，牛俱股栗不前。路上死鸟甚众。又有死金色鲤，狼藉地上。时予作《凤砚铭》云：‘德未尝衰，尔或不来，善以道鸣，必圣人生。’而忽闻此，又一异也”等语。

凡此毫无影响，妄捏怪诞之记载甚多。总由其逆意中幸灾乐祸，但以捏造妄幻，惑心观听为事。其荒诞不经，皆不顾也。夫灾亦古所时有，上天垂象，原以儆戒人君，令其修省进德，未有事不实而可以为鉴者也。若如吕留良之记载，一一皆虚，天地间未有之事，何以示儆于将来？假使传诸后世，以捏影捕风之语，或信为实有之事，必以从前太平盛世，尚有如此非常奇怪灾异，倘遇日月星辰水旱之变，必轻忽为无关于治乱，而漫不经心，其所以启后世人君之怠玩者，其罪不可胜数矣。

【译文】 又如他的文集里说：“今天百姓的穷困，是自从上古羲皇以来所仅能见到的”等话。在明末的时候，朝廷政治腐败，贪污枉法公开盛行，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以致引起流寇猖狂，战场形势日益紧迫，每年都要花费军饷几百万两银子，这全是从百姓手中搜刮得来，这时才是百姓极为穷困的时候。我朝扫清了流寇，使百姓得到休生养息。于是明代的穷苦百姓，才都得到更生的喜庆。吕留良怎么没有一点眼见耳闻，以至于如此丧心昧理，颠倒黑白，反说今天的百姓穷苦呢？况且到我朝圣祖康熙皇帝，非常爱护黎民百姓，国内殷实富庶，从黄毛小童到白发老翁，一辈子没遇到战乱，又有减免租税的政策，史书都记载不下了，百

姓又能因为什么而穷苦，甚至被说成自上古羲皇以来绝无仅有的穷困时代！试问吕留良，像我朝圣祖在位六十多年，成功地用道德教化百姓，使他们能够休养生息，物产丰收人民安乐，国内外一派太平景象，万民得以安居乐业，这种情况就是自上古以来，记载在史册上的，也是屈指可数。受到上天的关怀保佑，能够和我朝这样兴盛的时代，难道能有很多吗？而他却说成是“自上古以来从没有过的穷困时代”，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即使像吕留良这样心怀叛逆的人，动不动的可拿出万金来交给客人，而且他刻印我朝时文，贩卖牟利，赚了不少钱还不满足。看他日记里记的柴米油盐的生活琐事，连粪肥都计算了，营营追求财物的心，一天也没有满足，这还能说穷吗？

他的日记里又说：“四月末，京师里起怪风三天，其颜色大红，吹到人脸上，脸都变红了。”又说：“石门镇的堰桥，河水突然涌起二丈多高，船里的芦席，有被风吹刮到南高桥，又吹回原来的船上的。”又说：“有个大星像碗一样大，后边又有一些小星跟随着，好似彗星一般。”又说：“十二月二十九日，夜里下了大雨，巨大的电火闪耀，随之响起雷霆，声音响得很大而且时间很长，不知道明年又有什么气运出现。”又说：“初五日午后，太阳光摇荡不定，有一个黑色太阳，如斗一样大小。”又说：“出现了三枚太阳，太阳旁边有一个略小的太阳，颜色白而不怎么动，白日旁边又有一个更小的太阳，颜色红而动荡不停。”又说：“河南郊县有凤凰出现，百鸟都来朝见凤凰，一连聚会好几天，有二个红赤色的鸟，身长一丈多，用身体遮蔽着凤凰，凤凰羽毛五彩陆离，叫声和箫管的乐曲一样。当地人十分惊奇，赶了牛群去驱邪，牛都战栗不敢前行。路上死鸟很多。又有死金色鲤鱼，散乱的躺在地上。当时我正在作一首《凤观铭》说：‘道德并没衰败，你可能不会来，在道路上鸣叫，一定有圣人降生。’这时突然听说这件事，又是一件奇异的事”等等。

凡是这种毫无根据，胡乱捏造怪异荒诞的记载很多很多。总是因为他叛逆的心里藏着很多幸灾乐祸的想法，所以故意去捏造

一些荒唐古怪的事，去蛊惑人们的耳目。而从来不管它如何荒诞不经。至于灾异的出现，古时候也就有，这是上天降下的一些迹象，来警告劝诫人间的君主，让他反省过错增强道德，但是还没有过事情不确实而可以作借鉴的先例。比如吕留良的记载，都是虚假不实，天地间根本没这件事，又怎么能让人警戒将来呢？假如把这些虚假的记载流传给后世，把捕风捉影的话，当成实有的事，一定会使人觉得以前太平盛世的时候，也应该有这些奇怪的灾异。如果遇上日月星辰、水灾、旱灾的变化，必然会不重视，以为与国家的治乱没有什么关系，因而漫不经心，这样便引致以后的君王对灾异不重视，那他的罪行真是数也数不胜数了。

【原文】 又日记云“康熙甚吝，吴中顾云程者，写真甚精，供奉内廷，不许其遍游公侯之门。一日入朝，仓遽用旧服。康熙曰：‘此要银子也。’荐之一王子，王子送元宝二百两及缎，康熙收之。临行辞，康熙只予二十四两而已”等语。不但岂有此事，而怪诞悖乱，何至于此极也。吕留良以此诬诋圣德。夫韩昭侯藏蔽裤曰：“欲待有功者。”史册相传，以为美谈。今一写真之人，即圣祖仁皇帝不轻加厚赐，亦圣主慎重赏赉之盛德耳。而吕留良捏此浮言，讥为吝惜财物乎？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一年，除水旱赈恤外，特恩蠲免钱粮，不下数百万万。此天下臣民所共知，岂吝主所能为者？吕留良独无耳目乎！忍心害理，可谓极矣。且吕留良谊属臣民，而慢称康熙，其悖逆无状，何太甚矣。即此数条，猖狂悖乱，已极放言横逆之罪，况其它太甚之词，尤足令人痛心疾首，不共戴天。

夫吕留良生于浙省人文之乡，读书学问，初非曾静山野穷僻，冥顽无知者比。且曾静只讥及于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况曾静谬执中国夷狄之见，胸中妄起疑团，若不读吕留良之书，不见吕留良之议论蜂起，快心满意，亦必有所顾忌。而不敢见之文辞。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诚有较曾静更为倍

甚者也。朕向来谓浙省风俗浇漓，人怀不逞，如汪景琪、查嗣庭之流，皆以谤讪悖逆，自伏其辜，皆吕留良之遗害也。甚至民间氓庶，亦喜造言生事。如雍正四年内，有海宁、平湖阖城屠戮之谣。此时惊疑相煽，逃避流离者有之。皆吕留良一人为之倡导于前，是以举乡从风而靡也。

盖浙江士人等，习见吕留良之恣为狂吠，坐致盛名，兼拥厚货，曾无纤芥之患得婴其身。是以转相推服，转相慕效，多被愚迷而不知也。甚至地方官吏，怵其声热之器凌，党徒之众盛，皆须加意周旋，优礼矜式，以沽重儒之誉。如近日总督李卫，为大臣中公正刚直之人，亦于到任之时，循沿往例，不得不为之赠送祠堂匾额，况他人乎？此其陷溺人心，浊乱世俗，害己不可胜言矣。

数年以来，朕因浙省人心风俗之害，可忧者甚大，早夜筹划，仁育义正，备极化导整顿之苦心。近始渐为转移，日归于正。若使少为悠忽，不亟加整顿，则吕留良之邪说诬民者，必致充塞胶固于人心而不可解，而天经地义之大闲，混灭沦弃，几使人人无父无君之人矣。吕留良之为祸浙省者，不知何所底止耶！今日天道昭然，逆贼恶贯时至，令其奸诈阴谋尽情败露，则不容不明正其罪，以维持世教，彰明国法者也。

且吕留良动以理学自居，谓己身上续周、程、张、朱之道统。夫周、程、张、朱世之大儒，岂有以无父无君为其道，以乱臣贼子为其学者乎？此其狎侮圣儒之教，败坏士人之心，真名教中大罪魁也。而庸流下愚，不能灼知其心迹行藏，乃以一不解天经地义之匪类，犹且群我以道学推之，则斯文扫地矣。即吕留良自撰之文亦云：“逆天者亡。”又曰：“顾我逆天，死反得后。”明知逆天之罪大，而必欲悍然蹈之，死而不悔，不知古今以来，天地间乖戾悖暴之气，何独钟于吕留良也。

【译文】 他的日记里又说“康熙极为吝啬，苏州有个顾云程，为人画像十分精美，在皇宫充当绘画供奉的职务，不许他随便到

公侯贵族家中给人画画。有一天他去朝见皇帝，匆忙之间穿的是旧衣服。康熙说：“这是想要银钱的。”便介绍他去一位王子家画像，这王子送来元宝二百两和一些绸缎，康熙收了这些东西。后来顾云璠辞别康熙回家，康熙只给了顾二十四两银子而已”等话。这事纯属子虚乌有，并且编造十分荒诞悖理，可以说是达到了极点了。吕留良是用这来故意诽谤圣祖皇帝。战国时的韩昭侯收藏一条旧裤子，说：“打算用这奖赏立功的人。”史书上记载下来，以为这是一件美谈。现在不过是一个画像的画师，即使圣祖仁皇帝不轻易给他丰厚的赏赐，也表现出圣祖对奖赏抱着十分慎重的态度，也是一种道德修养的表现。而吕留良却捏造这种谣言，讥讽为圣祖吝惜财物！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一年，除了对水灾旱灾进行赈恤以外，特别降恩豁免百姓交税的钱粮，不下数百万两银子。这是天下臣民都知道的事，难道是吝啬的主子所能办到的吗？难道只有吕留良没有长眼睛、没长耳朵吗？他忍心歪曲事理，真是达到极点了。况且吕留良从伦理上说是我朝的臣民，却傲慢得直呼皇上为康熙，他这种狂悖忤逆的形状，也太过分了吧！就拿上面几条来说，他的猖狂悖逆已达到胡言攻击的罪行的极点，何况还有其他很多过头的言词，尤其令人痛心疾首不忍说出，我们与他的仇恨真是不共戴天了！

这个吕留良，生于浙江人文荟萃的地方，读书学问，不像曾静生长在深山穷乡的地方，愚昧无知难以相比。而且曾静只讥讽到朕一个人，而吕留良却更进一步诬蔑到圣祖仁皇帝的盛大道德；曾静的诽谤，是由于错误相信了流言诽谤；而吕留良的攻击，则完全出于他心中，造作妖言迷惑视听。况且曾静错误地固执着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心里妄起疑问，如果不读吕留良的书，不见吕留良的一连串的议论，虽觉得快心畅意，也必然会有所顾忌，不敢公然写成文词。所以吕留良的罪大恶极，实是比曾静要大上好多倍的了。朕向来认为浙江省的风俗不够敦厚，人心叵测，比如江景琪、查嗣庭等人，都是因为诽谤忤逆，自是罪有应得，也都是吕留良遗毒所害的例子。至于民间百姓，也喜欢造

谣生事，比如雍正四年时，有海宁、平湖要全城屠杀的谣言，那时百姓便相信谣言，互相煽动，引起百姓逃亡流离的大事。这都是吕留良一个人倡导在前，才造成地方众人纷纷盲从的。

因为浙江的读书人，见到吕留良在文章中恣意狂吠攻击，反而享受盛名，并且十分富有，却没有受到一点损害降临到他身上。所以辗转推崇他，互相模仿他，而大都被他迷惑愚弄而且还不知道。甚至地方官吏也害怕他的声势嚣张，忌惮他的党徒众多，都得对他们留意应酬，进行优厚礼节，来博得一个尊重儒士的好名声。比如最近上任的总督李卫，是大臣里公正刚直的一个，他在到任以后，也不得不根据过去惯例，向吕留良的祠堂赠送匾额，何况其他的人呢？由此可见吕留良影响人心，扰乱人间风俗，其毒害已经说不胜说了。

几年来，朕因为浙江人心风俗十分有害，给以很大的忧虑，朝夕思考筹划，设法教导他们懂得仁义，用尽了开导整顿的苦心，最近几年才略有起色，一天比一天正常起来。如果稍微有点疏忽，不尽力整顿，那么吕留良的异端邪说蛊惑人心，必然如胶漆一样充塞到人心中，牢固粘结便没法解除了。从而使天经地义的大道理，也泯灭废弃，差不多会使人沦落到无父无君的地步上去了。这样吕留良给浙江省带来的祸害，真不知道要到什么程度才能停止呀！今天天道昭然，贼人已经到了恶贯满盈的时候，使他的奸诈阴险面貌尽情败露出来，那么就不能不依法制裁他的罪行，以维持世上风俗教化，申明国法了。

而且吕留良以理学大家自居，说自己是继承了周敦颐、程灏、程颐、张载、朱熹的哲学正统。周、程、张、朱，是历史上的大儒，岂能用以无父无君来作为他们的主张，用推崇乱臣贼子来作为他们的学说呢？吕留良这种狎弄侮慢圣人的儒教，败坏读书人的心术，真可以说是名教中的罪魁祸首了。而那些平庸愚昧的人，看不透他包藏的祸心，便把一个不懂得天经地义的匪人，一哄而起地推誉他为道学大家，真把读书人的脸面都丢失尽了。就是吕留良本人的著作中也说过：“逆天者亡。”又说：“我虽然

逆天，死反得在后。”明知违反天道的罪行是很大的，而却不顾一切地去走这条路，死不悔改，真不知从古到今以来，天地间一切乖戾凶暴之气，为什么都集中到吕留良的一人身上了。

【原文】 朕即位以来，实不知吕留良有何著述之事，而其恶贯满盈，人神共愤，天地不容，致有曾静上书总督岳钟琪之举，曲折发露，以著吕留良之凶顽。而吕留良之子如吕葆中者，曾应举成名，蒙恩拔置鼎甲，仕列清华。其余子孙多游痒序，乃不即毁板焚书，以灭其迹。且吕葆中既已身叨仕籍。而犹世恶相承，并未洗心涤虑，前此一念和尚谋叛之案，党羽连及吕葆中，其时逆迹早已彰著，蒙圣祖皇帝如天之仁，免其究问，而吕葆中遂忧惧以死。就常情而论，吕葆中之兄弟子孙，遇如此之惊危险祸，且荷蒙圣祖皇帝如此之高厚洪恩，自当感激悔悟，共思掩覆前非，以为幸逃诛殛之计。岂料冥顽悍鸷，习与性成，仍复抱守遗编，深藏箝篋。此固吕留良以逆乱为其家传，故吕葆中等这竖昏愚，同知警惕；而实乃天道昭然，不容少昧，如有鬼神驱遣，使逆贼之阴谋彻底呈现于今日。逆贼之遗毒，不致漏网于天诛也。

前此曾静逆书，朕所以一一剖白者。缘朕即位以来，深知外间逆党甚众，自然散布讹言，惑乱人心志。其所以诋惟朕之一身者，朕可以己意自为判定归结。若如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获罪于圣祖在天之灵者，至深至重，即凡天下庸夫孺子，少有一线良心之人知此，亦无不切齿而竖发，不欲与之戴履天地，此亦朕为臣子者情理之所必然。兹特降谕旨，将诸条略为宣示，其逆贼吕留良及其子孙嫡亲弟兄子侄，应照何定律治罪之处？著九卿翰詹科道会议，直省督抚、提督、两司，秉公各抒己见，详核定义具奏。

【译文】 朕自即位以后，实在不知道吕留良都作了些什么。由于他恶贯满盈，人神共愤，天地也不容他存在，所以才有曾静上书总督岳钟琪这件事的发生，才被曲折地揭露出来，终于现出

了吕留良的凶顽面目。而吕留良的儿子，比如吕葆中这人，曾经应科举考中进士，又蒙皇恩名列鼎甲，授给翰林院官职。其余的子孙也有很多进学当秀才的，就这样还不立即把吕留良的著作和印书的木版烧掉，以灭去遗迹。而且吕葆中既然已经做官，还要继承他父亲的罪恶思想，并没有洗心革命从新做人。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一念和尚造反案件，其党羽便牵连到了吕葆中，那时他的逆迹就已经揭露出来了，蒙圣祖皇帝心怀上天的仁德，免去对他的拿问治罪，但吕葆中却因此惊惧而死。如果按一般常情来说，吕葆中的兄弟子孙，遇到这次惊扰危险的灾祸，并蒙圣祖皇帝高恩厚泽不加治罪以后，自然应该感激皇恩，幡然悔悟，大家应设法改正前辈的过错，以求逃避后代被诛戮的危险才是。谁知他们顽固凶悍，已经成性，仍死抱着吕留良的著述不放，把这些逆书深藏在箱柜里面。这就是吕留良将逆乱作为传家宝，所以吕葆中等叛逆后代，愚昧昏庸，不知道一点警惕；其实这是上天的英明洞察，不允许有一点隐藏，好像有神鬼驱使的一样，终久使逆贼的阴谋彻底暴露于今天，使边贼吕留良的遗毒，不致于漏网而逃避上天对他的惩罚。

以前对于曾静逆书一案，朕所以对他一一剖白清楚的原因，是因为朕自即位以来，深知外边逆贼党羽还很多，自然还会散布流言蜚语，蛊惑扰乱人的思想。他所诋毁的只是朕一个人的，朕可以用我自己的主意来判定案件的处理。如果像吕留良这样罪大恶极，得罪了圣祖皇帝在天之灵，其罪责就实在至深至重。即使是普天下的平民百姓和孩童，稍有一点良心的人知道这事，也会无不切齿痛恨，怒发冲冠，不愿和他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天地。朕若为臣子，也肯定会有同样的心理。现在特降下旨意，把各条叛逆言论略加宣示。至于逆贼吕留良和他的嫡系子孙，亲兄弟子侄，应当按照那一条法律定罪？命令九卿和翰林院、詹事府、有关科、道人员开会商议，直隶省总督，巡抚、提督、两司的官员，也要秉公议论，各抒己见，详细核定他们的罪行，奏报上来。

曾静供词二条

一、我是怎样受吕留良思想毒害，而成为弥天重犯的？

【原文】 曾静供：弥天重犯生于楚边，身未到过大都，目未接见文人，见闻固陋，胸次尤狭，只有一点迂腐好古好义之心，时存于中而不可泯。加以吕留良之文评，盛行于世，文章举子家，多以伊所论之文为程法。所说之义为定义，而其所讥诋本朝处，又假托《春秋》之义，以寄其说于孔子口中，所以不得不令愚人信其实。弥天重犯心下虽不知本朝得统来历，与列圣相承功德，然生圣祖皇帝之朝，赖圣祖皇帝之恩，自祖父以来，无干戈之扰，无苛政之苦，休养生息，以乐以利，大是安业顺化，胸中原无此说。无奈吕留良将此义发得惊异，且以为说出于孔子。弥天重犯虽不识吕留良如何人，焉有不信孔子？且浅陋无知，胸中实别寻个义理解脱不出，因妄自揣量，以为士人读书，无事不当以孔子为法，岂有当前一个这样大的名义全不照管，竟将孔子一部《春秋》囫囵吞下去，如何使得。所以抱此疑团，陷身大逆而莫救。直到今日想来，当时之所以别寻个义理解脱不出者，只为心中不知本朝龙兴之原，与列圣递承之绩，所以为一部《春秋》缚束。若晓得这两个缘故，本朝名正言顺，大义亭亭，关《春秋》所摭甚事，与管仲所攘何涉，又何至为彼说所拘局。

弥天重犯今日之所以切齿痛恨于吕留良者，为伊生于明末之

季，身处江浙人文之区。于本朝功绩岂有不知，以伊之聪明才性，本朝如此亭亭大义，岂看不出，即托身于儒林，合该早将斯义表白于天下，使天下读书士子，晓然知本朝大功大德，名正言顺，尊之亲之，而勿致疑于孔子《春秋》之说。此方是吕留良当身之正义，如何反将此正义理隐蔽，不见宣发，竟支吾旁引《春秋》之义，以抵当本朝。既背经文之旨，复乖当身之义，且流说于士林，遗累于国家。今日士子之从事举业文字，晓得他的说话者，胸中未尝不染其恶。但所知有浅深，是以受病有轻重，求其能卓然自信，知吕留良之说为非，而复解脱得一部春秋之义，与本朝丝毫无碍者实少。盖人纵晓得本朝功德之隆，治业之盛，远驾汉唐，而直接三代，与圣人之生，原无分于东西；然终不能去吕留良之说。而紧抱一部《春秋》义旨，在言下不是说坏本朝不是圣人，定会诽谤孔子错作《春秋》，此弥天重犯前在长沙两次亲供，解说此义。

【译文】 曾静供词：弥天重罪的犯人曾静，生长在湖南的偏僻边地，从来没有到过大城市，眼睛也没有接触过什么有学问的文人。所以见闻固然十分浅陋，肚里的知识更为狭小，只有一点陈腐的好古好义的心，时常存在心中丢弃不掉。再加上吕留良批评编选的文章，盛行于世上，凡打算举科举的读书人，大都把他评论的文章当成样板，把他所说的道理当成定义。而他讽刺诋毁本朝的地方，又假托是《春秋》中的大道理，把他自己的学说借孔子的嘴里讲出来，所以不能不使一些愚昧无知的人相信了他的话。犯下弥天大罪的我，虽然不知道本朝创业的历史，和以前几代圣主相继承下来的功德，然而我生在圣祖皇帝在位时期，受到圣祖皇帝的恩惠，从祖父那一代以来，没有遇到战争的骚扰，没有残酷压迫的苛政，休养生息，生活安乐富足，确实老老实实安居乐业，心中原也没有什么怪异的想法。怎奈吕留良把“圣人”的道理讲得十分怪异，并且解释成是孔子的观点。犯了弥天大罪的我，虽然不知吕留良是什么人，但怎能不相信孔子呢？况且我

浅陋无知，心里又想不出别的道理，从吕留良的观点里解脱出来。因此便胡乱揣摸，以为作为一个读书人，不管什么事都应当按孔子讲的作为标准，怎能对当前这么大的一个名义，完全不去联系，竟把一部《春秋》囫囵吞枣一样咽下去，这怎么可以呢？所以我心中抱有这个疑团，以致于相信了吕留良的话，陷入叛逆思想的泥坑而难以自拔。直到今天仔细想起来，所以当时想不出别的道理来解释，从吕留良的观点中解脱出来，原因在于不知道本朝创业的根源，和列圣继承开拓事业的功绩，因此被一部《春秋》束缚了思想。如果晓得了这两个缘故，便懂得本朝统一天下是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合乎义理，又和《春秋》所弃的事有什么关系，又和管仲所排斥的事有什么牵涉，又怎么能受他的说法所局限呢？

我这个犯了弥天大罪的人，今天所以对吕留良切齿痛恨的原因，是因为他出生在明末的时候，居住在江浙文化发达的地区，对本朝创立的业绩难道一点也不知？拿他的聪明的文才来说，本朝堂堂正正的大义，岂能看不出来？他既然身列儒士之中，就应该尽早把这些道理向世人讲解明白，使天下的读书人，都知道本朝的大功大德，建国的名正言顺，而对本朝尊敬之亲近之，而不致怀疑孔子关于《春秋》主旨的说法。这才是吕留良本人应做的正当事，为什么他反而把这个义理隐蔽起来，不见他讲解，竟然支支吾吾曲解一些《春秋》里的话呢，用来攻击本朝。既违背了《春秋》经文的原意，又违背了作为一个读书人应有的道义，并且流毒士林，遗害国家。现在的读书人做着应科举学写八股文的事业，晓得他的说法的人，心中没有不受他错误的说法所影响的。但是认识有深有浅，所以受其毒害也有轻重不同。而自己能做到卓然有主见，知道吕留良说法错误，并能真正理解《春秋》的主旨意义的，对本朝没有一点违碍的人，确实是很少的。因为人们即使晓得本朝功绩的巨大，事业的兴盛，远较汉唐为高，而且直可以和三代比美，以及圣人的降生，是不限于地域西东的；但终究也不能完全摆脱吕留良的影响。而紧抱着一部《春秋》的

义旨不放，在讲解时，若不贬损本朝不是圣人，就一定会诽谤孔子错作了《春秋》。这是我这个犯了弥天大罪的人，在长沙时两次亲自口供时解说的道理。

【原文】 到今日思来，实是皇天眷佑我朝，知得我朝正义正名，久为逆说掩蔽于士庶人之胸，所以假弥天重犯之口，曲折阐发此义，使天下万世共尊共亲，无毫发遗玷于我朝之圣德神功，故必如弥天重犯之身亲经历，方晓得此义。从前错误，实由于无知，而过信吕留良之说所致，今得圣谕开示，复就伊荒唐鄙谬，无中生有的说话思之，并考吕留良的时地与其学问心术，知得彼非不知而看错，实出于有意以诋诬也。所以于本朝一切实有征应之事迹，则概为隐匿而不书，而专以捏造妄幻惑人观听为事，全不知食本朝之粟，履本朝之土，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皇恩之当报，而竟无顾忌，相视如仇敌。今观其说话，全是以诋张佞利之口，逞其忿戾凶顽之习，而复七为藏奸隐诈，假托圣贤之说，盗名理学大儒，以欺世而惑人。自古以来乱臣贼子，包藏祸心，诱变士子，陷害良民者，未有如吕留良可痛可恨之甚也。

然在重犯因过信吕留良逆说，与误听谣言，而身陷极恶大罪以来，每清夜自思，心虽无恶，罪实难解。即令自家判断，亦寻出路不著，况圣天子一日万机焉，能烛照心肝。洞悉民隐，知得无知误听，本心无恶而钦恤之？是以屡蒙皇上如天之仁，颁旨宽宥，自家心正觉得皇恩虽然好生，当身罪过重大，恐难得其生路解脱也。今蒙圣谕剖判吕留良罪案，复取弥天重犯罪案比较，此时在弥天重犯只有惶恐战栗，死生待命之下而已。又焉敢摇唇张口，指他人所犯之大小，诉自己罪恶之轻重！特以尧舜在上，无不达之民隐，圣谕所颁，原得许直供陈奏，而今日所供者，又皆在谕旨包涵遍覆之内，是以敢于冒死直供。且以弥天重犯如此极恶重罪，尚得容许自供自解，可以知我皇上宸衷虚明广大，直同天体，不惟为亘古首出之圣君，然即此一事，亦属亘古未有之奇

典。弥天重犯当此盛会，又何敢隐忍回曲，而不直供其所以然。

【译文】 到今天我细细想来，实在是上天保佑我朝，知道我朝立国名正言顺，却被歪曲为谬说而长期地藏匿在读书人的心中，因此借我这个犯了弥天大罪的人的嘴，曲折地说明了这个义理，而使天下百姓万代共尊共亲本朝，没有一丝一毫来玷污我朝的神德神功。所以必须像我这个弥天大罪的犯人亲身经历，方能晓得这个义理。从前所犯的错误，实在是由于无知，错误相信吕留良的说法所致。如今得到皇上圣谕加以开导，又对照吕留良那些荒唐鄙谬、无中生有的说法仔细思考，并考察吕留良身处的时间、地点和他的心术，才认识到吕留良不是因为糊涂而把事情看错，实际上是由于他有目的地进行诋毁和攻击。所以他对本朝一切受到上天垂降祥瑞的事迹，则一概隐藏而不加记载，而专门捏造一些蛊惑人心的事；完全不知道吃本朝的粮食，脚踏本朝的土地，受本朝养育的恩德，才有他的家庭和身体，并繁育他的子孙达几十年之久。皇上的恩惠，他是应当报答的，然而他却毫无顾忌，把本朝看成仇敌。现在看他所说的话，全是用欺骗诡辩的口吻，来发泄他凶暴顽固的本性，而又巧藏狡诈，假托是圣贤的话，假冒理学大儒的名声，以欺骗诱惑世上的人。自古以来的乱臣贼子，肚里包藏祸心，引诱读书人，陷害良民百姓的，再也没有比吕留良更令人痛恨的了。

然而犯下弥天大罪的我，因为过分相信吕留良的悖逆邪说，误听谣言，而使我身陷入极大的罪恶深渊以来，每到深夜人静时自己仔细思考，虽然我心中没有恶念，但所犯的罪实在难以推卸。即使让我自己去判断这个案件，也觉得自已毫无出路可走。何况皇上日理万机，岂有时间去看透一个小民的心肝，洞察其内情，知道是由于无知而误听误信呢，而其本心无意为恶，而加以下旨宽赦呢？所以屡次蒙受皇上像上天一样仁爱百姓，降旨宽大处理，自己心中觉得皇恩虽然有好生之德，但本身罪过重大，恐怕是也很难有生路而解脱出来的。如今又蒙皇上圣旨分析吕留良

罪行一案，和犯弥天大罪的我所犯的罪行加以比较，此时在我这个弥天大罪的犯人心中，只有惶恐战栗，生死也只有等待命运罢了。又怎敢摇唇鼓舌，议论别人所犯罪行的的大小，诉说自己罪行的轻重呢！现在特因上有尧舜一样的圣明君主，没有不洞察民间隐私的地方，圣上的旨意发下，又允许如实地陈奏；况且今天想供出的事，又都在皇上圣旨包涵的范围之内，所以敢斗胆冒死如实招供。而且以犯人我犯下了如此重大的罪行，皇上还容许我自己招供自己辩解，由此可见我皇上胸怀广大，真和天地一样高大，不仅是自古以来第一圣明的君主，仅就这一案件来说，也是自古以来从没有过的奇特恩典。所以犯了弥天大罪的我遇到如此美好的机会，又怎敢隐忍逃避，而不直接了当的招供出犯罪的始末呢？

【原文】 因是思得吕留良之著说纪载，是有心为恶，而假托于善，以掩其恶。弥天重犯之狂举上书，本不知是恶，乃用意为善，而自陷于恶。盖吕留良生明末之季，处江浙之省，读书学问，何事不晓，何义不讲，本朝功德，宜耳闻目见而身被熟矣。岂若弥天重犯之生晚而居处穷僻，心暗质鲁，不惟别事不知，即流贼李自成名姓亦不晓。若使早似吕留良之有知，不但不肯为此狂悖之举，且久已将我朝功德阐发，见之于言，论传之于士林，使天下共晓君亲之义矣。又何至有弥天重犯狂悖之举。盖生本朝而搜纪本朝之功绩，阐明本朝之道德仁义，正学士分内事，自古儒者所必先之举。吕留良何计不出此，而反以讥诋为事？今蒙圣谕开示：“吕留良生于浙处人文之乡，读书学问初非曾静山野穷僻冥顽无知者比。”此诚德同天地，明并日月，至公至明之至论也。

且吕留良本心，不欲圣祖之圣，而伪捏不圣之说，以诬其圣。弥天重犯本心不知皇上之圣，忽听不圣之说，遂误信以为果是不圣。其实谤诬圣祖，罪固不容于死，而讥诋皇上，法又岂容独生乎？所不同者，只为山野愚民，不知圣德高厚，遂为奸党布

散流言，惑乱民间听闻。岂若圣祖皇帝在位六十余年，深仁厚泽，沦肌浃髓，虽黄童白叟，皆所深知，况身列胶庠十余年之吕留良乎？皇上天视圣祖，浑忘己德。今蒙圣谕开示：“曾静诋讪及于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此又不惟德同天地，明并日月，至公至明，而并且流露我皇上平昔至仁至孝之深衷矣。

大
义
觉
迷
录

【译文】 因此，我想吕留良著作里所记述的话，是故意去做坏事，却又假托出于好心而去掩盖他的恶念。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狂妄地上书，本来不知道这是一件坏事，用意还是从好处着想的，而自己将自己推入犯罪地步。吕留良出生在明朝末年，居处在江苏浙江一带，自幼读书求学，什么事不知，什么道理不懂？本朝的功德，当然能耳听眼见而都很熟悉的了。怎能比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居住在穷僻山乡，见闻少而心暗身愚，不光别的事不知，就连流寇李自成的名字都不知道。如果我能像吕留良那样有知识，不仅不会作出这件狂妄悖逆的事来，而且早就会把本朝的功德加以宣扬，挂在口上，传播到读书人中间，让普天下的人民都知道君臣之义了，又怎么会出现犯下弥天大罪的狂悖举动呢？因为生在本朝，而搜集记载本朝的功绩，讲明本朝的道德仁义，这正是读书人的分内事，是自古以来儒生所必须先做的事。吕留良为什么不这样办，反而用讥讽诋毁去对待呢？如今蒙皇上圣谕指出：“吕留良出生于浙江人文荟萃的地方，读书学问，不像曾静生长在深山穷乡的地方，愚昧无知难以相比。”这确实是仁德同于天地，英明相并日月，公明之至的论说。

况且吕留良的本心，是不想歌颂圣祖皇帝的圣德，而故意编造出边疆不会出圣人的说法，来影射圣祖不是圣人。犯了弥天大罪的我，本心是不知道皇上的英明神圣，忽然听到不算圣人的说法，遂误信果然不能称为圣人。其实诋毁诬蔑圣祖皇帝，其罪恶固然是死有余辜；而讥讽诋毁当今皇上，从法律上讲，又岂能允许他活命呢？所不同的地方，是我这个山里的愚民，不知道皇上

道德的高厚，遂替奸党散布流言蜚语，扰乱民间的视听。怎能比得上圣祖皇帝在位六十多年，给百姓带来深厚仁惠和恩德，真正深入肌肤和骨髓，虽是黄毛小童和白发老翁，也都深入人心，何况身为秀才，读书在学校十几年的吕留良呢？皇上如同敬上天一样恭敬圣祖，而忘掉了自身。如今蒙受皇上圣谕指出：“曾静诋毁的只是朕一个人，而吕留良则上诬及祖先皇的盛德。”这不仅表示了当今皇上道德和天地一样高厚，英明和日月一样，至公至明，而且也体现出我皇上平日至仁至孝的内心了。

【原文】 又弥天重犯之狂举，心中本无成见，因闻吕留良逆说，复闻谣言，而弥天重犯附近之地，又偶尔歉收，且平昔并未晓得我皇上圣德万分之一。此时觉得当身道义既催，目前时势又迫，俨若有个鬼神在此驱逐之使动，容人安息不得。所以不计利害，不审成败，妄萌此狂悖逆乱之举，若吕留良，则明知有道，而若不知其道；明闻有德，而若不闻其德。观其立说，多幸灾乐祸之心，毫无忧民爱国之念。是吕留良之诋诬，独出己意，而弥天重犯之狂悖，全凭人使。今蒙圣谕开示：“曾静之讪谤，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此诚德同天地，明并日月，至公至明之至论也。

至若中外之分，弥天重犯虽曾闻其说，其实亦心知其不然，苦奈学浅无知，见闻未广，思想义理不出，分解不来。无可如何。且一面反覆细观吕留良议论，直指此为今日等一大义，读书人所必守。岂知本朝得统之正，列圣救济之功，皆千古所罕见，与春秋之所接管仲之所攘义例，不惟不同；且以今较古，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今蒙圣谕开示：“曾静胶执中国夷狄之见，胸中妄起疑团，若不读吕留良之书，不见吕留良之议论蜂起，快心满意，亦必有所顾忌，而不敢见之文辞。”此诚洞见肺肝，民情丝毫不能隐处。

凡此乾断，固非具大舜之智，不能明察到此。抑非裕帝尧之仁，不能钦恤如是。仁智交融，圣神并至，焉得不令闻者拍案惊

倒，以为千古圣明之君所不到。弥天重犯到此生固有荣，死亦何恨？况昨又蒙降旨，九分不杀，是即感明睿之德，照烛隐情；复行高厚之恩，宽宥重典，恭逢这样神圣天子在上，竟无说可以颂扬比拟得，只有尊之敬之如天地，亲之如父母而已，更有什么话说得。

【译文】 犯了弥天大罪的我，所作的猖狂举动，心中本来并没有什么成见，只因听了吕留良悖逆的言论，又听到一些谣言，而犯了滔天大罪的我所居住的一带，又偶而粮食歉收；而且平日并不知道皇上德行的万分之一。这时便觉得身上压有一种道义感，同时目前形势又较为紧张，真如同有个鬼神在暗中驱使自己去行动一样，使人难以安定下来，所以便不顾利害，也不关事情成败，狂妄地产生鼓动叛变的行为。至于吕留良，明知我朝应乎天道，而故意伪装不知天道；明明听闻我皇上的仁德，而故意当作没听到过皇上仁德。看他的书中的观点，大都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情，没有丝毫忧国爱民的想法。以此可见吕留良对我朝的诋诬，完全出于他的内心，而犯下弥天大罪的我所作的悖逆行为，全被别人利用了。现在蒙皇上圣谕揭示：“曾静的毁谤，是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由于他本人的内心，而制造出妖妄的言论。”这真是仁德同于天地一样高大，英明和日月一样明亮，公明之至的说法啊。

至于讲到中外的区分，犯了弥天重罪的我，虽然曾经听到过这类说法，其实心里也不以为然，苦恨我自己学识浅薄无知，见闻狭隘，想来想去理不出个头绪，解不出道理，实在没有法子可想。而且一面反复地琢磨吕留良的议论，明确指出华夷之分是今天第一要紧的义理，读书人应当必须遵守。岂知本朝建国继承大统是十分纯正的，列位先皇拯救中国所建树的功勋，都是自古以来少有的。这和《春秋》排斥夷狄和管仲抨击的例子，不仅不同，而且用今天状况来套用古代事情，就像用寒与暑、昼与夜相比一样，恰恰相反。现在蒙皇上圣谕开导：“曾静顽固地抱着中

国和夷狄的见解，心理乱起疑团，如果没有读吕留良的书，没看到吕留良的众多议论，虽心中有疑团，也一定会心存顾忌，而不敢乱写成文字的。”这真是洞察人的肺肝，百姓的情况是一点都隐藏不住的。

凡这些英明伟大的论断，除非具有大舜那样圣人的智慧，是不能够这样明察的；倘若没有像帝尧那样仁厚的心怀，也不能体恤百姓到这种程度。仁德和睿智交融在一起，神和圣集中到一起，怎能不让听到这事而拍案惊服呢！这是千古以来所有圣明的君主都难做到的。犯了弥天大罪的我，遇到如此圣明的皇上，生在世上固然十分荣幸，就是死去也不会有什么遗恨。况且昨日又蒙皇上开恩降旨，说九分不杀，于是犯人马上感激皇上英明睿智的恩德，能洞照一切隐情；又受到高厚深恩，从宽赦免了重刑。能恭逢这样神圣的天子在位，是没有任何恰当的话可以颂扬和比拟皇上的伟大的，只有敬之如天地，爱之如父母而已，还有何话可说。

二、乱臣贼子吕留良是怎样把我们引入歧途的？

【原文】 刘之珩、车鼎丰、车鼎贲、谯中翼、孙用克即孙学颜、陈立安、曹珏、廖易即景叔、张孝先、张勘即实安、张新华、张照、张熙同供：

伏惟本朝圣圣相承，积厚流光，太祖高皇帝神武奋兴，肇基东北。太宗文皇帝举义师以除寇乱，为亡明雪耻，救生灵于水火，天下筐筐争迎，同登衽席。世祖章皇帝应天顺人，入登大宝，大一统之盛，虽殷周有未及者。迨我圣祖仁皇帝继统承乾，化神德盛。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乃不意沂省有吕留良者，恃彼小才，欺世盗名，假评选以驰声，藉刊刻而射利。适值昭代右文之隆会，得以风行宇内，一时传习举业者，悉为其所惑，遂多奉

为八股之金科，讲章之宗匠。

之珩等庸陋迂愚，素未谙其为人底里，但见其现行选刻本头，论文说书，笔尖舌快，因随众而推服者有之。今得见留良和抄藏残稿，种种悖谬，率皆大逆不道之语，甚至轻肆诋讥，上及圣祖，诚有巨子所不敢入于目，不忍述诸口者。乃始惊其平日凶悍性成。乖戾无比，逞臆妄言，私心梗化，正是乱臣贼子之尤，罪大恶极，为王法所断不容。夫以留良身为圣代之诸生，谬附前朝之余烬，践土食毛者业经数十年，直视如蔑有，顾以绝我影响之事，毫无顾忌之谈，公然形诸笔墨。观其言殆桀犬以自居，其实曾蜂蚁之不若，一何其悖逆之至于斯极也。

且其身后，长子葆中即成进士，缀清班，其余子孙，亦复多列胶序，则由今日而论，国家之恩泽。涵濡煦育于吕氏者甚深且厚，而回思留良之狂肆背负，愈觉可恨，而其罪益彰明较著，历劫难逃矣。此在忠臣义士固欲请上方以正显戮；而庸夫孺子，稍一线之良者，亦莫不痛恨而发指。即彼诗文中，亦尝自谓逆天，宜乎其享年不永，而旅已早伏冥诛也。

窃思留良既死，凡秘笈所留，其子若孙即当速为毁弃，而乃应毁不毁，片纸只字，卒致莫能适匿者，岂非上天之笃爱圣祖，而又欲有以显信我皇上之纯孝，所以默使之败露，而表暴其罪状哉！从此宇内士民，幸得悟其背伦逆天，以共晓然于邪正之判，如大寐之忽醒焉。昭昭天理，盖非狂悖者之所能久诬，恢恢天网，亦非叛逆者之所能终漏也。之珩待共沐皇仁，粗知大义，睹此奸回，不胜不共戴天之愤。谨供。

【译文】 刘之珩、车鼎丰、车鼎贲、谯中翼、孙用克即孙学颜、孙立安、曹珏、廖易即景叔、张孝先、张勘即实安、张新华、张照、张熙同供：

本朝创业以来相承袭，深厚的功德光辉万丈，太祖高皇帝神武兴国，开创基业于东北，太宗文皇帝率领义兵扫除寇乱，为亡去的明朝雪耻，救生灵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天下百姓提着装食

物的篮子争迎王师，一同参加庆贺的宴席。世祖章皇帝上应天心下得民意，进入北京登上皇位，统一了全中国，虽古代的商、周两朝，也没有如此盛况。到我祖仁皇帝继承皇位大统，教化人民盛德赫赫。凡是有血性的人，无不尊敬爱戴的。却不料浙江省有个叫吕留良的人，仗着他有些小聪明，欺世盗名，借着评选时文而获得声名，借着刻印图书而获利。恰逢圣朝崇尚文风的机会，他的书才得以风行于国内，一时尚科举的读书人，都受到他的迷惑，把他的图书当成学作八股文的金科玉律，把他本人当作评选八股文的权威方家，一代宗师。

之珩等人平庸愚昧，平常并不知道这个人的底细，只见到他曾刻印了许多八股文的选本，他对每篇文章的评语，笔尖舌快，便随着大流对他推崇而信服。现在见到了他抄写的藏在家里的残稿，有种种荒谬错误，大都是些大逆不道的话，甚至放肆攻击讥讽，一直到圣祖皇上，确实是作为臣下的人不敢看在眼里，不忍说出口来的。这才震惊他平日的凶悍性成，暴戾到无可比拟的地步，任意捏造狂言，其黑心已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真是乱臣贼子中突出的一个典型。他罪大恶极，是王法决不能容忍的。这个吕留良身为本朝的秀才，荒谬地附和明朝的残余势力，无视在本朝内安享数十年生活的事实，便把绝无影响的事，毫无顾忌的加以攻击，公然写到纸上。看他以向唐尧狂吠的夏桀走狗自居，其实他连蜂蚁这些小昆虫都比不上，为什么狂妄悖逆到这种地步呀！

并且在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吕葆中便考中了进士，在翰林院担任要职；其余的子孙，也有很多在校读书，身为秀才。这从今天来讲，国家的恩泽，如同雨露阳光，降给吕氏家族是很深而且很厚的。而再反思吕留良的狂妄，背负朝廷，越觉得他的可恨，而他的罪行也更加彰明昭著，在劫难逃了。这一点在忠臣义士的心中，固然想请求皇上赐下上方宝剑，把他处以极刑；哪怕是普通百姓和孩童，凡稍有一点良心的人，也没有不痛恨而怒发冲冠。就是他的诗文里，也曾自称他是逆天行事，这也正说明他

不得长寿，上天早已在冥冥之中判其死刑了。

窃想留良既然已死，他个人留下文稿书籍，他的子孙们就应该迅速地加以销毁，而却应毁不毁，片纸只字，最后也终于没有逃掉，这岂不是上天厚爱圣祖皇帝，又打算显示当今皇上的纯孝，所以才使他的逆迹得以彻底败露，而把他的这些罪证彻底暴露出来的吗！从此以后，国内的士人百姓，才有幸领悟到吕留良的违背伦常逆天行事，使大家都能晓得正邪的区别，真好像大梦忽然醒来。天理昭昭，是狂悖的人诬蔑不倒的；天网恢恢，是叛逆的人决不能逃脱的。之珩等人共同受到皇上的仁德，略略知道君臣大义，看到吕留良这种奸人，对他产生不共戴天的愤恨。谨此招供。

雍正上谕

一、本朝子民严鸿逵追随吕留良效颦狂吠，谩骂诽谤朝廷，是何居心？

【原文】 上谕：浙江逆贼吕留良，凶顽梗化，肆为诬谤，极尽悖逆，乃其逆徒严鸿逵者，狂暴狼戾，气类相同。意见吻合，实为吕留良之羽翼，推尊诵法，备述其遗言绪论，又从而恢张扬厉，以附益之，其词有较吕留良为尤甚者。夫吕留良以本朝之诸生，追附前明仪宾之末裔，无端反噬，愤懑猖狂，已属从古乱臣贼子中所罕见；至若严鸿逵，则生今之世，为今之人，自其祖父，已为本朝之编氓，践土食毛，戴高履厚。严鸿逵之于明代，岂有故君旧国之思，而于我朝实被遂生乐育之泽，何所庸其感忿，何所庸其追忆，而亦敢效颦狂吠乎？兹择其悖逆之语、彰明较著者，一并宣示，庶使中外臣民知严鸿逵背理逆天，无父无君之罪，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其日记有云：“索伦地方，正月初三地裂，横五里，纵三里，初飞起石块，后出火，迫三十里内，居人悉迁避。”旨云：此等异事，古来甚多，况在口外，何足为奇。又云：“徐姓在燕，有仆妇发狂，一夕见贵者三人坐堂上，忽报朱三太子来，三人下阶迎之。见一人浑身血痕，怒向三人索黑水三道，三人初不允，固索，乃允。约以某日发水始去。醒而言之。后几日，热河水大发，淹死满洲人二万余。计其日，则此妇所梦之日也。”又云：

“江都邵穆布将死，如有所见，曰呼‘惕斋先生，与我无预’者，月余而死。盖当时此事发于此人，有人在彼署中，见其死时如此。”又云：“十六夜月食，其时见众星摇动，星星如欲坠状，又或飞或走，群向东行。”又云：“旧年七月初四日星变，一钦天监云：此星出天沛垣，入天市垣，分野属吴越，应在数年内吴越有兵起于市井之中。其色白，应主国丧，在本年内其后说已验。”又云：“予所戴六合一统帽，以拟四方平定巾，今士人仿效渐多，因阅《日知录》，乃知先朝已有是名，亦太祖所制，若曰‘六合一统’云尔。”又云：“燕中人家门首悉土朱画圈，方圆点又不一，或圈中有字。”又云：“徐孝先终身衣直领，戴孝头巾，言与先皇帝戴孝。”又云：“近日有雄鸡生卵，雌化为雄；又有犬产蛇鳖，胎生。”又云：“练市有沈开生名伦，不去发，白衣冠终其身。”又云：“河南有虾蟆食人异。奇哉！”

【译文】 皇上谕旨：浙江逆贼吕留良，凶恶顽固，极力诬谤，悖逆已到极点。至于他的弟子严鸿逵这人，性情狂暴狠戾，和他气类相同，意见完全一致，确实是吕留良的死党，他推尊吕留良的学说观点，全面论述其遗著的主旨，并且进一步加以夸张发扬，作为吕留良论著的补充，他所说的话，有些甚至比吕留良说过的更为凶狠。这个吕留良身为本朝的秀才，却去攀附明朝的仪宾，自称是其后代，毫无理由地对我朝反咬一口，愤恨猖狂，已属于自古以来乱臣贼子中所罕见；至于严鸿逵这人，则是生在今天的世界，是今天存在的人，自他的祖父起，已属本朝的百姓，吃的住的都是本朝恩赐，对他恩泽真是如天地一样高厚了。严鸿逵和明朝的关系，怎能扯上一点故君旧国的想法，而他在本朝，则实际上受到养育的恩德，又有什么可让他愤慨，又有什么可使他追忆，因而也敢学着吕留良一样狂吠呢？现在择录他悖逆的言论，说得比较露骨的话，一起揭示出来，以使中外臣民，都知道严鸿逵违背天理，无父无君的罪行，是无法逃匿于天地间的。

他在日记里说：“在索伦（今属内蒙古自治区）这地方，正

月初三日发生地裂，横五里长，纵三里长，起初飞起石块，后来又喷出火来，附近三十里内，居民悉数迁移逃避。”圣旨评说：这种奇异的事，古来发生很多，何况在关外边区，有什么值得奇怪？他又记载说：“有个姓徐的，住在燕山一带，他家有个仆妇得了疯病。有一天晚上梦见三个贵官模样的人坐在大厅上。忽然有人来报告说朱三太子来了。三个人就走上台阶去迎接。只见一个人满身血迹，愤怒地向这三个人要黑水三道，这三个人起初不应允，朱三太子坚决索要，三人才同意了，约定于某天把水发去。这仆妇醒来以后，将这梦告诉了别人。又停了几天，热河发生大洪水。淹死了满洲人两万多名。计算发水的日期，正是那仆妇梦见三个人答应发水的日期。”又说：“江都的邵穆布快要死的时候，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嘴里连声呼叫‘惕斋先生，这事和我无关’，经一个多月才死去。当时这个案件就是发生在这个人身上。有人在邵穆布的衙门里，看见他死时就是这样。”又说：“十六日夜里月蚀。那时看见天上很多星星都动摇不定，好像要掉下来的样子，又有一些星星或飞或走，都朝东边去了。”又说：“往年七月初四日星星有变异，有一位钦天监的官员说：这个星星出在天沛垣，又走入天市垣；和它相应的地域是江南一带，预兆在几年以内，江浙一带会有兵灾起于民间。这星色白，预兆国家要发生大丧事，在本年内，这后一个说法已经应验（指太后去世）。”又说：“我所戴的‘六合一统帽’，可用它比‘四方平定巾’。今天的百姓仿效这种帽子的人逐渐多起来。因而查了一下《日知录》，才知道明朝时已有这个名称，也是太祖皇帝制定的，就像在说‘六合一统’这样的话。”又说：“燕地（今北京一带）的人，家门头上都用红土画个圈，画的方圆点又都不一样，有的则在圈里写上一个字。”又说：“徐孝先一辈子穿直领衣衫，头上戴着孝巾，说是给先皇帝带孝。”又说：“近来有雄鸡生蛋，母鸡变成雄鸡的事；又有狗生下蛇和鳖，都是胎生。”又说：“练市有个沈伦字开生的人，不去头发，穿白衣戴白帽终身。”又说：“河南发生有虾蟆吃人的异事。真可怪呀！”

【原文】 凡此荒谬叛逆之语，自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六年内所记载者，已经数不胜数，其中惟索伦地方，拥石出火，确有之事，此盖彼地气脉使然，前此已经屡见，现今有相同九山为证。本地相传，皆言自土中拥出者，历年已久，无从考索。是以其地名九墩，与新出之石，凡十矣。其傍远迫山顶，亦有烈焰者，此圣祖皇帝深知之事，是以有“从前甚多”之谕旨。而严鸿逵以此为讥讪乎。

至热河水发一事，口外重山叠嶂，五六月间大雨时行，凡涧溪悉成巨浸，行旅时为阻滞，然雨止，则一二时即退。热河山回峦抱，中惟一道河流，每雨水稍大，众山之水皆从此出，是以往有冲决堤岸之事。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大雨连昼夜，其时附近行宫一带，地处高阜，惟隔岸山根之下为水所漫溢。本地久居之民，实所习见，不以为异。而扈从之官兵，亦皆知雨止水即减退，皆安重不迁。惟寄居之匠人等，以生平所未见，惊惶迷惑。或有愚人编木为筏，谓可以乘流而渡，遂有木筏触石而解，以至沉溺者数人。又圣祖仁皇帝御用水井，在隔河山麓，有守水官兵，凛尊法度，水至不敢移徙跬步，亦至沉溺二三人。是时，朕以轮班，恭请圣安，随从官兵二三百人驻扎即在水发之地，因约束严整，无一妄动之人。及至水退，皆安然无恙，无一人被水者。乃严鸿逵谓淹死满人二万余，何其妄诞至于此极！江浙等处时有山水骤发，及起蛟之事。动辄冲没村落数百家，严鸿逵岂不闻之乎？何独以热河水发为异也。且热河之地，五方贸易之人毕集，而佣工力作者，多系山东山西之民。而严鸿逵谓独淹死满人，有此理乎？乃托之梦幻，造为朱三太子索黑水等语，不知严鸿逵是何肺肠也。

【译文】 凡是这些荒唐叛逆的话，自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到雍正六年（1728）这段时间所记载的，已经不胜枚举，其中只有索伦地方地下喷出石头和火是实有的事。这是因为当地气脉的原因致成这样，过去已经多次发生，现在还存在着九座石堆为

证。本地人传说，都说这九堆石头，都是从地底涌出来的，经历年代已经很久，无法考证出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所以地名就叫九墩，加上新出的石堆，已经有十个了。这些石堆旁边的山顶，也能喷出火焰。这事圣祖皇帝很清楚，所以才有“这事以前很多”的谕旨。而严鸿逵却用这些来当成讽刺的讥笑我朝出现灾异的材料。

至于热河发生洪水这事，是因为长城外群山层叠。五六月间下大雨时，凡是溪间，都成为大湖，旅行的人常常受到阻滞。但雨停后，不过一二个时辰，水自可退走。热河地方群山环抱，中间只有一道河流，每当雨水稍大的时候，群山的河流都是从这河流出，所以往往会产生决堤的事件。康熙四十八年（公元）六月，大雨下了一天一夜，当时附近的行官一带，地处高冈，只有隔岸山脚下有些地方被水淹没。本地居民住得久了，常常见到这种情况，并不以为奇。而那些护卫皇上的官兵，也都知道雨停后水势便会减退，因此都安稳不动。惟有那些临时来做工的工匠等，因为生平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以致惊慌失措，个别愚蠢的人便编造了木筏，以为可以顺流逃走，遂发生有木筏触碰山石而解体的事，以致落水溺死数人。此外，圣祖仁皇帝御用的水井，在隔河的山脚。有看守水井的官兵，恪守法度，洪水到来时，也不敢移动半步。因而也落水淹死几个人。这时诸皇子中，正轮到朕去恭问圣祖安康，随从的官兵有二三百人，就驻扎在洪水暴发的地方，因为军令约束很严，没有一个人随便走避；等到水退以后，都安然无恙，也没有一个人落水。可是严鸿逵却说淹死二万余人，为什么要荒唐捏造到这种地步！江苏、浙江等地，时常有山洪暴发，和发蛟的事情，动不动地会冲没村庄几百户人，严鸿逵难道没听说过吗？为什么独独把热河的发水当成上天降罚的异事。况且热河这地方，各地来做生意的人很密集，而来打工出卖劳力的人，大部分是山东山西的百姓，而严鸿逵却说只淹死满族人，能有这种道理吗？至于假托梦境，捏造朱三太子索要黑水等话，更不知严鸿逵肚里生的是什么肺肠。

【原文】 夫从来汕骂诽怨之词，多言桀犬吠尧，吠非其主，以自卸其罪。然以严鸿逵生之今世，为今之民，明代沦亡已久，而我朝定鼎，经百年有余，按之天时，稽之人事，则明之太祖与崇祯帝，以及伪朱三太子，非严鸿逵之主也，明矣。若之何托心于遥遥不相关涉之非其主，而转吠及于神尧之主乎？且臆造讹言，好乱乐祸，于升平宁谧之时，作干戈扰攘之望；以圣祖之德盛化神，而公然诬蔑；以今日之民安物阜，而朝夕咒诅。种种丧心病狂，皆拾吕留良之唾余，而尤加幻妄，岂非凶虐性成，万死有余之逆贼乎！且伊既私自著述，造为妖罔蝶，而又貌作迂腐曲谨之态，以掩其奸顽。浙俗浮薄之士，簧鼓其虚誉，致有廷臣以纂修《明史》荐举及伊者，伊乃自鸣得意，抗慢诡激，其日记有云：“传之得炳仪字，仍囑劝驾。有‘尧舜在上，不可徒事高隐’之语。予笑谓尧舜在上，独不可下放巢由耶。”又云：“总宪又有面奏，语囑易斋令惟怀驰信劝驾，势不得辞云云。然予意自定，当以死拒之耳。”其大言藐抗，即已若此。乃日记又云：“有衡州人张熙，字敬卿来见，言其师曾静，永兴县人，在彼中讲学，学者称蒲潭先生。从前因读讲义，始弃诸生。”又云：“敬卿欲往江宁，作致双亭字，又寄冬之字。”

夫以朕特旨诏修《明史》，旁求山林隐逸之士，而廷臣荐举及伊，则妄附巢由之洗耳，至欲以死力拒、视朝廷如儿戏，待征召于弁髦。而于逆贼曾静等叛乱悖恶之徒，尺书驰问，一介相通，则数千里之外，呼吸相应，亲如同气，辗转游扬，招纳党类天地间，显图不轨，恣意横行，扰乱纲常，震世骇俗，未有凶狡至于此极者也。似此悖逆叛乱之人，煽惑民心，贻祸后世，王法所不容，神人所共嫉，且获罪于圣祖皇帝，与吕留良党恶共济，其罪不容于死。严鸿逵应作何治罪之处？著九卿翰詹科道会同速议，具奏。

【译文】 自古以来谩骂诽谤朝廷的，大都用桀犬吠尧，各为其主这个典故，以此来推卸自己的罪责。但是严鸿逵生在今天的世

上，是当今的百姓，明朝灭亡已经很久了，而我朝建国有一百多年了，从天时上，人间关系上来说，从明太祖到崇祯皇帝，以及伪朱三太子都不能说是严鸿逵的主人。要是这样，为什么他要托心给遥远的并不是他主人的人，反转过来狂咬自己的像神尧一样的主人呢？而且他肆意捏造谎言，好乱乐祸，在全国升平安定的时候，他却盼望动乱打起仗来；像圣祖这样给百姓带来的盛大恩泽和天神一样。他却要肆意污蔑；对于今天的百姓安乐，物产丰富，他却要朝夕咒诅。他这种种丧心病狂的攻击，都是拾吕留良的唾余。而且更加上一些无影编造，这难道不是凶残成性，万死也有余辜的逆贼吗？而且他既然私自著述了不少攻击我朝圣祖的文字，捏造不少妖妄言论；而又在表面上装成迂腐安分的态度，用以掩盖他的奸险顽固。浙江一带轻浮的读书人，为他摇唇鼓舌吹捧，使他得到一些虚名，以至朝廷内有的官员竟然要推举他参加编修《明史》。他也因此而得意洋洋，用激烈傲慢的手段来拒绝征召。他在日记里说：“传之得到炳仪的来信，仍是托传之劝我应召参加修《明史》，信中有‘现在有尧舜般的君王在上，不可老是做高人隐士’等话。我笑着说，既然有尧舜般的君王在上，难道不可以放过巢父和许由吗。”又说：“总督又面奏，并嘱咐易斋，让惟怀写信给我，劝我去就职，这种形势下是辞不掉的’等话。但我的主意已定，宁死也要拒绝去干这事。”他口出大言，藐视和拒抗朝廷，既然已到如此地步，而其在日记中又说：“有衡州人张熙，字敬卿来见，说其师曾静，永兴县人，在他那里讲学，学者都称他为蒲潭先生。以前因为读了吕留良著的《四书讲义》，才抛弃秀才不做。”又说：“敬卿打算去江宁（今南京），给双亭写了封信，又给冬之写了封信。”

由于朕下旨要求纂修《明史》，并寻找一些有学问而隐居未仕的学者参加，因而有官员推举了他。他却狂妄地自比作巢父，许由的洗耳，甚至要以死来力拒，把朝廷看成儿戏，把征召的文书看成无用废物。而与逆贼曾静等叛乱悖忤的人，却不断书信往来，同类相聚，虽则远在数千里以外，也呼吸相应，亲密如同兄

弟，辗转交纳，招纳同党于国内，显然是计划图谋不轨，恣意横行。其扰乱纲常伦理的作为真是惊世骇俗，真是从来没有人凶狠狡猾到这种极点的。像这样悖逆叛乱的人，煽动蛊惑民心，把祸害带给后世，是王法所不能容忍的，神鬼和人民都对他们十分憎恨的。而且他罪行涉及到攻击圣祖皇帝，和吕留良一伙党恶共济，他的罪行真是死有余辜。严鸿逵应当怎样治罪处理，命令九卿、翰林院、詹事府有关科道，开会迅速议定，奏报上来。

二、曾静痛心疾首地说：“我这过去的禽兽，如今是怎样脱胎成人的？”

【原文】 上谕：曾静悖乱凶顽，诱张为幻，从古狡恶狂肆之徒，未有其比。宜若性与人殊，不可化诲。乃今悔悟，从前为邪说流言所蛊惑，痛心疾首，历历吐供，自称“向为禽兽，今转人胎”等语。可见天地之大，无所不有，亦无物不可化诲。圣人有言，“信及豚鱼”。今以曾静豚鱼不如之物，亦能悔罪悔改如此。伊著《归仁说》一篇，奏云：“此身若在，愿现身说法，化导愚顽。倘不能生，则留此一篇，或使凶恶之徒，亦可消其悖逆之念。”可见人无智愚贤不肖，无不可感格之人。是以将曾静《归仁说》附于各供词之后，非以其称功颂德、谄谀而存之也。

【译文】 皇上偷旨：曾静违反天道，凶狠顽固，编造谣言扰乱人心，自古以来狡猾狂妄的人，没有像他如此狠毒的。这种性情奸诈不同一般的人，看来是无法教育令其改悔的。可是如今却幡然悔悟，认识了以前是被异端邪说所蛊惑，现在能极端痛恨过去，清清楚楚进行了招供，自称“过去是个禽兽，如今才脱胎成人”等话。由此可见天地非常广大，无所不包，也没有不可感化的东西。以前圣人说过：“诚信能够达到猪和鱼的身上。”如今曾静这个连猪鱼都不如的东西，也能悔罪自新到这种程度。他写了

一篇《归仁说》，并且奏告称：“如果能不死，甘愿现身说法，去教育开导那些同样思想愚昧顽固的人；如果按刑法被处死，那么留下这一篇文章，也许能使同样凶恶的人，消除他悖逆的念头。”由此可见，不论聪明、愚笨或贤明和不肖的人，没有不可以感化教育的。所以把曾静所作的《归仁说》附在各个供词的后边，这不是因为他在这篇文章中竭力称功颂德、阿谀奉承才保存下来的。

曾 静 著 述

归 仁 说

【原文】 圣人之出也非常，故其生也无常地，亦无常格。而其德业光辉之周于上下四方，心思运量之通于四海万世也。乃一皆超于前古，而并非数百年数千年之所尝有。昔人云：“非常者，常人之所异。”窃以为非独常人，即世俗所震聪明绝世，才智出群，竭其私智，足以压服众论；逞其著述，且可流及远境。而不足以知圣人之生，与对人之德业光辉，心思运量之迥出前古，则亦至愚之常人，不安分之常人而已矣。

盖天之生圣人也，其积气也极厚，故其备德也极盛。以宇宙而言，必天地中和，积之之久，蕴蓄至数百年，而始生一圣人。又数千年，而始生一大圣人，不常有也。以一家而言，祖宗功德积之之久，至数十年，又至数百年，而始生圣子圣孙，并为大圣之子，大圣之孙。此则又圣祖、圣宗分所宜有。而自下而仰观，亦世所不常有者也。譬之未耕种之土，生气郁积既久，而一加耕种，收必数倍，嘉谷岂择地而生，天地于嘉谷亦岂择地而使之生者，而迥异他夫植。麒麟、凤凰不必尽出中土，奇珍大贝何尝不产海滨。同在此天地之中，一大胚胎，或左或右，孰分疆界，安得歧而二之，然则中国之生圣人，固已气竭力倦，而循环以出于远地也，抑何疑哉。况道之在天下无穷尽，无方体。今日与明日不同，此地与彼地各别，本极活脱变易，不容人以成格定式执持

捉摸。

所贵乎读书知道者，因时制宜，随地取中，即其活变之妙，以竭吾权度裁制之精，取吾与古人之同处勘出异，复使吾所处之异者归乎同，而后与古人五经垂训之旨合，而后人穷经明理，以定义之大用，斯无穷矣。然而斯义也，昔日扣盘扪籥，以警语警；桃源醉乡，由妄踵妄。若不经风霆鼓动，大冶熔铸，亦无由转头开盲，拨云雾而观天瞻日。盖生人之大迷，而至今乃得大觉也，抑厚幸矣。

【译文】 圣人的出生往往是不寻常的，所以他的出生地也是没有固定的地方，也没有固定的标准的。但是他道德功勋的光辉却能照耀着上下四方，他的思想却影响到四海和万代。他的一切作为都超过古人，而且圣人并不是在数百年内或数千年内经常能出现的。过去有人说过：“不寻常的人，就是和普通人迥异的人。”我以为不仅是普通的人，即使某些聪明绝世，使世人震惊的人，他们才智出众，用他们的智慧，足以压倒一切舆论而使人感服；显示他们的著作，也能够流传到很远的后世。但这样的人也不能说是出现了圣人。能够与圣人的光辉德业相比，思想影响超过了古人。那么这种人也属于凡庸的普通人之列，只不过是个不安分的普通人罢了。

所以上天降下圣人到世上来，他积累的天地灵气是十分厚重的，所以他具备的德行也一定非常盛旺。拿宇宙来说，天地阴阳之气和谐，积累很久，蕴蓄至几百年，才能诞生出一个圣人。又经过几千年，才能诞生出一个大圣人，这是不常能够出现的。拿一个家族来说，必须是祖宗积下很多功德，经过许久，或几十年，又到几百年，才能产生圣人的子孙，并且还可能是大圣人的儿子，大圣人的孙子。这都圣明的祖宗应该得到的。从下边仰看这圣人的家族，也是世上所不常有的。这好比一片没有开垦过的荒地。它的生气积聚了很久，如果一旦开垦出来加以耕种，它的收获一定比种了很久的地多出数倍。茁壮的稻谷难道是只能选地

点生长吗？天地对于茁壮的稻谷亦岂能限制到所选择的那块地里生长，而和别的土地上所生的不同吗？麒麟、凤凰这些灵禽珍兽，不一定都产生在中原，奇珍和大贝岂不常产生在边远的海滨吗？万物同在一个天地中间，好比一个大的胚胎，或在左边或在右边，怎么能划分疆界，把它切成二半呢？这样，在中国出生圣人很多，已经到了气脉衰竭的地步，因而循环到边远的地方降生，这又有什么值得惊疑的呢？况且天下的事理是无穷无尽的，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今天和明天不一样，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又有区别。这本是十分灵活易变的道理，是不能让人用固定不变的模式去认识和套用的。

因此真正读书懂得事理的人，都是因时制宜，随地按照事物的特点办事，掌握住事物变化的规律，而顺应规律制订精当的策略行事。拿我们和古人相同的地方，而从中找出不同的差异，再拿我们所处的不同的情况，引导到相同的地方。然后使自己的认识和古人经书所讲的道理相合，这样才能真正弄明白经书中所讲的道理，达到能够运用经书中的定义，这样享受到的好处便无穷尽了。然而对待这种定义，不能片面理解，以前有个传说瞎子没见过太阳，仅仅听说太阳是圆形的，后来摸到一个盘子和竹筒，便以为是太阳了。瞎子把这认识又传给另一个瞎子。桃源、醉乡本是神话传说里的地方，以妄传妄，有人便以为是实有其地了。这种人如不让他亲身感受一下天空中风雷鼓动，不让他靠近巨大的炼铁炉体验一下铁水的热力，是没法解决瞎子的错误认识的。只有拨开他心中的迷雾，才能使他懂得太阳的高远、巨大和炎热。这好比一个人思想陷入迷途，至今才得以觉悟清醒，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大的幸运吗？

【原文】 恭惟我朝，当明末之乱，明位之移，由东土而来，扫除寇乱，抚临诸夏，一统无外。至德深仁，沦洽四海，鸿功骏烈，焜耀两仪。自有生民以为，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自夫世人智不足以知对人之生，与天地之生圣人，往往非常。误以东土为非

中华文明之会，并不知列祖相承之德，皆为圣人。于是妄引《春秋》之义，与孔子所许管仲之仁诸说，以比例自矢，甚有感于近世吕留良之逆说悖论，忘其当前衣被仁育之深恩，敢肆然讥诋诬谤，私形于论说文词者，亦或有之。其名欲正大义，而不知实反拂乎生人之大义；谓以明道，而不知竟大昧乎当然之常道。既昏迷错乱，枉误乎当身，复陷身悖逆，以取罪于当时，而贻讥于后世。此曾经身历者，不得不为天下之有志于学，而不知亦变易之道，徒为吕说所陷溺者，变色告之也。

夫天地间二气，五行之精英，由聚而散，日流日广，且变动不拘，循环无常。唐、虞、三代之世，中土本狭、五服之地，荆、楚、吴、越已算要荒蛮服，其余粤、闽、古滇、巴蜀，封疆所建，贡赋所通，尚未属于中国。然计世运之升降，必以治统为转移。而稽治统之转移，又必以道统为依归。唐、虞、三代之盛，承帝治者首推大舜，颂至德者终惟文王。孟子曰：“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西夷之人也。”是唐、虞、三代时之圣人，已有不尽生于中土者矣。自秦以及五季，千五百余年，二帝三王，周、孔之道，晦盲否塞，不明不行。至宋而天运始旋，其道虽仍不行于上，而实明于下。然开其统者，始于濂溪周子，集其成者盛于紫阳朱子。周子生于湖南永州，而迁于江西；朱子生于江南徽州，而学于福建。今考湖南乃楚地，而永州竟居两广之界，江南即吴江，而徽州实于东闽相接。江西则古三苗之地，福建原属八闽之区。由是观之，则知圣人之生，其不以地限也，昭昭矣。且《春秋》之摈吴楚为夷狄者，因时审地。按其事迹，与今日不惟如方圆体度之不相合，竟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盖风气之开，由渐而著，自有天地以来，文运到周为极盛，而文、武、周公，以世德笃生之圣，制作礼乐，又鉴古为极精。故一时明备灿然，声名文物之隆，不惟非后代汉、唐所能及，实非前代唐、虞所得并。所以圣人赞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译文】 敬想我们大清，当明末天下大乱的时候，明朝的皇位移动，我朝从东方来到，扫除了寇乱，平定了中华，统一了国家。用至高的道德和至深的仁义，博得了四海融洽和睦，轰轰烈烈的丰功伟绩，照耀着整个宇宙。自有人类以来，还没有过如此兴盛的时代。由于世人的智慧不能认识到天地之间孕育出圣人，往往不同一般。因此错误地认为东北边远的地方，不是中华民族文明汇集的地方，又不知道我朝列位先皇互相承袭积累了深厚的德行，均为一代圣人。于是便错误地引用《春秋》讲的道理，以及孔子称许管仲“尊王攘夷”的仁德等观点，并发誓要根据这种观点去做。便为近年吕留良所说的一些悖逆言论所迷惑，忘掉当前自己身受本朝仁德养育的深恩，竟敢任意诋诬诽谤，私自写成论说文词，也偶然有这种事情。其目的是想说明人生伦常大义，而不知道实际上反而违背了人类的伦常大义；本想说明天道的规律，而不知道实际上竟然完全弄错了天道运行的道理。既达到思想昏迷错乱，毁害了自己一生；又陷入叛逆的行列，触犯了当前的王法，给后世留下了笑柄。这是我所亲身经历的教训，不得不为天下有志于求学，又不懂得事物变化的道理，而被吕留良的邪说蛊惑的人，郑重地讲述这番道理。

天地间的阴阳二气，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精华，都是从聚到散，天天流动天天扩大，并且时时变动不受拘束，循环没有常规。上古唐尧、虞舜和三代的时候，中国已开化的本土还十分狭小，京师以外，五百里为一服，五服以外的地方，像荆、楚、吴、越这些地方，就已经算是荒蛮夷狄的地方了，其余如广东、福建、云南、四川等地，还没有在那建起地方政权，收缴贡赋，还没有属于中国。考察社会的发展，要以政权为变化依据；而考察政权的变化，又必须以思想道德的统一为根本，唐、虞、三代的兴盛，第一个继承帝位的是大舜，论道德仁义则推文王为最。孟子说过：“舜出生于诸冯（今山东菏泽东南），是东夷的人；文王出生于西岐（今陕西宝鸡东北），是西夷的人。”根据这个，早在上古唐、虞、三代时的圣人，已经有不完全是生在中原

的了。自秦朝到五代，一千五百多年，唐、虞二帝，夏、商、周三王，以及周公、孔子的主张，没受到重视和提倡，道理不明，影响不广。到了宋朝以后，天道才有了变化，上古圣人的传统，虽然还未受到帝王的重视，而实际上在百姓中已经明白了圣人的道理。而开始真正讲述圣贤道理的人，开始于周敦颐；进一步加以发展，集其大成而使之成为系统理论的，则是曾讲学于紫阳书院的朱熹。周敦颐出生于湖南永州（今零陵），后来迁居江西；朱熹出生于江南的徽州（今安徽歙县），而读书求学于福建。今天考证起来，湖南是古代的楚地，而徽州实际与东闽相接壤。江西是古代的三苗地方，福建原来属于八闽地区。由此可见，圣人的出生，并不受地区的限制，这就非常明白了。何况《春秋》把吴、楚排斥出中国，称之为夷狄地区，这是根据那时的状况来讲的。考察中国当时的状况，与今天的状况相比，不只像方形和圆形形状不一样，简直好像寒和暑、昼与夜一样，完全相反。社会风气的开通，总是从逐渐变化发展到盛行的。自从有天地以来，文运在周朝时达到极盛，而文武王、周公，由世德深厚而诞生出来的圣人，制定了反映文明进化的礼乐制度，非常尊重古代文化遗产。所以一时之间，各种礼仪制度都齐备明确，声名的影响和文化的发达，不仅后来的汉、唐无法达到，即使以前的唐、虞盛世，也是比不上的。所以孔圣人才称赞说：“文采兴盛，是周文王时代，我推崇周朝。”

【原文】 《春秋》之书，虽因平王迁以后，政教不行，王者之迹熄而作，然当时鲁、卫、齐、晋诸国，去文武之世未远，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蔼然是成周之旧。而吴、楚、山戎以侏儻不通诗书，不知礼义之习，逞其僭王猾夏之恶，冒于中华文明之治，此圣人所以深恶而摈斥之。其实圣人之心，即天心，因其当绝者而绝之，初未尝有意以吴、楚为处地，亦未尝立念以高置诸夏，而重内轻外也。使诸夏而不谨其常度，则其贬而抑之，也又甚于吴、楚矣。故先儒撮其旨曰：“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

国之；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是《春秋》之书，分华夷者，在礼义之有无，不在地之远近。心实至公至平，原视乎人之自处何如耳。

况今日则更有事不同，而大相反者，何也？古来治统道统之合一，而从天定者，自暴秦变乱以后，虽历汉、唐、宋之盛，犹不免架阁漏空，无当于对人之万一。明末之世，尤君怠臣侈，百度废弛。内则宦官专权，把持国政；则藩封放恣，暴殄天物。官吏贪污，横征暴敛，所在皆然。荒淫骄奢，世家大族，习为高致。加以文德尽废，远人不服，各处蒙古外藩，皆为劲敌，边警时闻，应接不暇，元气尽丧。即极之前后五代之衰，亦不过是。座之流贼四起，惨杀屠掠，毒逾汤火。凡贼所经过府郡州县，以及市井村落，类皆片瓦不保，目惨心伤，自有生以来，其离乱未有如是之甚者也。论者不思此境，妄引三代、春秋之盛以此例，何其悖谬甚乎？

况本朝太祖创业东海，以德行仁本，无取明天下之心。至太宗皇帝，政举教修，仁声仁闻，四讫海内。当是时，曾勒兵入关，徇地直至山东临清，周视京城，纵猎南苑，以期为明解仇释怨，熄兵安民。而明之君臣，竟置之不问，由是振旅东归，明不能以一矢加遗。当时若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取明直如反掌之易，又何待贼陷京城，愍帝身殉国难，明祚已绝，明位已移，请除寇乱而后兴卿命将乎？即此一举，较之武王大会孟津，观政于商，以冀纣恶之俊悔，心事更光明正大，表里无憾。况入关一战而胜李自成二十万之众，如摧枯拉朽，望风逃窜，席卷长驱，廓清海宇，救亿万生灵于水火之中。当时天下之众之依我朝也。如出深渊，如睹父母。由是世祖章皇帝发政施仁，抚临天下。而天下之感戴者，不惟明之君臣雪耻复仇，衔结莫报；且大者为我亿万生灵拔死育生，大德深恩，直与天地同流。

【译文】 《春秋》一书，虽然是因周平王东迁以后，政治教化难以推行，对过去王室的威望消失而感慨所作。但是当时的鲁、

卫、齐、晋等国，离文王、武王的时代还不远，所以他们仍然遗留着过去的习惯，其风俗和好的政策，差不多还是成周时候的老样子。而吴、楚、山戎等地，因为边远方言不同，而不懂诗书，不知道学习礼仪，仗着他们自立为王的身份而与中国内地各诸侯并列，冒充中华文明礼仪之邦，这是圣人所深为讨厌进而排斥他们的原因。其实，圣人的心就是天心的表现，看他应该排斥的就排斥，起初并没有产生把吴、楚当成外地的意思，也没有把中原文化发达的诸侯抬高一等的想法，重视内地而轻视边远地方。假如中原各诸侯国不谨慎遵守传统礼义，那么对他们的贬低和指责，也会比排斥吴、楚更严重。所以过去的儒家归纳出这种观点的主旨说：“夷狄地方的人如果能实行中华的文明礼仪，就应当看成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地处中原的诸侯国，不实行仁义和边远地方一样，就应该把他们看成未开化的夷狄。”所以《春秋》这部书，把中国划分为华夏和夷狄二大部分，是根据其有没有文明礼仪，而不是依据他的地方远近。这种看法实在是非常公正的，关键是看你本身的实际言行是什么。

况且今天中国境内的形势和春秋时代不同了，而且又恰恰相反，为什么呢？上古时候政权的传统和道德的传统是一致的，是顺从天道运行的规律。自秦始皇变乱以后，虽然经历了汉、唐、宋这些朝代，也曾兴盛一时，但仍不免在制度上存在很多漏洞，比不上圣人时代的万分之一。明朝末期时，尤其表现出君主懒惰，臣子奢侈，各种制度废弛。在内来说，则是宦官专权，把持国政；在外来言，则是藩王放恣胡为，暴殄天物。官吏们纷纷贪污，横征暴敛，到处都是一样；荒淫骄奢在世家大族中，已成习惯达到极点。再加上文明道德的荒废，边远地方的人民便不服从了。以前的藩属相继都变成了强敌，边境的警报不断传来，应接不暇，国家元气丧失殆尽。即使和以前五代王朝覆灭时的情况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终于导致流寇四起，到处惨杀掠抢，狠毒胜过沸汤烈火。凡是流寇经过的府郡州县，以及集镇乡村，差不多都是片瓦不存，眼看已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自从有

人类以来，所受离乱之苦，没有比这时更甚的了。议论的人却不想想这种情况，只是错误地引用三代和春秋盛世的情况来相比，为什么会这样荒谬无理呢？

况且本朝太祖，创业于东海，以道德仁义之心作为根本，而并没有夺取明朝天下的想法。到太宗皇帝即位后，政治、教化都走上正规，仁德的名声，传播于四海。这时候，太宗曾经领兵进入关内，巡视地方直到山东临清，并且在明朝京师周围巡视一圈，还在南苑打猎，希望能和明朝化解怨恨，罢兵安民。然而明朝的君臣，对此事竟然不闻不问，于是太宗只好率兵回转东北，那时明朝已弱到不能放出一箭的地步。当时如果存有一毫夺取天下的心思，夺取明朝的江山易如反掌，又何必等流寇攻陷京师，崇祯皇帝以身殉国，明朝国祚已绝，明朝皇位已换主，应请求去除流寇的动乱，才兴兵点将入关吗？就拿这个例子来说，比较起周武王大会诸侯于孟津，率兵观政于商朝，希望用压迫使纣王悔罪恶的做法，心事更加光明正大，表里没有一点可指责的地方。况且入关后，只一仗便击败了李自成二十万兵马，如同摧枯拉朽一样，使他望风逃窜，我军席卷长驱，扫清了海内，拯救亿万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普天下百姓依赖我朝，如像跳出深渊，见到父母一样。因此，世祖章皇帝才决定建立政权广施仁爱，而登上统一中国的皇帝之位。普天下感恩戴德的，不仅是明朝的君臣因我朝为他们雪耻复仇，感到结草衔环也无法报答；而更大的的是为我国亿万生灵救死育生，其大德深思，直可说是天高地厚一样了。

【原文】 由此观之，在昔汤、武为夏、商诸侯，虽以仁兴，而君臣一伦犹不能脱然无憾。所以当时成汤不免有惭德，武庚不免以殷叛。岂若我朝之有天下也，得于流贼李自成之手，视商、周之得统更名正而言顺。明臣、汉人，当时皆乐为效力致死乎。是春秋之吴楚以夷狄之心，肆夷锹之行，蔑视诸夏礼乐文明之治，而来僭乱之。我朝以仁义之心，行仁义之政，不忍中国之生灵涂

炭，而来抚绥之。一是为乱于至治之世，一是敷治于极乱之时，所谓不惟如方圆体度之不相合，竟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者此也。使圣人而在今日，其作《春秋》也所以大褒予于我朝者，当如何深切著明可知矣。

盖圣人与天合德，天大无外，圣人之心亦无外，稍有一毫有外之心，即不能合天心，又何又为圣人。所以圣人判事，至虚至平，胸无一毫成见定义。原视天视民以定义。而天之于民，实无常亲，惟德是亲。今我朝不折一矢，不伤一众，不待年而成帝业，到今幅员之广，与天同大，享年之永，与天同久。承承继继，笃生圣人，愈远愈大，弥久弥光，四海升平，万国咸宁，此岂人力所能与？乃民之食德者厚，以至皇天亡眷顾者深，所以至是。圣人又何事违天拂民，而有彼此之间哉！故谓《春秋》大旨在谨华夷之辩则可。若概引《春秋》之例，以抵当我朝之盛，则罔诬圣人作经之旨，为大不可。谓圣人许管仲之仁，其功在于拨吴、楚则可，若妄以吴、楚例今日，则是非颠倒，害道害义，为大不可。是《春秋》不惟无碍于我朝，而我朝竟深有契于圣人之心，大有光于《春秋》之义旨也。审矣。

【译文】 从这来看，过去汤王、武王是夏、商两朝的诸侯，虽然靠着仁德建立了国家，但是不能摆脱以臣子夺去君主王位这一事实，因而有违伦常而感到遗憾。所以成汤不免有惭于德行，武庚不免因是殷纣王的儿子而叛乱周朝。这怎能像我朝得天下于流寇李自成之手，用商、周来相比，我朝得天下更名正言顺，所以明朝的臣子和汉族人，都乐意为我朝尽力效死。至于春秋时代的吴、楚两国，是怀着夷狄之心，逞着夷狄的不讲道德行为，蔑视中原礼乐文明的统治，僭号称王，兴兵扰乱中原；而我朝则以仁义的心胸，实行仁义的政治，不忍中国百姓生灵涂炭，才来救援抚育他们的。吴、楚是作乱于太平盛世，我朝则是为了创造太平于天下大乱之时。这两种不同情况，不仅像方和圆一样体形完全不同，而竟然和寒与暑、昼与夜恰好相反一样。假使孔圣人活在

今天，他所作的《春秋》，一定会大大地表彰我朝，应当如何来深切说明，看看以上对比便很清楚了。

因为圣人的心和上天的道德是一致的，上天是公正得没有一丁点私心偏见的，圣人的心也是没有一丁点私心偏见的，稍有一点私心偏见，便不能合乎天心，怎么能算得上圣人呢？所以圣人对事物的看法，是非常虚心和公平的，心中不存在一丁点成见定义，是根据天意民情而才能答出定义。而上天对于人民，也不是永远亲爱一个地方，只依据德行来相亲。今我朝不用一弓一箭，不伤一个人，不到一年时间便建成帝业；到现在国家疆域之广，与天同大；享受皇位之长，与天同久。一代代继承，连续出现圣人，传得愈远愈伟大，愈久愈加光辉，四海升平，万国安宁，这现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这是我国百姓受到恩德特厚，以至上天眷顾爱护得也就特别深，所以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地步。又有什么事可以上悖天意下违民情，而硬要划分彼此呀！所以说《春秋》的主旨，在于谨慎辨别华夷的区别则可以；如果一概引用《春秋》中的例子，用来诋毁我朝的盛世，那实在是诬蔑了圣人作经书的原意，是大不可的事。如果说圣人赞许管仲的仁德，因为他的功劳在于排斥吴、楚则还说得过去；如果错误地把吴、楚来与今天相比，则是非就完全颠倒，伤害了道义，则是大不可的事。因此，《春秋》不但对我朝没有什么妨碍，而且我朝的立国竟然深符于圣人的心，并发扬光大了《春秋》的主旨，这是可以肯定的。

【原文】 盖我朝自太祖高皇帝神武盖世，开创帝基；太宗文皇帝弘继体之业，统一诸国；世祖章皇帝建极绥猷，抚临中外；圣祖仁皇帝圣德神功，遍及薄海内外，久道化成，沦肌浃髓，更为超越前古，业隆万世。可见皇天笃爱之至，非三代以下所及，即极之虞、夏、商、周，天运初开，太和极隆之会，亦罕有此圣圣相承，绵绵无间之盛。况我当今皇帝，尤圣神文武，时中变化，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恢弘前烈，更有光于圣

祖仁皇帝者哉。故其治效化功之显烁于两间者，已极礼明乐备之盛，而其验实亦已至于海晏而河清，特以治德渊微，圣学深，山陬海澨之间，间有不能与闻其大者，实因初潜藩邸，韬尧养晦，无求无欲，研经味道，以尽己性分之固有，职分之当，为未尝稍露一声光于人间，所以龙德中正，不惟非天下所得知，并非在廷诸臣所能识。惟我圣祖仁皇帝，聪明天纵，本父子之亲，以圣知圣，早知人品贵重，蕴蓄美富，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然亦以是存亡于心，而不肯扬之于众。直至圣躬不豫而大渐，委以南郊大礼，从方知我皇上至德天全，圣学性安，久为圣祖皇帝所深契。而于此尤可以见圣祖皇帝之揆道精义，传子即以传贤，并二帝，兼三王，而适于中者，迈百王而首出矣。

所以当我皇上御极之初，一切政治，天下皆莫能仰测高厚之所由出。加以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奸谋，散布流言于外，以致盛德至善，不能骤得遍闻于穷乡远鄙者，斯亦事理之所必有。岂知我皇上渊衷至仁，天性至孝，发虑至诚，修己至敬；而造德之纯熟，学问之渊深，历练之缜密，处事之精详，则又一理浑然，泛应由当。举凡之于政刑，见之于德礼者，既无一处不知之极其精，复无一事不处之极其当。神明尽智，化裁尽变，推行尽通，深仁大德，际天蟠地。究其归，皆因物付物，初未尝稍存一毫成见于未事之先。是以身虽至劳至苦，无一时一刻不以爱养天下苍生为事。凡可以利济斯民者。思无不到，到无不行，行无不实。自朝至暮，一日万机，目不停视，手不停批，不遑宁处，而心实至安至逸。常如明鉴、如止水，万物之过其前者，妍媸自然必露，而不容掩。今试于荡荡难名中，而以管窥及者略举其万一。

如明王奉若天道，大义本于天经，自二帝三王唱和而后，后世主人主皆以国家行政出治，生杀予夺，权由己制，竟不知大君之上，更有天焉，不可违也。

【译文】 我朝自打太祖高皇帝凭神圣的武功，开创了基业；太

宗文皇帝继续发扬光大，统一了中国全境；世祖章皇帝建立治国大政，安定了中外；祖仁皇帝的仁德、武功，遍及全国内外，普施仁德教化百姓，恩惠深厚深入肌髓，更是超过上古前朝，帝业的兴隆光耀万世。由此可见上天对我朝厚爱已极，是三代以下各朝难以比得上的，即使追溯到虞、夏、商、周，秉承天运建立的最早的几个朝代，帝业极隆的太平盛世，也极少有我朝这样连续出现英明圣主继承帝业、绵绵不绝的盛况。更何况我朝当今皇上，尤其圣神文武，这时的变化，与天地化育一切相比也不为过；恩德泽及万物而无一遗漏，弘扬先皇的政教，使得圣祖仁皇帝的未竟事业更加光辉。所以他治理国家教化百姓的功勋显耀于二者之间，已经达到了礼乐文明极盛的顶点，而其治理的效验也由海清河晏得到了证明。至于当今皇上治理国家的才德更是深厚精妙，学识更是渊博高深。而远居山角海滨的人，也许有不知道皇上功绩之大者，这是因为皇上在还是藩王的时候，才能深藏而不愿显露，既不求名声也没有什么欲望，终日研读经书修养道德，以求尽力符合自己的个性和藩王的身分，从未曾想显露自己于世间。所以圣人的道德十分纯正，不仅不是天下百姓所能晓知的，就是朝廷内的各位大臣也很难知道。只有圣祖仁皇帝，因上天赋予他聪明，又与当今皇上是父子关系，所以能以圣人的眼光认识圣人，早就知道当今皇上人品贵重，胸中蕴藏着雄才大略，能够凭其聪明睿智做一个英明的君主，但是就也只是默记于心而不肯传扬出去。直到圣祖健康不佳处于病危之际，才委托当今皇上代为主持南郊祭天大典，于是众大臣才知当今皇上仁德天授，学识性情稳重，已经久为圣祖所深深注意了。由此可见圣祖皇帝处理大事的深刻意义，传位于儿子就要传给贤明的人，其英明见识可以说兼有尧、舜二帝，夏、商、周三王的美德于一身，而超过了后世的百王。

所以当今皇上自登基之始，实行的一切政治，天下人都很难懂得这些英明高深的做法是从哪里来的，加上阿其那和塞思黑等人，久已心怀夺位的奸谋，所以在外面散布流言诽谤，以至当今

皇上的盛德和善政，不能很快地传布于国内远僻山乡，这也是事理的必然。如何能知道我们皇上宽厚的心胸非常仁德，天生的性格极为孝顺，考虑问题本着诚心，修养自身要求严格慎重；而对道德运用的纯熟，学问的渊深广博，遇事思考的缜密，处理问题的精详，则又是浑然一体，各方面都应付得十分妥贴。比如施行政策和刑律，都用道德礼义去观察，既没有一个地方知道得不够精详，又没有一件事处理得不是极其妥当；智慧英明到极点，教化百姓使他们道德一新，推行的善政通行全国；其深仁大德，真是顶天立地呀。追究其功绩的根源，在于根据不同的事物予以不同的办法解决，于处理事情之前并没有存在一点成见。所以皇上虽然至劳至苦，也没有一时一刻不以爱护养育天下百姓为目的。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他没有不想到的，想到的没有不实行的，实行的没有不扎扎实实达到目的的。从早到晚，日理万机，目不停看，手不停批，没有一刻闲暇安宁，而内心实际上才最安定最放心。经常心如同明镜一样亮，如静止的水一样安定，万物从眼前经过的，美和丑都会自然显露，而没有一点掩盖。现在试于浩荡无数难以一一说清的圣绩中，将看到一斑略举其万分之一的事例。

比如英明的帝王都尊奉天道规律，道义是上天所树立的，自从上古二帝三王相继遵守以后，后来的帝王都是利用国家政权来治理，生杀大权自己说了算，一切权力都归于自己，竟然不知道在君王头上，还有上天，天意是不能违背的。

【原文】 我皇上念念从民设想，处处体天定趋。凡天所好者，体天之心好之；天所恶者，体天之心恶之；天所欲行欲止者，体天之心行之止之。由是体天之心以养民，知食为民天，农乃食本，务使各务本为，尽力南亩，不得贪利而废农功之大，不得逐末而忘稼穡之艰。每岁躬耕藉田，以重农事。而老农之勤朴无过者，令各州县岁举一人，荣给品秩，以示鼓励。而先啬神农，亦开千古未开之典，设坛崇祀，以报其功。偶间一处旱涝，即悯念

忧形，减膳之下，殫精竭诚，为民祈祷，专务修少人事，以格无心。座至祷雨雨通，祈晴晴应。犹不以此为足蠲减赋之典，无年不颁；赈灾救患之泽，无地不遍。甚者如江南、江西、浙江，正供六十余万两，皆沛恩永免，深仁厚泽，与天罔极不朽。采运积贮，禁屠崇俭，以预防其不足。与夫疏浚河流，开导积淤，相地开垦，以奠民居。通民行而济民食者，可谓无处不到，无法不备。推其极抚久绥尽六合之广，虽穷幽极僻之区，亦不至一夫失所，如西陲安插之众，不惜厚赐，使之衣食有赖。云贵等省，边塞土民，素受土司之害者，禁其鱼肉，革其科派，老有沿乡给发之养，孤贫有动用钱粮，务令得沾实惠之谕。存恤悯念，痼痼惻怛，恩膏直下及于行人气人之微贱，以期尽天子惠元元，包涵并育，大小高低遐迩，一体之本，量而后快也。

体天之心以爱民，则察吏不得不极其明，惩贪不得不用其法。谓贪赃犯法之官，蠹国殃民，罪大恶极，即立置重典，亦不足以蔽其辜。但不教而杀，有所不忍，故曲宥其死，偶行抄没其家资，以备公事赏赉之用，盖所以昭国法而惩贪污，并使后来居官者，知婪赃之物不能入己，无益有害，自不肯复蹈故辙，以罹法耳。更或即其所有之资，填补亏空之数，其得豁免其罪，此皆以罚恶之内，隐寓宽仁之意，原非过刻也。至于人之心术，隐微之中，疑似之间，最为难测。睿照则辨析精微，而公中有私，私中有公，尤如丝过扣，毫发清楚。然犹不以此自用，必广行采访，以收好问好察之益，以为执两用中之资，抑兼欲得人擢用，为生民思久安长治之计，故一切政令所敷，治益求治，安愈图安，务求适中得当，立千百年不坏之良谟，以期移风易俗，潜移默化，使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爱民者，又何无己也。

【译文】 我们皇上一心为百姓设想，处处体会天意而后才决定行动办法。凡是上天所爱好的，就体会天意而同样去爱好；上天所讨厌的，就体会天意而同样去讨厌；上天所打算实行或制止的，就体会天意去实行或制止。由此进而体会天意在于抚养百

姓，知道“民以食为天”这个古训，而农业就是吃饭的根本，所以力求农民能各就本业，尽力耕种田地，决不允许贪图小利而荒废农业生产这件大事，不允许追求小事而忘记耕种的艰难。每年皇上都要亲自到御田里去耕作，以提醒百姓要重视农事。而对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考察他们勤劳朴实没有过错的，让各州、县每年向朝廷推荐一个人，授予他相当官员的品级，以示鼓励。对于从事农业的始祖神农氏，也开创千古没有过的盛典，设立了“先农坛”加以隆重的祭祀，以报答神农氏的功劳。偶然听说某地发生旱涝，就怜悯挂念，忧愁形于颜色，除了削减御膳食物外，又尽精竭诚地为百姓祈祷上天，反省所办的各种事情中有没有过错，并加以改正，希望感动上天。最后终于达到求雨雨降，求晴晴至，还仍然不以此为满足，减免赋税的恩典，没有一年不颁发的，赈济灾民的恩德，也没有一个地方不到的。特别是像江南、江西、浙江等省，按规定每年田赋银六十余万两，都获得皇恩永远免除，这种深仁厚德，真和上天一样永远不朽。采运粮食积储于国家粮仓，禁止屠宰牲畜崇尚俭朴，以防止百姓粮食不足。以及疏浚河道，开导淤塞，根据各地情况鼓励百姓开垦荒地，以打下百姓生活基础。便利百姓交通和接济百姓粮食的事，可以说是无处不到，各种办法没有没用过的。推算一下恩德所到的地方已经遍及全国，即使是极穷困和极偏僻的地方，也不让一个人流离失所。比如在西部边疆为安顿百姓生活，不吝惜巨大的费用，而使他们衣食有赖。云南、贵州等省边境的少数民族，长期受到土司的压迫，于是就下谕旨禁止土司鱼肉百姓，免除了各种不合理的摊派，老年百姓由其乡村发给生活费用，孤贫的百姓可用专款救济，一定要让百姓受到实惠。心里所存的怜悯念头，病痛忧伤，恩泽惠及路上的乞丐等微贱的人，以赤将天子的恩惠遍施于平民，所有的人都应受到抚爱养育，不论大小高低远近，都是国家的一个根本分子，都能受到恩泽而后才会感到快乐。

要想体会天意而爱护百姓，则考察官吏就不能不严明，惩办贪官就不能不动用法律。贪赃犯法的官员，祸国殃民，罪大恶

极，就算立即把他们处以重刑，也不足以抵偿他们的罪行。但是不加教育而杀掉，心中实有所不忍，所以婉转宽恕他们的死罪，偶尔有抄没他们的家财，以备公事奖赏的费用。所以要这样申明国法来惩治贪污，并使后来做官的人，知道贪赃得来的东西不能归己，是无益而有害的，自然不敢再走翻过车的老路，而自陷法网。此外还要把他所有的资产，来填补亏空公款的数额，然后才免去他的罪，这都是在惩罚罪恶之中，暗隐有宽大仁德的意思，并不是对他们过分苛刻的。至于人的心术，在隐暗之中，真假是非，最难看得出来，皇上以聪明睿智的目光明辨精微，而在公中有私，私中有公的情况下，看得如同丝线穿过扣眼，毫发都能看清楚。但是仍不以此自信，必要广泛进行调查，以取得更清楚地考察之益，作为因地制宜，不偏不倚地处理政事的参考；同时也打算借此发现和提拔有才干的官吏来使用，为百姓设想长治久安的方法。所以一切政令的施設，在治中更求治，安中更求安，务必求得合理适中，树立起千百年不坏的良好楷模，以求达到移风易俗，潜移默化，使百姓一天比一天善良。而不知道皇上这样爱护百姓，可是没有一点想到自己啊。

【原文】 体天之心以钦恤民命，谓明刑原以弼教君德，期于好生，法虽一定，心本宽仁。《书》云：“宥过无大，刑故无小。”所以斟酌权衡，广好生之德也，有不得已用刑者，不过欲国法申行，刑期无刑耳。故每有改定条例，必期三令五申，惟恐小民无知陷罪，不教而杀。时深恻隐之念，承审官司，滥刑有夹讯之戒；秋审应决，具奏有三复之谕。稍有一线可生，因事原情，宁过乎仁，毋过乎义。不惜反复批阅，至再至三，每年沛岁多格外生全之恩。其实皆准乎天理之至公，即乎人情之至安，宽而得中，非废法也，然亦间有应严者，则又用严，以顺适夫至正至平之则。如阿其那、塞思黑蓄奸树党，贪图不轨，已经圣祖皇帝贬而绝之，乃不知仰体君父之心，痛自改悔，竟怙终不悛，按其罪过实同周之管蔡。我皇上本大公无我之心，揆道执中，以事关国

社生民之重，不惜数其罪，以大义灭之。此亦如四凶之在尧世，必有可容者，而后尧容之；其在舜世，必有不可留者，而后舜去之。尧舜何容心哉？皆因其人之自取何如耳。故皇上今日之义，即圣祖皇帝当年之仁，皇上今日之仁即圣皇帝当年之义，道无二致，同归一中，因时制宜便得其平而已。天语煌煌，反复剖析此理，已到至处尽处，而心事亦直与日月并明于千古矣。盖虚明应物之天，本无一毫成见已意稍杂于其中，所以用宽用严，无往而非道之至当，不易有如此也。

体天之心以为民，取士则于三年科举之外，有举贤良方正之恩诏，有令各省州县延访孝友端方，才可办事，而文亦可观者，每岁各举一人之谕。有选拔贡生，不拘考试名次，务取经明行修者之谕。有令满汉、内外、文武诸臣，将有猷有为有守者，各举一人之谕。有令中外诸臣，在京主事以上，在外知县以上，各举所知，或举贡生员，或山林隐逸，送部引见之谕。而于各省州县，文明极盛之学，又有升改增额，录取之谕。乡试中式各数，亦随着加增。广求博访，惟日孜孜，冀获贤才以为莅政临民之选。而犹忧人才难得，务在矜全器使，幽隐必录，所以于湖南等省，又特降分闈之旨，悯念士子之贫寒有志者。嗣后不为远险所隔，皆得以遂其观光之愿焉。

体天之心以为民，尊师重道，则至圣先师追封一代。敬圣人如君亲，易讳为“邱”，重临雍之大典，改“幸”为“诣”，而诞降之期，斋戒禁屠，著为定例。且旌有节义，崇建祠守，奖劝善行，虚公核实，军民一体，直及于匹夫匹妇之贫且贱焉，风声之树更远也。

体天之心以为民，优礼大臣，则赐坐赐茶；体恤群臣，有赏有赉。上下虽分，君臣一体，极至饮食之轻微，情至亦所必赐；器用、服物之小者，虽远亦所常颁。君臣之际，相期以诚，臣下隐微，无不洞烛，训诫开导。隆恩同于天地之钧陶万物，胜于父母之教育婴孺。至中至正，总以吏治戎政，物情民隐，各得其所为念。

体天之心以为民，存亡修废，则合天下为一家，视异代而无外，大廓成例，封明祖之后以侯爵。考古仁恕之君，隆名之主，从未有如此之洪施公普者也。

【译文】 要体会天意而爱惜百姓的生命，认为严明刑法原因是辅助君王道德教化的一种方法，立足于好生，法律虽然有明文规定，执法则应从存心宽仁出发。《书经》上说：“宽恕没有大的，刑罚没有小的。”所以要慎重考虑，以求能推广上天好生之德，有不得已而必须用刑的，不过是打算申明国法，处以刑罚是期望减少直至消灭犯法和刑罚罢了。所以每逢有改定刑法条律，必定要进行三令五申，惟恐百姓不知法令而陷入犯罪，成了不教而杀。时常对百姓深怀恻隐之心，为了防止滥刑，有严禁拷打逼供的规定；每年秋天审判死刑案件，有必须经过三次复审的圣谕。稍有一线生机的，因事论事寻找可原谅的情节，宁肯过分宽仁，也不可有一毫失去道义。不惜反复批阅公文，达到两三遍，每当遇到丰年时，往往都要格外加恩减少死刑。其实都是以天理至公为标准，也就是合理人情而至安，宽大而又适中，这不等于不要法律；但是其中也间杂有应该从严的，那么就要从严，以顺乎至正至平的原则。比如像阿其那、塞思黑私蓄奸党，企图不轨，已经由圣祖皇帝贬去王爵废为庶人，可是他们不知道仰望君父的苦心，痛改前非，竟然坚持作恶死不悔改，他们的罪行实际上与周朝的管叔、蔡叔相同。皇上本着大公无私的心情，根据道理公平执法，认为这叛逆大事有关国家和百姓是极为重要的，不惜责数他们的罪行，而大义灭亲。这也同于“四凶”在唐尧的时代，有可以容留的原因，所以尧才容忍他们活着；到了虞舜的时候，一定有了不能容许再留下的理由，所以舜才把他们杀掉。尧舜能有什么存心呢？都是四凶他们咎由自取的。所以皇上今天实行的大义，也就是圣祖皇帝当年实行的仁德，真理是没有二样的，只能同归于一个公正，不同的是因时制宜，处理要合乎当时的公平罢了。皇上金口玉言光辉万丈，已经反复剖析了这个道理，可以说

透彻已到了尽处，而皇上的心迹，也同日月一样明亮于千古了。上天的心怀是随着事物变化而产生，原本没有一丝一毫成见和私意掺杂在其中，所以用刑的宽与严，自古以来，非道德至当至公，是很难做到这样程度的。

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录取士人则除了每隔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外，还有要求各州县每年要荐举“贤良方正”的特恩诏书，还有下令各州县访求孝顺父母、品行端正、才能胜任做官、文章也有一定水平的人，每年各推荐一人给朝廷的谕旨。还有选拔贡生，不拘他在考试中名次的高低，务必要选拔通解经书、修养端正的人的谕旨。还有让满汉、内外、文武各种官员，把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的读书人，各自推荐一名的谕旨。有命令朝廷内外各官员，在京的主事以上，在外的知县以上，各自推荐所知道的人才，或是举人、贡生、秀才，或山林隐逸，保送到礼部，安排由皇帝接见后量才录用的谕旨。而对于各省、州、县，文风极盛的学校，有晋升级别和增加秀才名额，扩大录取的谕旨。各省乡试录取举人的名额，也随着增加。广泛地搜求人才，每天孜孜不倦，希望获得贤才以为做官治民的后备。却仍然时常担忧人才难得，务必爱惜保全人才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即使是偏僻地方，也要做到有才必录。所以对湖南等省，又特别降旨，采用分区乡试的办法，照顾那些贫穷而有志气的读书秀才，不必爬山越险集中省城，就能就近参加举人考试了。

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就认真尊重师道，对至圣先师孔子，追封其五代祖先为王爵。敬奉圣人如同先皇和亲人一样，下谕让百姓遇到孔圣人的名讳，都要改写成“邱”字以示敬避；重视皇帝拜祭文庙的典礼，把皇帝巡幸文庙的“幸”字，改为“诣”字，以表示对孔圣人的尊敬；并在孔圣人诞辰之日，都要进行戒斋沐浴，而且禁止百姓屠宰牲畜，用制度固定下来。并且大力旌表节烈孝义的人，建立祠堂和牌坊，以奖励善行，秉着一心为公的精神核实事迹，不论军民，都一视同仁，连极为贫贱的男女百姓也不例外，良好风气的树立是非常广泛的。

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对大臣能优礼相待，接见他们时赐茶对他们待如宾客；关心爱护群臣，对他们常有赏赐和馈送。地位虽有上下之分，君臣的关系却亲如一体。小到饮食这种微小东西，感情到时也必然要赏赐给臣下；器用、衣服等小物件，虽然臣下远在边疆，也要常常颁赐。君臣的关系，相待在于一个诚字，臣下的隐微私事，皇上没有不洞若观火，加以训诫开导的。隆厚的恩德同于天地的薰陶万物，胜过父母的教育婴儿。处理事情非常中肯而正确，总是把吏治、军政和社会状况、民间真情等，都处理妥贴记挂在心上。

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对国家的存亡兴废，则看成天下一家，对覆亡的朝代不存在一丝见外，扩大修改历朝的成例，册封明代皇帝的后代为侯爵。考查古时著名的仁恕的君主和声望极隆的帝王，也没有过这种宽洪而公正的做法的。

【原文】 体天之心以为民，励精图治，则天德之刚，纯乎一敬，乾乾终日。法天行健，无时不极其精，无处不尽其详，广览博访，随机应变，无一不中节合宜，神聚到至处，心细到极处，即至群臣奏章，偶有一义未安，一字错落，几经廷臣历阅不到者，一经睿照，必为摘出。反复诰诫，不以为倦。自朝至暮，凝坐殿室，扩然大公，物来顺应，非帝尧之钦明，大舜之恭己。殆未易臻此笃恭之境矣。

体天之心以为民，垂训立教，则皇极之敷言，尤长江大河，浑浑灏灏，盘折自如，愈析愈精，实无一不行所无事，与天理之大中至正者相准。诚以宸衷虚明广大，昭融洞彻，海涵天覆，内外无间，浑乎天理之公，无一毫人欲之私，故发于文辞，理实气足，巍然经天纬地之作，与《二典》、《三谟》并垂不朽。自古圣明之君见之典谟，载之史册，所传诏诰，其精思神力，未有在纵之深厚目极如是也。极而至于体天之心，为民之深，直至作述之间，心融神契，道统、治统、心法、圣学，一气相承。诚以圣祖皇帝德合乾坤，功弘位育，开生民未开之大业，深仁厚泽，迈百

王而独隆，为皇天笃爱之肖子。是圣祖皇帝之心即人心，圣祖皇帝之德即天德，故一切政治，祖述宪章，多以圣祖皇帝为准。然亦只学其道，而不拘泥其法，其中有时地异宜，损益殊方，所当更定者，则又未尝不推对祖之心，以承天之心，为民而更定之。其实继志述事，适与圣祖无违也。所以大孝纯笃，无处不到。当圣祖皇帝宾天，哀号恸慕，尽礼尽制，历三年如一日；继以孝恭仁皇后升遐，兼服不懈，悲思历久弥深。当斋居永慕之中，孝思所及，孝治所颁，徽号之议，协万世之人心；配天之典冠，百王之隆会。晨昏瞻拜，朔望祭享，望山陵而致敬，瞻庙寝以告虔。无一时不思哀思敬，无一事不尽制尽心。此虽一时怪于至情，由于至性，为所当为，不知其然而然。本无意于民，不求鉴于天，然天人一理，家园相通，此感而彼自应，上行而下自效，实无往而非继大立极，为民作则之大者。岂但区区致我仁孝诚敬之至于圣祖而已哉。

【译文】 体会天意而为老百姓着想，励精图治，皇上仁德的核心在于敬慎做事的一个“敬”字，终日兢兢业业，警惕自身。顺应天道而自强不息，没有什么时候不用尽精力，也没有一件事不考虑详尽，广览博采，随机应变，更没有一件事不处理得适中合宜。精力集中到一处，心思细致到极点，即便是群臣的奏章，偶然有一点意思不妥，一个字用得欠当，几次经过朝内大臣审阅都没有发现的，一经皇上阅看，一定会给指出来。并且反复告诫臣子，从不觉得疲倦。从早到晚，一动不动地坐在殿内，心中想的全是国家公事，而且每件事都会很快批复解决。假如没有帝尧那样的聪明睿智，大舜那样的严格要求自身，是很难达到这样敬慎认真的地步。

体会天意而为老百姓着想，对臣民百姓教育示范，皇上所说的话，就好像长江大河，浩浩荡荡，曲折自然，愈分析愈精辟，实在是没有一件事没有说到，那些指示都恰如其分，没有不和天道相符合的。这实在是由于皇上胸中心怀广大，明察一切，度量

宽宏如同大海苍天包容一切，对内外一视同仁，统一在天理之下，没有一丝一毫私心杂念，所以思想发挥到文辞当中，就理实气足，文笔磅礴雄伟。真是经天纬地的杰作，直可与《尚书》里的“二典”、“三谟”一样共垂不朽了。自古圣明的君王的著作见于经典，载入史册的，所流传下来语书和圣旨，它的精深思想和神圣的气魄，没有一个比得上我皇上的，上天赋予其圣智英明已经达到了极点。因为达到了这极点，而在体会天意，为百姓着想，也达到极深地步，反映到著述中间，就能心神融合，下笔如神，道德、政治、修养和孔孟之道，融合一体，一气相承。这实在由于圣祖皇帝的仁德广及乾坤，功绩弘大地位崇高，开创了亘古没有过的伟大事业，超过了历史上上百个帝王而独盛，是上天所笃爱的肖子。所以圣祖心就等于天心，圣祖的仁德就等于天德，所以当今皇上实行的一切政治，承袭的典章制度，大都是以圣祖皇帝时实行的为基准。然而也只是学其精神实质，并不拘泥于具体做法。其中有的因为时代地点情况变化不同，也作了增删改动，其中应当更改的，则又没有一处不合乎圣祖的思想，秉承上天的心意，为百姓着想而加以改定。实际上就是继承了圣祖的遗志办事，与圣祖原意没有一点违反的。这正是皇上大孝纯正的表现，没有一处不显露出孝心。当圣祖皇帝驾崩之时，皇上哀号恸哭，尽到了一切礼仪制度，守孝三年如一日；接着又遇上孝恭仁皇后去世，皇上兼为守孝，没有一丝一毫松懈，悲伤怀念，时间越久就越深。在戒斋守孝居住的时候，凡是能想得到的孝思，治丧所颁发的圣旨上谕，以及谥号的商定，都符合万代的人心；祭天的同时配享圣祖的典礼，其隆重程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一切皇帝。皇上朝夕在先皇神像前观瞻拜谒，每当初一、十五都要前往祭祀行礼，遥望皇陵而致敬，观看寝宫而虔诚祝福，没有一时一刻失去哀思和敬意，更没有一件事不尽心信守丧礼。这虽然是一时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是父子天性所至，应当做的就去做，没想到的也会不知不觉地做了出来。本来这种孝道，并不要求百姓也仿效着去做，也不求上天看见皇上这样守孝而感动，但是天理

人情总归是一致的，家庭与国家也是息息相通的，这里有感那边就会响应而互相影响，上边实行的下边就会仿效。所以皇上没有一件事不是代表着上天树立榜样，为百姓作出示范准则的行动，其意义又何止只是对圣祖皇帝表示敬孝的虔诚而已。

【原文】 凡此皆亲被德化之后，身近天日之光，管见所及，百千万分之一耳。至于广大精神，浩浩肫肫，可以意想而不可以言尽者，不惟今日浅陋不得而知，抑人所不得而传。盖圣本不可知，而至德尤未易名言故也。此所以天人交孚。数年以来，休征并著，嘉瑞屡见，太和翔洽，民康物阜，四海同登乐利之域，万姓共享升平之福者，诚以我皇上道德既早与二帝三王合辙，而治效自当与虞、夏、商、周并隆无疑也。

静生长楚边，山野穷僻，足迹未到通都大邑，生平未接见一名人达士，加以稍长失怙，身处露孤，形单影只，胸次极狭，见闻极陋。不惟列祖相承之圣德神功，有所不知，并我朝得统之大者，亦所未闻，徒以迂固执方之见，而痼其好古不化之癖。早年从事举业，翻阅八股时文，读吕留良文评，妄喜其议论之爽快，而不察其气象之粗暴；贪其意见之间与己合，而不知其发言立论之甚者，实多与道义大相悖也。且平昔徒知其刊刻之多为有功，而不知其实欲多刻以为阴图射利之计。知其立言之高为有德，而不知其故为高论，以逞其欺世盗名之术。由不知而错好，由错好而误信。日甚一日，不觉为其说所浸淫者实深。

至近年以来，兼读其杂文残诗，甚有谓《春秋》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义。而今日有人实若无人，有世实若无世。以此为《纲目》凡例未发之蕴。始闻未尝不疑，迨久而不得不信。盖以其意借口于孔子之《春秋》，而例又窃附于朱子之《纲目》故也。因妄思君臣为人伦之首，本于天降，由于性生。人之思君如子之思父，天下未闻有父既失处，而于能晏然独安者。读书以明理为大，身忝士林，所干何事？又焉敢重计一己之死生利害，而委弃当身大义于不顾乎！加以我皇上圣德高远，初年洋溢未遭海内，

即早为奸党布散流言，传闻满耳。此时不觉狂悖蛊心，顿忘天地之大，恍若当身道义之迫，甚于水火。乃敢定志，遍导域中，冀得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以为生民之依。遂即其谣传诋谤之词，大肆悖妄，冒昧上书于陕西总督岳公。直至事发之会，执讯庭阶，犹坚持吕留良悖论在心，以为道理当然，死何足惜。且妄谓纲常名教，而得其正，尤读书为士者之所乐，就而不避者也。

殊意承问大人仰遵谕旨，早知穷陋无知，为谣言邪说所蛊惑，乃将逐条所诬一一剖示；及我朝得统事迹，反复详告；并宣皇上文德之大，励精图治，孜孜为民，忧勤不倦之苦心。伏听之下，恍然自失，如梦初醒。本若可信而无疑，然反覆细玩，所宣扬处实无往而非三王之极诣、二帝之盛德。数千年梦想不到之境，岂意今日而恭逢有此盛会，似又可疑而难信。未几，蒙恩特发圣谕一章，颁到长沙，剖析宣示，极尽详明，觉大德粹行，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而不容掩。较前所闻于大人者，蓄德蕴道，深弘广备，玩味更无穷尽焉。复自湖南以抵京城，一路所见，风清景和，文明灿烂，民康物阜，雍睦熙皞，不觉心醉神移，穆然远思三代，而旷怀唐虞矣。直至抵京，更伏读近年以来所颁示内外臣工圣谕若干卷，广大深渊，纯粹至精，盖自殷盘周诰以后，久矣未闻有此盛德至善，发挥透辟到此极处也。由是回思我皇上德量同天，以蝼蚁之微，冒犯九五之尊，自料万死不足以蔽辜。而我皇上竟埋然于衷，丝毫不怒。到京即超禁释囚，被以广厦，给以丰食，叠赐厚衣，暑悯其热，寒恤其冻。沛几多殊恩厚泽于千古仁惠之主，常法所不到之处。及至臬狱讯供，则又刑措不用，纯以至诚至德，感孚默化，使民不期格而格，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译文】 以上这几条，都是我亲身受皇上仁德教化以后，身近皇上受到天日的光辉照耀，得到的一些微小认识，这只是皇上伟大仁德中的百千万分之一罢了。至于皇上广大深奥的精神，浩大诚恳，是只能意会而不能用语表现出来的，不但以我今天浅陋的

认识不可能完全领会，就算是所有的人也难说得详尽。这是由于圣人思想的高深是一般人所难以知道的，而至高至尚的道德尤其是不容易用话形容的原因。由于这样才达到天意与人事交融结合的盛世。几年以来吉祥的征兆十分显著，祥瑞事物不断出现，阴阳调和，物阜民康，四海之内共登欢乐世界，万姓人民共享天下太平的福气，这实是因为我皇上在道德上早已和二帝三王一样伟大，而且治理国家和效果，自然也 and 虞、夏、商、周一样隆盛，这是毫无疑问的。

曾静生长在湖南的边境，处在荒僻贫穷的山区，足迹从来没有到过一个大城市，生平没有见过一个知名人士，加上我童年时稍长大一点，便失去父亲，成为孤儿，形单影只，胸怀狭隘，见闻极少。我不但对我朝列圣代代相承的圣德和神功，一点也不知晓，并且对我朝建立是光明正大的正统，也没有听过，所以迂腐而执有偏见，顽固地坚持食古不化的毛病。早年时我读书走科举的道路，在翻阅学习八股文的时候，看到了吕留良作的一些评语，错误地喜爱他议论的直爽，而不加注意他性情语气的粗暴；贪图他的意见有些和自己的想法一致，而不知道他论说的要害，实际上大都和道义相悖。而且平常只知道他出版了很多书因而名气很大，对读书人有功，却不知道他实际上是为了读书牟利。只知道他能著书立说，有高尚的道德学问，却不知道他是故作惊人，以此作为他欺世盗名的手段。由不知道其实质而至错误地爱好，由错误的爱好而至错误地信服其谬论，一天比一天加深，不知不觉的便被他的邪说影响到了很深的地步。

到近年来，我又读了他的一些杂文和部分诗作，其中很多地方提到《春秋》上说的中国有华夷的区分，从道义上讲这比君臣之义更为重大。而今天中国虽有人，却被他族统治，等于无人；虽有朝代政权，实际上也等于没有。并把这作为《通鉴纲目》凡例中没有揭露出的要旨。开始时我也曾经怀疑这种说法，时间久了，也就不能不信。因为他把他的意思借口出于孔子《春秋》的主旨，而凡例又偷附于朱熹的《通鉴纲目》的原因。因此我就错

误地认为君臣关系是人伦的第一项，这本是上天所固定，由人的本性所产生的。人的想念君主如同儿子思念父亲，天下没有听说过父亲流离失所，而儿子却能够独自安逸的。读书的首要目的在于明理，我身在读书人之列，所做的是什么呢？又怎么能计较个人的生死利害，而抛弃了读书人的切身大义于不顾呢！加上我皇上虽道德高远，但在刚刚登基时，英明的德政还没有在国内传颂开来，而我自己的双耳又早已被奸党散布的流言诽谤灌满了。这时我不觉受到蛊惑而使狂悖充满心中，顿时忘记了天地间应以君臣之义为第一大义，恍惚觉得自身受了道义的压迫，更甚于如救水火。这才决定志向，想要追寻全国，希望找到一个聪明睿智能担起君王道德的人，作百姓的依托。遂即用这些谣传诽谤的话，大肆狂悖编写成文，冒昧地写了书信上呈给陕西总督岳公。直到上书事发以后，我被捕审讯于官厅，还坚持吕留良所说的“华夷”之分的悖逆论点于心中，认为这是当然的道理，虽死也不算可惜。而且错误的认为能坚持纲常名教，而坚持正确观点，尤其是读书人引为快乐的事，应当坚持而不能逃避。

不料负责审问的大臣，遵照皇上的谕旨，早已知道我的浅陋无知，是被谣言邪说所蛊惑，就把我的认识一条一条地作了剖析；并把我朝统一中国的事迹，反复详尽地告诉了我；并说明皇上用礼乐教化百姓，励精图治，孜孜不倦地为百姓办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苦心。我跪听教训之下，恍然领悟自己的错误，真是如梦初醒。本来就觉得可信而不必怀疑，但细细玩味之后，更觉得其所宣扬的没有一处不合乎“三王”的最高境界和“二帝”的完美盛德。几千年来所梦想不到的境界，不料今天竟能遇到这样的盛世，因此好像又有点怀疑，恐怕不可能吧。不久，又蒙皇恩发下一道圣谕，颁发到长沙来，对我所迷惑的问题进行更剖析和讲解，极尽详明，使我觉得皇上盛大精纯的德行，真如同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是不能掩盖的。比较以前几位审问我的大人们所说的，更加蕴藏了高厚仁德和深邃的道理，精深弘大，无所不包，仔细玩味，更觉道理无穷无尽。以后又从湖南到京城来，一

路上所见的，到处一片风清气和的太平景象，文明灿烂，百姓安乐，物产丰隆，到处是一片和睦快乐气氛，不觉心醉神怡，肃然地想到三代的光景，和唐、虞盛世了。直到抵达京师以后，又跪读了近年来皇上颁发给内外臣下的圣谕若干卷，只觉内容博大渊深，论说纯正精粹，实在是自打殷商的盘庚到周朝的诏书圣谕之后，几千年来，久已没见到的盛德极善，发挥透彻精辟的极好诏书了。由此回想到我皇上仁德齐天，我曾静不过如同一个蚂蚁一样微小，却冒犯了皇上，自料虽死上一万次也难以弥补自己的罪行。不料我皇上竟然心怀坦荡，没有丝毫震怒。我一被押解到京，就解除了监禁，安排住进很大的屋子，供给丰厚的饮食，不断颁赐衣服，夏天怕我受热，冬天又怕我受冻，给了我很多特殊的恩泽，是千古仁惠的帝王和通常法律都没能达到过的。后来定案审讯，又没有用一点刑罚，纯粹用真诚的道德来感化我，使我没想到被感动却不知不觉地被感动，竟使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在不知不觉中懂得了道理。

【原文】 于是实信圣德光明浑全，毫无瑕累遗漏，前谣传所闻，不惟无其事，无其影，已不啻如天渊之悬隔，南北之反向也。加以一面翻阅吕留良家藏日记诸篇，其所以讥诋我朝者，皆是无端妄捏，立意毁诋，实非虚心论道理，见之言词也。乃知其立心既险，为术复巧，平日所说《春秋》诸义，关通于我朝者，不过借圣贤言语，以为题目，肆逞其无忌惮之私见耳。况《春秋》正义与今日不相干涉者，有寒暑昼夜三反哉。静思量到此，如坠渊深，觉天壤虽大，无处可容，抢地号呼，痛悔何及。自咎数十年读书辛苦，修身砥行，无非欲敦伦笃义，俾或出或处，随在有以尽己性分之常，期无忝于名教，以仰副朝廷作养之意，并得有以报我父母鞠育之恩耳。今一旦身陷巨恶，罪犯弥天，生圣人之世，竟不得为圣人顺则之民，何颜立于世，何面见乎人？此种罪孽，从何处造作，从何处收赎填补？以是不得不切齿忍恨于奸党之造谤，与逆说悖论之陷害生民者，非小小事也。

于是回审当身之义，前之所以孟浪上书者，为心中无知，惑于流言悖论，为当世求君起见。今我朝既如此得统之正，溯其功德，揆之道义，驾过商、周，汉、唐有不屑道。而我皇上又如此道全德备，超越千古。虽以孔孟之圣，处春秋战国之时，其所以汲汲皇皇，奔走不暇，欲引君当道，致之尧舜者，亦只为不忍生民之苦，求明圣之君以主治耳。而今日现有尧舜之主在上，实亘古未有之隆会，生民无疆之福庆。当其时者，即草木无知，犹被荣而向化，况身带血气者乎。所虑在静者，罪大恶极，虽有自悔自咎之诚，自怨自艾之行，剖心沥肝，亦惟恐后时不足补既往之阙，而仰希对鉴于万一。斯为可痛可悲耳、岂尚有旁说剩义，可以假借乎。

是今日之心说诚服者，正如赤子无知，被人欺隐其父；而寻父，寻父未几，而适遇父，遇父而相喜以从父。虽缘幸出于意外，梦想所不到，实乃当身之正义。与从前误听误信，冒昧遍寻域中，冀德聪明睿智，能尽其性之圣人，以为生民主之心，名违而实相合，原出一辙。特先迷而后得，昨非而今是耳。天经地义，本不容混。而德盛物化，尤不期然而然，至性至情所发，夫岂有所为而为之哉。

【译文】 于是才真正相信了皇上的仁德和光明完美，决没有丝毫的缺点和遗漏，以前所听到的谣言，不但没有其事，没有影子，而且与事实有天渊之别，如同南北的方向相反一样。加上又翻阅了吕留良家中收藏的他的日记多篇，才知道他所诋毁我朝的，全是无根据的捏造，蓄意攻击，并不是真心在讲道理，而写成文词的。这时才知道他不但用心险恶，又巧施诈术，平常他讲《春秋》的各种义理，所关连到我朝的，不过是他借圣贤的语言，作为幌子，而肆意无惮地发挥他个人的私意罢了。何况《春秋》中真实的义理和今天的情况毫不相同，有如寒与暑、昼与夜一样恰恰是相反的呢。我一想到这里，真感到如同坠入深渊一样，觉得天地虽大，我实在无可容身之地了，就是伏地呼号痛哭，后悔

忏罪也来不及了。自恨我几十年来辛苦读书，修养自身言行，无非是想作一个遵守伦常道德、忠实于礼义的人，以便将来或者出仕为官或者在家终身，都能够经常保持本性的善良，不致辱没于名教，不辜负朝廷养育之恩，并得以报答父母抚养的恩德罢了。如今一旦身犯大罪，罪恶弥天，我生长在圣人的时代，竟不能做一个圣人治理下的恭顺百姓，还有什么面目活在世上，还有什么脸去见人呢！我犯下的这种罪孽，是从什么地方引起的，又该从什么地方去赎罪和弥补呢？所以我不得不痛恨奸党的造谣诽谤和吕留良的道说悖论，它对百姓的祸害，真不是小事呀。

于回顾自己的思想，以前所以冒失地上书给岳总督，是因为心中无知，被流言迷惑，而产生了为当代寻求君王的想法。如今才知道我朝创业是如此正统，追究其功德，估量其道义，实在是超过了商、周，汉、唐则不在话下。而我皇上又是这样的道全德备，超越千古。虽然像孔子、孟子那样的圣人，处于春秋、战国的时代，他们所以急急忙忙，奔走于各国不停，原是打算引导各国君主，使他们走上尧舜之治，也是因为不忍心百姓受苦，才去寻求英明圣贤的君主来治理的。而我们今天，现有尧舜一样的君主在位，实在是自古以来没有的好时期，是百姓无边的幸福。当这种时代，即便是无知的草木，也会被感化得欣欣向荣，更何况是自身带血气的人类呢？所考虑的像我曾静这样的人，实在罪大恶极，虽然有自悔自责的诚心、自怨自艾的行动，可即使剖心沥肝，也惟恐不能够弥补以前的罪过，而仰面希望皇上明察于万一。这真是一件可痛可悲的事，难道还能用别的说法理论，来找借口为自己辩护吗？

所以今天我能够心悦诚服，正如同孩子被人欺骗不知道自己的父亲，而去寻找父亲；寻找父亲不久，在和父亲相遇，遇见父亲而高兴地随从父亲。虽然这件事是出于意外，梦想不到的，但实在是一个人当身的正义。和从前误听谣言，冒昧地遍寻国内，希望能得到一个英明睿智能尽其能力的圣人，作为百姓之主的想法相比，从外表看来是不同的，实际上这两种想法恰恰相符合，

如出一辙。只是先前迷失了方向而后来才走上了正路，昨天想的不对而今天才真正达到了愿望。天经地义的道理，是不能够泯灭的，而道德隆盛万物都要被感化，更是不以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至性至情所爆发出来的，岂是想做就能做到的吗！

【原文】 盖以我皇上道如此之全，德如此之备，不惟居中定治，处一统无外之下者所当服，即龙潜东海，未飞未跃，闻其声教，亦所当归当服。不惟今日宽仁不杀所当服；即按律治罪，置罪于极刑重典，亦所当悦当服。盖生死事轻，道义事重，若审之于义有所不可，静虽极愚不肖，又岂敢前既无知而犯莫大之罪，后复隐忍苟活以坏生民之大义，罪上加罪乎！故今日之倾心顺服，非是贪生，当身本无可据之义；皇上之宽仁不杀，实非废法，按罪实有可原之情。特以德非尧舜，则不能明照得情及此，即能明照得情及此，亦必不能大公无我至是。明照得情，圣也；大公无我，仁也。一举而仁圣并尽，此汉唐以后之贤君英主所万不能到，而必独让于唐虞三代之圣君哲后者也。况尚有几多盛世未开之令典，生民未有之殊恩，令民感戴无穷者乎！此静今日所以不徒于语言传闻间，信我皇上之大德同天，乃于当身经历中，亲见我皇上之圣，与尧与舜并参也。

夫为国以正名为先，名不正其弊至于礼乐不兴；为学以定义为大，义不定其弊至于进退无据。今我朝得统如此堂堂正正，历三千余年而莫有能媲，而列祖列圣之功德，并非汉唐以来之贤君所能拟。而读书向道之士，未闻有能出分毫气力，阐发其正大之名义，申明其广远之功德，使天下后世共见共闻，以报食德被功之大，而尽己当身之职分，斯已不能无愧于衷矣。而反含愤嫉忌，诋德若仇，造为悖论，诤张妄说，奴号以掩盖其实，而又甚焉。徒使穷乡晚进之士，胸无定见，但喜其议论之高险，而不审夫神圣之生，总无常域，遂将身为其说所眩迷而不知返。而山林清谨之士，无从考其底里，尤见道不真，择义不精，不知道之变易无方，义例所值，各有不同，一闻当前有此名义，则恐得罪

地当时，进又虑见恶于圣贤，徘徊歧路，进退两碍；久之不得不托为高蹈远引之行，以自放其轻世肆志之习，其害理悖义而得罪于天也，可胜道乎。

夫人同此耳目心思，非甚无良，断无有食德而不见为德，被功而竟忘其功，生于圣世而不愿为圣人之氓者。今种种悖谬若此，盖为名主莫明天心，趋向莫知所定之所致，推其极皆由吕留良之悖论在前，错认题目，有以起之也。静至愚不肖，信其说最深，受其祸极大，以是犯罪弥天。幸蒙天子仁圣，体恤民隐曲，谅无知，得留残喘，以苟延岁月。然惟其信之深，是以于此中曲折知之甚悉；抑惟其受祸大，故于此中利害，言之稍切。乃敢忘其固陋，详述夫本朝得统之正，直迈商、周；当今皇帝之德，上参尧、舜者，以遍告焉。

【译文】 因为我皇上的道德是如此地周全，仁爱如此地完备，不仅居于天下的中心而治理国家，使处于一统中华内的一切臣民都理当悦服，即使是龙潜东海，未登皇位之时，听到其声音教化的，也应当归心悦服。不仅今天对我宽仁不杀，应当悦服；即便按律治罪，处以极刑重典，也应当心悦诚服的。因为生死事轻，道义事重，如果认为有违于道义的，我曾静虽是极愚昧不肖，又岂敢因以前无知而犯下大罪，后又苟生偷活破坏人生的大义，罪上加罪吗？所以是今天倾心顺服，不是为了贪生，因为我本身根本没有什么可以依据的道义可言；皇上仁爱宽大而不杀我，实质上也并不是违背法律，按罪行来论，确实也有可以原谅的情况。如果皇上仁德不像尧舜那样，就不可能洞察这种情况，即便能洞察一切情况，也未必能大公无私到这种地步。洞察情况，是圣明的表现；大公无私，是仁德的表现。一下子做到仁德圣明兼尽，这是汉、唐以后历代贤明的君主所万万达不到的，而必定是唐、虞、三代的圣哲贤君才能够做到的。何况还有很多过去盛世所没见过的政令、制度，使百姓享受到过去从来没有享过的特殊恩惠，而让百姓感恩戴德无穷的呀！这就是我曾静今天之所以不仅

是靠语言传闻，信服我皇上的大德同天，乃是在自己亲身经历当中，亲眼见到我皇上的伟大圣明，真是和尧舜一的。

一个国家的建立，以正名为先，名如果不正，其弊病会陷入礼乐不兴；读书做学问，以立定义理为最要，义理若不稳定，其弊病会使人进退没有依据。如今我朝取得统治是这么堂堂正正，是历三千年来没有一个朝代可与之媲美的；而我朝几位先王先帝的功德，也是汉、唐以来的贤明君主所难以比得上的。而现在的读书做学问的那些人，也没有听说过有哪一个人能用出分毫的气力，来阐述我朝名义的正大，讲解我朝历史广远的功德，从而使天下和后世都能知道，以报答我朝养育的大恩，来尽自己本身的责任，这已经不能无愧于心了。却反而含着怨恨嫉忌，诋毁仁德像仇人一样，制造一些悖逆的言论，胡说骗人，喋喋不休地妄图掩盖事实真相，这就更加恶毒了。这只能让住在穷乡僻壤的后来读书人，心中失去了主见，只愿意其议论新奇惊人，而没去细想神圣人物的降生，总是没有固定地点的，于是使自身受他的邪说迷惑而不能回头猛省。而那些居住在山林中的清白谨慎的读书人，因为没法得知他的底细，尤其对天道认识不清，对义理体会不精，不懂得天道是不停变化没有一定规律，对义理事例所持的观点，各有不同，一听说当前有华夷之分的说法，就害怕得罪了当今的政府；进一步又担心违反华夷的说法又违反了圣贤理论，所以就徘徊不定，进退两难；只好假托清高，远远地隐居起来，以遂其不问世事纵情自乐的习性，这是有损于伦理和道义同时又得罪于天的事，这种人现在真是多得不可胜数。

人都同样长着耳目和心思，不是非常没有良心的人，决不能做出受到国家养活却看不到国家的恩惠，受到国家功德的荫庇却忘掉国家的功德，生在太平盛世却不愿做圣人的百姓这种事。现在种种荒谬错误如上所说的事，都是因为心中不明白我朝得统之正，而走向不知如何是好，追究其根源都是因为吕留良的谬论在前，而错认了源头，就盲目地跟着走了。我曾静是个愚昧不肖的人，相信他的说法最深，受他的毒害非常大，因此而犯下了弥天

大罪。幸好遇上了仁圣的天子，体恤到小民的隐情，从而原谅了我的无知，得以留下性命，以暂且度过岁月。但是正因为对吕留良的谬论信得最深，所以我对其中的曲折知道得也就更详细；也由于受其祸害最大，所以我对其谬论的利害关系，讲得也就比较切实。因此才敢忘掉自己的浅陋，详细地讲述了本朝得统之正，可以比美商、周；当今皇帝的仁德，真是可与尧、舜并列，用以遍告一切人。

【原文】 伏望沉潜向学之士，去井蛙习见，相观于昭旷之途。知覆载之大，原无畛域，神圣之钟，气流愈远。天亲民怀，亦只以其德其仁，而初无额定九州之例，则中外之谔释然矣。放勋重华，绍麻尚分二代；文漠武烈，盛德仅推二君。而我朝极帝王之隆，兼积累作述之全，则治统道统之归，晓然矣。尧舜生安而在上，孔子以生安而益加好古敏求于下，功在一世，万世不相兼也；而皇上以尧舜之君道，复备孔子之师道，而天纵神奇，丝纶直匹之典，则心悦诚服之戴，沛然矣。猗欤盛哉！麒麟凤凰，犹欲先观为快，奇珍大贝，尚冀一见为荣。今圣仁天子在上，应非常之运，具非常之才德，成非常之勋华。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而犹以中外为疑，是天地本至大无外，而人自以为有外。正如尧舜之治，不过九州，则人遂以为九州之外，不复有九州，而并疑邹衍所论为荒唐也，岂不悖哉。昔益之赞尧也，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说者以为惟其广运，是以变化莫测，而形容之不尽。窃尝谓皇上之圣神文武，由于仁孝敬之至，而仁与孝敬之至，又本于一诚之至，是以克合天地之量，克符天地之运，而无有远迩内外之间，为一无以内，对神文武之极谊也。孟子曰：“至诚不动者，未之有。”《书》曰：“百兽率舞。”《易》曰“信及豚鱼。”今上有至诚，而下不以诚应，是殆鸟兽昆虫之不若也。乌乎忍，乌处敢！

今而后凡为臣民者，益悟覆载之无有限隔，对人之诞生，无有中外。君臣之大伦，必不可逃，毛土之深恩，决不可背。《春

秋》义例，因时审地，天悬地隔。而吕留良之逆说，必当芟除。今日之正义，永有攸归矣。人人脰悦服爱戴之忧，在在守孝子忠臣之分，各有重夫人伦，以全其天理之大公，复多所性之固有。常以静之至愚不肖，误听误惑力戒。四海同化，九州一德，各安有道之天，长享元疆之福，斯不枉为圣世之民，而为生人之大幸耳。是为说。

【译文】 我希望氛民间家居读书做学问的人，都去掉坐井观天的成见，放眼于光明远大的世界。要知道天地之大，原本不分界限，神圣所钟爱的灵气，越大则流动得越远。上天眷爱百姓怀念的圣人，也只是由于他崇高的仁德，而起初并没有规定圣人只能产生于中原九州的成例，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么就不会被把中国分为中外、华夷的说法所蛊惑了。唐尧和虞舜，继承帝位还分为二代；文王的谋略和武王的武功，隆盛的功德首推这二个君王。而我朝则达到了帝王功业的极点，并兼有积累著述的齐全，那么我朝在政治和道德的继承上的正统地位，便可一目了然了。尧舜为了百姓的安乐而身居帝位，孔子为了百姓的安乐而更加好古和勤于下层，二者都功在一世，是万代也不能够兼有的。而当今皇上既具有尧舜的君道，又具备孔子的师道，上天赋予他圣明睿智，治国功勋可以与尧舜匹敌，那么心悦诚服地拥戴这样圣明的君王，理由还不够充沛吗。啊，真是盛大啊！麒麟凤凰，都想要先看到为快，奇珍异宝，都盼望能一见为荣。当今有仁圣的天子在上，顺应非常的好运，而且有非常的才德，以成就非常的功勋。日月所照的地方，霜露所降的地方，凡是有血气的人，没有不对皇上尊敬亲近，但还有人因为地分中外来怀疑，其实天地本来是极广大的，并不存在什么外，只是人心中产生了中外的想法才有外。正如尧舜时的统治，不过只有九州地方，而人就以为九州以外，就不再有九州中华之地，而且怀疑战国时邹衍的说法是荒唐的，这是十分错误的呀！上古时候伯益称赞帝尧，说尧“乃圣乃神，乃文乃武”。评论这话的人认为尧因帝远广大，因而变

化莫测，圣德是形容不尽的。我认为皇上的圣神文武，根本在于仁孝诚敬之极，而仁和孝敬达到极点，其根本又在于一个“诚”字达到了极点，所以能够符合天地之量，也能够符合天地之运，所以不分远近内外之间都统一在一元之内，达到了圣神文武的极点。孟子曾说过：“不能被至诚感动的，是没有的。”《书经》上说：“百兽也跳舞歌颂太平。”《易经》上说：“猪鱼也懂得诚信。”当今皇上有至诚的心，而下面臣民不用诚信来响应，这样真是连鸟兽昆虫都不如了。这种事能容忍吗，哪里敢！

从今以后，凡是作为臣民的，都应该更加明白天地之大是没有界限的，圣人的诞生，不分中外。君臣的大伦，是绝对不能够逃避；食毛践土的深恩，绝对不可以忘掉。《春秋》中所讲的义理和例子，是由当时人状况决定的，和今天的情况已是天地悬殊大不相同了。而吕留良的逆说，必须铲除。今天的正义，才能够永远深入人心。人人都要献出悦服爱戴的热忱，处处守孝子忠臣的本分。各自尊重人伦的道德，以求保全天理的大公，恢复我所固有的人性。经常以我曾静的愚昧不肖，误听误信为戒。四海同风，九州一德，从各自安居于有道的盛世，长享无边的幸福，这才不枉为一个圣人时代的百姓，而是人生的一大幸运。本文就说这些。